

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

[俄] 库罗帕特金著



3 商务印书馆

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

〔俄〕库罗帕特金 著

〔英〕A. B. 林赛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80年·北京

**THE RUSSIAN ARMY AND
THE JAPANESE WAR**

By

General Kuropatkin

Translated by

Captain A. B. Lindsay

Edited by

Major E. D. Swinton

London

John Murray, Albemarle Street, W.

1909

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

[俄] 库罗帕特金 著

[英] A. B. 林赛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0 1/4 印张 251 千字

1980 年 6 月第 1 版 198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6,300 册

统一书号: 11017·476 定价: 1.00 元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库罗帕特金生于1845年。他在军事学院毕业后，一直在俄国军队中工作，担任过各种军职，自1898年起担任俄国陆军大臣。1904年2月，被任命为俄国在满洲军队的总司令，指挥俄军对日本军队作战。由于俄军屡次战败，总司令之职于1905年3月被利涅维奇所接替，他改任满洲第一军军长。战争结束后，返回俄国，退隐于普斯科夫省乡间别墅。

本书是作者在战事停止后逗留满洲期间和后来在乡间别墅里写成的，脱稿于1906年11月。原书名为：《库罗帕特金将军关于俄日战争的札记》，全书分为四卷：第一卷，《辽阳战役》；第二卷，《沙河战役》；第三卷，《奉天战役》；第四卷，《战争总结》。第一、二卷为作者的幕僚在作者指导下写成，第三、四卷则为作者自己执笔。

第四卷共分十二章，其内容大致有下列几部分：第一部分叙述在十八、十九世纪中俄国军队的状况与俄国陆军部面临的问题和工作，第二部分说明作者对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意见，第三部分总结日本之所以战胜和俄国之所以战败的原因，第四部分为改进俄国军队的建议，第五部分为战争总结。

本书给予读者最深的印象是贯穿全书的为自己辩护的语气，作者为俄国战败列举了种种原因，并且不胜惋惜地指出，在俄国胜利在望的时刻，过早地讲和了。不过在辩护当中也暴露出俄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和矛盾，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作者是站在反动的俄帝国主义的立场，是拥护俄帝的扩张政策的，他对于俄国在

十八、十九世纪中向各方面扩张，抱着十分赞赏的态度，他虽然主张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不赞成向南满推进，但仍然主张牢牢地控制北满，而且极力反对将伊犁地区退还给中国。此外，作者在第十二章中还提出反动的“黄祸”论，对中国人民进行诬蔑，妄图挑动列强敌视中国人民。所有这些反动观点，希读者注意批判。

这四卷书中，仅第四卷有英译本，英译者为林赛，编者为斯温顿，于1909年4月在伦敦出版。英译者将书名改为《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除第四卷原有的十二章外，又将第三卷的绪言和结语译出，作为第十三章，另外又增添了两个附录，《附录一》为《皇家木材公司》，原载《麦克卢尔》杂志，系这类报告文章的评论；《附录二》为《部队编制的打乱与部队分布》（这附录原为本书第十章的一部分，十分详细地叙述了打乱部队编制的情况，英译者将这部分从第十章中抽出，附于书末，作为《附录二》）。

中译本系根据英译本译出，为节省篇幅起见，将英译者增添的第十三章和两个附录删去未译。中译本中的脚注，未加注明的为作者库罗帕特金所加的注，注明为“编者”的为英译本编者斯温顿的注，注明为“译者”的为中译本译者的注。原书中提到的地名，有一部分难以查到中文地名，只好照音译出，并在译名后注明。译文旁的边码和索引中的页数，均系英译本的页码，供检索用。

本书译者：吕浦、林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

79年9月

英译本译者前言

“这不仅是俄国人的意见，而且也是全世界职业军人的意见：库罗帕特金将军比任何其他俄国军官享有更高声誉，如果有任何人的力量能为俄国挽回那悲惨的局面，那也许就只有库罗帕特金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了。”^①《泰晤士报》军事通讯记者于1904年2月写的这句话，很好地表达了当宣布任命库罗帕特金将军统率俄国在满洲的军队时绝大多数人的意见。

“或许可以说：一位军事天才可能会克服我们不得不遇到的士气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种种困难。可能是这样。但是一位阿列克谢耶夫，一位库罗帕特金，一位利涅维奇，一位格里彭伯格，一位考尔巴斯和一位比尔德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②这是库罗帕特金将军本人在两年以后向沙皇报告时使用的语句。

虽然这两段引文扼要说明了本书的倾向和存在的理由，但它们决不能为本书的范围提供完全的说明。如果本书只不过是一种辩白，那末不管作者以前的声望和地位有多高，此书也不能免除为人所轻视，这种轻视是失败者自我解脱必然会遭到的。但是本书不仅仅是辩白。因为，书中除了失望语气外，除了贯穿全书的占支配地位的失败的色采，以及几乎在每一页上都重复提出的种种解释和理由外，这部著作是一种继续不断的反对意见。全书从头到尾反对意见如下：这次战争没有战斗到底（就俄国来说）；这次战争过早地结束了；当俄国胜利在握，俄国兵力达到最高峰，而敌人兵

① 《泰晤士报》军事通讯记者约翰·默里：《远东的战争，1904—1905》。

② 原书第II卷，第68页。

力已开始衰落的时刻,宣布讲和了。不管这种观点是否正确,都不应该把它认为一个失败者的自然呼声而不加以考虑就表示不同意。这部书提供了思考的材料,此外,本书还包含许多迄今一直不清楚的材料:即关于俄国陆军部的态度、陆军部为防止战争所作的努力、陆军部的一般政策和其他事情等等。

作者力图以列举种种事实,并同俄国两个多世纪的军事史相对比的方法,来证明他的反对意见是正确的。他是否证明了他的说法,须由读者去判断。就算是这样,由于本书是俄国方面一位最有资格说明那场震动世界的最大的国际斗争(这场斗争是在一个世纪的三分之一多的时间里发生的)的原因和过程的人的真实意见,本书应当受到读者的注意。本书也具有情感上的兴趣,因为这是一位曾在俄国军队长期服役并有过功勋的人物,他在担任他的那专业中最高职位以后,失败了,名誉扫地,退隐到穷乡僻壤。他是否会在公共生活中重新出现,不得而知;但是当人们想起他为俄国建立的卓越功勋,并且认识到在这次战争中他必须与之作斗争的若干巨大困难,要抑制对他的同情,是不可能的。

阿列克塞·尼古拉耶维奇·库罗帕特金是一个俄国地方官员的儿子,生于1845年3月17日。他在学生军训队和巴夫洛夫斯克军事学校受教育后,于十八岁时被任命为土耳其斯坦第一来福枪营的陆军中尉,他和来福枪营的人一起看到了中亚细亚现役军队的情况。他以出色的成绩在参谋学院毕业,并获得上尉的军阶,于1874年随同一支法国远征军进入撒哈拉沙漠。1876年,他参加那一年的中亚战役,作为斯科别列夫的参谋,赢得很多荣誉,并且受了伤。在1877—1878年的土耳其战争中,他担任参谋长,并且再次受伤。在1880—1881年的阿哈勒·特赫远征中,他指挥土耳其斯坦来福枪旅,在袭击格奥克-泰佩的战斗中,两次负伤,再一次出了名。从1883年至1890年,他是总参谋部主管战略

问题的将军。1890年，他晋升为中将，从1890年至1898年，他作为外里海军区的司令官，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1898年，他被任命为陆军大臣，担任此职直至1904年2月20日，这时他被任命为满洲野战军总司令（他于1900年已晋升为步兵上将）。1904年3月27日，他抵达辽阳就职。在几次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俄国人都几乎都被打败）以后，1905年3月，他的总司令之职被利涅维奇将军所接替。此后他处于下级地位继续供职，指挥第一军，直至战争结束。在和约缔结以后，他留在满洲监督俄国军队的复员工作，这项任务完成后，返回俄国乡间别墅，从此一直在这里过着退隐的生活。他是在战事停止后，逗留满洲期间和稍后在乡间别墅里，在他的《作者绪言》里向之致谢的几位助手帮助之下，写这部书的。当这部书刚刚出现时，在俄国就立即被禁止发行。据信这本英译本中的题材，从未在俄国印行过。在原著的四卷书中，只有第四卷被译成英语，现将这一卷的译本奉献给英国公众。 ix

在作者提供给我们的许多事实中，有些事实需要加以特殊说明。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这个事实：虽然库罗帕特金将军是一支在战场上从事激烈交战的军队的总司令，但是在一个长时期内他却不是最高指挥官。的确，从他到达辽阳之日起，直至1904年10月25日止，他被任命为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助手（异体字是我们加的），而总督的总部设在哈尔滨，因此他是处于一位实际上不在前线的军官之下。非常奇怪的是，库罗帕特金将军对这个问题说得很少。他只不过指出，在这次战争中，他只有四个半月——在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离去和他自己被利涅维奇将军所接替之间的期间里——是真正地处于最高指挥官的地位，顺便又提到总督的各种行动和命令，这些行动和命令迫使他违背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这种控制对于指挥作战一定已经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是用不着强调的。试图对俄国的战略或指挥作战——不论是 x

库罗帕特金将军还是其他人指挥——进行批判或辩护，不在本前言的范围以内，但是这样一种有缺陷的指挥系统可以说明许多迄今似乎难以解释的问题。其他突出的问题是：俄国的完全没有准备；导致它进入战争（尽管处于这种无准备状态）的种种原因；日本由于掌握了制海权而取得压倒的优势；旅顺要塞对于俄国的战略起了掣肘的作用；以及担心西部边界发生纠纷，这种担心迫使它把最好的军队留在欧洲。它的效率差的铁路交通对于它的兵力的障碍作用是明显的，不过它的障碍作用还不如在战争过程中要实现对铁路的巨大改进那样显著。

在作者的意见中，他的同胞最感兴趣的或许是我们已经提到过的那个意见，即：对俄国来说，这次战争是过早地结束了。不过，对我们英国人来说，他对于与“军队”战争相对立的“国民”战争的高度评价是有教益的，而俄国陆军部在详细估计俄国在二十世纪可能付出的代价方面所表现的深谋远虑和谨慎小心的精神，是有启发的，因为，谁曾估计过英帝国在以后的一百年中从事扩张或维持现状可能要流多少鲜血和耗费多少财富？他对于俄国在阿富汗和波斯边界所采取的正确政策以及一般地对于英国在印度和中东所采取的正确政策所表示的意见，肯定也是重要的。

最后一点，也是为库罗帕特金将军增光不少的一点是：他能够服从他曾经一度领导过的人。他在曾经担任过最高司令官以后，满足于接受一个下级的职位，尽他的职责，而不是在战争结束以前就回到俄国去。在这部著作中找不到他对于被人接替有发牢骚的话，也看不到对于皇上对他的处置有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怨言，这是令人高兴和感兴趣的。

这本译本是这部著作第四卷的精确翻译。对于原著所采取的唯一的不拘泥的处理方法是把某些经常的重复——关于这一点，作者是过去的大师——以及某些长的人名名单和地名名单的段落

删去不译。在译本中仍然有许多重复的地方，但是这些地方被保留下来，以便英译本可以尽可能地接近于原著的形式。由于翻译大部分不得不根据一本模糊的打字复写本进行，工作是有相当大的困难的。在文体和安排方面的许多缺点或许能以下面的事实来解释：原著的印行，显然未经作者校订改正。此外，没有作者提到的地图（假如确实有这种地图的话）可资利用，大大增加了这本译本制图的困难。由于俄语对满洲地名的音译方法同英、法、德或日语的音译方法颇有不同，如无大比例尺的俄国地图，要确定书中提到的每一个村庄或地方，是不可能的。现将已经确定的地名，在译本中所附地图上标注出来。译本中所有的地名，不管已否确定，都尽可能地按照“威妥玛音译法”^①译出。我们应用这种方法，是希望当有较好的英国地图可资利用时，目前不能确定的某些地方可以在地图上找出它的位置。译本里的一幅大地图是按照《俄日战争正史》第二卷中的地图翻印的，这幅地图的使用已得到文书局审计长的允许。译本中并附有一份各次最重要的战斗的英俄地名对照表。

为了说明原著中提到的关于俄国军队和军区动员的某些情况，在这里简短地说明俄国在1904年实行的动员制度，可能并不是不适当的。俄国实行普遍兵役法已有多年，当对日战争爆发时，新兵从二十岁起被征入伍，服二十三年的兵役，其中五年是在正规军中服役，十三年在预备役中服役，五年在民兵中服役。在预备役中服役的时期分为二“类”。第一类包括最近转入预备役的士兵，第二类则是年龄较大的士兵。如果发布“全面”动员令，所有军区的第一类预备役士兵首先被征重新入伍。不过，假如实行“局部”动员，那就按照军区来动员，而不是按照类别来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军区的第一和第二类预备役士兵都被征召。在对日战争

^① 即帝国国防委员会历史组现正发行的《俄日战争正史》所采用的音译法。

中,实行了“局部”动员的制度。由于本书中解释的种种原因,俄国当局对于实行全面动员的制度,颇为踌躇,因为这样就将把俄国欧洲部分的第一类预备役士兵全部剥夺掉。因此他们实行了局部动员,征召的大部分是年龄较大的士兵。这项措施的不幸结果,库罗帕特金将军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此外,关于从俄国欧洲部分派出的军队,对于“援军”和“分遣队”必须加以区别。前者是用来表示派往前线的建成了编制的部队;后者是用来表示在需要时派往前线以补充消耗的成群的士兵。

A. B. 林 赛

E. D. 斯温顿

于伦敦

1909年3月1日

作者绪言

xv

我这部书的前三卷，记载了这次战争的三次主要战役——辽阳战役、沙河战役和奉天战役。虽然编写所依据的是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情报资料，但对于这样一部书来说，不准确之处还是难免的；因为对于日本人的所作所为，我们不仅了解极为有限，而且消息来源也是非官方的。再者，在编写这几卷的时候，来自我们自己各个军团和军的报告，可资利用的也为数很少，我们能够得到的都是一些梗概。一般说来，最完整的情报资料来自团队的报告，我们几乎完全依靠的就是这些；但即使这些报告也是很不完全的。指挥官们自然都有自己喜爱的部队，因而同一个师或军团的下属部队的事，在各自所作的叙述中，记载就很不相同。因此我们就着重于作战、部署和进军的书面命令，以及伤亡表册和消耗弹药统计表这样一些文件。消耗弹药统计表不经仔细检查也不能使用，因为行军中的弹药损失是经常包括在发射总数中的。然而，尽管情报资料来源有着公认的不完整和片面性，前三卷所叙述的事实还是提供了充分的材料，可据以估量我国军队的士气、战术原则和装备——简言之，据以判断我国军队战争准备的状况。 xvi

关于辽阳战役的叙述是总参谋部的伊林斯基上校在满洲写的，那时他是我的参谋，1904年11月被送回圣彼得堡总部。他写成后，由我在材料上加以补充，就成为第一卷。第二卷，《沙河战役》，是在我的指导下由总参谋部的鲍霍维丁诺夫上校在满洲写成的。第三卷《奉天战役》和第四卷《战争的总结》是我自己写的，前者是在满洲，后者是在我的乡间别墅。资料的收集，统计材料的汇

编,以及第三卷的大部分制图工作,应当感谢总参谋部的塞维尔斯上校和哈夫雷里茨中校,而第四卷的这类工作则由他们同一部门的克里莫夫中校担任。没有这些军官干练的工作和不懈的努力,这部包括图版、地图和图表在内的两千页的书的完成和付印,就要拖延若干年。

我们国家和军队在1904—1905年所经历的严峻的战争考验虽然如今已成为历史事实,但迄今为止所收集的资料还不足以使我们能够公正地估价战前的各种事件,或者对我们所蒙受的失败作出详尽而圆满的解释。然而直接利用我们最近的经验却是重要的,因为只有弄清我们的错误和我们军队弱点的性质,我们才能知道如何改进。

在过去,战争是由少数常备军进行的,战争的失败对于全体国民日常利益的触动并不象现在那样深刻,现在服兵役已成为普遍义务,大部分士兵都是从广大人民中征召来的。现今如果要打赢一场战争,就必须不仅是由一支军队进行战争,而是由一个武装的国家来进行战争。在这样的斗争中,所有各阶级都受到严重影响,人们对于失败比以前更敏锐地感觉到了。当民族自尊心因战争失败而受到屈辱时,通常都要试图弄清失败的原因和承担责任的人,有的人把失败归咎于一般的原因,有的归咎于特殊原因;有的人谴责国家制度或政体,有的谴责个别人。抱着不满情绪的政治派别立即利用国家的灾难作为武器反对政府。敌视俄国政府的政党也是这样,他们不仅在战后极力诋毁政府,而且在作战实际过程中也是如此——这对我军是很不利的。这种政党确实乐意看到我们遭受失败,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就有希望败坏政府的威望,从而实现一场革命。他们的格言是,“事情越坏——就越好。”在开往前线的部队中——特别来自我国西部的部队中,他们散发了几十万份宣言,怂恿士兵们打败仗,而不要打胜仗。在俄国,有许多报刊,虽不

是上述政党的机关报，实质上却是以谩骂我军和我国政府为这种政党获得成功出力。此外，还有许多前线的通讯记者，关于我军的作战并未得到确切的消息，关于敌军的作战更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却毫不犹豫地发出以完全不可靠的情报为根据的报道，并对我军所遭受的每一个挫折的重要性加以夸张，这样就更加动摇了公众的信心。许多军官也从战场上写信回家^①，以轻率的批评、不正确的叙述和以悲观的论调讨论各种事件，来显示他们的聪明。而在实际战争前线真正发生的事情——许多英雄好几个月来与敌人面对面地奋战从没有丧失最后胜利的信念，还继续战斗下去，他们的业绩却写得很少。英勇的士兵、谦逊的青年军官、连队的、骑兵连的、炮兵中队的和团的指挥官们没有写什么东西——他们没有余暇来滥写自己的艰苦与功绩，而新闻记者又很少有人愿意亲眼目睹他们的英雄事业，因为这就要和他们同甘共苦，分担他们的危险。 xix

当然，通讯记者中也不乏勇敢之士和真正要想对战争助一臂之力的人，然而既然他们那样缺乏最基本的军事知识，他们所作的有关复杂作战情况的报道价值不大，也就毫不奇怪了。真正最有能力对他们观察到的情况作出判断并把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世的，是外国的武官。他们中的许多人从各种意义上讲都是优秀之士。他们对我们的士兵有兴趣，分担他们的一切危险与艰苦，而作为报 xx 答，也就赢得了士兵的爱戴与尊敬。但是他们的报道在俄国长时间内连一篇也看不到，而我们许多报纸通讯记者呆在后方，只看到与战争唱反调的材料，却只喜欢写令人痛心的哈尔滨狂欢宴会和闲游浪荡的故事，并把完全歪曲了的我军生活实况提供给公众。其结果，是我们的报纸进行了大大有利我们国内外敌人的活动；与此相反，它们本来可以利用我军首战失利的消息掀起爱国主义与自我牺牲的浪潮，而且，当着前线困难日益加深的时候，呼吁祖国

① 那些一回到俄国就动手写作的人，其动机也不是完全无可怀疑的。

奋起作出新的努力，激励懦怯者，并召唤全国健儿去补充对敌斗争中减员的部队。而它们所完成的，却是向群众灌输对战争的仇恨，使那些开赴前线的人精神沮丧，破坏士兵对军官的信任，削弱指挥官的权威。老实说，军队在克服困难，赢得胜利方面，是得不到什么鼓励的。相反的，从俄国送往前线的部队，却随身携带着煽动性的宣言，孕育着新灾害的种子。

xxi 以最近战争为题材的涉及各方面问题的有价值的作品已经大量涌现出来了，这些作品很多是抱着对军队主持公道的真诚愿望写作的；但由于对真实情况的无知，其中包含着很多的甚至是严重的错误，现在，激忿的情绪正在冷静下来，因此有可能把战争过程中及战后针对我国军队及其代表人物的责难分门别类地罗列出来。这些责难，涉及陆军部的，主要有如下数端：

军队对于对日战争没有准备。

陆军部对战争的准备采取的措施既不充分，又没有试图阻止战争。

军队的领导人在战争过程中没有很好利用归他们使用的人员和物资。

在这部书的第四卷中，我将尽力对这些责难断然予以反驳，并着重指出通过这次战役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作为将来行动的指导。

xxii 一个象我们这样的帝国的陆军部，工作不应当是没有计划性的。它的成功一定取决于分配给军事需要的经费总额和对这些款项的使用方法。国家对军队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结果使其他许多紧急需要的项目大为匮乏，一场失败了的战争很自然地导致这样的结论：这些经费都白白抛弃了。但在作出任何判断之前，需要充分掌握必须担负的任务和可以使用的财政手段的详细情况。我们的陆军部所面临的那些问题，是它以往多年奉行的政策的必然结果。这些问题可以说就是十九世纪遗留给二十世纪的遗产。一个

国家军队规模的大小和军费的多少必须与这个国家的成长壮大及其邻国的军事活动成正比例,这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如果我们要想对帝国的安全感到放心的话。对我们来说,我国尚处于比较不成熟的文明状态,欧洲的军备无限增长,使我们必须维持武装和平,这种沉重负担看来几乎是不堪忍受的,我们可用的资金也不足以应付一切军事上新添的和经常的财政需要,而只能满足最紧急的任务。在诸如重新装备炮兵、建设要塞和兵营、积累各种军用物资以及改善部队状况等等这些事项中,决定哪个是最重要的,对陆军部来说已是够复杂够困难的;但是对于较为重大问题的决定,如哪处边境最有遭受攻击的危险,或者我国扩张政策要求在何处采取另一个前进步骤,那就不是陆军部力所能及的了。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总的政治计划,而它又是帝国几世纪来所遵循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帝国国内状况和需要的结果。 xxiii

1898年1月1日,在我接任陆军大臣时,我发现许多计划实际上正在进行中,其他许多已经制定的和列为紧迫项目的计划要执行经费尚无着落。多亏我的前任的精明才干和旺盛精力,军队与以往年代相比,已处于高效能的状态,这样我就感到自己在制定下一个五年工作计划时处于有利的地位^①。然而正如已经阐明的那样,陆军部的政策与内政部、财政部和外交部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前任陆军大臣和他的同事们在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上曾经有过意见分歧。由于陆军部与海军部之间没有一个协同一致的计划,我不得不在开始任职的头两年拟制一个周密的指导性的说明书。在这个说明书中,我探讨并总结了俄国的军事成就,以及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放在它面前的任务,说明哪些已经完成,哪些是留待二十世纪完成的,并指出国家为取得这一成就所作出的牺牲。我检查了我国的各个边境的情况,指出了可能作为战场的各个不同地 xxiv

① 财政部为陆军部所拨的经费,不是每年分配一次,而是五年一次。

区作战时需要的军队数目和编制，并估计了我们最为可能的敌手的进攻力量。在这样得出了关于下一个世纪一定会面临的任务的某些逻辑结论之后，尚待提出些明确的建议，在军队作战的组织上作些必要的改进。

我的工作得到了参谋学院的帮助：米什莱夫斯基上校在历史方面，佐罗塔列夫少将在军事统计方面，古列维奇上校在后方勤务方面给予帮助。战略方面的材料是由总参谋部提供的。这一分析纲要于1900年春季完成并奏呈沙皇，少数几份——删去了秘密战略方面的材料——经他批准分送给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内务大臣、xxv国家主计长和几个特选的官员。1898年至1902年期间的计划是我依据这个说明书得出的结论制定的。1903年，一个关于陆军部前五年期间一切已完成工作的总报告印制出来并奏呈沙皇。这一文件说明了可资利用的资金，已完成的全部必需的工作，以及那些因经费不足而未进行的工作。同一年晚些时候，一项1904年至1908年期间的工作计划奏呈沙皇并得到批准。因此，在战争前的十二个月，工作是按照严格规定的计划进行的，达到的结果可以根据印制的工作记录来判断。同样，我们在陆军部，在编制未来计划时，不得不求助于过去的教训，所以为了恰当地说明1898—1904年所完成的工作，在这部著作中，必须提到这一时期的计划所依据的结论。

这部书的第四卷即最后一卷共有十二章。最初几章中包括我于1900年所作的分析纲要和我于1903年所作的关于陆军部1898—1902年五年期间工作报告的某些必要摘录，当然，机密材料是删去了。最后几章依据的是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文件、我的日记和报刊上的文章。

我与远东的重要事件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而且对于我军作战的失败负有如此重大的责任，所以在这部书中涉及到有关

的人和事时,很难希望我采取完全冷静和客观的观点;但是我的目的与其说是以回答对我个人的责难来为自己辩解,不如说是提供材料,以便未来的历史学家易于公正地说明我们失败的原因,从而使我们将来得以避免类似的不幸。

本书使用的
度量衡及货币对照表^①

1 俄里	= 500 俄丈 = $\frac{2}{3}$ 英里
1 俄丈	= 7 英尺
1 平方俄丈	= 49 平方英尺
1 普特	= 36.11 常衡磅
1 卢布	= 2 先令
1 日元	= 2 先令

① 本表均系按当时的标准。——译者

目 录

第 一 章	1
过去两世纪俄国陆军部所面临问题的历史概述	
第 二 章	23
俄国的欧洲边界与亚洲边界——关于边界适合帝国需要的结论	
第 三 章	47
我国军队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在数量方面的扩充,平时编制 与战时编制的适应情况,以及邻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状况—— 在将近上世纪末时我国防御问题日益增加的复杂性	
第 四 章	57
由过去二百年军队工作中引出的推论,它对二十世纪初我国 军事政策所应采取的方针有某些指导作用	
第 五 章	66
上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期陆军部所面临的任務——1898年 至1903年分配给它的经费——这些经费不敷需要——可能 采取的措施——为改进和巩固我国在远东的地位所采取的 步骤	
第 六 章	84
1900年至1903年陆军大臣关于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意 见——为避免与日本决裂他做了些什么	
第 七 章	114
日本胜利的原因	
第 八 章	131
我们失败的原因:舰队所起的作用不大——西伯利亚铁路和	

中东铁路运载量甚小——缺少允许我军不受阻碍地派遣和配置兵力的外交上的布置——援兵动员的拖延——“局部动员”的不利之处——战争期间俄国在欧洲的军区的正规军转入预备役——分遣队迟迟不到达前线——指挥官惩罚士兵权力的削弱——对有军功者晋级的迟延——技术上的缺陷

第九章175

我们失败的原因(续): 我们军队战术准备之不足——采取的改进办法

第十章193

我们失败的原因(结论): 战略形势的特殊困难——在编制和人员方面的缺点——在军队中缺乏尚武精神,和缺乏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打乱我们部队的编制

第十一章239

为改善高级军官、为改善正规兵和预备役士兵、为改编后备部队、为在步兵团中增加战斗员的人数而建议采取的措施——机关枪——后备部队——保卫交通线的部队——工兵——炮兵——骑兵——步兵——一般的编制

第十二章287

战争总结

索引305

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

i.1

战争的总结

第一章

过去两世纪俄国陆军部所面临问题的历史概述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我国武装部队所完成的主要工作是我们帝国向北方、西方和南方扩张所必须的为到达波罗的海和黑海海岸的斗争。二十世纪初，我国军队也还是与海洋打交道，因为在最近的对日战争的前几年——不过是在日本战败中国之后——我们占领了满洲，先头部队推进到了关东半岛，并继续前进直到太平洋海岸。在战争期间，我们必须在保持自 1897 年以来就已取得的阵地的同时，击退日本的进攻。结果我们丧失了关东和南满，并在 i.2 在远东被驱逐回来，造成了我们现在大陆上与占领了朝鲜、关东和南满的日本直接接触。这对俄国不仅仅是一件意外的事情，而已经是一场灾难。但是既然最初爆发的很自然的忧伤情绪已经平息，就有可能按迹寻踪，追究造成我军军事灾祸的各种原因，注意其中最重要的，并评价报刊上许多过于匆忙评论军事事件的批评意见的真正价值。导致战争的一系列情况是复杂的，随之而来的军事行动是错综纷纭的，这就要求人们详细地调查研究我国军队在满洲不可能取得胜利的特殊情况的性质，我认为，回顾一下我国过去军事史上的某些事件，将会大大地帮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困难情况。

俄国是在经历了严峻的斗争和剧烈的变动之后，才在十七世

纪成为一个统一的帝国的。十八世纪开始时，我国极其辽阔的领土达二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左右（其中七万九千平方英里在欧洲），居民只有一千二百万；我国边界虽然只有一部分划定界线，总长已达九千三百三十英里。我国军队大约有十五万至二十万人，但因组织和训练低劣，作为一支战斗力量仍是不可靠的。全部国家预算约一百二十万英镑，维持这支军队占其一半。我国漫长边界的正当防卫需要一支庞大的军队，因为我们没有任何自然地理特征能加固边防，而我们的邻国却是强大的王国，例如瑞典，波兰，和土耳其，游牧的鞑靼人、高加索山民和中国人，关于中国人我们还知道得很少^①。

i.4 在十八世纪，除了创建一支正规军队外，我们必须把过去一百年作为一项遗产交给我们的下述任务坚持下去：

在西北，我们必须继续沙皇约翰三世和约翰四世所进行的努力，将瑞典从波罗的海沿海地区驱逐出去，把我国边界推进到海岸线。

在西方，继续进行沙皇阿列克塞-米哈伊罗维奇的事业，并把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从波兰手中夺过来。

在南方，遵循斯维亚托斯罗夫大公和奥列格大公所指示的方针，前进到黑海沿岸并在土耳其造成不稳局面，作为我们进一步向

^① 在西北，从瓦兰格尔湾到普斯科夫（约一千三百五十英里），我国与强大的邻国瑞典毗邻，它拥有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在那骚乱不安的时期，它是波罗的海沿岸周围地区和现今圣彼得堡省的霸主，并在芬兰的要塞和波罗的海沿岸据有向我国普斯科夫省和诺夫哥罗德省逐步推进的包围基地。在西方，从普斯科夫到契格林（约一千英里），我国与波兰毗连，边界在斯摩棱斯克附近象一个凹进的楔子，距离莫斯科是三百英里。瑞典与土耳其的盟国波兰是俄国的天然仇敌，因为它占领着我国白俄罗斯和小俄罗斯的土地。在南方，从契格林到亚速海（约四百英里），边界实际上并未划定，而与附属于土耳其的鞑靼部落所共有，土耳其拥有一支五十万人的陆军，并在黑海拥有一支强大的舰队。从亚速海到黑海（约四百英里），我们的近邻是鞑靼人和游牧的高加索山民，他们不断骚扰我国边境。最后在亚洲（在这里，边界也仅仅是模糊地划定），我们与隶属于中国的吉尔吉斯部落和吉尔吉斯族接壤。

前挺进的准备。

在东南,继续沙皇西奥多-伊凡诺维奇与鲍利斯·戈都诺夫变里海为俄国内海的斗争,并在高加索山脊获得一个牢固的立足点。在亚洲,帝国要向两个方向扩展——为了防御侵扰向中亚扩展,并向俄国在东方的天然出口太平洋扩展。

在这个世纪中,仅仅是这些计划中的前三项我们真正是竭力 i.5 地去执行的。1717年我们占领希瓦的企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这在一个长时间内使我们向中亚的进军停顿;而在西伯利亚,幸亏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和平态度以及吉尔吉斯人的软弱无力,才使得我们有可能以微不足道的兵力保卫了与中国接壤的六千英里边境。在上述三项认真谋求实现的任务中,第一项,即占领波罗的海沿海地区,是最困难的。能干的瑞典司令官查理十二以一支小而久经战场的军队对抗彼得大帝所领导的俄国强大兵力达二十一年之久。即使后者的天才也无助于避免1700年在纳尔瓦的彻底溃败,但是他要创建一支训练有素并在数量上优于敌人的军队的坚定努力终于使我们在九年以后在波尔塔瓦赢得了胜利。这次斗争——伟大的北方战争——直到1721年才告结束,根据尼什塔布茨基条约,将英格尔曼兰德(圣彼得堡省)、爱沙尼亚、利沃尼亚和芬兰的一小部分,共三千五百平方英里,并入我国版图。我们在纳尔瓦败北的原因是最初投入战场的兵力太少——只有五万人,而且这些军队是靠不住的。在战争过程中,军队数量增加到十三万六千人。 i.6 因而在波尔塔瓦,除了有经验丰富的部下和久经战斗的部队帮助外,彼得大帝在兵力数量上具有异常巨大的优势。在整个战争中,我们投入战场的兵力总共为一百七十万人。我们为进入波罗的海付出了伤亡十二万人的代价,还不把失踪者和五十万病员计算在内,可是获得这个地区,俄国就在欧洲诸强国中赢得了地位。我们向黑海的进展被证明几乎是同样的困难,而且被迫与土耳其进行

四次战争。第一次——在 1711 年——我们又犯了与瑞典战争开始时同样的错误，兵力不足就动手打仗，结果，尽管有彼得大帝亲自出马，我们仍被围困在普鲁特河。不仅我们的目的没有达到，而且在土耳其人的胁迫下放弃了亚速海，并毁掉了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的防御工事。但在第四次战争（1787 年至 1791 年）中，我国军队总数逐步增加到七十万人，最后打败了土耳其人。我们在任何一次战役中投入的最大兵力为二十二万人。根据雅西条约^①，我们获得了克里米亚和巴格河与德涅斯特河之间的地区。这最后的四年战争中，我们付出的代价是伤、亡、失踪者九万人，病员三十万人；十八世纪我们为进入黑海而投入战争的兵力总数为 i.7 一百五十万人。执行第三项任务——即收复小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是我们与波兰进行三次战争的原因，而在第三次战争后，波兰就不再是一个独立国家了。在这些战役中，我方出动的部队最多为七万五千人。三次战争我方参战者共四十万人，伤、亡、失踪者三万人，病员七万五千人。因此，在十八世纪中，我们扩张的努力在哪个方向上付出的代价最大，是十分清楚的。在这些战争中我们的陆军是首当其冲的，虽然我们的舰队在它的缔造者彼得大帝领导下在与瑞典的战斗中发挥了突出的和勇敢的作用。

十九世纪开始时，与一百年以前的情况相比，俄国已经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了。在过去一百年中，帝国面积由二十六万五千平方英里扩展到三十三万一千平方英里，人口增加到三千七百万。国家岁入也有相当大的增长，从一百二十万英镑增加到五百五十万英镑；但国家的财政由于连绵不断的战争而严重地动摇了。尽管军事需要耗费了二百二十万英镑，整个边界仍处于不稳定的状态，i.8 由于可能与瑞典、普鲁士、奥地利、高加索和中亚之间发生的许多

① 签订于 1792 年。

政治军事问题,仍需要特别的警戒^①。上世纪后期发展军队的努力并不是没有成果的。军队的质量和专业知识有了改进,产生了象鲁勉采夫和苏沃洛夫这样的人物,而且军队的数量也增长了;但是军队的大小跟整个国家的财政状况依旧是不相称的。在军务中不懂得节约。行政管理是有缺陷的,最高的战术组织是团队,对部队的训练又不一致。保罗二世皇帝为改正这些缺陷所采取的步骤没有获得成功,军队的战时编制由五十万人减少到四十万人。从理 i.9 论上讲,军队分布于十二个视察区域或军区;但当西部地区并入帝国,因而我们直接卷入欧洲政治问题的漩涡时,我国军队的大部分都要用来驻守第聂伯河以西地区。1799年,跨过边境屯驻着约十万人^②,将近十三万人组成两个军屯驻在西南地区^③,在北方有五万人左右分布在首都周围;其余散布全国,在西伯利亚和高加索边境约有二万五千人。十九世纪的军事问题虽然是以前业已进行的工作的一个继续,但必须在更加复杂的条件下加以正视。在西北,俄国还必须占有芬兰湾北岸和波的尼亚湾东岸,为完成在波罗的海获得一个出海口作最后一次努力。在西方,必须使波兰人保持从属地位,而且我国边界必须能抵御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侵犯。我们必须保持已赢得的阵地,并须对抗拿破仑的百万大军。在南 i.10 方,我们必须永远保有黑海海岸的立足点,并防卫黑海沿岸免受海

① 在1800年的时候,我国边界(其总长自1700年以来已增加到一万一千三百三十三英里)最薄弱的部分是:在芬兰(瑞典的)方面,自涅什洛特至库门河口(约二百英里),因为这部分边界与圣彼得堡接近;自格鲁德诺至霍京(约一百三十英里),因为缺乏天然屏障和坚固的要塞,并与普鲁士和奥地利邻近;在高加索方面,只有一部分地区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而自吞并格鲁吉亚后,与高加索人常常发生冲突;在中亚方面,由于安娜·伊凡诺芙娜时代吞并了吉尔吉斯部落,使俄国直接与希瓦、布哈拉与浩罕诸汗国相接触,这些汗国的居民以不友好的眼光注视着我们的边境。

② 苏沃洛夫、利姆斯科夫-科萨科夫和赫尔曼的部队,以及海军上将乌沙科夫舰队上的部队。

③ 拉萨指挥的军(约六万五千人,司令部在格鲁德诺)和古多维奇指挥的军(约六万五千至七万人,司令部在卡门涅茨-波多尔斯克)。

外进攻。在高加索和远东，一切都尚待完成。为了在后两个方向巩固我们的阵地，以便首先保护南部地区的俄国居民，迫切需要一次强有力的进攻。

陆军的肩上自然就承担了执行这些计划的任务。首先，这个世纪之初我们与法国的巨大斗争就值得注意，这场斗争是从1799年苏沃洛夫的出征开始的。我军作为奥德两国的盟国军队进击拿破仑，他正在对这两个国家进行毁灭；但这些战争以我们在1805年奥斯特利茨之役和1807年佛里德兰之役的完全失败而告终。1812年至1814年在我国境内的战争是前两次拿破仑战争的继续，尽管俄国遭到庞大的军队的侵略，尽管我军被逐出莫斯科，但拿破仑还是被击败了，欧洲从他的桎梏下获得了自由，波兰变成了俄罗斯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彼得大帝与亚历山大一世在他们领导抗击象查理十二和拿破仑这样的劲敌时所表现的决心，是具有最高度指导性的。在两种场合，我们都以不足的兵力开始战争，在纳尔瓦、奥斯特利茨和佛里德兰遭受了初战的完全失利，但仍然把斗争继续进行下去。在这两种场合，我国部队都得到了增援，逐步变得训练有素，适应性很强；战争本身造就了将领；我军数量不断增加，直到取得对敌人的优势。最后，斗争一则以我军赢得波尔塔瓦之役，一则以我军开进巴黎而胜利告终。

这些战争的结果之一是我们与波兰之间现存疆界最后的确定，这条疆界确定以来，不久就有一百年了。对这条疆界的任何改变，如后来表明的那样，不仅将会明显地损害我们的利益，而且这只能由一场欧洲的冲突才能实现，这场冲突将造成如此令人惊骇的牺牲，所以现存疆界的任何改变从整体来看都将对德国和奥地利象对俄国一样不利。因此我们能够把防御我们的现存波兰边界的任务从我们在二十世纪可能担负的任务中立即排除出去。但是被三大强国瓜分的波兰人，由于他们著名的民族愿望，迄今还没有

甘心顺从自己的命运，因而波兰内部的平定和管理无疑将是这个世纪的问题之一。

虽然十八世纪我们最艰巨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谋取一个出海 i.12 口，但在十九世纪完成这项任务时并未遇到挪威和瑞典的多大对抗。1808年至1809年与瑞典的战争持续了十五个月，以我国吞并芬兰而告终。战争过程中我国军队从未超过四万四千人，投入战场的总兵力共计六万五千人。我军伤、亡、失踪者七千人，病员九千人，共计一万六千人。注意这一事实是饶有兴趣的：我军以优势兵力交战四十三次，其中得胜二十九次，失败十四次。虽然这次战争之后我们吞并了芬兰，作为我们帝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我们对它的内部事务注意太少，结果在紧靠我国首都的地方出现了一个怀有敌意的大国，其人口虽为数不多，但具有顽强和独立的性格，并被灌输了一种与我们截然不同的观念。芬兰最后并入我帝国有待本世纪的政治家们去完成。

我们于1791年在黑海所得阵地的巩固工作，曾着力进行，但尚未完成，尽管我们在1806—1812年、1828—1829年、1877— i.13 1878年与土耳其进行过三次战争。第一次以我们吞并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而结束。第二次我们获得了多瑙河河口和黑海沿岸三百七十英里长的一块狭长地带。欧洲列强干涉俄国事务，企图在近东削弱我们，引起了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战争的结局对我们是不幸的，我们损失了黑海舰队，丧失了原占有的多瑙河河口。克里米亚战争之际，我们有一支在数量上强大的军队，在军官和士兵中都有许多优秀的人才。军官中很大一批人出身于贵族；士兵是长期服役的（二十五年）；而准尉和军士都是富于经验的人，而且发挥了相当大的权威。但在这个世纪早期我们打过一些胜仗以后，军队在训练上退步了，装备落后了。整个军队深受阿拉克切夫军事学观点的腐蚀，高级军官尤其虚弱无力。军队是为了打仗。

这个道理完全被置诸脑后。对营房装备表面的整洁和阅兵时步伐的敏捷的考虑比战斗实效要多得多,注重“操枪教练”和讲究仪式的动作胜过其他一切。在此期间主张这种观点的最好证明就是各

i.14 兵种的指挥官都让步枪队排成纵队,枪擦得锃亮,好在步枪操练中使上千枝步枪闪闪发光,声响一致,漂亮得象一枝枪一样。一个军官的发展前途视他的后台势力而定。没有权势的,只有那些奴性十足地执行他们上司的意愿之徒才能发迹,不管上司是多么残酷与野蛮。拿破仑战争以后,亚历山大一世皇帝创始的趋向较大的个人自由的国民运动已经渗入到部队的士兵中,但现在又被一种统制所代替,这种统制使全国趋于创造性的一切活动或推动力陷于瘫痪,它象一个阴影一样笼罩着全国军民的各阶层。每一个人都可以说是穿着长达膝盖的紧身上衣,钮扣扣齐下巴,看去好象是“吞下了一根拔火棍”,在全国(包括军队在内),人们只会说“很好”,“正是这样”和“完全正确”。士兵受到残酷的待遇,吃得很坏。各种各样的侵吞公款和不老实的行为猖獗一时。不仅指挥官们以粮秣公款饱私肥己,大大增加自己的收入,而且这种现象又得到默许,视为自然。依照一贯的制度,团队交由贵族的青年子弟统率,使他们能够继续存在,而对近卫军的偏袒成为军队咒骂的事情。

i.15 士兵表现出任何主动精神都要受到惩罚,而报刊却不敢吭一声;甚至军队报纸上讨论一下服装问题,也被视为是有害的“自由思想”。结果,我们在武器装备上被欧洲军队远远抛在后面的同时,在士气方面也没有什么进展,尽管我军数量是庞大的。由于持有这种观点,例如,步枪的主要用途是在“操枪教练”中发出一种悦耳的声响,我们自然无须为重整军备而自寻烦恼,因而在1854—1856年的战争中只能以滑膛枪武装起来对抗敌方的来福枪。我们的舰队刚刚经历了在锡诺普的胜利,并有象拉扎列夫、纳希莫夫、科尔尼洛夫和伊斯托明这样的人物指挥,在精神上是卓越的,数量上也是

强大的；但在技术上，比起我国陆军落后于我们邻国的地面部队来，它是更加落后于欧洲其他国家的舰队了，所以联军就以一支蒸汽舰艇组成的舰队在黑海对付我们的帆船。1850年至1860年，我国平时常备军兵力超过一百一十万人，但是大部分驻扎在西部边境地区、高加索和一些大城市。联军平时兵力共计：法国，四十万人；大不列颠，十四万人；土耳其，四十五万人。这些军队只有一部分参加了战争，然而俄国却被打败了。

关于我们对多瑙河的第一次战役的准备，一位参加了战役的 i.16
军官在他最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写道：①

“1854—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中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对我们不应当是一个意外。在1852年夏季，关于战争的传说已是谣诼纷纭了；因为这种谣传，人们普遍地对于我们运输效能的低下和军事装备的不足感到特别焦虑。确实，先帝尼古拉·巴夫罗维奇当年秋季在耶里萨维特格勒视察时，就已亲自警告部队战争快要临近。最后在1853年6月，我国部队越过普鲁特河，占领了多瑙河公国，10月，土耳其宣战。我军的辉煌胜利与敌人舰队在锡诺普的全部被摧毁唤起了全国的积极性，但也给了法国和大不列颠对我们开战的理由。这就开始了对俄国军队说来是一连串可悲而屈辱的灾祸。1853—1854年的多瑙河战役没有胜利的可能。因为进行这次战役没有明确的目的。不是因为我们没有摸透奥地利的真实意图，就是我们相信它会保持中立，我们力图满足它的要求，这样一来却束缚了自己的手脚。我们在左岸的防御没有交一点好运，而进攻又在来自奥地利的压力下很快就放弃了。这次战役既没有给我们带来荣誉，也没有给我们带来收获，虽然再一次证实 i.17

① 《一个塞瓦斯托波尔人的回忆录》(N.S. 马洛舍维奇, 1904年), 第9、10章。

了俄国士兵的勇敢，却暴露了指挥官的极端无能和军队中暗中滋生的很多弊病。1854年6月，我们带着耻辱与愤懑的心情从未能攻克西里斯的黎亚的堡垒撤回本国。联军的视线就转向了克里米亚。”

登陆的联军只不过五万人，在我军百万之众和我们的强大舰队面前似乎是疯狂的举动。可是总司令又是职业海军人员的缅希科夫亲王，尽管有六十艘船舰归他指挥，其中有一些还是汽船，却于9月14日和15日未加阻击就让联军在欧巴托里亚登陆了。当然，不能指望这支舰队有取胜的绝对把握，但当时我们却有力量以击溃他们的运输护航队的办法来破坏敌人的作战计划。联军从9月8日至14日在瓦尔纳与欧巴托里亚之间的海面活动，但我们却没有能够发现他们。阿尔马河一战，我军三万三千人（四十二个营，十六个骑兵连，八十四门大炮），进行了坚决的抗击。但我军虽在本国作战，却不熟悉当地的地形，鲍斯凯将军率领他的纵队经过一条我们根本不知道的小路，攻击我军左翼。这一攻击决定了战争的i.18 胜负，我军因而溃败了^①。于是从9月26日起开始了十一个月的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我军消耗殆尽的舰队将一批大炮和几位富有经验的指挥官——主要有纳希莫夫，科尔尼洛夫和伊斯托明，转到陆军进行支援。此时战争采取了围攻战的形式，战斗中我军英勇顽强；但必须记住，在克里米亚的陆军曾两次遭受严重打击：1854年11月5日在英克尔曼，1855年8月17日在切尔纳亚河。关于英克尔曼之役，上述作者写道：

“随着第四步兵军团两个剩余的师的到达，除了塞瓦斯托波尔城防部队之外，在缅希科夫亲王指挥下的军队有四万人，但他却使1854年11月5日英克尔曼的一场大战失败了。此

^① 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武器射程为三百码到四百五十码，而敌人的米尼式来福枪射程为一千二百码。我军每一军团只有一个来福枪营配备有来福枪。

战的目的是夺取萨蓬山岭，作为使该城解围的第一步。经过这一步骤，他本该将联军赶向巴拉克拉瓦，然后赶出克里米亚。这次战斗是经过很好计划的，作出了每一种布置以保证战斗的胜利，然而结果，由于个别指挥官的难以理解的错误，却遭到了伤亡惨重的失败，并且还是决定性的失败。

* * *

“伤亡一万名，士气消沉——士兵们对他们的领导人失去了信任，以及缅希科夫亲王对他指挥的部队怀疑——这就是 i. 19 这次灾祸的后果，它使我军注定了长时期扮演着一个被动的角色。克里米亚战役的最终结局实际上就是由这种情况决定的；援救塞瓦斯托波尔的关键时刻错过了，我军在战场上完全失去了主动性。士气败坏的过程开始了，这导致我军前所未闻的各种反常现象。”

戈尔恰科夫亲王接替了缅希科夫，但事情并未有所好转。在阿尔马河^①部队的指挥仍和在英克尔曼一样。各个指挥官互不支援，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进击并不支援阿尔马河的作战。9月8日，联军发起进攻，夺取了马拉霍夫高地。虽然在阵地的其他部分他们被打退，伤亡惨重，我们还是在10日夜间被迫从北面撤退了。这一退却是具有决定性的，因而宣布媾和——这一和约对我们是屈辱的，因为根据和约我们被剥夺了在黑海保持一支舰队的权利，并丧失了多瑙河口。这个结局使我们格外痛苦，因为联军兵力比我们差，而且如果我们决心不惜任何代价将战争继续下去，就会迫 i. 20 使他们下决心征服克里米亚半岛。即使联军成功地占领了它，我们也应当记住彼得大帝在北方战争中的意见和亚历山大一世祖国保卫战的范例，继续战斗。

我们的弱点在于我们高级军官和参谋的无能，特别是军需供

① 疑为切尔纳亚河。——编者

应工作效率很差。在各兵种中，步兵、炮兵和工兵是最可靠的，而骑兵，尽管其人数不少，所起的作用不大，也是不体面的。保持与本国后方的交通困难重重，尤其是到了冬天，道路很坏。给养运往前线遇到的障碍如此之大，安排又如此糟糕，因此部队不仅遭受巨大的艰苦，而且实际上经常缺少食品。医务工作也组织得极糟糕。官兵中的酗酒和赌博，特别在远离前线的地方，每天发生；各种抢劫与盗窃行为成为普遍现象。然而这只是事情阴暗的一面，并不表明整个军队或整个国家都腐败了，因为不管我们的指挥官有多少错误，士兵们仍然保持着战斗精神，准备好战斗下去，直到最后他们的努力如愿以偿获得了胜利。这一战争产生了纳希莫夫、科尔尼洛夫、伊斯托明这样的人物，他们都英勇地牺牲了，而在活着的人们当中，突出的有赫鲁列夫、托德列本、萨巴申斯基、以及其他人物。团队指挥官从各方面证明大部分是称职胜任的，各兵种的许多低级军官都成了老练的军人，士兵是愿意跟随他们到任何地方去的。士兵是坚忍不拔的，吃苦耐劳的，勇敢的，也是无知的。

而且，国家财政也并没有因为这次战争而受到损害。整个作战期间只筹借了两笔贷款，共计一千万英镑；发行纸币四千三百万英镑，使用国家银行的资金一千九百万英镑。这次战争总共使我们花费了七千二百万英镑。即使在 1856 年，人们对我国力量和资源的信念也未动摇，我们的信用还是高的，尽管我们在战场上遇到了灾祸。因此我们能够、也应当继续战斗下去。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正如我所说过的，联军就会被迫进行征服克里米亚。他们越是从海岸向前推进，困难就会越多；而我军则由于兵员和经验的增多，就会越来越勇猛可怕，最后就会把他们赶回海里去。我们的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在他的关于这次战争的札记中写道：

i. 22 “新君即位时，举国上下心中充满了克里米亚战争结局的痛苦。亚历山大二世不得不以缔结一项自普鲁特之后的和约

以来俄国皇帝未曾接受过的和约开始他的统治，因此新皇帝充分感到了加在他身上的沉重负担。当时的外交事务决不是处在如此危急的状态，致使一个有能力的新君无法在不损失尊严与物质利益的情况下摆脱战争。在俄国内部，一切也没有枯竭；国家决非到了穷途末路的地步。人人爱戴的新沙皇如果求助于这种爱戴之情和全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无疑能够唤起支持他采取任何行动的巨大热情。联军不仅感到了战争的负担，而且急于结束战争，这时如果沙皇发表一个坚定的声明，要继续战斗，直到缔结一项光荣和约，毫无疑问是会迫使联军退缩的。

* * *

“……但为实现这一行动方针，就需要有远见、勇气、才能和活力，而这些素质是新皇帝所不具备的。甚至如果在他周围的顾问们提供他某些支持，也就足够了，但在他的周围却没有一个德高望重才智出众的人。他被那些毫无根据地害怕要和整个欧洲开仗的人们所包围，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应对尼古拉的退缩负责。这时唯一能听到的就是这样的叫喊声：‘和平！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因此，在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以后，^{i. 23}在该地可以起莫斯科在 1812 年所起的作用的时刻，却签订了和约。在丢失了该要塞之后，我们本应当宣布，战争非但没有过去，而是刚刚开始！这样迫使联军来结束这场战争。”

对这次战役的结果产生的不满情绪是普遍的，而且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阶层。人们看出，祸根在于我们的农奴制度，因此亚历山大二世，这个最人道的人，亲自领导了解放农奴的运动。农奴们得到了自由。这一事件极为重要，老实说，它构成了俄国生活的新纪元，影响到活动的各个领域，陆军部也不例外。到处听到的是一种新的语言。的确，现在很难理解《军事论文集》上出现的那些

激烈的、有说服力的自由主义论调的文章。但是，可叹！一切很快地又回到了先前的状态。1863年波兰人的叛乱，暗杀沙皇的企图，一小撮居心狠毒的人公开谋叛，都被旧制度的维护者用来作为力图缩小已被许可的权力的口实。他们的努力取得了胜利，因而

i.24 开始了反动，这种反动在有关教育和土地问题上特别剧烈。然而陆军部在米柳京将军的开明领导下，极力缩小了这种反动对军队的影响；的确，有一个时期陆军部因此被人们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尽管克里米亚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唤起了群众潜在的爱国热情，但进行这种战争距离人民的心愿太远了，因此称不上是一次民族战争。

任何大国会甘心情愿接受象1856年俄国签订的这种和约的条款是难于想象的，根据和约俄国允诺在黑海不得保持一支舰队，并放弃它于1828—1829年获得的多瑙河口。所以不论其原因显得多么复杂，1877—1878年的战争实质上不过是我们二百年来为到达黑海的斗争的继续，这一次复杂的是要援助我们同种族的巴尔干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虽然我们并没有充分利用我们的机会，但土耳其与塞尔维亚的战争给予我们的准备时间却真正决定了我们与土耳其战争的结局。固然在宣战前我们在比萨拉比亚动员了和集中了军队，但我们宣战拖延太久，使土耳其

i.25 人也有时间进行准备。我军初战告捷之后所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这时以后膛枪装备起来并以欧洲方式组织起来的对手，已不再是1828年我们所面临的敌人了，那是以一支小部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击溃的武装暴徒。象往常一样，最初我们投入战场的部队太少，但皇上在米柳京将军的建议下，把大量的增援部队推进到前线，其中包括我们陆军的精华：近卫军和掷弹兵^①。我们比较短的运输线使我们相当迅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普列夫纳，我们于1877

^① 帝俄的一种精兵，身材高大、体力强壮。——译者

年8月遭受了最后一次严重的挫折,而到了10月近卫军和掷弹兵就到达了前线。包括罗马尼亚、塞尔维亚、门的内哥罗以及保加利亚的民兵在内,我们成功地将优势兵力投入战场,在两个战场上我军兵力总数约达八十五万人,尽管敌人勇猛反抗,我们还是一直打到了他们首都的城下。但这并不是轻易得来的胜利。为了突破土耳其人(他们在普列夫纳是指挥得当的)的防御,我们不得不以三倍于他们的兵力投入战场。设防非常薄弱的都布尼亚克山,仅由近卫军以五六倍于该地敌人的军力经过殊死战斗才把它攻下。虽然他们的土筑工事大部分是按野战工事标准的,又没有诸如铁丝网、地雷和鹿砦等任何障碍物;虽然防守者并无避弹掩蔽部;虽然我们以三比一的兵力并增加了许多门大炮,投入战斗,我们仍不能以猛攻拿下普列夫纳,而必须采用封锁的手段。然而我们的总司令在欧洲方面得到了象古尔科、斯科别列夫、拉德茨基和托德列本这些出类拔萃的领导人得力的支援,他们的部队很快得到了锻炼,并为我军带来了胜利。在亚洲战场上,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大公得到了拉扎列夫、海曼、特尔·古卡索夫的帮助,他们都是干练的和精力旺盛的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我们的高加索部队勇猛顽强,功勋卓著。当克里得奈尔和佐托维指挥下的部队从薄弱的普列夫纳阵地上被驱逐回来时,他们正对卡尔斯要塞从事夜间袭击。在土耳其方面,我军对希普卡隘口和巴亚泽特的防守是我国军事史上最光辉的成就之一。

这次战争再一次暴露了我们组织工作的许多缺陷。供应工作和医务工作效率很差。在欧洲方面,骑兵和炮兵的工作不副所望。这一战役的全部重任都由步兵所承担,这一兵种很好地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一些战斗中部队兵力损失达三分之一甚至一半,但仍能重新整编继续战斗。关于后备部队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他们在基西涅夫的长期驻扎使他们能和现役士兵和睦相处,并和他

们合在一起。可是有些部队刚由预备役士兵补充起来，未经适当教练与纪律教育即进入战斗，并没有在任何时候都表现出应有的坚定。但总的来说我军保持了勇猛、坚定、忍耐和遵守纪律的好声誉。不过我们在防御方面较之进攻方面为强。虽然这次战役——这是我们采用普遍兵役法以后的第一次经验——胜利地结束了，但也显著表明，在部队迅速动员和集中的安排组织上，我们比西方邻国差。士兵不是在正规的动员计划或制度下召集起来的，后备部队的形成是没有计划的，由于通往罗马尼亚的铁路运输效率很差，部队的总集中是迟缓的。我们对于敌人的情报不充分也不可靠——正是由于我们对敌军的实力不了解，我们才会以这样薄弱

i.28 的兵力开战。由于缺少资金，我们重整军备的工作未能完成，开始作战时我们用的是三种不同类型的步枪。我们没有足够的地图，已经绘制的观测草图——例如希普卡阵地的草图——却留在圣彼得堡。我们的炮兵装备在技术上比敌人的低劣，发射四磅重炮弹的炮尤其无用。工兵的人员和需用品不足，其分配工作也不好。因此，在9月12日、13日普列夫纳战斗中，当斯科别列夫和伊迈尔列京斯基统率一个由二十二个营组成的军团向敌人坚固设防的阵地发动主力进攻时，只有一支约三十名工兵的支队，这个支队是我自己由于偶然的机会才能够召集起来的！现成的攻城器材数量不足，已有的那些又陈旧不堪。我已经论及骑兵在欧洲方面的职责，在整个战争中，除了少数例外，它执行任务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也是利己主义的。炮兵的工作，在高加索方面是极好的，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在欧洲则缺点不少。有这样的例子：有些炮兵中队因为几个人负伤便退却了。最高级的指挥官很多都不称职，而炮兵和骑兵的有能力的领导者又极少。参谋工作，尤其是总参谋部的工作，好的不多。

i.29 战斗之前通讯太多，而到战斗的紧要时刻，向上报告最重要的事件或向下通知正在发生的事情，这种职责却经常被

忘记了。在实际战斗时不论和邻侧或是和后卫都没有保持适当的联系，结果在不同兵种之间合作很少，而战斗的重担几乎全部推给了步兵承担。通过罗马尼亚的轻便铁路运载量不充分，组织也不好。沿线没有歇息站，冬天，道路断了，各种供应品的运输几乎都无法进行。我国在保加利亚的军队对当地居民的态度并不总是人道的和公正的。购买产品的付价不正常，或根本不付钱，由于不适当的制度，粮草补助是作为指挥官的临时津贴来对待的。在离开前线的地方，混乱和放荡是普遍的。由于我们兵力不足仓促进攻，不得不从一度占领过的地区撤出，起初把我们作为解放者热诚欢迎了我们的人民，这时就被迫或者跟随我们一起撤走，或者被回来报复的土耳其人屠杀。因而有一个时期存在着普遍的感情激变；保加利亚人丧失了对我们的一切信任，开始倒向敌人。从 i. 30 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克里米亚战争的再现。我军防御很强而调遣的能力很差，因而在进击中由于笨拙而受害不浅：在普列夫纳发生的事件就是显著的例子。另一方面，土耳其人在不论哪次进攻中的比较拖沓都极大地帮助了我们；否则我们保加利亚的封锁线在 8 月或 9 月援兵未到之前就会轻易地被突破了。我们因此就会被迫退缩到多瑙河的后面。只是因为土耳其领导人的互相妒忌和无能，以及来自君士坦丁堡的干扰，才使我们免于厄运。但不管我们如何缺乏组织，以及我们的一切短处，我们还是打败了土耳其人，在普列夫纳、希普卡、卡尔斯俘虏了整军团的人，最后军队胜利地开到了君士坦丁堡城下。

这是我们十九世纪从事的最后一次巨大战争，紧接着在 1879 年，我们军事上的自尊心在中亚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由于屡次遭受土库曼人的攻击（这种攻击甚至到了克拉斯诺沃德斯克附近），就需要向土库曼草原进行一次特别的远征。富于经验的老练的将领拉扎列夫将军被指定负责这次远征的指挥，但在部队从阿 i. 31

泰克一线出发开往格奥克-泰佩的前夕，他死了，指挥权不幸转交到了下一个高级将领罗马金将军手中，他是很不适宜于担负这个指挥任务的。远征以灾难而告终。部队进抵设防薄弱的土库曼要塞格奥克-泰佩，试图猛攻该要塞，未果，虽然我们的部队是由精锐的高加索团所组成的。我们被迫抛弃了几百枝后膛枪，撤退到阿泰克一线筑有防御工事的阵地，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我们必须付出更大的努力，必须组织一支庞大的部队——以亚洲战争的标准来衡量。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斯科别列夫将军，他是一个特别有才能的精力充沛的人。经过一场激战，他击败了土库曼人并夺取了格奥克-泰佩。在敌人进行的各种夜袭中，我们两次遭受挫折，在奋不顾身的肉搏战之后为绝对的多数所压倒；我军丧失了三门大炮和我们最著名的高加索团的一面军旗^①。但斯科别列夫成功地在全体成员中灌输一种信念，即无论遭受如何重大的损失和痛苦，都应继续战斗，死而后已。因此我们胜利了。不过这次远征也表明，象切尔尼亚耶夫将军和考夫曼将军指挥下的由几个连组成的纵队能够打败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土著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土库曼人除了异常勇敢之外，还装备着虏获来的伯尔丹来福枪，他们使用这些来福枪设法使我们遭受严重伤亡。我们攻打格奥克-泰佩不足五千人的小部队死伤就达一千人之多。我军在十九世纪参加的最后一次战事是1885年在库什克的一次小仗，那一次一支俄军小部队以四十三人的损失打败了阿富汗人。^②

1877—1878年的土耳其战争的结果是我们收复了多瑙河口，并占有了巴托乌姆和卡尔斯。十九世纪我们与土耳其斗争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尚隶属于它的巴尔干诸民族。但这个问题影响到欧洲

^① 军旗所在前哨战壕的连队只剩下十四人，营长、连长和全连尉官全部阵亡。

^② 阿富汗边境前哨地点的一次小仗，这次小仗在当时引起了相当大的轰动。
——编者

其他国家的利益太密切,它们在塞瓦斯托波尔以武力反对我们,在柏林会议上从外交上反对我们。我们的目的不够单纯,这也妨碍了我们的成功,因为我们在为这些少数民族的命运担忧时,忽略了我们自己的物质利益。因此这个世纪在黑海方面获得的结果总的来说是得不偿失的。我们在三次与土耳其的战争中共投入兵力一百七十万人(1878年军队达到兵额八十五万人),伤、亡、失踪者十二万六千人;病员二十四万三千人;共三十六万九千人。克里米亚战争期间我们投入兵力一百三十万人,伤、亡、失踪者十二万人,病员二十二万人。如果把克里米亚的这种情况计算在内,那么我们为得到黑海沿岸、多瑙河口及在黑海保持一支舰队的权利,付出的代价有:投入战场的兵力三百万人,战争中死伤二十五万人,病员四十六万人。然而,尽管作出了这一切牺牲,黑海的大门依旧对我们关闭着,而对我们可能的敌人开放着。1878年这座大门实际上为我们所占有,而现在戒备着我们,把守这座大门的不仅是土耳其人,而且还有德国人。通过黑海保持我们地中海阵地的任务转移到了二十世纪。

为了占有高加索,十九世纪我们必须两次与波斯交战,并与高加索山民战斗了六十二年之久。在谈妥目前我们在中亚的边界之前,有三十年之久我们一直在进行远征。我们在高加索与中亚的作战都产生了很多英勇事迹。虽然在高加索作战中与我们交战的是特别勇敢的敌手,我们还必须与自然界特殊的困难作斗争,但我们兵力数量占巨大优势,组织也远比敌军为好,而且从单纯军事观点来看,这次作战也完全不象与土耳其人的战争那样困难。在中亚作战中,从1847年到1881年,我们一次出兵作战从未超过一万五千人。派出兵力总共约五万五千人,其中伤亡不到五千人,病员不到八千人。在这两个方向上,我们的任务可以说在十九世纪已经完成了,因为以后将会看到,我们的现有边界不仅没有重新划定

的必要,而且如果不冒与土耳其、波斯、阿富汗、或许还与英国发生严重冲突的风险,也没有改变的可能。但高加索人与中亚人的性格要求我们仍须保持经常警惕,保持军事威力,以防止出现种族叛乱和宗教叛乱。

i. 35 尽管在西伯利亚保持着小部队,在十九世纪中我们还是大大地改变了我们在东方的边界线,在二十世纪,我们必须谨慎地维持二百年来自中国人的和平关系。

在此期间,我们将在美洲的领地廉价转让给了美国。我们事实上也迫使日本将萨哈林岛南部划给我国,以换取千岛,并吞并了堪察加、阿穆尔和乌苏里地区,最后吞并了关东半岛。乌苏里地区是根据 1860 年北京条约,多少有点象是作为一种报酬划归我国的,因为英法占领北京后我们曾帮助中国拟定它与英法两国缔结的北京条约。同样,我们进入满洲,可以说是中国对日作战失败后对我们代表它从中斡旋调停的酬谢。这样,当我们用了两个世纪,劳师丧众向波罗的海和黑海进军的时候,却能在 1897 年未经任何流血斗争而到达太平洋海岸。不过轻易得来的成功孕育着灾祸的种子。

i. 36 上两个世纪中帝国的扩张意味着我国所有边界的逐次重新划界,例外的是我们与中国的大部分边界,自卡通河谷至石勒喀河口,两百年来没有变动。我国西部边界已自 1700 年距莫斯科三百英里处移至距莫斯科六百七十英里处。在西北方和南方,我国已到达波罗的海和黑海天然疆界。在同一时期,我们自高加索和在中亚将我国境界向前推进了相当大的一段。下列数字约略告诉我们,1700 年至 1900 年之间的这两个主要斗争使我们在兵力上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到达黑海的斗争中,我们投入对抗土耳其的兵力三百二十万人^①,损失了七十五万人,而为了到波罗的海与瑞典

^① 十八世纪一百五十万人,十九世纪一百七十万人。——编者

发生的冲突中,我国从事作战的战士一百八十万人,付出七十万人的代价。这就足以表明一个概念:如果本世纪我们试图到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必将使我国军队付出什么样的牺牲。而且我国领土的扩大已迫使我们在境内容纳许多不同的外国种族,甚至有敌意的种族,因而从军事观点来看,我国现时(1900年)^①的边境不如1700年那样巩固。虽然帝国的人口已自一千二百万增加到一 i. 37 亿三千万,但必须记住,在边境上和边境内有四千万以上的人口只是部分地以种族纽带和我们联系着,而在宗教和历史渊源方面却和我们多少是相异的。

在这同一时期,俄国有七十一又三分之二年的和平局面,其余一百二十八又三分之一一年有三十三次对外战争和两次国内战争,按其作战的政治目的来分类,可分为下列几类:

1. 为了帝国的扩张——二十二次战争,持续约一百零一年。
2. 为了保卫帝国——四次战争,持续四又四分之一年。
3. 为了欧洲总的政治利益——七次战争和两次远征,用了十年时间。
4. 内战——两次战争,持续六十五年。
5. 为了镇压叛乱——六年军事行动。

这些战争冲突使大约一千万人遭受战争恐怖,国家丧失了其中约三分之一的人,有近一百万人战死和负伤。

我国军队的战时编制的逐渐变化(民兵、第二线部队和后备部队除外)可从下列数字中勾画出一幅轮廓:

1700年,我国人口一千二百万,战时兵力五万六千人——占 i. 38 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四七。1800年,人口三千五百万,战时兵力四十万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一点一四。1900年,人口一亿三千二百万,战时兵力一百万人——占人口的百分之零点七五。但必须

^① 这显然是引自库罗帕特金将军1900年的报告。——编者

注意，1700年军队刚刚组成，而且在极短时间以后战时兵力就上升到十五万人——占人口的百分之一·三。因此，尽管采用了一种新的征兵制度(普遍兵役法)，而且兵力逐步增长，但按比例来说，二十世纪开始时国家所承受的满员兵力的负担，只有一百年前和二百年前的一半。这一点更加值得注意，因为由于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帝的改革，在1700年和1710年的时候，军队还没有正式发展起来，在1800年的时候也远未达到兵员定额。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的激烈的争论第一次发生于1855年，这是因为克里米亚战争之故，但因采用普遍兵役法，这种争论就变成了永久性的。

关于二十世纪可能落在俄国武装部队身上的任务，我在1901年陆军大臣任内的一份报告中写道：

i. 39

“因为人的认识能力有限，不可能预见到整个一百年内的事，因而我们无法规定二十世纪我国军队必将担负何种任务；但分析过去，观察当今我们在世界列强中所处的地位，则估计一下至少最近几年将向我军提出的任务的性质，既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过去两世纪俄国的主要任务是与帝国的扩张相联系的。从这一点来看，我国的疆界问题似乎依然是最紧迫的。所以回答下述要害问题甚为重要：我们对目前的边界满足吗？如果不满足，在何处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这件事一定不能只从我们自己的观点来考虑。假如我们满足于我们的地位，不渴望在边界上推进或退却，那么我们在二十世纪当然不会从事任何侵略战争；但因二百年来的巨大努力与重大牺牲使我们得到了称心如意的地位，我们或许已把自己的邻国置于这样的地位：在未来的世纪中它们的目标可能就是收复被剥夺了的领土。如果这样，战争的危险就没有消除；战争的性质就将从进攻转为防御。”

第二章

i.40

俄国的欧洲边界与亚洲边界——关于边界适合帝国需要的
结论

我在 1900 年任陆军大臣时所写的一份报告的第二章,含有一个对我国边界的战略观察。其总结论可概括如下:

1. 与瑞典的边界^①——这条边界有一千英里长,横过一个崎岖险峻难于到达的、人烟稀少的地区。它从波的尼亚湾的极北端开始,一直向北,象一条鲜明的种族划分线横亘在西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与东边的芬兰人之间。其南部十分符合我们的要求,但其北部则过份人为地划界,对我们不利,因为它把芬兰和北冰洋分割开了,并把所有的海岸都划给了挪威。我们自然高兴看到这部分地区重新定界,但所能得到的利益微不足道,没有理由为这些利益而争吵。不过我国边界的这一地区仍不能认为是十分理想的。 i.41

前章已经表明,俄国为了到达波罗的海、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曾付出了何等巨大的努力和牺牲。我们不得不对瑞典进行四次战争,投入兵力一百八十万人,在伤亡约十三万人之后,才在最后取得了胜利。胜利的主要因素是彼得大帝对事件所起的影响,因为正是他在波尔塔瓦的胜利,为我们开辟了道路。十八世纪初,维堡省已有点俄罗斯化了:那里已建立起俄国人的村庄和教堂,我们的俄语已成为主要语言。1809年,由于腓特烈海姆和平条约,芬

^① 与挪威和瑞典的边界,由 1809 年的腓特烈海姆条约和 1826 年的圣彼得堡协定予以解决了。

兰永远并入帝国版图。当时尚待进行的，就是利用我们的胜利，悄悄地但坚定地将这个征服了的省与俄国其余省份合并起来。但我们并未这样做。由于在别处奔忙——在黑海和里海加强我们的据点，向太平洋推进，在高加索进行长期斗争，与波兰和在中亚作战——我们很少注意在芬兰发生的事情，满足于表面上的太平无事、秩序良好和人民的顺从。芬兰人利用了这一点，从1810年至1890年，不断地反抗我们，总想获得完全自治。1811年，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获得的维堡省再度转移到他们手中，虽然他们至今未能在该省完全消除掉俄国居民的一切痕迹。于是，在我们的某些政治家的帮助下，我们逐渐学会了忘掉芬兰确曾是我们帝国完整的一部分；我们逐渐地受到教训，使我们认为，它应当按照1772年的瑞典宪法进行治理，最后，认为它确实并非俄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自主的国家。1800年，制定了普遍兵役法。这使芬兰有一支国民军，这支国民军固然不大，但由于设想周到的预备役制度，使它能够 在俄国首都附近投入一支十万人的武装力量。这样，芬兰人没有流一滴血，但审慎地、连续地、系统地活动了八十年，又成功地将我们摒于芬兰湾和波的尼亚湾之外，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夺去了我们的胜利成果。因此，由于挪威和瑞典王国^①是弱的，由于芬兰几乎伸展到俄国首都城下，而且不仅遮蔽了它，还遮蔽了整个俄国北部，因而对我们具有极大的重要性，我们应当做的，不是设法改划与瑞典的边界，而是设想如何更好地消除引起两国之间摩擦的原因。只有芬兰人独立的梦想得以实现，瑞典才有希望从我们手中攫取芬兰；它也只有 在芬兰居民参加或至少同情它时，才能冒险与我们在芬兰作战。因此，为了保证该边界的安全，我们的责任就是尽可能为芬兰与俄国的早日联合铺平道路。

① 写于两国分开之前。——编者

下面便是我的报告的引文：

“不论我们占有芬兰的主张多么公正合理，必须承认，我们对它持续了八十年之久的错误政策却不是立即就能改正的。轻率地处置涉及一个民族内部生活的事务，只能激化和加剧困难。为了我们能够最终在波的尼亚湾和芬兰湾沿岸占有适当的地位，一种多年持之以恆的坚定而又慎重的态度是必需的。在如何改变该民族的生活方式上，我们必须特别谨慎，同时也必须坦率承认，芬兰所达到的文明程度，比我们的许多省进步，虽然这种进步主要是以俄国人民的牺牲为代价的。我们应当尊重芬兰文化，以期芬兰与我们合并时这种文化将会帮助我们，而不是危害我们。” i.44

2. 西部边界——从波罗的海海岸的波兰根岬到黑海的多瑙河口，俄国与德国毗连七百三十八英里，与奥匈帝国毗连七百六十一英里，与罗马尼亚毗连四百六十七英里。

这条边界线的南北两端完全是笔直的。在中部，从赖格罗德到利托姆杰，边界线一直向西，并转弯沿德国南部和东部边界延续三百九十英里到达梅斯沃维茨，从那里又沿着奥匈帝国北部边界延续二百十三英里。这条边界线伸入这些国家，形成了我们的华沙军区，它的地理位置和它的战略意义都是重要的。这个地区原先是波兰王国，依据 1815 年维也纳条约并入俄国。据有这一地区，我们就可以包围东普鲁士的南部边境和加里西亚的北部边境。从这个军区采取军事行动，在北部向波罗的海进军，或者在南部向崎岖的喀尔巴阡山脉进军，我们能够把那些省份和它们的邻省分割开来。另一方面，这一地区本身也容易受到来自南北两方指向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的进攻而被割裂。所以它的位置使它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如果我们对战争比邻国更有准备，它可能成为我们力量的一个源泉。反之，如果德奥两国一起能够将较大的军 i.45

队投入战场,并能比我们更迅速地集中,它就只不过是一个弱点。

与德国的边界,长七百三十八英里,地势无自然界的特征。边界那边,是我们最近的邻国——一个自我们接触欧洲生活以来就同我国发生密切的社会和经济关系的民族。目前(1900年)有五条铁路把俄国的不同地区与德国的波罗的海港口和柏林联接起来;我们每年与它的贸易额达三千二百二十万英镑(自1893年至1897年五年的平均数),亦即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六点五。我国每年向德国出口(五年平均数)共计一千六百四十万英镑,占我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点一;自德国进口一千五百八十万英镑,占我国进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八点六。仅1897年一年,我国向德国的出口就达一千七百五十二万英镑,自德国进口一千七百九十八万英镑。所以,两国之间的经济联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两国的利益是相互的,因此,仅仅经济理由就需要我国方面保
i.46 持现有的友好关系。但掩饰这些事实也是无用的:德国政府在柏林会议所起的作用使得我们有理由改变一种总是对德国有利的政策,它加入针对我国的三国同盟,起因是我们同法国恢复友好关系。整个与德国的边界都是人为的,而且从哪一边都易于遭受侵犯。自波罗的海至菲利波沃,这一段边界线好象是一条种族分界线,它介于东边的立陶宛人和西边的日耳曼人、德国系统的立陶宛人和波兰人之间,并把俄国的波兰人和德国的波兰人分开。尽管我国与德国之间没有明显的天然边界线,种族分界线却起了天然边界线的同样作用。德国人以一种系统的政策卓有成效地使东普鲁士一个斯拉夫地区如此地条顿化,以致它现在已成为霍亨佐伦王室最忠诚的省份之一。同样的政策正在波森实施,但效果不甚显著。在我国方面,我们正作出巨大努力将华沙军区和毗连德国边界的西北部地区殖民地化,使他们更加靠近我们。如果我们的工
i.47 作没有邻国那样成功,主要应归咎于我国文明的落后。我们在实

行最好的政策以获得所期望的成果方面所表现的优柔寡断，也应对进展缓慢负有责任。

德国花费了大量金钱，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说，业已作好了以一百万大军迅速越过我国边境的准备。它有十七条铁路（二十三条轨道）通向我国边境，使它能够每天向前线开出五百多列军车。它能够在宣战的几天之内将其大部分武装部队（十四至十六个军团）集中到我国边境，而且，迅速动员的问题且不论，还有比我们多得多的技术物资，诸如轻便铁路、大炮、军械和工程器材，尤其是电报器材，机动攻城炮兵辎重等等听凭它使用。它也极为周密地做好了坚决防卫自己边境省份特别是东普鲁士边境省份的准备。在托恩、科尼希斯波格和波森的第一等的要塞每年都有改善，在最重要的交叉点上，壕沟环绕的兵营兴建起来，物资堆积着，准备迅速构筑半永久性的野战工事。

维斯杜拉河的渡口已处于防御状态，许多城镇和大的村庄也是如此。确实，举国上下正在准备一场民族战争。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我们也已努力工作，在维尔纽斯和华沙地区准备战争；然而由于德国在三十年里所做的远比我们在五十年里所做的多，它已把我们抛在后面。它的主要的和压倒的优势在于它的铁路；面对它通向我国边境的十七条铁路，我们只有五条能与之抗衡。这一优越性是无法抗拒的，它给予德奥两国的优势，不论是军队的数量和勇敢都无法与之抗衡。事实仍然是，德国花费了数十亿巨款——一部分来自 1871 年的战争赔款——准备了战争，包括强力进攻的战争和坚决防御的战争。如果对我国的战争发生，它就要试图吞并整个华沙军区乃至维尔纽斯（在德文纳河左岸）的一部分，因为这些地区的人力能够大大增加它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对这样的战争可能有的后果进行分析的人们却看不出德国在这种扩张中会捞到什么好处。不能设想，一亿俄国人会甘心丧失他们曾为之

牺牲流血、而且由于历史因缘与祖国联系在一起的土地。反之，这样的思想家确信，我们应该一有机会就集中力量将该地收回。假如我们对战争有较好的准备，或者万一德军主力被牵制在另一个方向上，华沙军区就将构成一个练兵场，深深地插入德国和奥地利之间，从那里我们可以同样轻易地向柏林或维也纳迅速进军。前者距我国边界二百英里，后者距离二百十三英里；而圣彼得堡和莫斯科距德国边界分别为五百三十三英里和七百三十三英里，距奥地利边界分别为九百英里和八百英里。不过，如果我们在这样的战役中取胜，并谋求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从军事上考虑，就将是吞并直至维斯杜拉河的整个东普鲁士。跨过这条河流，占有该河两岸及该河河口和尼门河，我们就会对德国处于控制的地位，并使我们的军事边界线大为改进。但随着这种领土的增加而来的许多不利因素将超过这种有利地位。对我们来说，将会发生德国人丧失可与阿尔萨斯-洛林相比拟的领土的问题；而这将具有更为尖锐的性质，因为德国民族总要等待机会来收复——如果必要，就用战争——当今王朝与之联系得如此紧密的领土。因此，可以设想：

i. 50 假如两国武力保持现状，并考虑到两国准备的情况，则德军侵犯我国领土的可能性大于我军侵犯德国领土；

入侵德军将比入侵俄军遇到的困难为小，如果俄军开进普鲁士的话；

我国某些领土可能被占领；

我们可能占领德国的普鲁士领土，但被占领区的居民对我们总是敌视的，因为他们的文化状态、民族因缘和传统感情都与我们不同；

俄国和德国都是这样的大国，因此双方都不会同意丧失领土，也不会坐着等待领土收复；因此

“如果事事都加以考虑，那末，为改变现存边界而进行战争，对

德国是不适宜的,对我们当然也是不适宜的。”

3. 与奥匈帝国的边界——奥匈帝国面积二十四万三千零四十三平方英里,比德国大些,1900年人口为四千五百六十万;但日耳曼民族极为纯一和爱国,而奥匈帝国的人民则包括许多民族。i. 51 其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四点一是日耳曼人;为数众多的斯拉夫族集团占百分之四十七(波希米亚人、摩拉维亚人和斯洛伐克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九;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人占百分之十一;波兰人占百分之八;罗森人占百分之八,斯拉夫族人占百分之三);匈牙利人占百分之十六点二;罗马尼亚人占百分之六点六;犹太人占百分之四点五;意大利人占百分之一点六。至于这些民族对俄国的感情,居住在距我国边境相当距离的日耳曼人对我们无敌意;匈牙利人因我们参与镇压1849年的起义,即使不是公开的敌人,无论如何也是不友好的,而且他们潜在的憎恶感情受到最大的斯拉夫族集团即波兰人的煽动。斯拉夫族的其余部分对他们在俄国的亲属表示同情,不过这种感情的主要动机是他们害怕被日耳曼人或马扎尔人所吞并。

奥地利的边界没有一处太平无事。但自缔结三国同盟以来,它的注意力——从军事意义上说——已几乎专门转向俄奥边界。一看地图,第一个想法就是两国之间的自然边界应沿喀尔巴阡山脉划定,但实际边界却离这山脉俄国的一边很远。加里西亚可以说形成了这个主要障碍物(喀尔巴阡山)向俄国倾斜的一个斜坡,在那里最近已构筑起准备充分的设防营地,由许多公路越过喀尔巴阡山与奥匈帝国的其他地区联接起来。该营地设防坚固,储藏各种补给,准备持久防御,或向俄国进军。奥地利现在能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在这个地区集中一百万人。我们两国有七百六十英里的共同边界,维斯杜拉河上游——自涅波罗姆尼查至扎维霍斯特——和德涅斯特河的一小段及其支流兹布鲁兹河在这一方向上形成了一

条自然边界。不过这些河流并无战略价值。有四条铁路穿过边界：

- (1) 在格兰尼查,华沙—伊凡哥罗德线。
- (2) 在拉德齐维洛夫。
- (3) 在沃洛奇斯克。
- (4) 在诺沃谢里茨。

我国与奥匈帝国的经济关系不如与德国的经济关系重要。自1893年至1897年五年期间,两国贸易额平均每年仅为五百八十万英镑,或占我国贸易总额的百分之四点五;其中出口占三百五十万英镑,进口占二百三十二万英镑(分别占出进口总额的百分之四点八和百分之四点二)。1897年,我国出口为三百九十万英镑,进口为一千九百万英镑。尽管奥匈帝国将近一半的民族与我国人民同一个祖先,尽管我们曾在十九世纪为维护当今奥地利王室而流过大量的血,万一欧战总爆发,两国之间的战争也决非不可能,因为血统上宗教上的兄弟也是会互相对抗的。这样一场战争,除了一小撮波兰梦想家的空想之外,对所有斯拉夫民族都是一场灾祸,它在奥地利日耳曼人中是不受欢迎的,不管他们的利益与我们多么对立。在奥匈帝国内,只有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恨我们,他们有很多和充分的理由附和我们可能的敌人,这是人们十分了解的。关于对奥战争后改变两国边界问题,我在1900年的报告中写道:

“奥匈帝国政府一旦战胜,就可能在波兰人的压力下坚持把那些波兰人占优势的俄国边境地方归并到加里西亚里面去。某些波兰和匈牙利的爱国者甚至渴望将俄国疆界推回到布列斯特和第聂伯河。

“俄国肯定永远不会答应任何领土的丧失,即使战败了,也不会答应,并将尽最大努力尽快地收复失地。另一方面,在战胜奥匈帝国并在可能随之而来的奥匈帝国的崩溃之后,俄

国面临的问题将是是否要取得更多的领土，如果要，那又是哪些领土？那时将会再度出现‘修改边界’的呼声。喀尔巴阡山似乎是造物主安排的边界，因此整个加里西亚可能成为俄国的一部分。

“然而我们必须及时把我们的见解搞清楚。这种土地和人口的增加对我们是必要的吗？由于这种吞并我们是否变得更为强大？或者，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在为自己制造虚弱和忧虑的根源？七十或一百年前，加里西亚的易手似乎很可能是有益的，并增加了我们的实力，尽管那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决不能肯定奥地利不会试图将它夺回去；1855年它就已有过这样一个极好的机会。然而现在，在加里西亚在长期与我们分离之后，吞并只能是以武力从奥地利手中抢夺过来，因而是不自愿的。不论是加里西亚的波兰人或是那里的俄罗斯居民都不希望成为俄国臣民。我们决不能忽略这样的事实：对于奥地利的斯拉夫人（包括罗森人）来说，我们只能被作为达到目的（解放）的手段，而不能有我们自己的目的。即使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也可能起来反对我们。奥地利斯拉夫人也并不真正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以和平的方式坚持斗争，每年获得越来越多的公民权利，使他们逐渐与日耳曼人和匈牙利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尽管他们处于严重的经济地位；尽管犹太人控制着土地，尽管赋税比俄国重些，而且波兰人和罗森人承受着不平等的权利，但加里西亚的人民还是认为他们比自己的俄国邻居先进得多。在他们看来，变成俄国臣民将是一种退步。这一点我们也必须经常清楚地记在心里，否则我们就可能存在这样想法：只须我们进入东加里西亚，那里的人民就会起来反对永远压迫他们的奥地利人。反之，如果我们被这样一个前景——即利用自然边界完全满足我们的所有权——所

引开，我们肯定将为自己的未来招致无穷的麻烦与消耗。加里西亚人并入俄国，对我们来说，在较小的程度上可能成为阿尔萨斯-洛林，就象东普鲁士并入俄国一样。”

在发展铁路事业上，奥地利人也把我们远远地抛在后面。他们用八条铁路(十条轨道)每二十四小时能向边界开驶二百六十列火车，我们却只有四条铁路向同一地点运送军队。由于他们边界线上的无论那支军队都要处于喀尔巴阡山之前，这个山脉以前被认为是退却的障碍，是加里西亚与奥地利其他地区间交通的障碍。但最近十年已有五条铁路通过这座山，并且已做好准备工作，再铺设三条铁路。尽管我们没有准备，奥地利人即使在日耳曼人的煽动下也不会轻易进攻我们，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将会遇到一个坚决的敌手，并导致一场民族战争。另一方面，我们也切不可用这种观念欺骗自己：我们能够轻易地打败奥地利人。他们装备精良的庞大军队将以加里西亚的坚固设防的营地为基地，如果指挥得当，并能出动优势兵力来对抗我们。我在1900年的报告中关于俄奥边界问题有如下结论：

“为了改变现有边界而进行战争，这对奥地利和俄国都不是有利的。

“能够得出关于我们与这两个强国边界问题的这种结论是令人满意的。由于我们没有对邻国土地的渴求，同时又做好不惜任何牺牲捍卫我们自己国家的充分准备，那么我们就可以期望，如果我们方面没有理由发动一场战争，我们邻国方面也会用一切办法避免与我国开战。”

4. 与罗马尼亚的边界——在奥匈帝国之南，我国有四百六十六英里与罗马尼亚毗连。这条边界线是沿着普鲁特河与多瑙河三角洲以北的支流划界的。它是以天然河流形成的，充分适合我们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要求，因此无需更改。年轻的罗马尼亚王国约有五

万一千平方英里土地,五百万人口,是欧洲二等强国之一。我国与 i. 57
罗马尼亚的贸易每年约达一百零二万英镑(以 1893—1897 年的
平均数计算),占我国对外贸易的百分之零点八。我国出口每年平
均为七十五万英镑(占我国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一点三)。从我国方
面有两条铁路通往边界:一条通到翁格内,从那里再到雅西;另一
条通到雷尼,那里有公路延伸到加拉茨,因为该处没有横跨普鲁特
河的桥。虽然罗马尼亚的生存全靠俄国,但它与德国的关系密切,
与奥匈帝国的关系更密切,它又显然急切地想发展军队,并在它边
界的我国一边构筑防御工事,凡此都肯定地表明,它在一场欧洲战
争中可能起来反对我们。其理由可能是,万一爆发这样一场冲突,
希望从我们手中夺取比萨拉比亚,该地居民一半是罗马尼亚人。

5. 在外高加索,我国与土耳其毗连三百二十五英里,与波斯
毗连四百六十五英里。前者地跨三大洲,面积一百五十八万一千
四百平方英里,人口四千万。我国与土耳其的贸易(以前述年数计
算)每年为二百十一万英镑,占我国对外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二点
一。两国边界是 1877—1878 年我国打了胜仗之后确定的。边界 i. 58
线大部分沿河流这样的天然疆界而划定,它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我
国占领地区免于土耳其的任何侵略企图而保持完整,而且给了我
们一条向埃尔佐鲁姆进军的有利路线,埃尔佐鲁姆是小亚细亚最
重要的据点,也是比司库台更近的有点抵抗力的唯一要塞。因此,
按照我们的观点,现有边界是可以接受的,十分满意的,无更改的
必要。

由于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介于我们两国之间,我国与土耳其
在欧洲没有很长的陆地边界。在大陆上我们与它直接接壤的地方
只有高加索,这也是我们能够越过边界向它直接进军交战的唯一
地点。尽管我们对自己所处的地位是满意的,但也一定不要忘记,
土耳其一遇良好时机,就可能奋力夺回被我们占有的领土。要想

使我们边境的阵地安全,我们就应平定高加索,改进当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当地军队的组织机构,并加强对黑海的控制。

6. 在土耳其以东,我国在外高加索有四百六十五英里与波斯交界,由此往东,有二百七十五英里是沿着里海的,再往东是陆地边界五百九十三英里,直到赫里鲁德河上的祖勒费卡尔。包括里海海岸,我国与波斯有一条一千三百三十三英里长的共同边界。^①我国与它的贸易最近十年逐步增长,由 1888 年的二百万英镑增加到 1897 年的三百五十万英镑。我国陆路通商只有与德国、奥地利和中国的贸易超过这个数字。九年间,我国出口已由九十万英镑上升到一百六十万英镑,进口由一百一十万英镑上升到一百九十万英镑,然而,我国出口由于糖和棉花出口税很重的回扣而受到人为的刺激,进口却因对(来自中国和印度)途经波斯的茶叶征收高额税,以及对外国制成品几乎是禁止性的关税而减少了。波斯在印度洋的地理位置,处于一条自欧洲至印度最短的路线上,加上它资源的不发展状况和军事上的孱弱,使得它成为争夺中东优势的大国之间任何斗争的天然活动舞台。迄今为止,俄国和英国是主要的竞争者,但德国现在显然也准备参加这种竞争,因为它正以最大的努力在小亚细亚建立自己的立足点。我国与波斯是有漫长边界线的邻国;两国间存在着长期的和平关系^②;我国根据古利斯坦条约享有的特权使我们有权干预这个国家的内政管理,并允许我国在里海上保持独占的霸权,虽则波斯北部无防御海岸也濒临里海;最后,还有我国军事方面的完全优势;凡此种种,可以说目前给了俄国在这个国家以有效的政治上的支配地位。至于经济优势,我们只掌握北部三省的贸易;该国其余地区的优势都不属于我们。

^① 在外高加索,沿阿拉斯河与阿斯塔拉河的边界是由 1828 年土库曼查伊条约确定的。在里海对岸,沿阿尔台克和科佩特山脉的边界由 1881 年德黑兰协定确定。

^② 外高加索边界保持有效已有七十年。

在南部诸省，经济优势几乎全部操在英国手中。英国夺取在印度洋沿岸的据点，建筑铁路和发展对波斯的贸易，显然是希望不仅确保其在波斯南部的霸权，而且还想要逐步攫取中部诸省的贸易，甚至在北部与我国竞争，德国不久也将成为我们严重的竞争对手；它已控制了自特拉布松至塔布里兹的重要通商路线。下面是我前所引证的报告中的有关结论：

“我国与波斯的边界问题已经解决并已全线划定。无论 i.61
在战略方面还是在其他理由方面，边界的任何更改都是不值得的；我们也不想进一步从波斯得到让与我们的土地。正相反，不仅获得尽是外国人的新地区以及随之而来的行政管理费用的消耗对我们没有好处，而且任何可能损害我们目前与波斯人来往中存在的友好感情的行动，显然对我们的利益都是有害的。从军事观点看，似乎也不需要重新调整边界。这条边界把同种的民族——即在连科兰和沿阿尔台克河的波斯人和土库曼人——隔开只是很短的距离。顺着边界其余部分的天然界标前进，它象一条种族分界线——在亚美尼亚人和土耳其人之间的外高加索；在波斯人、土耳其鞑靼人和库尔德人之间的阿塞拜疆；在土库曼人和外高加索的俄罗斯人之间，以及库尔德人和霍拉桑的波斯人之间的中亚。最近五十年来，我国与波斯的贸易，进口与出口都有巨大增长，当前我们的责任就是保持和发展这种贸易，并采取各种步骤，使其北方市场一年年更加完全为我们所控制；但贸易的进一步增长只有波斯人民感到安全和内部秩序稳定才有可能。由于二十年前征服了土库曼人，我们保证了霍拉桑人民的和平发展，现在我们正在收获我们在格奥克-泰佩胜利的果实，因为我们仅在霍拉桑一地的贸易，一年就达一千万英镑。因此，假如将来产生需要的话，帮助波斯政府在邻近我国边境的那部分地区维

i.62 护治安,肯定是我们的责任。所以,当前我们在波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在其靠我国最近的诸省中保持秩序,并保持在该国北方市场的控制。”

7. 由波斯边境再向东是我国与阿富汗定界不久的边界。这条边界线长一千二百五十九英里,通过一片沙漠地区直到奥克斯河,从那里又顺该河绵延。这条边界令人满意,并已妥善划定。

阿富汗西界波斯,东、南与俾路支和印度帝国接界,国内有广阔无垠的兴都库什山脉及其许多支脉。面积约二十一万七千八百平方英里,人口五至六百万,其中百分之五十六是阿富汗人,百分之四十四是非阿富汗部族。由于它介于我国在中亚的领土与英属印度帝国之间,长期以来就是渴望在那里建立独占霸权的英国所追逐的目标。他们害怕我们要向印度推进,对我们在中亚的每一个活动都投以警戒的眼光。远在1873年他们就试图同我们达成一项协议,根据这项协议,如果他们克制,不干涉布哈拉,我们也应节制自己,不对阿富汗进行任何干涉。从那时起,他们已在阿富汗边境上有过若干推进,甚至已吞并了它的一部分。然而,他们愈是在印度河对岸前进,遇到的困难就愈大,结果并没有确保边境更为安宁,却使他们当前在印度西北边境的地位处于动荡不安和不满意的状况。阿富汗非但没有变成英国的,而且在阿布杜拉·拉赫曼二十年的有力治理下更为强盛——强盛到这种程度,以致现在已成为一个具有健全军事组织的真正独立的帝国。^①至于这个国家的感情,对我们是同对英国人同样敌视的。

自1873年以来,我们在中亚占有的地区也大大增加了。我们征服了土库曼和浩罕汗国,击败了希瓦的居民并把希瓦变成一个贸易中心;我们虽没有吞并布哈拉,但以建筑通过它的铁路和把它

^① 原文如此。——编者

包括在我国财政区域以内的办法，使我们获得了绝对的霸权。就这样我们把自已的边境线推向波斯和阿富汗，在我们的边界沿自然特征划定之后，现在我们有了一条明确规定的边境线，并在整个边境线上幸运地享有和平。我 1900 年所作的报告中所表述的关于同阿富汗边界我所得的结论如下：i. 64

“如果我们把英国自 1873 年以来在印度的政策的成功与我们在中亚进展的结果对比一下，我们是有理由为自己庆幸的。我们现在的境况比他们好，也比他们稳定得多。使我们当前的处境变坏不会有任何好处，而如果我们吞并了阿富汗的一部分领土，我们的处境肯定是会变坏的。因为阿富汗北部的非阿富汗人希望被我们接收过来，所以我们吞并阿富汗的土耳其斯坦和赫拉特省似乎是很自然的。这种吞并将给我们增加二百万以上的新臣民，他们多数都是勤劳熟练的农民；将把我国边境线推向兴都库什山，这是许多俄国人长期以来的梦想；并将使我们占有非常有名的赫拉特，而这毫无疑问是一个具有很大战略重要性的地方。乍一看，这种利益似乎是无可争辩的；但比较仔细地研究这个问题，很清楚，实现这些计划的结果，在当前，将为自己制造无穷困难，在将来，将产生可能的危险。首先，地理学上的疆界与人种学上的疆界就不一致。因为如果将我们的边界推进到兴都库什山边，我们将被迫把阿富汗血统的部族接收过来，然而同时还要排除一些与我们业已接收的民族同种的非阿富汗人。这本身就充满了困难。那里住在山谷的是农民、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他们或许会不加反抗地屈从于我们，但那里的山民，即使是非阿富汗血统的山民，将会为保卫他们的自由而勇猛战斗。即使征服了他们，我们也会象今天英国人在印度一样，不会有安宁。沿着我们的新边境，叛乱将不断发生，来自阿富汗本部的山民将象印i. 65

度边境的部族一样，开始进行袭击，连续的远征将成为必然的。结果我们将象英国人所经历的一样，被迫将边境一再向前推移，并吞并更多的领土。事情将这样发展下去，直到我们的边境终于与英属印度边境相一致为止。这个被接管的地区的组织与管理、建筑公路和大量军队所需要的设防阵地以及支付远征的费用等等都需要大量费用。最后必须记取，阿富汗土耳其斯坦和赫拉特的人民现在把我们看作是将他们从阿富汗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解放者，一旦接收过来，他们就可能改变对我们的感情。其后果会是，我们没有保持住对我们甚有好感并乐于应召前来帮助我们的邻人；却负上新的义务，得到了些心怀不满的臣民，并须派驻军队去控制他们。”

1878年，即二十七年前，当我在总参谋部亚洲司任职时，就已确信俄英两国在亚洲融洽合作的必要性，并对每一个进攻印度的计划表示反对。1885年我国在库什克与阿富汗发生冲突后，与英国的关系极为紧张，破裂随时都可能发生，这时我们做了准备，在中亚集中了一支军队，以备万一英国宣战。我被提名任这支军队的总参谋长；在汪诺夫斯基将军主持的委员会会议上，我就与英国取得和平协议的必要性公开陈述了自己的意见。我指出，这两个国家在亚洲大陆上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两国都必须对付被征服的各民族想要推翻他们的征服者那种自然的愿望；因此，我们在中亚的军队帮助英国同当地民族作斗争比我们激起印度来抗英而向印度推进要合理得多。1890—1898年我担任外里海军区司令期间，曾在我的权力范围内竭力在阿富汗边界上保持和平，在我获准向库什克修筑一条铁路之后，我极力主张必须与英国达成协议，以便把印度与土耳其斯坦的铁路网连结起来，从而一劳永逸地结束我们在中东的竞争。我任陆军大臣后，仍继续鼓吹谋求协议，在前

面已经引用过的我那个报告中简述阿富汗边界的那一部分的结尾这样写道：

“我不得不表示我坚定的信念，即：用一条自查曼经坎大哈和赫拉特到达库什克的铁路线把印度与中亚的铁路网连结起来，将造成一条有重要国际意义的铁路线。这样一条铁路线将来会有助于和平地划定我们在阿富汗的势力范围，而且如果英国能放弃在我们前进的道路上到处设置障碍的政策，这条铁路也将促进以两国互利为基础的亲善关系^①。由于我完全确信俄国如果占有印度，在二十年内将成为一种灾祸和难以支持的负担，所以我认为我们同英国建立一种协约关系便是自然而又正确的，这样万一印度发生任何大规模起义，我们就可以站在英国一边。二十世纪在亚洲一定会有一场基督教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的大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基督教国家结成同盟反对异教种族，对于人类的幸福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我国对同中国、朝鲜和日本边界的意见，由于它们的重要性，我将尽可能逐字引用我的报告：

“从帕米尔几乎一直到太平洋，我国同中国接壤达六千零七十四英里。中国面积约为四百二十六万七千平方英里，人口约四亿，因此它在世界上人口最多。中国人民多数是佛教徒，约有二千万回教徒和约一百十五万基督教徒。我国同中国的贸易，过去十年间在逐渐增加，已从 1888 年的三百一十
i.68
万英镑增加到 1897 年的四百五十六万英镑。”

“虽然我们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我国的对华出口却微不足道；但希望穿过满洲的铁路及其通往旅顺支线的修筑将改

^① 照最近的事来看这观点是有趣的。——编者

变这种无利可图的状况，使之有利于我们。^① 虽然我们与中国发生关系已有两世纪之久，虽然两国边界接壤达六千余英里，但这种关系和边界没有一次被军事行动所破坏。我国在西伯利亚驻军的数目始终是很少的。这是由于中国人一般都性好和平，由于黑龙江的地位和其他自然屏障——巍峨的山脉和辽阔的草原，并由于中国和它在最靠近我国边境的臣服种族之间缺少任何真正紧密的联系。

“我国占领乌苏里江地区，使我们有必要征集新的军队加以守卫。最后，中日战争及其后果迫使我们迅速采取进一步行动以加强我国在远东的力量。这次战争一方面暴露了中国政治上的极端虚弱，另一方面又表明了日本的巨大力量和精力——这些事实在东亚事务中具有极大的重要意义。我国同中国接壤的边界是如此之长，使我们对于这种发展趋势自然不能漠不关心。日本流露了要占有我们的邻邦朝鲜的意图；因此我们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对朝鲜建立一种暂时的保护关系，并且根据我国同日本的一项协定，朝鲜被宣布为独立国家，表面上听其自主。但我们并没有以此为限。由于我们在战争中曾给予中国以巨大帮助，我们便以商业为借口获得了修筑一条从外贝加尔经满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译者）的铁路的特权，而且作为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我们发现有必要

① 1897年主要出口有：棉制品，三十四万四千一百英镑；石油及石油产品，十万零八百英镑；羊毛，四万零四百英镑。主要进口有：茶叶，三百二十一万零九百英镑；棉织品，十七万零二百英镑；纺织品，十六万五千八百英镑；家畜，七万八千七百英镑；皮革制品，七万二千三百英镑。出口总数，六十四万英镑；进口总数，三百九十二万英镑。

俄中边界的中部和绝大部分地段由1687年涅尔琴斯克（即尼布楚——译者）条约与1727年布连斯克条约、恰克图条约所划定；最西部由1864年楚呼楚（塔城）条约和1881年圣彼得堡条约（在伊犁和约之后）所划定；最东部沿黑龙江与松花江，由1858年璦琿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所划定；我国最后在中国取得的土地——关东半岛南部——是1898年割让给我们的。

努力取得关东半岛的一部分(包括大连和旅顺)作为租借地^①。这种前进政策迫使我们从俄国欧洲部分抽调军队增加我们在东方的兵力,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就削弱了我们在西方的地位^②。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方针,并把整个满洲包括在我们的势力范围之内,但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的边界是相当满意的,如果以并吞满洲任何部分的办法来改变这条边界,将是极不合适的。

“在极西边,我国的边界沿着巍峨的天山山脉本来就非常险固,因此,虽然疆界那边的喀什噶尔人与疆界这边的东土耳其斯坦我国当地居民是同种同族,但改变这种疆界却不会得到什么。再往北,边界线把伊犁盆地分割为二,这里的一部分居民也是属于同一种族的各个部落。与前面的情况相反,将肥沃的伊犁地区(这个地区象一个坚固的稜堡一样向东突出)加以并吞,对我们会有某些好处,因为那会使我们便于设防,并且可以作为对中国人的一种威胁。然而这样一种好处是比较不重要的,并且不足以证明我们应当为此而损害同中国的关系。从这里一直到满洲,边界线都穿过蒙古草原地带,这一带边界的位置对我们来说是够牢固的,使我们既可以应付当地情况,又可以应付因中国对它的边界各部落缺乏控制而造成情况。最后,在最东边——在满洲——边界则不那么保险,由于穿过满洲以最短的路线修筑一条连结乌苏里江地区与外贝加尔的铁路,我们的地位已变得不平静了。

“说到处于北面的黑龙江地区、东北面的乌苏里江地区和

① 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过满洲缩短线路,因此在商业上有巨大的价值,但在军事上是危险的。沿黑龙江的线路较好,因为铁路只通过俄国领土,并有黑龙江掩护。

② 为使我们在关东能有足够的部队,陆军部被迫削减放得萨和基辅军区六千人的编制。

南面的关东半岛之间的中国这一片地方的地位，很自然就要发生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将来对它怎么办？并吞它将是很不上算的，且不说这样一个事实，即：夺取这一片地方——这是中国最重要的省区之一——将永远破坏中俄之间自古以来的和平关系。那样做的结果将会是许多满洲人定居在我们的领土内，定居在俄罗斯人现在还很稀少的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地区，我们虚弱的殖民地将被黄种人的浪潮所淹没。东部西伯利亚将完全成为非俄罗斯人口，而我们必须记住，只有俄罗斯人现在构成、将来也会构成我国人口中的可靠成分。中国人这样涌入阿穆尔沿岸地区，无疑会改进这里的农业水准，并把这里的荒地改造成为花园；但在同时，西伯利亚的剩余土地将转入非俄罗斯种族之手，而每一英亩这样的土地我们都是应该保留给自己的民族的。二十世纪的俄国人口将需要所有这些土地。由于俄国人口到公元2000年很可能会达到四亿左右，我们现在就必须开始至少为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的人口留出土地。因此，如果满洲仍然是中国完整领土的一部分，那倒要好些。但是，如果我们决定不予以吞并，无疑我们应当采取一切手段来取得商业上的绝对控制，以穿过那一地区修筑铁路（例如外贝加尔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以及至旅顺的铁路）的办法来巩固我们的地位。我们不应该再从中国获得任何进一步的特权，但是我们在最近的将来对中国的政策应该是——

i. 72

“1. 不允许中国的武装部队有任何增长，也不允许它的武装部队的训练有任何发展，特别是在北方，并且禁止外国军事教官到那个地区。

“2. 尽可能地发展我们同中国的和睦相处的关系和商务关系，首先从北方诸省开始。

“3. 尽可能地避免在中国土地上同其他欧洲国家发生任何争执，为了保证这一点，我们应该把注意力限于华北，并且不在长城以南、特别是不在长江流域承办铁路企业。

“我国边界的最后一部分与朝鲜接壤。朝鲜土地面积八万平方英里，人口至少有一千一百万，其中只有约二千到一万名中国人，四万五千到五万五千名日本人，约三百名欧洲人。^①朝鲜的地位是很特别的；它同时附属于中国和日本，然而自1897年以来，由于我国同日本的协定，它的独立已得到了承认。因此我们同它交往和我们对它的政策都须极端慎重。虽然我们认为自己没有必要吞并这个国家，我们也决不同意活力充沛的日本或其他任何强国控制那个国家。当前对我们来说，保持一个虚弱的、独立的、但是在我们保护下的朝鲜，是解决朝鲜问题最简单的办法。马上建立保护国不仅需要所有各种经费，而且可能在无准备的情况下把我们拖入战争的泥坑。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象在波斯和华北那样，进行有系统的工作，逐步达到对这个国家经济上的绝对控制。占领关东半岛，永远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地位，并把经过满洲的交通道路修好，这些就是解决这个未来的问题的先决的、并且是重要的步骤。在当前，我们决不准备在朝鲜采取积极的方针，并且必须无论如何也要避免因朝鲜事务激起与日本的冲突。

“在我们极力取得对朝鲜市场的控制时，一定会遭到日本的拚命反对，即使这种反对仅仅以政治竞争或只不过是贸易竞争的形式出现。如果我们不能完全避免一场冲突，二十世纪初我们很可能不得不与日本进行战争。”

^① 最近到朝鲜的主要是日本人以及少数中国人。他们在温暖季节去的较多，从事捕鱼和砍伐木材等活动。

从对我国边界的这种非常简短的考察中可以看出，我国如何以一万一千余英里的边界与九个国家相毗连，并且不论在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愿对边界有任何调整。这是非常令人满意的，而如果我们满足于现有边界，又在本世纪只关心于巩固我们二百年来所取得的这种地位，那么与邻国战争的危险似乎是遥远的。对现在这一代俄国人来说，这一方针是绝对重要的。我们的祖先为了增加我们伟大帝国的版图曾经作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为保持现有边境地区的存在所需要的斗争甚至在现在还是如此严重，以致它还进一步阻碍着俄国人民群众本来就缓慢的经济发展。事实上，我国边境地区的存在是以国家内地的牺牲为代价的，直到现在它还是帝国虚弱的根源，而不是力量的根源。这一代俄国人由于这些边境地区的管理和防御等需要而负担如此沉重，以致同时再承担任何新的对外事业可能很快就完全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但帝国人口在增长，它会满足于现有的边界吗？或者，俄国会不会必须解决进一步扩张的问题？解决些什么问题？这就是我提出报告时摆在自己面前的问题。我以为，俄国“在欧洲和亚洲都不增加领土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应该试图进入终年不冻的暖海，例如地中海内海和进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终年不冻的出海口，这事是很自然的。至于着手实施这些计划的困难与危险，我写道：

“不论我们占有黑海出海口或者进入印度洋或太平洋的愿望是如何地理所当然，这样的目的不使几乎全世界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是不能实现的。事实上，情况就是这样，在我们追求这些目的时，我们必须准备同下列任何国家的联合力量作战：英国、德国、奥地利、土耳其、中国和日本。其实，别人害怕的不是我们向上述任何地方的实际发展，而是这种发展的后果——如果我们成功的话。占有博斯普鲁斯海峡和通往地中海的通道将使我们能对埃及问题采取决定性的行动，并使

苏伊士运河国际化^①，而我们出现在印度洋将会成为对印度不断的威胁。但在欧美先进国家（它们现在是全世界的工厂与作坊）的心目中，不安的主要因素还是害怕我们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手中有了连结太平洋与波罗的海的铁路干线以及通波斯普鲁斯海峡、印度洋和太平洋的支线，就能够以我们无穷的天然富源控制全球的工业。”

最近各国的军备发展很快，因此我们在本世纪内要到达暖海 i.76 将遇到的困难之大完全会使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任何困难都相形见绌；而这一代俄国人的力量可以充分表明对于仅仅是为我们子孙争得所需要的东西，它也是不相称的。的确，对比一下战争实力就可以得出必然的结论：我们这一代俄国人不仅是太虚弱了，不能负担谋求我们未来四亿人口生存所需要的东西这样的新任务，而且我们可能的敌人力量的比较强大，使得确保我们帝国的完整也成为极端困难的了。下面就是我的报告中关于这一点的论证：

“最近五十年内我们邻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是如此迅速，尤其是德奥两国入侵我国的准备工作非常充分，使我国西部边境遭受的危险比我国整个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大。

“我们在土耳其边界的军事地位也不再象十九世纪初那样有利了。特别因为现在德国似乎十分热衷于染指土耳其事务，情况更是如此。高加索的防卫也已变得困难起来。同样，在阿富汗边界，现在我们有强大的邻国，它们在组织和军备方面都比上世纪初进步，越来越和我国在土耳其斯坦的军队处于同一水平。阿富汗侵略我国领土决非不可能，这一事实使 i.77 土耳其斯坦的防御大为复杂化了。

“目前只有中国没有值得认真考虑的军队，而且它也无力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或关东地区对抗我们。但取代衰弱的中国

① 原文如此。库罗帕特金将军这样写似乎是由于疏忽。——编者

而崛起的是强大的日本，它的军事力量对我国远东军队可能是危险的，直到我们能向远东派出足够的增援部队。

“不过尽管我们有漫长的边界需要保卫，尽管邻国的军事力量有巨大的发展，要想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打败我们，种种困难是如此明显，如此巨大，因此如果我们把自己的行动局限于自卫，大概没有敌人会来攻击我们。”

最后，经过对近邻诸国力量与资源的分析，迫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倘若发生一场欧洲战争，我国西部边境在俄国整个历史上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遭受这样大的危险，因此在本世纪初陆军部的注意力应当限于加强我国在该地区的地位，而不要转移到别处去进行侵略事业。”

第三章

i. 78

我国军队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在数量方面的扩充，平时编制与战时编制的适应情况，以及邻国军事力量的增长状况——在将近上世纪末时我国防御问题日益增加的复杂性

1700年，我国军队人数为五万六千人；1800年为四十万人；而到1894年我国战时兵力已达到二百万人；但十九世纪的这种增长与过去一百年的逐渐增加不同，是伴随着大的起伏的。对克里米亚战争结局的普遍不满引起了公众感情的觉醒，终于实现了农奴解放，那时向节约方面所做的巨大努力直接导致了军队的缩减。甚至1866年在科尼格拉茨隆隆的炮声中，我国欧洲部分的常备军却从六十万削减到三十七万二千人。然而不久普法战争打开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了可能来自西方的危险。直到那时为止，我们一直是按照传统生活，按照往日的老经验生活的，那时，战争用常备军进行，并不要求动员全国的力量；军队的调动是靠普通的公路，从宣战到第一次决定性的交战，几个月已经过去了。德国在1870年迅速地集中兵力，并能以大量军队迅速越过法国边界，这种情况表明，德国对我们这方向也有能力这样做。很久以来，我们忽视了在我国西部边境继续设防，唯恐给德国造成口实，怀疑我们不信任当今两国王室之间长期以来的传统友好感情。然而，它这样的进军速度（首先用以对付奥地利，其次对付法国），它的力量的极大的增长，它不仅为了保卫自己而且为了获得欧洲霸权的明显野心，这些都形成了威胁，迫使我们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予以对抗。

因此我国军队再度尽快地增加起来,在 1869 年到 1880 年之间,俄国欧洲部分军队的平时兵力从三十六万六千人增加到五十三万五千人,与此同时,还安排动员一支一百五十万人的野战军。但在这一时期内,我们邻近诸国在动员人员的数量上和军队集中的速度上都能更好地完成它们自己的部署。由于有一支平时和战时都一样的兵力,由此形成的我国战时军队现在已变得这样庞大,使它应该得到“国民军”的称号。但即使是一支国民军今天也是不够的。因为在对抗一个强大敌手的冲突中的成功行动,是要求做出各种努力——道义的、精神的、物质的——即整个国家都必须参加的一场斗争。换言之,以一支主要由为了进行实际作战而征召起来的人们所组成的军队,要在斗争中获得胜利,全体人民必须同情它,必须认识其任务的重要性和重大意义,并且必须毫无保留地支持它。

1870—1871 年的战争是德国人以真正的民族精神进行的战争。社会各阶级对政府着手进行的这场民族斗争的态度,是一种高度的爱国精神。军队的良好风气和无私的献身精神得到了高涨的爱国热潮有力支持,这种爱国热潮从普鲁士人开始,波及整个日耳曼各民族,上自国王下至农民。说德国的学校教师是 1870—1871 年战争的真正胜利者,是一种陈词滥调。这种说法或许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更加真实地加以表达:法国人不是被德国军队所征服,而是被日耳曼民族所征服的,它把自己的子弟和道义上的支持都献给了军队。而在法国皇帝、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之间却没有这样紧密的团结。与德国战斗的不是法国,而只是法国军队。战争的结局是大家都知道的。当侵略者蹂躏这个国家时,它的人民(除了少数例外)并没有表现出正当的爱国精神,也没有帮助士兵们去进行一场民族战争。战争在实际进行时,人民中一部分有识之士的确认为,进行一场内部斗争以推翻政府的时机已到,帝国军

队一被击溃，皇帝一被俘虏，他们努力追求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在 1877—1878 年有利的条件下抗击了土耳其。我国人民对巴尔干半岛的关系密切的斯拉夫民族的同情，在先前的塞尔维亚人与土耳其人的斗争中已经被唤起了，而且我们又是在同自己的传统敌人作战。因而众多的志愿兵和大量金钱便从俄国来到塞尔维亚。被报刊所激动的社会深受感动，并施加压力促使政府宣战，而积极作战自然便成为俄国士兵的一桩心愿，宣战的最终实现赢得了一片欢呼。前面已解释过，我国军队在比萨拉比亚集中的迟缓使我们可以进一步训练部队，特别是训练预备役士兵与选择最好的人担任指挥官，因而我们开进土耳其时已有相当充分的准备。我们的部队精神饱满，对胜利充满信心。但我们错过了宝贵的时间，而且土耳其人的抵抗比我们预料的要坚决得多。然而我们迅速增援，突破了一切抵抗，终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看来似乎这一次我们将要充分利用我军所取得的胜利，把对我们黑海海岸的保护置于永久的基础之上了。但我们却犹豫不决，在敌人首都城下拖延了作战，这样便听任我们军事胜利的成果被贻误时机的外交行动葬送了。英国对 1877 年东方问题的错误见解，加上我们对奥地利的不信任，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上层人物的厌战，这一切所造成的结果，与我们所作的牺牲是很不相称的。当柏林条约取代了圣斯特凡诺协定的时候，国民乐观的爱国情绪便为普遍的不满所代替了。我们在战争中是胜利者，但在政治上却打了败仗。

俄国在二十五年内在欧洲进行过两次战争，都过早地结束了。1856 年在塞瓦斯托波尔，在敌人无力进行战争的时刻，我们承认自己打败了。1878 年，我们虽然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却没有占领它，虽然我们征服了这个国家，但我们承认自己单独的力量并没有强大到足以保证甚至以前是属于我们的那些黑海沿岸地区的

和平发展。这些结局虽然使军队和国家普遍惊讶和失望，但却带来了补偿。正是柏林会议以明白无误的措辞向我们证明，在欧洲大陆上我们是孤立的，并且表明我们多么需要在西部边境进行整顿，如果我们不愿意遭到已作好准备的邻国突然袭击的话。但改善我国西部边境的军事地位——特别是对德国的——使之可以与我们的敌手达到同一水平，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意味着要以庞大的费用建筑和改进要塞，修筑道路和收集储备各种供应，而在这时我们的财政资源已被削弱，陆军自由支配的资金不但没有增加，得到的拨款却反而比战前少了。由于我们的慷慨，我们向土耳其索取的赔款太少了，而且又准许把付款期长期延长，使这笔款项不象法国对德国的赔款那样，作为一种“可靠的资金”用于战费和改进军队。大约也就在这时，我们对西部边境状况产生的忧虑之感，由于帝国在亚洲边境发生的新纠纷而增加了。

i. 84 我们最早利用我们在中亚的地位作出一点努力，间接地推进我们的总政策是在1878年，那时我们曾派出一支部队到撒马尔罕附近的贾姆，目的在于给当时正在与阿富汗交战的英国造成困难。这种以在别处（在阿富汗边界）施加压力的方法迫使英国让我们在近东自由行动的企图并没有成功。斯托利耶托夫的出使喀布尔使阿富汗人确信俄国会援助他们对抗英国，但当英国人大举进入这个国家时，我们却裹足不前，避而远之。埃米尔谢尔·阿里死后，这个国家又重新陷入一片混乱。阿卜杜尔·拉赫曼从撒马尔罕进入阿富汗，极力争取一些部族的同情和帮助，以图取得王位；他也力图获得我们的支持。但给他援助的却是英国人，不知道是好事还是

i. 85 坏事，在他整个统治时期他都记着这件事，而且成了我们的敌人。1877年到1879年，我们本来可以很容易地使阿富汗成为俄印两国之间友好的“缓冲国”，但因我们不顾考夫曼将军的主张，未能抓住这一最适当的时机，而其后被英国造成的“缓冲国”对我们是抱

有敌意的。由于我们对这个国家眼光短浅的政策，我们曾一度在中亚丧失了威信，而许多英国间谍（他们承担着煽动好战的土库曼人反对我们的使命）渗入到土耳其斯坦草原。土库曼人对我国里海东岸领土的入侵更加频繁更加大胆了，最后甚至远达克拉斯诺沃茨克。我们不能再观望了，于是决定派遣远征军进入草原夺取格奥克-泰佩。罗马金指挥的第一次远征的失败和斯科别列夫将军领导下的远征在格奥克-泰佩遭受的严重损失是一个信号，说明我们可能在中亚遇到严重纠纷，因此必须在那里增加驻军，并须——这更为重要——改善该地区与俄国的交通。意大利人在阿比西尼亚的事例表明，即使是游牧部族，只要爱国，领导得当，就能够对抗欧洲的正规部队。事情越来越清楚，在当时的复杂条件下，在 i. 86 远离俄国前哨奥伦堡一千三百三十五英里而又交通不便的中亚地区留驻当时那样小的一支驻军，就要招惹灾祸。因此我们开始修筑中亚铁路网，两年前才完成。^①这些铁路线耗费的巨款，必须以牺牲西部边境和在远东的防务准备为代价来提供；但我们这个行动的明智性却在 1885 年得到了充分的证明。当时在边界骚动中阿富汗部队以在库什克溃败而告结束。^②经与英国谈判（这项谈判有时几乎陷于破裂）以后，达成了临时条约，而由一个特别混合边界委员会确定的目前我国与阿富汗的边界，二十年来再未受到侵犯。我再重复一遍，我坚信这一边界无论从什么观点看对我们都是满意的，以向赫拉特^③推进来改变这条边界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有益的。发动每次以稍微给我们增加一点领土而结束的小远征的时期因这条边界的划定而停止了。现在同我们在中亚接壤的 i. 87

① 这显然是指 1904 年完工的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编者

② 我国军队那时是二千人。那是一次不重要的事件，在那次事件中我们只有四十三人伤亡。

③ 离库什克要塞阵地七十三英里。

波斯和阿富汗这两个国家中,后者拥有这样庞大的武装力量,因此我们要进入这个国家,不管英国可能给它的援助多大,都需要一支相当大的部队。另一方面,守卫我们这一带广阔的领土已非常困难,主要是因为泛斯拉夫^①的宣传很广泛,如果阿富汗人借口要解放臣服于我国的民族对我国入侵,居民的局部起义是十分可能的。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些地区保持足够的部队,不仅为了应付万一发生的战争,而且也为了防止内部出现的纠纷。这样,最近四十年来——实际是从我们占领塔什干以来,我们在中亚所处的地位更加复杂了。现在我们驻土耳其斯坦的不是过去用以征服这个地区的五个或六个营,而是整整两个军团。

正象亚历山大二世即位时的情况那样,亚历山大三世即位后,1.88 作了节约军费的巨大努力,军队裁减了二万八千人;但三国同盟的缔结和邻国军备的迅速增长又使我国军队有了增加,以及与同样感到威胁的法国有友好关系。对于德奥两国创建新军,我们的回答是: 募集新部队或将驻扎在高加索和内地的部队调往西部边境。在这场严重的战备竞赛中,我们无法赶上我们的西方邻国,这与其说是仅在军队数量方面,不如说是在必要的组织方面。我们太穷太落后了,因为现代的动员需要在一个国家的全部后备部队中选拔出大量的分遣队,而且整个国家都深刻地感受其影响。就象德国著名作家冯·德尔·戈尔茨所说的一样,现代战争必须由武装起来的国家,而不是由军队来进行。如果别的条件都一样,胜利就属于能够在战场上最快地集中优势兵力的一方。这些部队不仅要由有才干的领导者指挥,而且必须供应充足,增援及时,装备精良。正是主要地在这个方面,我们很快就感到自己处于劣势。我们是在没有任何兵力或兵力很小的情况下培养干部的,多亏我国有大量的人口和为数众多的预备役士兵与民兵,使我们能够动

^① 原文如此。疑为泛伊斯兰。——编者

员起数量庞大的各种部队——正规军,预备役士兵,后备部队和民兵。但因缺少军官和供应不足,这些部队在战争中的价值就大为不同了。当我们的先头部队好歹能象邻国一样迅速集中起来时,后备部队却只能慢吞吞地动员,后备部队人数非常不足,最后,民兵的作用也不能和其他部队同时体现出来,而且就连做到这样也有很大的困难。虽然我们的人员、马匹很多,但军需品尤其是技术装备不足(如电报机、电话机、气球、通信鸽、轻便铁路、炸药、器械、电线等)。由于科学知识的经常提高和对结构的强度要求不断增加,要塞刚刚构筑起来,全部工程就得重建。因此我们无法使我们的军备和防御工事适合于时代要求,它们大部分是陈旧的。我们的攻城炮兵部队虽然得到一些好的现代大炮,但其机动性不如我们邻国的大炮,而且我们远没有具备技术部队如坑道兵、地雷工兵和铁道兵连队。我们没有平时或战时为交通线服务的辅助勤务组织;打算建立的补充部队兵员不充足;而且也没有保持很多军官和医生的办法。但我们最大的危险还在于我们铁路的劣势。 i. 89

1882年以后,我们的效率有很大提高,但达到的水平也只是能以两倍于邻国的时间向边境集中兵力,这样我们不仅注定要处于守势,而且后续部队也要被各个击破。自1870—1871年的教训之后,我们甘心认定自己在动员的速度方面再也赶不上德国了,但又自以为比奥地利好。大约十年或十一年前,我们在这一点上也醒悟了。奥地利陆军部创造了惊人的奇迹,他们在邻近我国边界的地方布置了既可进攻又可防守的假想作战区,而且,由于穿过喀尔巴阡山建筑了许多条战略铁路,这条山脉已不再成为他们前线阵地后方的危险障碍了。除了拨给军队的通常经费之外,德奥两国都依靠额外的和特殊的补助;因此他们的仓库是充实的,他们的要塞构筑坚固,装备齐全,他们还修筑了道路。我们不仅因为缺少资金妨碍了在这些方面的进展,而且我国发展的落后状态也被证 i. 90

i.91 明是一种不可克服的障碍，特别是在铁路建筑方面。在我们的邻国，战略铁路方面的要求通常是与经济方面的要求一致的。在我国，这两种要求却是互相冲突的，我们提出的每一条战略铁路财政部都以在经济上不合理为理由而加以反对。

在远东，我们多年来没有遇到多少麻烦。虽然俄中边界长达六千英里，但直到1880年——二十七年前——由于日本军事力量的增长和中国的觉醒，才迫使我们考虑在这一地区加强我们的地位。

1871年，中国西部地区^①为回民叛乱所震撼，我们为了保卫自己的边境，占领了伊犁地区。当地居民——东干人和塔兰奇人——先已完全击败了中国人和一部分加尔梅克人，未给我们造成什么麻烦，并且在我们明确答应他们成为俄国臣民之后，放下了武器。但当我们的士兵在当地奋勇立功的时候，我们的外交官却坐在遥远的办公室里，不与任何了解当地情况的人如考夫曼或科尔巴科夫斯基商量，就认为应当答应中国人，一旦他们平定了叛乱，

i.92 到达伊犁，即可将伊犁归还他们。其实我们当然希望中国人不能打败阿古柏，因而也就永远不能占领喀什噶尔，然而我们却在帮助他们达到这一目的。当时的形势是奇怪的，1876年我作为俄国特使在库尔勒^②附近阿古柏营地谈判我们刚刚征服的费尔干纳的划界问题时，他本人就批评了这件事。他非常公正地指责我，说当我和他办理交涉时，俄国总参谋部的另一个名叫索斯诺夫斯基的中校军官却在俄国当局知情的情况下接济中国军队来进攻他。他的说法是完全正确的。阿古柏突然死后，中国人迅速地占领了整个喀什噶尔，直打到伊犁南端，并宣布他们对该地区的主权。尽管考夫曼极力主张我们不应交还伊犁，但我们拖延了。1878年，当我负责总参谋部亚洲司时，曾上书我的上级海登伯爵，指出伊犁对我们有

① 即所谓东土耳其斯坦。——编者

② 离罗布泊湖(是普列杰瓦斯基发现的)不远，塔里木河流入其中。

极大的战略价值。我并且说明，如果我们由于不精确的契约感到负 i. 93
有义务非交还该地区不可的话，那末我们因耗费了八年的占领费
用而要求赔偿，无疑是非常正当的。我建议索取一千万镑金币，因
为这对建筑西伯利亚铁路是适宜的和及时的。考夫曼支持我的论
点，但我们的外交官们反对。亚历山大二世皇帝指定了一个特别
委员会，包括外交大臣基尔斯、财政大臣海军上将格里也格、考夫
曼将军、奥布鲁切夫将军和我，在米柳京伯爵主持下讨论这一问
题。基尔斯和格里也格海军上将赞成不要任何赔偿即将伊犁交还
中国。格里也格断言俄国并不特别需要金钱，两位大臣都认为因
有许诺，我们对中国负有义务——这是我们的外交官在当地的人
们不了解的情况下轻率作出的许诺——而 1871 年对东干人和塔
兰奇人所作的其他许诺就可以忘掉。经过旷日持久的讨论，决定
将伊犁交还中国，索取五十万英镑作为赔偿。与会人员中最反对
从中国获得一大笔钱的是财政大臣，他显然忽视了这笔款项将促
使西伯利亚铁路的修筑工程提早十年完成的可能性。由于这一疏 i. 94
漏，我们后来付出了代价。在此期间，中国作出一种强硬的姿态，
威胁要夺取伊犁，将军队开到乌鲁木齐、玛纳斯、库尼亚吐鲁番和
其他各地，直指伊犁。我们连忙从塔什干派遣军队前往伊犁加强
我们的阵地，以应付局面。1880 年，我们在巴罗霍林斯基山脊构
筑工事，将它与中国人占据的东土耳其斯坦的部分地区分隔开来。
那时我指挥着前卫部队，看到我们的军队多么高兴地服从进军的
命令。他们对那种不得不将我们占领了将近十年的好地方舍弃
的想法感到厌恶，对我们对答应过要加以保护的背信弃义的人民
主张也深为憎恶，这些人甚至在那时还聚集在我们营地周围，对
我们将把他们移交给中国人的谣言感到惊慌。当然，在决定这个
问题的时候，我们对于中国军队本身以及对中国的军事智谋怀有
一种非常夸张的概念。

以后事情的进展很迅速。我们开始了建造穿越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并占领了关东半岛，这样不仅使中国而且也使日本惊恐不已。

i.95 这样，在十九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事情变得牵涉更广了。我们不仅必须在西方应付奥德两国的备战和靠近罗马尼亚、土耳其、阿富汗的边界地区受到的威胁，而且从1896年至1900年，我们还必须面临着保卫我们向太平洋推进时在远东突然地——对陆军部来说也是意外地——得到的阵地的的问题。保护一万一千英里的边界，保持军队以便能与至少九个国家的各种联合进攻作战，这样巨大的任务，表明我们需要庞大的军费。

第四章

1.96

由过去二百年军队工作中引出的推论，它对二十世纪初我国军事政策所应采取的方针有某些指导作用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中，我国的精力主要集中于扩张和巩固方面。在实现这些目标时，我们曾进行过多次战争，由此而得来的经验有助于说明将来陆军部应当怎么办。以下似乎就是能从过去引出的推论：

1. 我们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的推进，俄国领土的向西扩张(白俄罗斯，小俄罗斯，波兰)，向南扩张(高加索)和向东扩张(中亚)，所有与此有关的各项任务都是由陆军实现的。从第二章关于我国边界的分析可以看出，多亏我们已做的工作，俄国不需要再增加领土了。这个结论是非常重要的，非常令人满意的。同时，我们现在的军事地位与邻国相比，不及先前有利，主要是由于我们缺少铁路，我们的西部边界由于德奥两国的完全战备状态也容易招致巨大危险。 i.97

2. 在前两个世纪中，我们只享受了七十二年的和平；在其余的时间里，俄国进行了三十三次对外战争和两次国内战争。所以平均每六年发生一次战争。在十九世纪前半期战争尤其频繁，而到后半期，如果除去在高加索和亚洲的战役，我们只进行过两次战争——在 1853—1855 年和 1877—1878 年。我们是在经历了二十二年持续和平以后进入本世纪的。这是二百年当中一个较长的间隙；然而在此期间到处都产生过许多可能引起战争的原因。帝国

不仅受到武装和平沉重负担的压力,而且形势是如此紧张,以致有理由担心“大炮会自动地开始射击”。过去三个世纪的开始,对俄罗斯说来都充满了悲伤记忆;考虑到各种军事力量都想自由行动,因此可以预料,二十世纪开始时是不会没有战云笼罩的。只需在边界的一处有一个火花,就能引起遍地的大火灾。在西部边界、土耳其边界和阿富汗边界,存在着严重的战争潜因。1895年,在中国边境确实也有作为宣战理由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制造任何另外的战争借口,就需要非常审慎地处理国际事务。

3. 如果把高加索除外,在此期间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只进行过六次战役,前后历时六年半,其余的战争都是在边界以外进行的。这给予我们很大好处,并表明当时我们比敌方处于更高的备战状态。进攻比防御具有这样巨大的好处,因此在与邻国的战争准备相同时,我们始终应当争取处于进攻的地位。

4. 在十九世纪的二十六次战斗中,一百五十万战斗人员之中死伤人数达三十二万三千人——几乎达到百分之二十二。伤亡最重的一次是在奥斯特里茨——七万五千人参战,伤亡二万一千人;在鲍罗季诺——十二万人参战,伤亡四万人;在塞瓦斯托波尔——二十三万五千人参战,伤亡八万五千人。下表表明两个世纪中我国人员损失的总数:

	参战人员	伤 亡		
		伤 亡	病 者	总 数
十八世纪	4,910,000	350,000	1,030,000	1,380,000
十九世纪	4,900,000	610,000	800,000	1,410,000
总 数	9,810,000	960,000	1,830,000	2,790,000

两个世纪参战的人数实际上相等,而十九世纪的伤亡损失几乎是十八世纪的一倍;这表明了十九世纪战争更加致命的特性,也说明

武器越完善损失就越大。^①假定俄国在二十世纪投入战场的人员和过去相同,假定伤亡也按相同的比例增加,我们就必须准备对付二百万人伤亡的损失,——即占参战人员的百分之四十。

5. 为了与我们不断改进备战的邻国并驾齐驱,俄国无疑将被迫增加战时编制。在1827—1829年对土耳其的胜利战斗中,我们 i.100 在一次战役中所达到的最大兵力是十五万五千人。而在1877—1878年,最高数字达到八十五万人。1756—1762年的普鲁士战争中,我们兵力的最高额只有十三万人。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与西方邻国在和平中生活了一百五十年;但如果我们目前在没有盟国的情况下在西方作战,十倍于此的兵力也不足以击败德国军队,并——这是主要的——灭掉支持这个武装起来的国家的爱国精神。因此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在本世纪不但必须准备比以往大得多的军队出征,而且还必须承担为创设和维持这批军队所需的巨额创办费和经常费用。

6. 在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前半期,我国军队是一支长期服役的军队,是按照欧洲类型组成的,装备精良,尽管缺乏训练,但仍和瑞典、法国和普鲁士的军队不相上下,而在组织、军备和训练方面却比我们的主要敌人——土耳其为优。约在上世纪中,我们开始在装备上和一切杀伤的技术手段上落后于西方国家。鲍罗季诺之战时,我们的火器并不次于法国,但在塞瓦斯托波尔之役,我们却 i.101 只有滑膛枪,这种枪在造成声势,表演步枪练习或刺杀时都是卓越的,但是射击不准确,射程短。

7. 在最近的1853—1855年和1877—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好多军官在现代复杂条件下不胜任的情况是太明显了。低级军官在其职责范围内勇敢而主动,但受教育不足。指挥一支部队的军官除一些优秀的例外,都没能将部队的战斗力充分发挥出来;但最

^① 这并非一般所接受的观点。——编者

弱的还是我们的将军们——我们的旅的、师的和军团的指挥官。他们大部分无能力指挥所有三个兵种作战，既不能保证他们所指挥的部队之间互相配合，也不懂得如何与两侧其他部队保持接触。所以相互支援的气氛在我们部队里是非常不够的。的确，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我们的一支部队行将溃败时，邻近部队的指挥官却毫无动作，借口是没有接到任何命令。

8. 一般地说，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土耳其战争(1877—1878年)时，我们的部队实际上还没有战术训练，也不晓得如何以最小的损失获得最好的战斗成果。在进攻中，我们几乎列成纵队前进，因而伤亡惨重；而辅助兵种——骑兵、炮兵和工兵——则很少运用，的确，它们几乎被遗忘了。但我们也有一个长处，就是不怕死，只要要求指明需要我们在哪里作出牺牲。

9. 根据过去两个世纪的战争经验来判断，为了在将来的战争中保证胜利，我们必须准备集中优势兵力。没有数量上的优势，我们的军队过去就不能(特别是在进攻中)击败瑞典人、法国人、或在最近的战争中击败土耳其人。

10. 然而，姑不论如何最好地准备对抗西方诸邻国二百万军队这严重的问题，陆军部必须考虑四千万非俄罗斯人的臣民，他们中的很多人居住在亚洲边境地区和高加索，因为一旦发生欧洲战争，他们的态度确实取决于我们必须留驻该地区防卫这些边界的兵员人数的多寡。

11. 最后，由于对军队参加镇压俄国自己内部骚乱的要求更加频繁，陆军部的工作在上世纪末变得更加复杂了。近年来各个阶级的不满已经增涨，革命宣传已发现这种不满情绪是最有利的土壤；就连军队也不免受传染。因此卫护我国内部秩序在未来的世纪中似乎并不是陆军部的最小的任务。

12. 在最近二十五年中，不但德奥两国，而且我们的其他邻国

也都使他们的军队组织日臻完善，并已达到了卓越的程度，使他们既能采取有力的防御，又能迅速地使战争在我国领土上进行；因此，我们就不得不勇敢承担数额更巨大的经费，并须在罗马尼亚、土耳其和阿富汗边界聚集更大的兵力。在中国边境上，我们和平相处了将近二百年之久，但上世纪最后十五年内事件不断发生，迫使我们使当时在远东的微不足道的军队开始增多，虽然我们也很清楚，我们最好的政策乃是与中国保持和平，并避免同日本决裂。因此，本世纪初陆军部的主要任务就是我们的各条边界的防御。在这些边界中，奥地利边界和德国边界危险性最大，应受到特别的重视。

毫无疑问，实行有力的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御。但我们这样做 i.104 的力量不单是因陆军部的行动而定，而是依靠国家相对的实力。一个国家越是发达，实力越雄厚，各种战争资源就越多。但是今天比其他一切更能决定战争性质和方向的因素是铁路。就此而论，我们注意到西方邻国有大量的铁路线供其使用，而正是在这条战线上，我们由于自己的落后而受到妨碍，几乎处于虚弱无力状态。经费的其他急需支出项目太多，致使建筑单纯适合战略需要而在经济上不合算的铁路线似乎是太浪费，代价太高了。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在西部边界上的战略就是要求给予最大的注意和考虑，以便我们可以尽可能做到有力的防御。承认了我们当前的不利处境之后，下一步就是要认识到应将可用于军事目的的资金的最大部分花在这一边界上，其余的资金可在其他各边界上分配使用。很清楚，我们不能在远东花费金钱，在 1896 年至 1900 年向这个方向 i.105 推进之后，已认识到在这个地区完全采取防御是我们最好的政策。我国政府 1900 年 6 月 24 日的公报向全世界宣告了不吞并我们当时占领的满洲领土的意向，并使我们有各种理由推测，如果我们遵守约言，与中日两国大概不会发生麻烦。

13. 甚至在上世纪末的最后几年，俄国也没有准备在远东有任何新的推进，而以全部精力忙于西线的防御和维持国内秩序。因此，我们首先在满洲尔后又向太平洋海岸的意外的前进行动使陆军部因没有准备而感到突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吞并满洲的诺言是非常必要的，不仅因为我们不想搞坏和中国的友好关系，而且我们也明白，在世界的那一部分地区我们没有军事上的准备。在我 1900 年提交的报告中，关于陆军部不久将来的任务，我写道：

i. 106 “当我们必须准备在太平洋、阿富汗、波斯和土耳其保卫我们的利益，并在海上作战时，我们就无法同时提供人员或金钱，使我国军事力量敌得上西方诸邻国。我们由于把注意力引向远东已给了德国和奥地利明显的利益。这种力量平衡的失调威胁着帝国的完整，我真诚地相信沙皇陛下是不会允许继续这样做的。因此，作为陆军部首要的任务，我建议在西部边界发展我们军队的实力，并为它们制定出明确的作战计划。”

同样，从我们盟国的观点看，立即对此加以注意是唯一正确的，因为万一发生战争，我们在西线比较虚弱，就会使三国同盟的国家以很少的兵力在我国边界牵制住我们，而以压倒多数的兵力击溃法国。

14. 在此期间，我国陆军在国家的斗争中首当其冲。自彼得大帝时代之后，俄国舰队的作用在我们所从事的一切战争中都是微不足道的。在上世纪最后的两次大的战争中，我们特别需要舰队的合作，但在塞瓦斯托波尔之役我们的水兵却在陆地战斗，因为海军没有实力。在 1877—1878 年的战争中，土耳其在黑海没有舰队。俄国无疑是个陆上强国；所以过去舰队起的作用小并非偶然，而是很自然的。假如我们当时把大量金钱用于海军，就只能削弱
i. 107 我们的地位，因为只有将巨额经费用于陆军，我们才能取胜。历史

教导我们，我们应当跟随前辈的脚步，考虑到陆军是俄国的右臂，应将财政部所拨军费的较大部分用于陆军。但我们在远东的积极冒险迫使我们在上世纪末年以使陆军经费窘困的办法扩充海军经费。其后果是严重的。关于这一点，我在1900年提出的报告中写道：

“如果将来要以牺牲陆军来增加舰队，如果我们东部边界军队的增加是以牺牲驻守西部边界的军队为代价，那末我们对德奥两国来说已经是虚弱的地位将会更加恶化。随着我国海军的增长就会产生煤站和港口的问题，而这些方面的费用以及船舰费用的加重，就会使我国最重要的边界——西部边界的经费受到削减。我们的舰队曾在锡诺普歼灭了土耳其的帆船队，尽管它的士气是高的，它却已变得无战斗力了，因为它那时必须对抗汽船队，而这是它无能为力的。”

15. 在1877—1878年的战争中我们有一段不幸的经历。我们以前曾经打败过土耳其人，尽管当时众寡悬殊，这次他们是按欧洲方式由欧洲教官组织起来的，武器装备也比我们的好。他们的火器是德国和英国工场生产的，远比我们的火器优越。假如别的条件都一样，较好的武器就不仅有助于取得胜利（因为它能造成较大的伤亡），而且——这要重要得多——因为知道有较好的武器装备，就会给人以信心。武器即使只不过稍稍劣于敌人，人们也容易把自己的过失归因于敌人武器的优越。在1877—1878年，我们和土耳其人之间在这方面并不象1853—1855年那样有如此的差别，但我们在普列夫纳首次遭到灾祸之后，我们的军队还是对自己的枪炮丧失了信心，并把这种灾祸归因于土耳其人武器装备的精良。因此，一切都表明备有新式武器的必要性。过去我们的困难——要跟上极迅速采用的各种先进武器——由于下列事实增加了，即：我们不但必须重新装备正规军，而且必须为后备部队、民兵、补充

部队建立大量的武器储备，并且还要为整个各种武装部队建立武器储备。

i.109 16. 我们与较小的敌人(如土耳其人，高加索人和中亚人)进行战争时，由于我们巨大的数量优势，我们是得胜的。在与文明程度高于我们的民族(如瑞典人和法国人)作战时，一般是起初严重受挫，但由于我们勇猛、顽强、坚决，尽管缺乏技术，最终还是赢得了胜利。彼得大帝从纳尔瓦到波尔塔瓦进行了九年的战争，亚历山大一世也以同样的时间在奥斯特里茨与我军进入巴黎之间进行了战斗。这些战争的目的我们的部队是清楚的，它鼓舞人们不惜任何代价战斗到底。结果我们的部队是胜利了。在克里米亚战争和 1877—1878 年的战争中，不仅我们战争的目的不明确，而且在军队或国家真正发挥力量之前战争就过早地结束了，不管我们蒙受多大的牺牲和损失，在这两次战争中我们都没有胜利。每次战争都给交战双方带来很多不幸，而一场战役的失败对一个大国来说乃是一件最大的不幸，而且是一种使政府机构不安的最大的不幸。因此，虽然力求反对开战，一个国家一旦拿起武器，它就应当继续战斗下去，直到取得胜利；否则它就会丧失被认为是一个大国的权利，并会变成“不过是人种志资料收藏馆”，别的国家就可以因
i.110 此得到加强。我在 1900 年报告中的下面一些话，适用于当时我写的时候，也适用于今天：

“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危机突然爆发，并不因哪个国家没有备战而妨碍其出现。相反地，任何地方的无准备状态都只能引起别人对此加以利用的欲望。因此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斗争的到来，可能比我们设想的要快些。它的爆发甚至可能与沙皇陛下的意愿相反，并违背俄国的利益。这对全世界来说，将是一场大灾难。但特别对俄国具有灾难性的，将是战争一旦开始后，在取得完全胜利前它就停止战争。

“万一首战失利，并在人们感受到战争最初的和严重的后果——饥馑、疾病、商业瘫痪、尤其是重大伤亡——之后，俄国君主就需要有坚忍不拔的性格，使他能够抵制那种将会产生的要求接受失败、缔结和约的普遍呼声。”

第五章

上世纪末期和本世纪初陆军部所面临的 任务——1898 年至 1903 年分配给它的经费——这些经费不敷需要——可能采取的措施——为改进和巩固我国在远东的地位所采取的步骤

在 1895 年 143 期《俄罗斯残废者》上刊载过一篇回答德姆琴斯基发表在《言论》上的《我们对战争作了准备吗?》的文章。德姆琴斯基力图证明,我们在国防上花的钱比别的国家多;俄国为此目的拨款数量是足够的;为使我国军队备战所提出的必要措施只不过是进行敲诈的外衣;我国政府缺乏财政监督给侵吞公款大开了方便之门。《俄罗斯残废者》的文章在回答时引用了马克谢也夫教授关于 1888 年至 1900 年德国军队和俄国军队的预算的权威性著作。在这十三年中,德国经费总数是三亿五千八百一十万英镑,俄国经费总数是三亿四千七百九十万英镑。因此,在此期间德国平时兵力虽只有我国的一半,所花的经费却比我国多一千万英镑。尤其是我国漫长的边界线,迫使我们在平时要保持两倍于德国的兵力。就连这种用于较多人员身上的较少款项,我们也不得不几乎全部用来满足军队的维持费用(食物、制服等)。因此,不仅我们所花的钱总数比德国少,而且我们能用于“专门或特别用项”(包括军队备战的用项)的钱按比例来说也比德国少。关于这个重要问题,《俄罗斯残废者》文章的作者说得很中肯:

“经常费用是急迫的,也不能拖延,由于事实上它是用于

我们已经承担的措施，所以无须评议。至于特别经费项目下的措施，情况就不同了。从我们确已承担的意义上讲，这些措施是不急迫的，因此从不通晓军事的人的见解看，它自然也是不急迫的。因而这些人对这类措施就想拒绝批准，拖延，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安排很长的时间去执行这些措施。这样做的结果对国防和军队的备战都是不利的。我们的 i.113 部队可能突然被召集起来去打仗，但武器装备是低劣的，供应品是不足的、无用的，又没有组织良好的交通条件。分析一下德国军队的预算，就会对其创办经费和特别经费的比较巨大而惊愕，这说明，德军兵力虽只有我国军队的一半，但它在军队上所花的钱比我们多得多。”

如前所述，我国虽拥有一支庞大的常备军，但对战争的比较无准备状态早在 1870 年就已成为明显的事了；当时德国能够在两周内以大量军队越过法国边界，并且以惊人的速度赢得了战役的胜利。1877—1878 年的土耳其战争再次暴露了我们在组织与动员方面的弱点，米柳京伯爵负责陆军部期间吸取了这些教训，并采取了许多改善措施。列强的新组合和三国同盟的形成也使我们整顿国防的必要性显得突出。从 1882 年至 1898 年的十六年中，万诺夫斯基将军和奥布鲁切夫将军在指挥部队的主要将领的意見的指导下，曾设法增加军队的实力并同时加强我国的防御。在西部边 i.114 界组成了一个设防阵地的体系，并在战略地点集中了军需物资的储备；但由于我国铁路系统不够发达，此外还需要在西部军区增加永久驻军的数量。对波罗的海和黑海沿岸的防御也采取了步骤。但我们的注意力主要而且是十分正确地限制在西方；而对高加索、土耳其斯坦和西伯利亚军区则尽量少拨款。因此在西伯利亚，从太平洋到乌拉尔山，我们只有少数几个营，没有一个堡垒；在土耳其斯坦，我们也没有任何设防哨所。确实，为了加强西部边境的兵

力，我们从高加索调去部队，为了筹款组成新部队，我们不得不削减土耳其斯坦的兵力。这样做的设想是，假如我们在对德国方面强大，就不会有人在高加索或亚洲攻击我们。换句话说，我们的努力是集中在我国边界最危险的地方。但即使如此，考虑到军队的多种需要，用于西部边境的款项虽然很多，但还不足以使我们在一切方面和德奥两国达到同一水平。虽然我们在加速动员方面卓有成效，并已建筑了若干非常有用的战略铁路线，我们军队集结的速度仍比不上铁路系统比我们发达的邻国。不论陆军部对待不紧要的措施如何节约行事，并能将它们暂时搁置起来，紧要事务的进展还是不如所希望的那样快。因此，面对西部边界许多要求尚未满足的情况，陆军部一般说来对在远东、阿富汗或波斯的前进政策不得不是自信的反对者。这实际上是代表了直到 1894 年中日战争爆发为止的形势和陆军部的情绪。

1898 年，我继万诺夫斯基将军任陆军大臣，萨哈罗夫将军接替了奥布鲁切夫将军的职务。^①在编制预算时，我们充分认识到必须遵循我们前任的政策，把改进我国在西方的军事地位的任务放在首要地位，然而到这时我们在远东已经采取步骤，这就使我们不可能把远东地区的经费限制在往年那种很小的数目上。那里事情发展很快，在关东、满洲和阿穆尔沿岸地区都需要耗费人力和金钱。

i.116 当时拟定了一个给陆军部拨款的分配经费预定计划，在这个预定计划中，陆军大臣经财政部门预先同意，制定一个五年的总预算，其中按照基本经费和经常经费划分了用项。需要创办费的新的重要用项的预算经军事会议审查后，在得到认可前提交一个专门委员会仔细审查。该委员会由国家经济部门的主席主持，财政大臣和国家主计长都是委员会成员。然后将五年期间着手实行的

^① 司令部参谋长。——编者

各项措施的最后清单奏呈沙皇批准。说明军队所有各种需要，是陆军大臣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首先，指挥各军区^①的陆军将领们都将他们部队的需要，以及构筑堡垒、铁路等工程需要的说明书奏呈沙皇。各主要部门——军需部、炮兵、工兵等——的首脑拟定关于建筑、动员、教育等需要的预算。这些预算按其需要的创办费或经常费加以分类，许多更重要的项目在军事会议上或经专门委员会审查。这是一种复杂的程序，在1897年和1898年，这对于确定陆军部在1898年至1903年五年期间维持军队和增进其军事实力所需款项的总额是必要的。在这个时期以前的二十年中，所拨的非常有限的款项，实际上不是按照军队的需要，而是按照从财政部能到手的数量；因而军队对经费的需要继续在累积增加，直到1898年使我们面临一种比过去要做出更大牺牲的局面。 i.117

1898年初，依照我的前任的命令拟定了一个表明我们的紧急需要的总说明书。根据这个总说明书，很清楚，为了满足我们的一切需要，在五年预定计划所要求的款项之外附加一项五千六百五十万英镑的补充拨款是绝对必要的。这笔款项包括两项性质非常特殊的费用：用速射炮重整野战炮兵的军备（九百万英镑），和增加宿舍津贴（二百万英镑）。必须记住，现在由万诺夫斯基将军提出的各项措施甚至连我们的很多真正重要的需要也没有解决，因为在他的补充说明书中，只包括了那些不能拖延的事项，或早已批准但因缺乏资金而未实行的事项。其中最^{i.118}重要的有：

1. 军队组织机构的改善及其编制的增加，包括对亚洲地区特别是阿穆尔沿岸地区部队增添编制。

2. 各级人员服务条件的改善，特别是增加军官薪金和宿舍津贴，以及采用战地厨房。

3.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土耳其斯坦地区增加军需物资储备。

^① 俄国划分十三个军区。——编者

4. 在西伯利亚军区增加炮兵。

5. 组织特别工兵部队和增强要塞。

曾将 1898 年至 1902 年期间预定计划之外增拨四千五百五十万英镑^①的这个要求提交给财政大臣，财政大臣回答说，根据国家财政状况，不可能拿出钱来。经过多次争论，他同意拿出一千六百万英镑，而不是四千五百五十万英镑，这一较小的金额最后被批准了。因此我们在这五年期间实际得到的款项就比所需要的大约少三千万英镑，即每年亏空六百万英镑。这样一种政策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使我们在军事竞赛中更加落后于西方邻国，因为它迫使我们停止在欧洲和亚洲边界上加强我国地位的必要工作。此外，改善平时编制下我国军队的状况也需要大量金钱。首先，要使高级军官中能有较大的工作效率，就必须以更加宽大的精神对待全体军官，使积极而能干的人乐于留在部队工作而不愿离开；就必须使我们的军事学校现代化并增加其数量，以便尽可能多的军官都能受到相当于中级学校的普通训练。我们的士兵在薪饷、食品、衣服、装备等方面，无疑都比别国军队差，而改善他们的状况所需要的经费自然是大量的。另外，我们的马匹也不够好，尤其是在哥萨克团和运输方面用的马匹更不好。以上这些只不过是军队许多需要中最迫切的而已。

因此 1898 年 1 月 1 日我担任陆军大臣职务时，留给我的遗产并不是令人满意的。军队巨大的需要一看就清楚，但用以满足这些需要的资金的匮乏也同样清楚。因而我就得极为审慎地审查一切申请，才能决定哪些能够实行，哪些必须无限期地延缓。我已经对我国西部边界的重要性表明了自己的见解，但要完成为在西部边界加强我国军事地位所需要的工作，就会将五年期间用于一切目的的补充拨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全部用光。同时又有改善高级军

^① 重整炮兵军备和宿舍津贴拨款除外。

官状况、巩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等等几乎是同样迫切的一系列问题。我们部队的住宿在很多情况下条件极差；以致很难进行训练，这就需要在各个屯驻地兴建兵营。最后，在前一个五年中已经开始的事业、尤其是涉及后备部队的组织的工作，必须完成。沙皇审查了这些事项的相对的迫切性，并批准了一项 1899 年至 1903 年的计划，这一计划除改组后备部队和进一步增加俄国欧洲部分军队外，都全部完成了。沙皇批准的事项，陆军部都作了记录。下面是其中的几则，并表明它们是正式记录下来的：

1. 鉴于在远东可能发生纠纷，沙皇指示，我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地位应当加强。 i.121

2. 陆军大臣关于改善军官服役的一般条件以使高级军官能有较大工作效率的建议，得到沙皇热情支持，并命令立即付诸实施。

3. 沙皇也高兴地指示，对于士兵服役条件，应使之更为优厚。要兴建较好的营房，茶点配给要逐步地实行。

4. 沙皇高兴地认识到重整炮兵军备的特殊重要意义，指示财政大臣以增加补助金为此提供资金。

陆军部从 1899 年至 1903 年采取措施的情况可简要叙述如下：

目前划定的阿穆尔军区在 1883 年才成立。它的守备部队原有十二个营，十个骑兵连，两个半哥萨克营，五个炮兵中队，一个工兵连和一连要塞炮兵。十年后，到 1894 年，已增加到二十个步兵营。从 1895 年起，我们在远东开始以一定的速度增加部队。在 1898 年与 1902 年之间，增加军官八百四十人，士兵三万七千人， i.122 马匹二千六百匹。在此期间我们的兵力总共增加到三十一个营，十五个骑兵连，三十二门大炮，一个工兵营和三个要塞炮兵营。此外，五个铁道兵营也已建立起来，以便在中东铁路工作，边界和其

他守备队的兵力已从八千人增加到二万五千人。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在满洲和关东，兵员增加总额达到六万人。1899年的计划是想使我们在远东这些地区的部队建制尽可能快地达到四十八个步兵营和四十八个后备营，五十七个骑兵连，二百三十六门大炮和三八又四分之三个工兵营，组成三个军团。与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沿岸地区不久前只有少数的营相比，这是一支大部队，而且因为相距太远，极难组织。这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可资利用的金钱和当地条件，并需要若干年来完成。由于这支部队能够迅速集中，所以想把它组成坚强的前卫部队，在它的掩护下从俄国派去的增援部队将得以集中起来。第一次战役的命运显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取决于这些增援部队运送的速度，然而在1900年的时候西伯利亚铁路尚未建成为第一流的铁路线，中东铁路尚未完成。1900年我在报告中写道：

“要使我们的军队达到规定的总数^①，需要六至七年的时间。这一事实，加上我们的铁路无力应付繁重的运输量，要求我们在对外关系上极端慎重，以免使自己在不利的情况下，只能非常缓慢集中的数量不足的兵力陷入战争。”

由于种种复杂得难以解释的理由，这一建议没有实行；极端慎重的必要性没有被重视，而我们却在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置身于战争之中。1902年我国的军事形势是好的，并且已在开始实现从满洲撤兵的诺言，我们有一切理由指望在远东继续维持和平。但到那年年底，已经出现了可能与日本破裂的信号。陆军部并非不明白这些，前面列举的措施，以当时可资利用的经费要到1906年或1907年完成，由于借助于一项补充拨款，在一年之内就完成了。

我们虽则希望和平，却毫不动摇地准备战争，并于1903年在远东增加了三十八个营，同年在俄国欧洲部分也新组成了三十二

^① 九十六个营，五十七个骑兵连，二百三十六门大炮。

个营；这样把每一个东西伯利亚两营建制的团^①增加一个营，使其成为三营建制的团，所有九个东西伯利亚旅就能扩充成九个东西伯利亚步兵师，每师十二个营。对这些师配置炮兵和工兵，是在一项专门计划中实现的。这样，中日战争时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十九个营的兵力在1903年就可以扩展到一百零八个步兵营和二十个后备营。在这些部队的后面，还有四十多个后备营，在西伯利亚军区保持后备状态。总之，我们在1903年在西伯利亚就可以有一百六十八个步兵营的兵力，并配备着适当比例的其他兵种。但直到1904年春战争已经开始时我们的铁路才能运送这些增加的部队。然而这些部队最后还是运到了。这样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部队——那里在中日战争时实际上还是无防御的——已经成长为一支拥有四个西伯利亚军团和两个独立师的军队，这支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最先受到打击。虽然在1895年与1903年之间我们临时仓促行事，但由于曾作了巨大努力使这些军队成为可靠的军队，由于幸运地遴选了指挥官，并由于它们强大的平时编制，这些部队证明是我们最好的部队。这些部队组建的原则，是从欧洲部分的军团中抽选整个连队调到这些部队，而且这些连队的军官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被允许调离新部队。三十二个营中的每一个营都是来自俄国的一个军团，每个旅抽调一个连，以优秀的军官指挥每一个营。创建这些部队的计划理由正确，可由下面这个事实得到证明：在鸭绿江的第十一团的第三营和第十二团的第三营，刚刚到达加入各该团，就异常英勇地作战。特别是第十一团的第三营，以刺刀进行反攻，使敌人遭受了严重的损失。1905年春，所有七个东西伯利亚步兵师的团都改成了四个营的团。我荣幸地指挥过的满洲第一军里有五个这种东西伯利亚步兵师，它们的九十个

^① 战争爆发时，远东的三十六个东西伯利亚步兵团都辖有两个营，其中只有一个旅下面的各团辖有三个营。——编者

i.126 营被公认为是所有三个军中最好的。然而为了组成所有这些新部队，我们不得不从我们的俄德边界抽调人员，其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

除了在 1896 年至 1903 年之间在远东增加人员数量外，我们还设立了供应站，并匆忙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港构筑工事。的确，从 1898 年至 1902 年所拨的兴建和维持我国所有要塞的费用总数的四分之一都用在这两个要塞上了。在我们所有的陆地和海岸要塞中，只有在喀琅施塔得^①花的钱比旅顺港多。除财政困难外，我们在军备措施方面还碰到了许多其他困难。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应当具备最新型的海岸炮，这是极端必需的，但由于工厂已经接受了海军部的大量订货，要交出这批武器就要拖很长的时间。作为临时措施，我们只好安装上老式的大炮。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一千多门大炮从俄国的欧洲地区运往这两个地方。当铁路在 1900 年满洲的叛乱期间被阻断时，工程的进展大为耽搁，而旅顺港本身的工程又因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命令停顿了一段时间。假如没有这些延误，在 1904 年该地的准备工作就会比已有的好得多。但为了正确评价短时间内在那里所完成的工作，应当记住两种情况：

1. 由于我国舰队被封锁在旅顺港，日本人就掌握了制海权，得以将大炮从他们的一些海军要塞转移到关东进行围攻作战；对抗这些海岸炮，就连石结构的防御工事也用处不大。

2. 由于大连港的存在，使运送这些重榴弹炮的和其他攻城用的物资的着陆大为便利了。这个地方完全是因维特伯爵的建议而创建的，并未与陆军部或指挥关东地区的军官进行过任何联系，而该地区实际上是在这个军官的控制之下的。

在旅顺口，收集了大量的食品供应物资，甚至在它过早地投降

^① 对于喀琅施塔得的建议是在我担任陆军大臣之前批准的。

的时候,也还足够维持一个半月。而且该地当局还授权就地购买,由于该地区面粉、大麦、大米和牛这类物资是无限制的,并没有什么东西阻止他们去购买。许多无理的非难指责陆军部,认为防御工事的力量不够,但在创建这个要塞时,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克服巨大的困难。在估价这个地方的最大的力量时,一定不可忘记,我们只不过在1897年底才占领它;在1898年和1899年,我们在海岸上只有非常薄弱的临时军备;而当时实行的繁琐的公务程序,又使在新要塞的防御工事上迅速地花费大量金钱成为不可能。首先,计划必须由工程师们在当地拟定出来,然后又必须送往圣彼得堡工程委员会审查,最后由沙皇批准。就旅顺来说,为了加速这个例行公事,曾把特别权力委托给地方当局;一位富有天才精神饱满的工程军官陆军少将维利奇科被派到远东,作为司令部工程管理总局的代表。的确,和通常的程序相反,当旅顺口口的防御工程计划呈报皇上批准时,由于预料能被批准,一大部分工程已经提前开始了。由于满洲1900年叛乱期间管理关东地区的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命令停止一切工程,我们只有三年的时间(1901年、1902年和1903年)来完成这些巨大的永久性的工程。就可利用的时间和岩石土质而论,的确是完成了很多工程。 i.128

武器装备也未能更快地准备好。武器首先要制造出来,而海岸炮定货的完成只能是缓慢的,因为奥布霍夫工厂所做的尽是海军部的工作。陆军部定做的十英寸和十一英寸口径的堪乃特大炮和大口径的迫击炮,俄国所有的海军要塞同时也都需要(特别是利鲍、喀琅施塔得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但事实上大部分大炮为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得到,其代价是牺牲我国在波罗的海和黑海的实力。我们一面在等候对新武器的要求得到满足,一面又从其他地方夺得新武器,以便能使旅顺港以数百门大炮装备起来。在占领旅顺的头几年,这里所需要的一切都必须从海上绕道运来。 i.129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在四年当中（1899年至1903年）成功地把旅顺港建设得如此坚固，以致其滨海区的大炮使整个日本舰队都在相当大的距离，而陆地的炮台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敌人不仅数量众多，拥有技术部队和摧毁我们防御工事的武器，而且由于大连向它提供了现成的基地，他们能够把巨大的攻城炮运上陆地。这次又象在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我们的舰队在陆地战斗中比它在其所擅长的活动范围内战斗得更有效。虽然如此，敌人还是损失了两倍于守备部队的兵力，而旅顺港从战争开始一直坚持了几乎十二个月。即使到了那时，它的陷落也是过早了。

我们对于节约也很注意，财政部的利益决没有被忽视。部队要迅速集中，大量的建筑物必须建造，以及为军需部和工程部门搜集供应物资和军需给养，这些都为营私舞弊提供了充分的机会；但由于任命挑选出来的军官领导军队的这两个重要部门，又以最好的人选当他们的助手，自然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因而这两个部门的声誉在战争中决未受到损害。

我深信，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考虑到从俄国的中心到战场之间遥远的距离，他们将不仅会因陆军部在1895年至1903年之间为加强我国在那里的地位所取得的成果而大为惊异，而且将会看到，那种指责说没有采取足够的步骤准备战争是多么荒诞无稽。我再说一遍，我们以这点可供利用的金钱，在可由我们安排的这样有限的时间内，完成了一项巨大而可靠的工作，甚至在1895年还毫无防御的阿穆尔沿岸地区，到1903年已如此强大，即使一个全部武装起来的国家，尽管它作出巨大的努力，尽管我们的舰队完全无用，也无法触犯除萨哈林以外的我国任何领土。1900年我就记下了我的意见：一旦发生战争，日本将能投入战场四十万人，一千一百门大炮。当然，我们在满洲和阿穆尔沿岸地区不可能投入这

样大的兵力。这需要许多年,需要数百万的经费,而且还要早日建成连接远东的铁路。

由下述事实看,我们在远东的兵力直接依赖于铁路效能是很明显的:在1903年7月关于运送部队的计划中,我们只能指望每天有二短列军用火车。当下达指令要将四个步兵营、一个工兵营、两个炮兵中队和一千七百吨军需品尽快运到旅顺时,按照动员计划计算,没有二十二天的时间是完不成的,而开战后的半年之内我们还不能利用新建的中东铁路的充分运载能力。为了改善这条铁路,就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如铺设旁轨和交叉口,安排供水,在线路上铺石碴,以及营造楼房等。这说明要用铁路运输大量的枕木、铁轨、建筑材料以及客车和货车等;也需要运输建设材料的列车。在1902年和1903年,军用列车行驶的数量越大,铁路线建筑和改善的进展就越小。1903年,陆军部充分利用铁路运输以增加我们在远东的军队,只是由于全体铁路人员的极大努力,才能既不全部停止修筑铁路还能运送军队和军需品。尽管水路有危险,我们还是利用海运运送了军队和军需品。在1903年下半年总督辖区建立之后,我们这样做是冒极大风险的,这由下面的事实可以说明:一些托运到旅顺的腌肉在宣战的前几天落入了敌人之手。因此,别佐勃布拉佐夫在南满迅速集中七万五千名军队的计划(1903年夏季通知我的)究竟能完成到何种程度,就很清楚了。阿穆尔沿岸地区人烟稀少,富源缺乏,不允许平时在那里保持大量军队。从贝加尔湖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广阔领土上只有约一百万人,其中仅四十万人在阿穆尔和滨海地区。由此就可推断,要在这样一个荒漠地带保持一支大部队将会给国家造成多么受不了的负担。因此我们在西伯利亚和阿穆尔沿岸地区尽量只保持这样规模的一支军队,其数量足以牵制敌人,并成为掩护部队,在其掩护下,能够集聚援军。在西部、高加索和阿富汗边界,情况也一样:当地军队好比

形成一幅无从进入的帷幕,在其掩护下,能够集结主力部队。

在远东,虽然这个掩护部队包括一百七十二个营^①,其中有一百个以上能够出战,但战争的结局当然不是说要依靠它们的单独努力来决定;但我们的困难在于尽早地运送主力部队,因为,由于敌军能够比我们更快地集中,我军增援部队到达时就可能被各个歼灭。铁路的运输能力是如此之差,使我们既不能给先头部队派出分遣队,也无法以足够的援军及时支持它们。假如事情的安排处理象我在后面详细陈述的那样,我们在辽阳和奉天就会有两倍于已有的兵力,战斗的结局也必然会不同。但交通大臣和财政大臣未能实现他们的许诺,因而我军比本应到达的时间晚了八个月才完成集中。到1905年9月,我们终于能够聚集总数达一百万人的一支军队,从各个方面准备开始第二个战役,拥有充分的人力和物力来保证战役的胜利。我们已得到了机关枪、榴弹炮、炮弹、轻便武器弹药、军用铁路、无线电报机和各种工程器材,高级军官也多半是新的。陆军部在其他部的合作下胜利地完成了一项极其巨大的任务。几年以前,哪个军事权威会承认有可能利用修建得很差的单线铁路在远离供应和装备基地五千四百英里的地方集中一支百万人的军队呢?奇迹实现了,但已为时过晚。陆军部不能为之负责的俄国内部事务,是战争结束的根由,而这时决定性的军事行动刚要真正地开始。

炮兵的重新装备是这样完成的。由于别国的军队都推广了速

① 在这个数字中有:八个东西伯利亚步兵师,九十六个营;西伯利亚第一、第二、第三后备师,四十八个营;独立后备营十二个;两个旅,第三十一和第三十五师,十六个营——共一百七十二个营。在1904年4月,所有这些部队都在西伯利亚、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满洲。其中有二十七个营组成了旅顺的守备部队;二十一个营组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南乌苏里地区的守备部队;西伯利亚第一师留在后方,而那些独立后备营则守卫着铁路。在1904年4月,这一百七十二个营中,在满洲的军队中只有一百零八个营,分布在从鸭绿江到牛庄,以及从大石桥到鄂木斯克的铁路沿线,因为西伯利亚第四军团尚在来远东途中。

射炮,我们才被迫采用这种大炮。速射炮显然比旧式大炮优越,且不说它较远的射程和准确性,由于它能发射较多的炮弹,每个速射炮兵中队就能造成相当于数量多得多的非速射炮所造成的破坏。各种类型的速射炮都经过了长期的彻底的试验,提供试验的有法国圣查蒙德工厂、施奈德工厂,德国的克虏伯商行和俄国的普梯洛夫,最后选择了俄国的设计,并于1900年初定制了第一批一千五百门大炮;同时也安排了进一步的试验。并非每个人都相信这种新型武器具有无可怀疑的优越性,一贯反对速射炮的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依然强烈反对采用这种大炮。1902年定制了第二批经过修正和改进的这种大炮。为了彻底地并在实战情况下试验这种武器,1900年8月,将配备着这种三英寸口径新型速射炮的警卫步炮师第二炮兵中队派往远东,当时那里正进行着义和团运动。该师参加过四次出征,两次在北直隶盆地,一次在蒙古的山丘和沙漠草原,一次在满洲东部山丘。它走过了大约二千四百英里各种不同的地区,温差从列氏三十五度到二十二度。大部分行军每日行程长达四十英里。该炮兵中队参加战斗十一次,对骑兵、步兵、建筑物和碉堡发射炮弹三百八十九发,射程从近距离平射到二千五百码。所得到的结果十分令人满意,特别是如果考虑到这次战役的艰苦性,炎夏的季节,以及该中队编成的仓促,就更加令人满意了。不幸的是,炮击房屋和野战工事的试验是对没有作什么抵抗的敌人进行的,因此最近出现的弹药的毛病当时没有发现。我们希望有一种尽可能简单的装置,因而采用了一种类型的炮弹,它以定时引信有效地对付露天的部队,又能以着发引信对付掩蔽的部队;但我们忽略了作为爆炸物的炸药的不足之处。对付暴露在外目标有很好效果的炮弹,对于诸如摧毁建筑物、木材或胸墙等掩蔽物则用处不大。1902年3月,拨出必要的补助金对一批第二类的炮兵中队重新装备,我们的兵工厂也完成了定货。这次重新装

备取得了如此的进展,因此到对日战争爆发时,除一些西伯利亚炮兵中队外,我们的全部炮兵都以速射炮装备起来了。这时一种速射山炮也发明出来了,这种炮证明是非常有效的。一般说来,炮兵的重新装备是迅速而顺当地实现了。

但除了沙皇特别重视的前述四点外,陆军部还必须在与军队的生存与效能都有关联的其他方面作出巨大努力。其中就有建造 i.138 战略公路和铁路以改进我国交通的任务。这些工程的兴建是根据一项特别计划,按照其缓急的次序,并在有资金可用时进行的。对赶筑波洛戈耶至谢德尔采和奥伦堡至塔什干两线曾作了巨大的努力,这两条铁路都具有特殊的战略重要性;1899年,克拉斯诺沃茨克至库什卡铁路也完成了相当大的改进工作。

1902年我们开始考虑1904年至1909年这五年的需要,1903年我向财政大臣提出这五年经常预算之外的一项八千二百五十万英镑的补充补助金。他觉得只可能答应一千三百万英镑。1899年已经延期的大批迫切的措施这时再一次推迟了,指望到1910年俄国或许能够提供资财来捍卫它最关重要的利益——换言之,即保卫帝国。

1904年——新五年时期的第一年,陆军中将列季格尔在他提出关于陆军部的年度报告时,以陆军大臣的资格和举世公认的权威,提出了如下真实而重要的意见:

i.139 “我国军队现在组织机构上和装备上的缺陷是自俄土战争以来经费不足的直接后果。拨款数量历来都不适应部队的实际需要,也不适应它必须做的工作,而是完全由似乎可资利用的总金额来决定。在拟定即将来临的五年的计划时,曾经说清楚,仅仅为了满足最迫切的需要,就要求有一项八千二百五十万英镑的补充数额,但却只拨了一千三百万英镑。因此目前五年计划的预算不能产生改进现状的希望。”

由于有一支一百万人的平时军队的庞大的需要，又必须保卫绵延一万一千英里长的边界，财政部要满足陆军部的要求无疑有很大的困难。海军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结果可用于陆军的钱就比较少。然而如果财政大臣把他的任务局限于收集国家岁入并以此来满足国家的所有需要，那我们就永远不能建议这样收集起来的金钱须按照实际需要来花费，因为决定哪一种需求最急迫，并不是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事。事实上，我们的财政是以这样一种稀奇古怪的方式管理的，财政大臣不仅是征收者，而且也是国家钱财最大的花费者；除了必须负担自己部门经常增加的经费支出——如规定的薪俸与收税和专卖酒类有关的费用——外，他又在自己的部里设立了其他各部如交通、陆军、海军、教育、内务、农业、外交等部的分部。具备了这样一套机构，他就撇开交通部，计划、建筑和管理巨大的中东铁路；他组织和指挥两个军团，一个是边界警卫军团，另一个是铁路护卫军团，而且实际上不管陆军大臣意见如何，就为这些部队的装备选择了大炮的类型；他在太平洋上创建和管理一支商船队，又有一支武装的江河轮船小舰队在河上来回行驶，而这都可以说是海军部的职责。至于教育部的工作，财政大臣设立了高等工艺学校；至于内务部和农业部范围的事，财政大臣进行了极为重要的经营——为中东铁路保留所谓“割让”的狭长地带——以及兴建城镇村庄，并决定有关占有和开垦土地的问题；至于外交 i. 140 部范围的事，财政大臣与中国政府最高代表举行谈判，缔结条约，并在中国和朝鲜不同的地方保持着他的商业和外交代理人。俗话说，“先救济自己再救济旁人”，的确不错。所以，对财政大臣心爱的计划的拨款比其他各部要求的相应事业的拨款慷慨得多，这又有什么奇怪呢？学校教育经费被削减了，却耗费了千百万巨款为圣彼得堡和基辅的各种专科学院建筑高楼大厦，为税务局建筑宏伟建筑物，为官员们建造完美的府邸。花了巨额款项创建大连 i. 141

城、兴建中东铁路及其在哈尔滨的宏伟的官署、以及与此有关的事。这后一种企业既是商业的又是国家的事业(就经营管理说,是民间的,就供给资金说,是官方的),它的经费主要来自所谓“剩余”。这种“剩余”的扩增方式不仅在我国,而且可能在世界财政纪录上也是没有先例的,而在我国的情况下这对所有各部门的最紧迫的需求都是有害的。据以创造剩余的主意本身是简单的,各部门对经费的要求都被削减了,预算从国家岁入中的进款也被压低了。其结果是惊人的。当国防上最紧迫的需要由于资金缺乏得不到满足时,有几年收入超过支出的总额却达到二千万英镑以上。下列表格表示财政大臣在 1894 年至 1905 年期间计算国家岁入时预算中造成的“错误”:

	国 家 岁 入		实际收入
	预 计	实际收入	超过预计
	英 镑	英 镑	英 镑
1894	100,482,327	115,378,581	14,896,253
1895	114,295,700	125,581,878	11,286,177
1896	123,947,169	136,871,935	12,924,765
1897	131,836,649	141,638,609	9,801,960
1898	136,445,821	158,485,444	22,039,622
1899	146,912,820	167,331,306	20,418,485
1900	159,374,568	170,412,850	11,038,282
1901	173,009,600	179,945,715	6,936,114
1902	180,078,448	190,540,444	10,461,995
1903	189,703,267	203,180,081	13,476,813
1904	198,009,449	201,826,131	3,816,682
1905	197,704,561	202,443,193	4,738,631

这表明:

i.143 (1) 在 1898 年和 1899 年, 预计收入和实际收入之间的差额每年都超过二千万英镑。

(2) 在十二年中, 有八年每年实际收入超过预计收入达一千

万英镑。

(3) 国家岁入并不受战争的多大影响, 1904年和1905年两年的收入超过预计收入多于八百万英镑。因此, 如果对于收入的计算更准确一些, 陆军部就很可能得到所要求的补充拨款, 因而也就会使我们东部和西部的战备更加完善。

总之, 我们军事上无能的主要原因是财政部拨款不充足。对陆军部资金的限制——

(1) 是由于花在舰队上的经费的极大增长。

(2) 是由于财政大臣在远东的计划中花费了大量的经费, 以及对于国家岁入的低估。但尽管如此, 我认为, 陆军部在1898—1903年期间(在这个期间里, 它按照一项严格制定的计划分配自己的经费)在远东加强我国军事地位方面总的来说所取得的非凡的成果将会得到承认。由下列数字可以估价对日战争前十年间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果。在阿穆尔沿岸地区、满洲和关东, 我们兵力 i.144 的增长如下所示:

1884年.....	12个营
1894年.....	20个营
1903年.....	63个营
1904年.....	140个营

第六章

1900年至1903年陆军大臣关于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意见——为避免与日本决裂他做了些什么

战争不仅是意外的；战争违反我们的利益，也违背皇上的意愿。假如战争胜利结束了，那些对战争负有责任的人们就会因为他们如此机敏地为远东战争的胜利装了导火线而觉得自己是民族英雄；然而由于国内的麻烦迫使我们过早地实现和平，阻止了继续斗争直到我们取得胜利。社会各阶级都为我们的不幸而震惊，现在坚持要听听战争起因的实际情况，要求知道是些什么人对皇上表示过的和平意愿置之不顾，并因违法或失职而把国家的航向引向破裂。现在的出版自由已经允许在这些问题上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在大量的虚构之事中已有某些事实被透露出来，而这种透露只有经其他部身居高位而与此有利害关系的人知情并允许才能办到。

在报纸所刊载的许多涉及战争起因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是1905年5月发表在《俄罗斯新闻》上的古里也夫的一篇文章：《对日战争的爆发》。很明显，古里也夫接触了很多官方文件，而文章看来是一种片面的叙述，作者在文章中为维护财政大臣维特伯爵而进行辩解。由于这篇苦心孤诣的文章已在国内外报刊上刊登并且一定为广大读者所阅读；由于它至今仍被人引用；由于文章中谈到陆军部的地方不正确，并已导致对该部工作的误解，我不得不尽量少说几句话来阐明陆军大臣在1898年至1903年间在远东事务

中所扮演的角色。

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出口的问题，先前在俄国曾讨论过。据认为鉴于我国人口大量增长，一个通向不冻海的出海口最终将是必需的；但由于两个世纪的经历已向我们表明向波罗的海和黑海推进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因而感到必须特别小心谨慎，以免在我们渴望向太平洋海岸接近时过早地陷入战争。我们在远东和贝加尔湖地区的领地都是些难于接近的不毛之地，一切开发工作尚待进行，我国与远东的贸易从哪方面看都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因此不仅向太平洋接近对现在这一代显得不必要，而且为达到这一目的所遭受的消耗与牺牲实际上似乎将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妨碍我们国家在其他地区的发展。在上个世纪的后半期，陆军部——会同外交部——鉴于欧洲事务进展情况，系统地反对我国亚洲边界的任何扩展。因此，我们深入中亚腹地的连续的步骤，常常是在不顾圣彼得堡的意见，无视圣彼得堡发出的命令的情况下采取的。切尔涅夫于 1864—1865 年占领塔什干被认为是过早了，因为这使我们与布哈拉和浩罕两汗国直接接触，而在 1868 年向撒马尔罕远征之后，不仅不允许考夫曼完全攻占布哈拉汗国，而且将我们经过激烈战斗之后占领的沙阿尔和基塔布也还给了埃米尔。1873 年，我们攻占希瓦汗国之后，只以取得奥克苏斯河右岸为限，而保留了汗的权力。1875 年，当我们越过整个浩罕汗国时，我们故意地以占领纳曼干城为限，而把汗国的其余地方留给它的虚弱的统治者去占有。1881 年，陆军大臣不同意保留十年前占有的伊犁地区；1882 年，斯科别列夫夺取格奥克—泰佩后，我们严格禁止他向梅尔夫推进。陆军部方面这种一贯的政策，在每一种情况下都是由于担心较多的花费和新的责任会削弱我们在西部边界和土耳其边界的现有地位。尤其重要的是陆军部反对引起与中国或日本的纠纷。因此它以惊异的眼光看待并强烈反对这种理论：“俄国是亚洲最西部

的国家，而不是欧洲最东部的国家”，因而它的未来完全在亚洲。正如我们已经说明的那样，二十年前我们在远东实际上是没有防御的。象萨哈林这样广阔的地方只有当地的三个支队（总共一千人）守卫着。符拉迪沃斯托克没有防御，它与俄国的主要交通——一条六千英里长的干道——从军事意义上讲是完全无用的。只是到 1882 年以后，当我们将伊犁交给中国，日本开始增加它的军队时，我们才开始增加在那个地区军队的数量。

陆军部在这个时期一直高度注意阿穆尔沿岸地区与俄罗斯之间交通不安全的性质，新兵和大部分给养都从海上运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在这种条件下，梦想任何进攻作战自然是办不到的，就连进攻计划也谈不上；但中国和日本的觉醒使我们对贝加尔湖以东的安全产生了很多忧虑，因而经过我国本土修筑西伯利亚铁路的计划就受到欢迎，认为可使交通便利。修筑这条铁路的问题第一次由一个各部大臣的委员会于 1875 年加以讨论，但当时的计划仅限于修筑俄国欧洲部分的线路，通至图们为止。1880 年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了这部分的计划。1882 年，亚历山大二世皇帝不满意这个不全面的计划，决定这条铁路线应一直通过西伯利亚。据此进行了勘测，并提出了三条供选择的线路。1885 年，对这三条线路进行审查之后，委员会得不出究竟哪一条最为有利的结论，但他们决定立即开始建筑铁路的第一部分。1886 年，皇上一收到东西伯利亚总督的一份报告，就批示道：

“看了总督的报告，深感痛心，政府迄今实际上未做什么事情来满足这个富有而又被忽视的地区的需要。现在是该做些事情的时候了。”

尽管皇上的责备措词强烈，但直到 1891 年 2 月，该委员会才决定同时兴建乌苏里江地区铁路和自米阿斯至车里雅宾斯克这一部分的西伯利亚铁路。在给当时作环球航行的沙皇太子的一道诏

书中,说明这条铁路将“一直通过整个西伯利亚”,并命名为大西伯利亚铁路。构成这项计划基础的设想兼备单纯与大胆两种特色,这条铁路无疑会使一个发展非常缓慢的地区富有生气,将会吸引大量的移民,因而将使我们保证有一个重要的地区。当然,由于铁路的很大一部分是沿着中国边界的,难免有危险;但这种危险由于邻接铁路的北满地区比较难于到达和中国的虚弱而减轻了。而且 i.151 还有巨大的阿穆尔河作掩护。

中日战争后,我国联合其他列强,迫使日本放弃了刚占领的旅顺与关东半岛。俄国这个第一次激起日本敌意的行动,也是非常具有决定意义的。这时在远东产生了一种新的事态,这使我们军事上的完全无准备状态似乎很危险,特别是阿穆尔沿岸地区在那时实际上对日本的进攻毫无防御可言。这整个广阔的军区只有十九个步兵营,因此我们不得不立即开始在远东增加兵力,并把符拉迪沃斯托克变为海军要塞;但最急迫的问题还是发展铁路交通。

在中日战争以前,没有人想象西伯利亚铁路会不经过我国领土。但那时中国所显示出来的虚弱就成了该铁路经过满洲的诱因,这样使铁路距离缩短了三百多英里。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杜霍夫斯基将军坚决反对并指出这条路线的危险性,但是徒然。他 i.152 争辩说,铁路通过中国领土,不仅将对中国人有利而不是对俄国移民人口有利,而且这样做也不安全。他的观点未被接受,这条对我们有着不可估量的重要性的交通大动脉终于穿过一个外国而铺设了。想把横贯大陆的一切过境运输都吸引过来,尽量使这条铁路具有一种国际重要性的诱惑力,对于考虑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谨慎主张来说,是过于强烈了,尽管这条铁路对我们关系极深。杜霍夫斯基将军的担心很快就被证实了。铁路的一部分为1900年造反的人们所破坏,我们驻哈尔滨的部队不得不进行防守。我们丧失了整整一年的时间,耗费金钱数百万,很快就认识到,除了非常

有限的最易腐烂的货物外，没有什么货物可由铁路运送。海路运输则比较便宜和安全些。我们被迫放弃了这条铁路的国际重要性的梦想，并承认，它仅仅构成西伯利亚铁路的一部分，而西伯利亚铁路由于有八百英里通过外国，将需要我们付出巨大代价进行专门保护。再者，财政大臣使铁路经过满洲而不经过西伯利亚以实现节约一百五十万英镑的估计被证明完全是骗人的，因为这条铁路按英里计算的建筑费用比俄国国内任何铁路的建筑费用都大得多。不仅对该铁路的国际重要性的一切设想都很快被放弃了，而且不久就很清楚：它的经济价值尽管对当地中国人是重要的，但对俄国却很轻微。那么，它存在的理由想必主要是在战略方面吧。然而，如果根据战略理由而建筑，一条通过我国本土的铁路不是更可取吗？这个不幸的企业对俄国非常不利，是将会产生巨大结果的积极政策的第一个迹象。占领旅顺，创建大连，兴建西伯利亚铁路的南支线，在远东保持商船队，以及我们在朝鲜的商业企业，这都是一条链条上的各个环节，这条链条把这些遥远的广阔地区与俄国牢固地结合起来。

某些方面认为，如果我们局限于将铁路的北线通过满洲，就不会发生战争；只因为我们占领了旅顺和奉天，特别是我们在朝鲜的活动，才引起了战争。另外一些人认为，不能把铁路通过满洲看作仅仅是我们活动的开始，而必须视为一切活动的基础；因为如果我们在自己本土沿阿穆尔河岸兴建铁路，那我们就永远不会想到占领南满和关东。铁路的北线通过满洲，永远不会妨害我们同中国的友好关系，这是十分真实的。我个人相信，如果我们以此为满足，日本就不会因为北满而向我们发动一场战争。无论如何，通过满洲兴建铁路既不是为陆军部打算，也不是由于陆军部的主张，而是不顾陆军部在该地的代表杜霍夫斯基将军的反对而实现的。义和团在满洲的叛乱显示了我们军事上的虚弱，而财政大臣的希望，

即由他所建立的当地警卫部队在没有陆军部派兵协助的情况下能够保护铁路的设想并没有实现。甚至叛乱已到处蔓延时，他还要求我们不要把格罗戴柯维将军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阿穆尔沿岸和关东地区待命的部队派往满洲。他的劝告被接受了，但这次向铁路增援的拖延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除了靠近哈尔滨的一部分外，中东铁路干线以北几乎所有铁路线，以及南支线的很大一段，连同宽城子、奉天和辽阳车站，全被叛乱者所据有。格尔格罗 i.155 斯将军和米斯钦科将军指挥的当地铁路警卫部队英勇奋战，但因寡不敌众，被迫从几乎所有已占领的据点撤退，大部分集中在哈尔滨，被暴徒包围起来。最后，由于皇上直接下令，陆军部才采取行动，集中军队镇压叛乱。当时与外贝加尔湖地区的铁路交通还畅通，海路也开放着，到1900年秋，我们已从水陆两路集中了十万人的一支军队，迅速地平息了叛乱。利涅维奇将军指挥的联军攻占义和团运动的司令部所在地北京，也有助于满洲秩序的恢复，而格罗戴柯维将军以充沛的精力组织和派遣若干纵队进入满洲，以此援救在哈尔滨受围的格尔格罗斯将军，也是值得称道的。齐齐哈尔和吉林为连年卡姆普夫将军所攻占；奉天为苏鲍京将军所攻占。

一旦秩序恢复，陆军部立即着手从北直隶尽快撤军，尽管瓦德 i.156 西伯爵不赞成，我们还是照样做；所有从西伯利亚和俄国欧洲部分增援的部队都已返回原地。铁路的破坏相当可观，1900年内完成该路建设的一切设想都已被放弃，整整一年——这一年的重要性没有被人们所认识——丧失了。如果1900年我们以足够的兵力保持了铁路的秩序，该铁路在1904年准备的情况就会好得多；1903年增援部队的运输和1904年部队的集中都要完成得快得多，我们在辽阳就会十之八九比实际有的多两三个军团。1900年的叛乱清楚地表明，我们的铁路干线通过中国领土八百英里，要指望将来保持它与俄国交通的安全是不可能的。要保证我国的地

位,就必须在我国本土沿阿穆尔河左岸迅速修建一条铁路,同时将北满置于这样一种状态:即在我们已建铁路的协助下,它不致继续成为我们在远东虚弱的根源。

i.157 由于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是战争的起因,那就有必要略微详细地说到陆军大臣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俄国在满洲自愿承担的责任是以1900年9月1日的政府公报为依据的,公报中引用了外交大臣1900年8月25日的一则通电。据这则通话说,我国政府对于中国事务主要是以下列原则为指导方针的:

“在中国必须保持原状,一切瓜分中华帝国的倾向都要避免。”

该通电还认为,如果由于中国人的任何行动,我国被迫派遣军队进入满洲,并占领牛庄,此种临时措施决不能被认为是超出帝国政府总政策范围的任何利己主义计划的证据,而且,一旦满洲的秩序永远恢复,铁路得到保护——

“——俄国必将撤退它的军队,如果其他强国的行动不对此种撤退设置障碍的话。”

i.158 此项声明发表时,我国在亚洲有十万人以上的武装部队,因此当时从满洲撤兵的诚意是不会有问题的。1901年,我国政府在4月5日同样的一项公报中重申了此种许诺。无论是中国的反对,或是1902年缔结的很明显是针对我国的英日条约,当时都未被认为是我们放弃一切希望——履行我们许下的从满洲撤兵的诺言——的充分理由。

但早在1900年,我们是否能实现此种诺言就是有疑问的。首先,不可能完全不顾该地当局的意见,他们从我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并不认为撤兵是值得想望的,或者是可能的。满洲中国官员的行动,成夥成夥的红胡子的存在,以及我们在1901年被迫进行的严重的军事远征——这一切都加强了我们在那里的指挥官们的

意见，认为我们过于仓促地许诺了从该地区撤兵。尽管有这些疑问，我们还是在 1902 年 4 月同中国签订了一项条约。这只能是 1900 年和 1901 年官方声明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起初设想此项协定会使我国在远东的地位得到一种明确的解决，但不久就很明显，这种希望是没有多少根据的。1900 年至 1903 年铁路、军队和舰队的巨额开销使人们产生和助长了一种固定的想法：如果我们严格遵守 4 月签定的条约，我国至关重要的利益就将得不到足够的保障。中国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并且几乎是公开敌视的；日本公开仇视我们；同时所有其他强国都不信任我们。我们在满洲的立足点也似乎是朝不保夕的，尽管铁路加紧建设并增加了警卫部队，但决不安全。火车因有红胡子的频繁袭击必须加以护送，不论是当地土人，或是他们的官吏，都无法予以信赖。这一切都表明，如果我们仅仅局限于保护铁路线本身，暴乱一开始它就会有多处遭到破坏。如果我们在东方进行着一场战争的时候，又在西部边界遭到攻击，我们的处境就将极端严重了。毫无疑问，如果西方发生了麻烦，我国军队又已从满洲撤退，1900 年在中国的骚乱就可能轻易地再度发生；我国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交通就会再度中断，我们就不得不再度攻占满洲。^① 随着时间的逐月消逝，对于我们能否实行 1902 年 4 月条约规定条款的怀疑也与之俱增，由于中国和日本对我们的敌视日益增加，这一变幻不定的困难时期变成了一个令人极为焦虑的时期。作为例行公事，我们继续保证守约，甚至履行了条约的第一部分，从奉天省直到辽河的地区撤退了我们的部队；但实际上我们已在采取对我国的利益至为必要而与条约绝对不同的步骤。

在 1900 年义和团暴乱之前我就表示过这样的意见：北满和南满对我们具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前者有较大的重要意义是由于各

^① 旅顺的占领使满洲对我们具有相当重要的军事意义。

方面的考虑。首先，该地区因有西伯利亚铁路干线通过而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为我们交通的安全有赖于它，还因为 1900 年的经验表明，财政大臣所组织的铁路保护极端薄弱。因此我要求除当地铁路护卫部队外，能有一支包括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中队和一个哥萨克骑兵连的小部队在哈尔滨驻扎在铁路线上，作为机动后备部队。为此建筑了这样规模的部队的兵营，并为 1903 年住进部队作了准备。但如果中国想要在满洲使我们不愉快，仅在沿铁路

i.161 线本身驻军——而且是一支小部队——是没有用处的。铁路线将被切断，犯人却永远也找不到，因为官吏们表面上向我们磕头，实际上总是遵照北京的指示行事。唯一能指望的是中国人大批流入北满，群聚于接近中国边界地带。对付这种情况，我认为即使完全吞并北满似乎也是不值得想望的，大概也没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吞并过来的中国人口具有公民权利，沿阿穆尔河左岸定居，就会将阿穆尔地区和沿海地区^①的当地居民淹没。在整个上世纪，我们在外贝加尔湖地区以东至海滨的西伯利亚那一部分地区只是非常稀疏地移殖了一些俄国人，这说明该地区与俄国的结合是极端薄弱的。在阿穆尔地区和沿海地区，与中国有一千六百英里的边界线（自外贝加尔湖地区至海滨），全部人口只有四十万。北满土地约有四十五万平方英里，包括整个黑龙江和吉林省的北部。根据可以获得的资料，北满战前只有一百五十万居民，每平方英里为三人。

i.162 1900 年的义和团叛乱表明，只要北满人民的事务继续由北京控制，我们就必须预料到叛乱和破坏铁路的事情。因为中国政府对我们的抗议总是有一个现成的答复：“罪犯是红胡子”。我们也不能毫无忧虑地看待中国在北满增加兵力，以及中国人在靠近阿穆尔河和额尔古纳河荒漠土地上的定居，我国人民已在那里定居很久了。所以我们有必要在北满以某种方式拥有控制的权利以及做

^① 即滨海省。——编者

出我们自己的全面安排的权利。没有这一点，我们警卫薄弱的铁路线或许就成为一种肯定的不利因素，因为它增加了我国边界线的脆弱性，这条边界线在外贝加尔湖地区与乌苏里江地区之间向北形成了一个大的曲弯，整个黑龙江和吉林省北部呈楔形突入我国领土。只有北满安全，我们才能充分放心地着手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开发。

北满并不紧挨着朝鲜，我国永远占领北满不会有与日本发生纠纷的危险，欧洲在那里也没有重要的利益会被侵犯。但它对中国无疑是重要的，我们强行吞并它可能会导致与中国的纠纷。所以 i.163 要由我们找出一种在这个地区巩固我国地位而又不引起与中国破裂的方法。因此我坚决赞成以某种形式将北满包括在我国的势力范围之内；但同时我断然反对在南满有任何半政治性的或军事的冒险事业。

这一区域直至关东地区，包括整个奉天省和吉林省南部。其幅员虽只有北满的四分之一，人口却超过八百万。与北满每平方英里大约三人相比，南满每平方英里为七十多人。奉天省是中国王朝的圣地，或许始终是与中国发生不和的根源，而我国与朝鲜的接触有五百三十三英里，又易于引起与日本的纠纷。

南满呈楔形，邻接关东，沿朝鲜边界只有五百三十多英里。所以占领南满必定会面临两条战线，一条面对朝鲜，一条面对中国。假如有一个敌人在海上占优势，他就能以在沿南满四百英里长的 i.164 海岸登陆相威胁，例如在牛庄^①登陆，就会从后方袭击该地以南的全部我军。在讨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时，可以建议——万一中国方面有任何不友好行动——我们应以取得关东半岛同样的方式占有满洲。这样做，就将使我们与关东半岛的交通得到安全。如前所述，我确信将北满纳入我国势力范围是使西伯利亚铁路干线

① 营口。

通过满洲的自然结果,我同样确信,对南满的任何种类的吞并都将是危险的。

在 1903 年 10 月呈交给沙皇的一份关于满洲问题的专门备忘录中,我表示了如下的意见:

i. 165

“如果我们不触及朝鲜边界,也不派兵驻守该边界与铁路之间的地区,我们就真正向日本人证明了无意攫取朝鲜和满洲的意图。那么他们大概将把自己局限于和平促进他们在该半岛的利益,既不对该半岛实行军事占领,也不会大大增加其国内的兵力。这将使我们免于扩充远东军队的数量,免于即使没有战争也要承受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吞并南满,当前使我们烦恼并使两国不和的一切问题都将越来越尖锐。我们对铁路与朝鲜之间某些地方的暂时占领会变成永久性的,我们的注意力就将越来越被引向朝鲜边界,而我们的这种态度就会使日本人证实他们对我国企图攫取朝鲜半岛的疑虑。

“我国占领南满将会导致日本占领南部朝鲜,这是不容有丝毫怀疑的;不过除此以外一切都很难断定。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如果日本采取这一步骤,它就要被迫迅速增加它的军事力量,而我们就将不得不以扩大我们的远东兵力来回答。这样,两个利益如此各不相同以致似乎注定要和平相处的国家,就将在和平时展开一场竞赛,在竞赛中每一方都将试图在战争准备上超过对方。我们俄国人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牺牲我国在西方的兵力,牺牲一般人民的重要利益,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对我们实在并没有特别重要意义的一部分地区。而且如果其他强国加入这场竞争,争夺军事霸权的斗争随时都容易变成一场殊死的斗争,这不仅可能长期推迟我们远东领地的和平开发,而且说不定对整个帝国都会是一种挫折。

“即使我们在大陆上——在朝鲜和满洲——打败了日本，如果战争不深入到日本本土，我们还是消灭不了它，也得不到决定性的成果。当然，这样做并非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日本是一个具有四千七百万好战人民的国家，就连妇女也要参加卫国战争的，要入侵这样一个国家，即使对俄国这样的强国来说，也是一件须认真对待的事情。如果我们不完全消灭日本，如果我们不剥夺它保持一支海军的权利和能力，它就要等待有利时机——譬如说，我们与西方交战——袭击我们，或者单独干，或者与我们在欧洲的敌人合作起来干。 i.166

“不要忘记，日本不仅能够迅速在朝鲜或满洲投入十五万到十八万组织良好训练有素的军队，而且这样做根本不需要在它的人口中大量抽调人员。如果我们承认德国关于正规军与人口的比例^①——即百分之一——的话，我们就会看到，它有四千七百万人，在平时它能保持的兵力不是十二万人，而是四十万人，在战时它能保持一百万人。即使我们将这个估计减少四分之一，日本也能够在大陆上以一支三十万到三十五万人的正规军与我们相抗衡。如果我们打算吞并满洲，我们就要被迫将自己的兵力增加到能够在远东单独抵抗日本进攻的程度。”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陆军部是如何严重关切象日本这样一个敌手，对于与这个强国因朝鲜问题可能发生纠纷是多么感到焦虑。但只要我们还坚持从南满撤兵的决定，又不干预朝鲜事务，那么破裂的危险就会消除。1900年，我国政府不得不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从满洲撤兵的问题也已在原则上确定；如果我们是在准备离开这一地区，我们肯定不能同时又在准备把它作为军事作战的一个战场。 i.167

^① 此比例很难说是正确的。——编者

至于撤兵问题，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关东地区的司令官)与我在南满对我们的的重要性上持有不同意见。我相信，占领满洲不会给我们带来好处，一方面由于我们接近朝鲜而会卷入与日本的纠纷，另一方面又因我们占据奉天而会卷入与中国的纠纷。因此我认为迅速从南满和奉天撤兵是绝对必需的。而关东地区的司令官(他的责任是保卫该地区)则认为应极力主张，对南满的永远占领是对该地区与俄国交通的最好的保障。关于从北满撤兵的问题，财政大臣和我之间也有些较小分歧。他认为只将边防警卫队留下

i. 168 保护铁路就够了。鉴于我们 1900 年镇压义和团叛乱的经验，我认为在我们尽快地从南满撤兵之后，必须将这些部队撤离北满所有人口稠密远离铁路线的地方，包括吉林和齐齐哈尔，而在哈尔滨铁路上驻扎一支小的后备部队以防止骚乱。这支后备部队无需大于二至四个步兵营和一个炮兵中队的兵力。而且我认为，我们应当保持一些小的军事哨所，继续沿松花江守卫哈尔滨与哈巴罗夫斯克之间的交通，守卫齐齐哈尔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的交通。但这些分歧意见随着 1902 年 4 月 1 日俄中条约的批准也就不再存在了。根据该条约规定的条款，我国军队除守卫铁路者外，在指定的时间内撤离满洲一切地方(南满和北满)。这个问题的解决对陆军部是一个很大的慰藉，因为它一直希望我们的军事事务“回到西方”。第一期的六个月中，我们要在南满西部，从山海关到辽河撤

i. 169 兵；我们按时做到了。第二期的六个月，我们要撤离奉天省其余地区，包括奉天和牛庄两城市。陆军部赞同从奉天省撤兵的安排，并大力准备以促其实现。在哈巴罗夫斯克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匆忙地建起了兵营，以便将士兵撤退到阿穆尔沿岸地区；运输计划已经拟定并得到了批准；部队的移动已经开始，奉天实际上已经撤退，这时关东地区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突然命令停止一切行动。他采取这种行动的理由至今未完全搞清楚。但确切知道的

是,改变政策,停止从南满撤兵在时间上是与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已退休)第一次访问远东相一致的。我们已经撤出的奉天又重新占领,牛庄也是一样。鸭绿江采伐木材特许权^①被认为比以往更加重要,为了支持该公司和我们在朝鲜北部的其他企业,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将一支带枪的骑兵部队派往凤凰城。这样,我们不但 i.170 远未完成从南满撤兵,实际上开进了该地区一些我们以前从未占领过的地方。与此同时,我们听任与朝鲜采伐木材特许权有关的工作继续进行,而不顾该企业发起人违背圣彼得堡指示、极力想使企业具有一种政治和军事性质。

这种意外的政策改变惊动了中国与日本,有充分理由相信,停止从奉天省撤兵是一个至为重要的事件。只要我们坚持从满洲全部撤兵的意图,局限于以边防警卫队保护铁路线,在哈尔滨屯驻一支小的后备部队,并克制自己不侵入朝鲜,那么与日本的破裂就没有多大危险性;然而当我们违反与中国的协议,将军队留在南满,并为从事木材开采事业而进入朝鲜北部时,我们就危险地陷入了与该强国破裂的边缘。而且我们意图的捉摸不定不仅惊动了中国与日本,甚至也惊动了英国、美国和其他强国。

1903年初,我们的地位已变得极为复杂。阿穆尔沿岸地区的 i.171 利益这时已被完全置于不显著地位;在有关远东的最重要的问题上,连该省总督、总司令杜霍夫斯基将军的意见也不征询。同时,在中国领土的满洲,包括数百万英镑的巨大企业已在建立,并且以独立的方针管理着。财政大臣(维特)在兴建和管理着一千三百多英里的铁路线。如前所述,该线路北方部分的确定是直接与我们在该地区的最高权威杜霍夫斯基将军的意见相反对的,而在财政大臣的命令下,建立了一个军团以保护该铁路线。的确,财政大臣在纯粹军事问题上的行为是如此之自行其是,以致决定供警卫

^① 皇家木材公司。——编者

部队使用的一种大炮的类型，以及从国外购买此种大炮，都不征询陆军部的意见，就径自决定了。为了帮助该铁路的经济发展，维特着手组织了一支从事航海业的商船队；为了在满洲河道上活动，他经营着一支河上轮船队，有些轮船还配备着武装。符拉迪沃斯托克不再被认为适于作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干线的终点站了，因此，不顾关东地区是在陆军部管辖之下、又直接在该地军队司令官

i. 172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管辖之下这一事实，也不管他们的意见如何，就选择了大连并将它建设成一个大港口。大量的金钱在这个地方花费了，这对旅顺口的军事重要性和它的军事实力都有不利的影响，因为这就需要考虑或者在大连设防，或者准备它被敌人攻占作为反对我们的作战基地——这种事后来果然发生了。还要指出，华俄道胜银行也操纵在财政大臣的手中。最后，维特在北京、汉城等地还保持着他的私人代表(在北京的私人代表是波科提洛夫)。因此这一年我们的财政大臣恰巧在远东管理着铁路，管理着一支商船队，管理着一定数量的武装船只，管理着大连港和华俄道胜银行。他还指挥着一个军团。同时，别佐布拉佐夫和他的公司在满洲和朝鲜扩展着他们的各种开采特权，用各种可能的手段在朝鲜北部鸭绿江上发展他们的木材投机事业。别佐布拉佐夫使人信不过的计划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他的想法是利用木材公司作为一种“屏障”或壁垒，以防御日本人可能对我们的攻击，在1902年和1903年，他和他的信徒们的活动具有非常令人惊异的性质。在他向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提出的许多要求中就有：向朝鲜领土派遣六

i. 173 百名穿便衣的士兵，在同一地方组织一支由三千名红胡子组成的服役部队，向鸭绿江边的沙河子派遣六百名持来福枪的骑兵以支持木材公司的经理人，以一支分遣队占领凤凰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拒绝了其中的某些要求，但不幸却同意派遣一百五十名持来福枪的骑兵到沙河子，并调动一个配备着大炮的哥萨克团到凤凰

城。这一行动对我们特别有害，因为采取这一行动时，正是我们承担义务从奉天省全部撤兵的时候。如前所述，我们不是撤兵，反而是向朝鲜推进了。

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维特、拉姆斯道夫和我)都已认识到，如果我们继续拖延履行已许诺的撤兵，尤其特别危险的是如果我们不能停止别佐布拉佐夫在朝鲜的活动，威胁着我们的危险将会是什么。因此我们三位大臣促成任命一个专门委员会，于1903年4月18日集会于圣彼得堡，考虑别佐布拉佐夫在一份专门备忘录中向该委员会成员提出的某些建议。这些建议的目的是加强俄国在鸭绿江流域的战略地位。我们三位大臣在委员会上都明确坚定地反对别佐布拉佐夫的建议，并一致同意，如果他在鸭绿江的企业要想得到支持，就必须严格地限制在商业的基础上。财政大臣断然宣称，俄国今后五年或十年在远东的任务必须是稳定该地区并完成在那里业已着手的工作。他进一步指出，虽然政府各部的观点并不总是恰好相同，但从来没有——就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而言——在行动上发生过任何冲突。外交大臣特别指出了别佐布拉佐夫提出的停止从满洲撤兵的建议所包含的危险。 i.174

皇帝陛下听取这些意见后表示满意，下诏说，对日战争决非所望，我们必须尽力使满洲局势恢复平静。为在鸭绿江开采木材而组成的公司必须是严格的商业组织，必须允许希望参加的外国人加入，必须不让军队中的各级官兵参预其事。于是我受命前往远东，在该地熟悉我们的需要，并前往日本探明该国的意向。在日本，我受到最热诚的和亲切的接待，使我确信该国政府是希望避免与俄国破裂的，但我们必须在满洲有完全明确的行动，并克制自己不干预朝鲜的事务。如果我们容许别佐布拉佐夫和该公司的计划继续推行，就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这些结论我都电告了圣彼得堡。 i.175

但在我离开圣彼得堡以后，因为朝鲜问题而与日本破裂的危险性已大大地增加了，特别是财政大臣在 1903 年 5 月 20 日宣告，在得到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的解释后，就事情的本质而言，他与别佐布拉佐夫之间并无意见不合之处。

我到达后在旅顺举行的会议上，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列萨尔^①、巴夫洛夫^②和我都诚挚地赞成，鸭绿江企业应当具有纯粹商业的性质；而且我还补充说，按照我的意见，该企业应当完全放弃掉。我召回了几个参加该公司工作的军官，并向管理该公司军政 i.176 事务的陆军中校马德里托夫建议，他应当或者将他的军职辞去，或者放弃在该公司的工作，依我看来，这种工作对于一个穿着总参谋部制服的军官是不合适的。他选择了前者。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所提出的一切军事上的要求，经与在关东地区的高级军官商议之后都极为迅速地实现了。我的建议和命令是在旅顺做出的，用急件发出。1903 年秋，他因我对他的建议如此迅速地采取行动表示感谢。鉴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再三向我保证他完全反对别佐布拉佐夫的计划，正在全力制止这些计划，而且他是一项俄日和平协定的坚定的拥护者，这使我充分相信，避免与日本破裂一事是完全可由我们控制的，遂于 1903 年 7 月离开旅顺前往圣彼得堡。我这次访问远东的结果在一个专门报告里具体都说到了，于 1903 年 8 月 6 日呈报皇上，在这份报告中我绝对坦率地表明了 i.177 了我的意见，认为如果我们不结束在满洲事务上含糊游移的状况，不结束别佐布拉佐夫在朝鲜的冒险活动，我们与日本的破裂就是必然的。报告的副本送交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并得到他们的赞许。这份报告不知用什么方法宣传开了，1905 年 6 月 24 日，《黎明》刊载了一个名叫罗斯拉夫列夫的人的文章，题目是

① 俄国驻中国公使。——编者

② 俄国驻朝鲜公使。——编者

“哪个大些？”文章的目的在于论证，我应当包括在那些对于跟日本破裂负有罪责的人之中，因为由于害怕别佐布拉佐夫，我签署了一份在旅顺起草的文件，这份文件将鸭绿江企业置于俄国军队的保护之下，从而停止了从满洲的撤兵。这篇文章被许多俄国和外国杂志所转载，但该文中包含的错误论述——硬说我签署这份虚构的文件——从来没有人给予任何驳斥。

鉴于该文传播特别广泛，并鉴于对准我的责难很严重，我要将文章的有关部分摘抄一些出来。罗斯拉夫列夫引用了我给皇上报告中如下的一些句子和段落：

“我们在鸭绿江流域的行动和在满洲的行为已在日本激起了敌对的感情，这种感情可能会由于我们采取任何稍为不慎的步骤而导向战争……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的行动计划如果实现，将不可避免地导致违反 1902 年 4 月 8 日我国与中国达成的协定，也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与日本的纠纷……去年 i. 178 年底和今年初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的行动，实际上已违反了与中国签订的条约，造成了与日本的裂痕……应别佐布拉佐夫的请求，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派了一支持来福枪骑兵到沙河子（在鸭绿江边），并在凤凰城保持了一支部队。这些措施使从奉天省的撤兵停止了。……在其他参加鸭绿江企业并给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带来麻烦的人中，代理国务大臣巴拉舍夫的为人很象别佐布拉佐夫，十分好战。巴拉舍夫曾发给鲍迪斯科上尉一封急信，要求‘捉拿所有的日本人’，‘公开惩治他们’，并‘采取用排枪齐射的行动’，若不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将此信加以制止，鸭绿江上的一场流血插曲在此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不幸的是，即使现在每天都容易发生这种流血事件……我在日本停留期间，有机会观察他们怎样神经过敏地理解我们在鸭绿江上的活动，如何夸大我们的意图，如何准备

以武力保卫他们在朝鲜的利益。我们在那里的积极行动使他们确信，俄国现在将要进行它在远东的第二部分计划——已经咽下满洲，正准备鲸吞朝鲜。在日本，情绪激昂，若不是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明智地给予警告——假如他让别佐布拉佐夫的一切建议付诸实行的话——我们目前或许已同日本处于交战状态了。无论如何也没有理由设想，在鸭绿江砍伐木材的几个军官和后备兵会在对日战争中有什么用处。与木材企业促使日本人民保持激昂情绪所造成的危险相比，他们的价值简直是微乎其微……只要这样说就够了：据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我国驻北京、汉城和东京公使的见解，木材采伐特权也许会成为战争的起因，这个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

罗斯拉夫列夫从我的报告中引用了上述摘录之后写道：

“库罗帕特金如此热烈、雄辩而又严峻地责难了鸭绿江的冒险事业，以他的政治见识清楚地看到了这个冒险事业将对俄国产生毁灭性的后果。然而为什么这位勇敢而又英明的非难者却没有向旅顺会议的决定提出抗议呢？为什么说了几句挖苦别佐布拉佐夫的话之后，他又签署了将鸭绿江冒险事业置于俄国军队保护之下的文件，从而中止了从满洲撤兵呢？为什么对别佐布拉佐夫冒险计划的巨大危险性与库罗帕特金持共同见解，并预料到与日本的破裂迫在眉睫的其他成员，不根据旅顺7月会议的精神制止别佐布拉佐夫政治的和经济的越轨行为呢？为什么他们与此相反，却和库罗帕特金一道，在一份承认别佐布拉佐夫的企业为有益的政府事业的文件上签字，并批准一项在中国、朝鲜和日本都是背信弃义的政策，因而为被战争建立起来的洗雪不掉的耻辱纪念碑安放了第一块基石？为什么？就是因为当时每个人都害怕别佐布拉佐夫。”

这种指责已经广泛流传，因此需要加以说明。

1903年6月在旅顺举行的会议是为了，如果可能的话，寻找出某种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而又不降低俄国的尊严。出席这次会议的除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和我之外，还有代理国务大臣、俄国驻中国公使列萨尔；皇帝侍从、俄国驻汉城公使巴夫洛夫；陆军少将沃加克；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以及普兰康，一个外交官员。我们都了解皇上的意图，即我们在远东的企业不应引起战争，我们必须想法贯彻这种旨意。至于办法，各有不同的意见，但在基本问题上完全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其中有：

1. 满洲问题——7月3日，会议就此问题作出如下判断：鉴于吞并满洲难免会发生异常的困难并要负担巨额的管理费用，与会者一致同意原则上不希望这样做；这一结论不仅适用于整个满洲，而且也适用于它的北部。

2. 朝鲜问题——7月2日，会议决定，占领全部朝鲜，或者，^{i.181}即使只占领它的北部，对俄国都是无利可图的，因而不是我们所希望的。而且我们在鸭绿江流域的活动可能使日本有理由害怕我们夺取朝鲜半岛的北部。7月7日，会议召请代理国务大臣巴拉舍夫和总参谋部的马德里托夫中校到会，说明鸭绿江企业的状况。从他们的证词来看，该公司似乎是合法地组织起来的，公司持有中国当局关于在鸭绿江北岸砍伐木材的许可证，并有朝鲜政府让与的在鸭绿江南岸采伐的特权。虽然1903年4月18日圣彼得堡会议结束后该企业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挑战性的特色，在关东省已为人所共知，但它的活动还不能说是纯粹商业性的。到7月7日，公司雇用的人员有：九个高级经理人，其中一名是军队的军官；九十七或九十八名后备兵，在河上管理从沙河子到江口的木排；二百名左右中国佬（来自烟台）和大约九百名朝鲜人。公司的事务由马德里托夫中校经管着，虽然该军官并不正式在公司供职。

与会者考虑了所提供的这一切事实，一致得出结论，“尽管鸭 ^{i.182}

绿江木材公司的确象一个商业组织，不过它雇用现役名册中的军官做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的工作，这无疑使公司有了一种政治军事的面貌。”因此，会议为了不让日本有借口，把木材公司视为一种军事政治性企业，认为有必要“立即采取措施使公司事务成为专属商业性质的，从公司排除正规军军官，并将木材业务的管理交付给不在帝国供职的人。”7月7日，所有与会者，包括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在内，都在这一决定上签了字。我个人拒绝参与涉及满洲的任何经济问题，并说财政大臣是干这些事的适当人选。大家要求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在他遴选的专家帮助下解决以下各点：

1. “为了减少中东铁路的亏空，应采取何种行动，在满洲应奉行何种经济政策。

i. 183 2. “专家们建议的增加铁路收入的措施和在满洲的经济政策，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经济状况将影响到何种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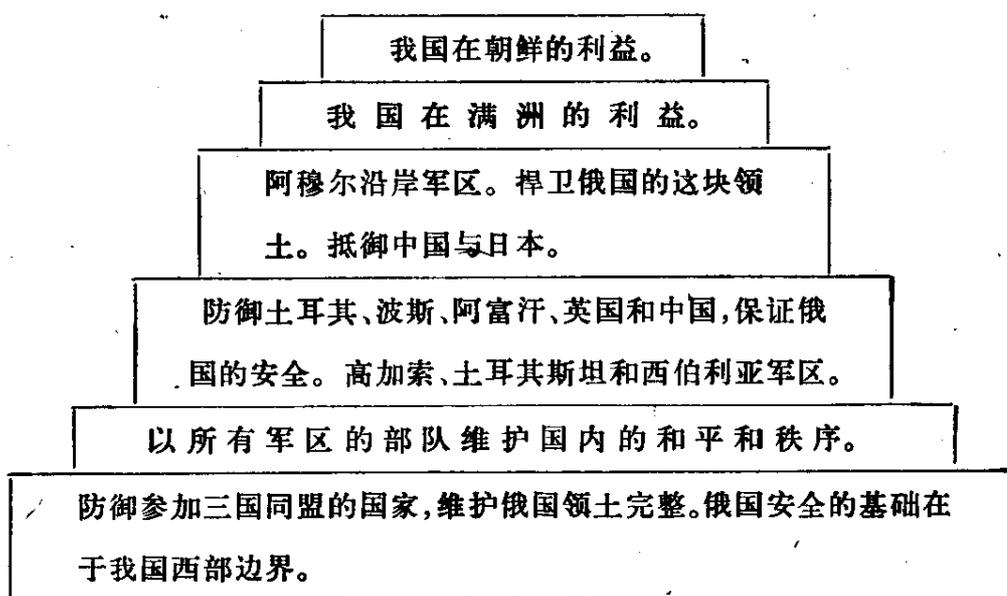
交给这个小组委员会的另一任务，就是编制在满洲经营的一切私营企业的名册。7月11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宣读了该小组委员会关于经济问题的报告，决定：“注意报告的结论，不加审议，将其附于会议记录之后。”对此，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建议应将这句话加上：“以便在考虑我们在满洲的经济进一步发展时，尽量不使国家进行更多的投资。”所有与会者都支持加这句话，只有国务大臣别佐布拉佐夫除外，他不认为自己能对此提出什么意见。^①旅顺会议的参加者未签署其他关于一般经济问题的决议或关于在满洲的其他任何企业的决议，经济性质的事也未调查研究。

i. 184 显然，从上述事实可以看出，罗斯拉夫列夫责备会议成员签署了会议诸事项的记录，因而使别佐布拉佐夫的冒险事业在帝国有益企业中有一席之地，这种论述是虚构的。这种虚构根据什么，我们无从知道。立即将会议决议付诸实施——马上结束鸭绿江木材

^① “关于满洲问题的会议的决定”第十号，1903年7月11日（于旅顺）。

企业的军事政治活动——的任务是依靠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以赋予他的权力来进行的。他先必须做并且有充分权力做的是召回派往凤凰城的部队和派往鸭绿江的持来福枪骑兵。这件事为何未做，我不清楚。就我个人而言，我是不让总参谋部的马德里托夫中校继续与木材公司保持联系，而且我还可以指出，他和其他与木材企业有联系的军官这样做我并不知情。但不管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使鸭绿江企业成为纯商业性企业所采取的措施多么有效，我还是担心这个全世界声名狼藉的企业将继续具有它的重要政治意义。因此，我从日本返回后于1903年8月6日奏呈皇上的报告中表示，必须立即结束木材公司的工作，并将全部企业出售给外国人。我们在朝 i.185 鲜的其重要性微不足道的利益可能使我们陷入与日本的冲突，这种想法我在日本停留期间一直使我感到焦虑。1903年6月26日，在我经过日本海前往长崎的路上，我在日记中写了如下一段话：

“如果有人要我从军事的观点发表一项意见，比较俄国利益在帝国各地区和各条边界的重要性，我就将把我的判断画成金字塔式图解的形式，将我国利益最不重要的部分置于顶端，而将最重要的部分置于底层，如下所示：



“这个图解清楚地说明，陆军部今后应将主要精力集中在哪里，俄国的主要力量和资源将来应转向何方。作为我们国家地位的基础来说，它的利益在于：(1)防御参加三国同盟的国家，捍卫帝国领土完整；(2)运用我们所有各军区的军队保持国内的和平和秩序。与这些任务相比，其他一切任务都是次要的。图解进一步表明，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利益必须看作比在满洲的利益更为重要，而后者又必须优先于我们在朝鲜的利益。然而，我恐怕至少在一个时期内我国的活动将以远东事务为基础，如果这样做，那么这个金字塔就要翻个底朝天，倒立在朝鲜的利益那个狭窄的顶端。但建立在这样一种基础上的这种结构将会倒塌。哥伦布用敲破鸡蛋的办法解决了将鸡蛋倒立顶端的问题，难道我们为了把我们的金字塔倒立在它的狭窄的朝鲜利益的顶端上，一定要敲破俄罗斯帝国吗？”

我从日本回国后，曾将上述图解给维特伯爵看，他表示同意，认为该图表是正确的。尽管最近的战争遭到了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并没有采取哥伦布的办法。俄国还没有破裂；然而毫无疑问，既然战争是过去了，上述图解必须大大地改变。

在远东设立总督辖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1903年8月15日，我请求皇上免去我陆军大臣的职务，在军队举行大演习以后，我被准许请长假，我享用了这个假期，希望任命别人来担任我的职务。1903年9月，远东局势开始严重起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明确受命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防止战争的爆发。皇上对此坚定地表明了他的意愿，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限制为了避免同日本破裂而应当采取的让步。现在所要做的只是寻求一种方法，使这种让步尽量地少损害俄国的利益。我在日本停留期间，日本政府打算冷静地考虑日本和朝鲜事务，希望在互让的基础上达成一项协定，这使我感到满意。皇上明确表示的不让战争发生的意愿，在一

个短时期内在远东事务中产生了镇静效果。鉴于远东局势的动乱，我缩短假期，在向皇上要求赴任的报告中，我把这种险恶的局势作为我返任的理由。1903年10月23日，皇上在我的报告上作了旁批：“远东的警报显然在开始平息。”10月份，我建议加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守备，但对该地的增援并未得到许可。在此期间，并没有真正在远东重建平静的局面，我国与日中两国的关系纠缠越来越深。1903年10月28日，我向皇上呈递了一份关于满洲问题的专门报告，说明为了避免与中国的纠纷，避免同日本破裂，我们必须结束对南满的军事占领，并把我们的活动和行政监督限制在满洲北部。 i.188

在此报告呈递的当时和以后(11月)，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与日本的谈判不仅未取得进展，而且更加危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依然相信，表示屈从只能使事情更坏。

由于牢记皇上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避免战争的明确意愿，并且不指望阿列克谢耶夫的谈判能取得有利的结果，我在1903年12月6日向皇帝陛下呈交了第二个关于满洲问题的备忘录，建议 i.189 将旅顺口和关东省归还给中国，并出售中东铁路的南支线，以此来换取在满洲北部的某些特殊权益。这个建议的实质是，我们应当承认我们在太平洋取得一个出口的企图是不合时宜的，应该完全放弃。要做出这种牺牲看来可能是重大的，但我强调两项重要考虑来表明它的必要性。首先，交出旅顺(该地是从日本人手中夺取的)和放弃南满(连同鸭绿江企业)，我们就会避免与日中两国破裂的危险；其次，我们就会避免俄国欧洲部分内部骚乱的可能性。对日作战是极端不得人心的，会增加人民对政府的不满情绪。

在备忘录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话：

“俄国在远东的经济利益是微不足道的。谢天谢地，目前我们还不是生产过剩，因为我们的国内市场尚未供应过多。

我们的工厂和铸造厂或许有一些产品出口，但那大部分是因为受政府补贴的，当不给予这种人为的鼓励时，出口就会停止，或接近停止。因此，俄国尚未达到为了获取产品市场而必须进行战争的程度。至于我们在该地区的其他利益，在满洲和朝鲜的几个煤炭或木材企业的成败并不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足以证明冒战争风险的正当性。通过满洲而兴建的铁路并不能迅速改变局面，使这些铁路成为国际通商大动脉因而具有世界重要性的那种希望不见得很快就会实现。旅客、邮件、茶叶，可能还有其他商品将通过它来运送，但大量的国际货运（只有这种运输才能使一条铁路具有这种世界重要性），由于铁路运价太高，还必定是通过海路来运输。但以当地的货物运来供应当地的需要，情况就不是这样。这种货物是铁路——尤其是铁路的南支线——将要以日益增多的数量来运载的，从而获得它的大部分收入，同时又刺激该地区使之发达起来，并使中国人得利（尤其在南满）。不过如果我们不采取特别措施，把即使是地区性的货物引到大连，该港口就要受牛庄竞争之害。旅顺就防务和铁路终点站而言对俄国是没有价值的，除非那条铁路是国际运输线的一部分。中东铁路的南支线就通商而言仅仅——或主要——具有地区的重要性，俄国不需要以旅顺作为要塞，并以一支舰队和三万人的守备部队这样高昂的代价来保卫它。这样说来，似乎支持在关东保持一个前方阵地的，不再是经济上的考虑，而只是出于政治的和军事的考虑了。那末可能使我们卷入对日中两国作战的那种利益又是什么呢？这种利益有足够的重要性，足以证明战争要求的巨大牺牲是正当的吗？

* * *

“俄国人民是强大的，他们对上帝的信仰，以及对沙皇和

国家的献身精神都是不可动摇的。因此,我们相信,如果在二十世纪初俄国注定要经受战争的考验的话,它将从战争中取得胜利和荣誉。但是它将不得不作出可怕的牺牲——或许是长期妨碍帝国的自然成长的牺牲。在十七、十八和十九世纪初期我们所进行的战争中,敌人侵略我国领土,我们为生存而战——为保卫我们的国家而进军,为信仰、为沙皇、为祖国战死沙场。如果在二十世纪初,战争的爆发是由于远东纠纷的结果,俄国人民和俄国军队将一如既往,以同样的献身精神和自我牺牲执行君主的意志,为了获得彻底的胜利,舍弃他们的生命和财产;但是他们对于战争的目的将没有明确的理解。由于这种缘故,就不会象我们曾经或者为自卫而战,或者为人民的宝贵目的而战的时候那样,伴随着战争而来的,是那种精神的兴奋和爱国情绪的激增。

“目前我们正经历着一个危急时期。企图毁灭生活的最宝贵最神圣的基础的国内敌人甚至正在侵入我们的军队。在 i.192 人民中,大量的人已变得不满,人心浮动,各种动乱——大部分是革命宣传造成的——日益频繁。需要调军队加以对付动乱的事端甚至比不久前更为普遍。矛头指向政府的秘密的革命出版物屡见不鲜,甚至在兵营也有发现……但我们必须希望,这种邪恶的东西尚未在俄国的土壤中深深扎根,而且以严峻明智的措施就可将它根除掉。如果俄国受到来自外部的攻击,具有爱国热情的人民无疑将拒绝革命宣传的那种虚伪说教,并准备响应他们尊敬的君主的召唤,象在十八世纪、特别是十九世纪初期那样,来保卫他们的沙皇和国家。但如果要求他们为进行一场其目的他们并不清楚了解的战争而作出巨大的牺牲,反政府政党的领袖们就会利用这种机会散布煽动叛乱的言论。这样就有了一种新的因素,如果我们决定在远

东进行战争的话，必须把它考虑在内。我们在远东获得阵地所已经历的或预料要经历的牺牲和危险，在我们梦想在印度洋暖洋的查巴尔^①得到一个出口时应成为对我们的一个警告。事情已经很明显，英国正在准备和我们在哪里作战。兴建通过波斯的铁路，建造防御港和保持一支舰队等等，只不过是重蹈我们关于中东铁路和旅顺口经历的复辙罢了。代替旅顺口的将是查巴尔，我们与之作战的将不是日本，而是与英国进行一场更加不必要和更加可怕的战争。

“鉴于上述考虑，就产生了问题：难道我们不应当避免目前在旅顺的危险，以及将来在波斯的危险吗？难道我们不应当将关东、旅顺和大连归还给中国，放弃中东铁路的南支线，以此换取从中国得到在北满的某些权益，并得到一笔比方说二千五百万英镑的赔偿，作为我们在铁路和旅顺方面所付出的代价吗？”

这份报告的副本送给了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不幸的是，我的观点并未得到赞同，与此同时，与日本的谈判也在旷日持久，拖延不前，并且越来越纠缠不清。未来的历史学家将会接触和研究所有的文件，或许可以断定，俄国君主避免对日作战的意愿为什么没有被他的主要的文武大臣们贯彻到实际中去。在目前，有可能说得明确的只是，尽管不论皇上还是俄国都不希望战争，我们却并没能避免战争。谈判失败的原因显然在于我们对日本备战和以武力支持其争论的决心的无知。我们自己是不准备作战的，而且决定，事情不应达到作战的程度。我们提出了要求，但没有用武力强迫对方接受这些要求的意图——而且还可以说，不值得为这些要求去进行战争。再者，我们总是认为，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问题取决于我们，而我们全然忽略了日本坚持其要

^① 在波斯的梅克兰沿岸。——编者

求的顽固决心，这些要求对它具有生命攸关的重要意义，也忽略了它指望我们军事上的无准备状态。这样双方在对等条件下的谈判就没有继续进行下去。

还有，在此期间我们的局面被阿列克谢耶夫对委托给他的谈判所采用的方式弄得更糟了。日本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由于阿列克谢耶夫对外交程序生疏，又缺乏干练的幕僚协助，结果整个外交来往变得紧张而困难。而且他还按照这种错误的假定行事，即必须表现出顽固执拗，不屈不挠的精神。他的想法是，一个让步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另一个让步，一项屈从的政策与一项坚定的政策 i. 195 相比，最终大概更会引起一场破裂。

1905年7月4日，《我们的生活》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的坚定政策》，这篇文章传遍了全世界，文章写道：

“目前，当我们在陆地和海上作战中所遭遇的灾祸，连同我们的士兵和水兵所经受的可怕的令人难以相信的痛苦，正在使我们把意见集中在应对这场可悲的战争负责的人们身上时，在确定不同的部门和人员对此‘挑起事端’负责的程度时，我们必须记住，该总督代表着俄国在远东的利益，他完全熟悉一切政治情况，人们必须认为他是一位远东事务的权威。

“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政策是‘坚定’的，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为着不让俄国在该地区的政治地位被削弱，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不以为在满洲已被占领三年之后可以建议从那里撤兵。尽管作出让步是绝对必要的，他还在1903年9月报告说，日本的建议‘完全是一个办不到的要求’，我们应当继续占领满洲这一点，必须被明确规定为与日本进行任何谈判的开端，而且他‘坚信’，按照我国在远东的地位来说，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这位前总督以一般政治形势为‘依据’的意见是这样的：

i. 196

只有使日本政府清楚理解，俄国决心以武装力量支持它在满洲的权利和利益，才能‘指望’谈判得到一个好的结局。由于持有这种看法，又由于‘日本人的挑衅行为’，阿列克谢耶夫提出了一整套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万一日本在仁川、南浦或鸭绿江口登陆，我们应当立即在海上打击他们。他‘深信’，为了要同日本达成一项协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不屈不挠的决心和及时的行动，只有如此才能阻止日本实现它野心勃勃的企图。’

i. 197

“1903年12月，当日本政府提出他们的建议来答复由阿列克谢耶夫起草、并被描写为‘从俄国用它自己的傲慢行为造成的地位上光荣退却’的协定草案时，他认为这些建议的特点‘等于是要求俄国政府正式承认朝鲜为日本的保护国’。的确，他认为这些要求‘如此飞扬跋扈，因此我们应当立即加以拒绝’。他说，在提出这些要求时，‘日本超越了一切理性的界限’，因而他感到无让步可言，并认为较好的办法是把俄国在自己的建议中‘已达到了让步的极限’这点解释明白之后，使谈判中断算了。于是，当1903年12月底日本开始占领朝鲜时，他最强烈地提出，‘为了自卫’，应采取相应的措施，来保持因朝鲜被占领而打破了的的力量均势——即应当占领鸭绿江下游，应当实行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省的动员。他认为，1904年1月中旬收到的日本最后建议‘在腔调上和实质上都比以前更加自命不凡，更加狂妄’，他坚持中断谈判，断言继续谈下去‘无法获致一项互利的解决办法’，而我方‘任何屈从的表现都会在整个东方眼里严重损伤俄国的尊严，相应地增大日本的威信’。

“这是外交谈判破裂前三星期的事。俄国的尊严还没有受到足够的损害吗？”

“最后，仅仅在宣战的前几天，我们送出了对日本的最后答复。这份答复拒绝考虑建立一个中立地带，并承认日本在朝鲜统治的权利，却被说成是‘一种慷慨的表现，俄国很难再越出这个界限了。’

“三、四天之后，即在1904年2月6日，日本突然中断了外交关系，这样就开始了那场可怕的战争，这场战争本来是在不损伤我国尊严的情况下加以阻止的，如果该总督的政策少‘坚定’一点而且——必须还要说——少反常一点的话。”

我对于我们陆军部所面临的各项任务的相对重要性的意见，使我成了一名人所深信的反对者，反对一项积极的亚洲政策。

由于认识到我国西部边界军事上的无准备状态，并且考虑到 i.198
要以我们的资源致力于国内整顿和改革的紧迫需要，我认为与日本破裂将是我们国家的一场灾难，并且尽了我的一切努力加以阻止。经过在亚洲的长期工作，我不仅是在该大陆与英国达成一项协定的倡导者，而且我还确信，我们与日本和平划分势力范围也是可能的。

我认为，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干线通过满洲之举是一个错误。采用这条线路跟我毫无关系，因为我当时是外里海军区的司令官；这也是与陆军部在远东的代表杜霍夫斯基将军的意见相反的。

第七章

日本胜利的原因

我们投入战场的军队无法在规定的时间内击败日本人。很多历史学家大概将会企图解开这个谜,即一个我们认为是二等的、不久前还没有军队的强国,如何能在海上绝对压倒我们,并在陆地打败一支强大的军队,最后我们无疑将会找出全部原因。目前我打算只谈谈有助于日本胜利的某些一般原因。概括地说,我们低估了它的力量,尤其是它的精神力量,而过于轻率地开始了战争。

我们在彼得大帝时代占有堪察加的时候,日本第一次变成了我们的邻国。1860年根据北京条约和平地占领了辽阔的乌苏里江地区之后,我们就到达了朝鲜边界和日本海。这个海几乎完全被朝鲜和日本列岛包围着,对于整个邻接的海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由于从那里进入大洋的出口在日本手中,它可以轻而易举地阻止我们向太平洋自由接近。但我们由于获得了库页岛,就有了一个经由鞑靼海峡^①的出口。然而这个海峡长期地经常被冰封冻着,大约四十年间,在乌苏里江沿岸唯一发达的地方是符拉迪沃斯托克。我们的这个新邻邦长期以来并未引起我们的注意——事实上,只要它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并不接触,它就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我们也一直确信它军事上的薄弱。我们知道,日本人是技艺精巧和有耐心的工匠;我们喜欢他们的产品,它的优美的手工艺和灿烂的色彩对我们很有魅力;我们的水手以欣赏的口吻谈论这个国

^① 应为拉彼鲁兹海峡。——编者

家和它的居民，对他们访问该国充满了愉快的回忆，特别在长崎，他们受到当地居民的热烈欢迎；但作为一个军事因素，日本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水手、旅行家和外交官完全忽略了一个奋发而独立的民族的觉醒。

1867年，日本的武装部队有一万人，组成九个营，两个骑兵连和八个炮兵中队。这支构成常备军骨干的部队由法国教官训练，部队采用的服装也是法国式的。1872年，由于法德战争的结果，^{i.201}日本实施了普遍兵役法；德国人代替了法国教官；按德国方案组织军队，每年并派遣军官到欧洲学习专业。中日战争时日本军队有七个步兵师；但由于它在陆地和海上力量都还薄弱，妨碍了它享受这次战争的胜利成果，这个国家就竭尽全力建立一支足以保护其利益的陆军和海军。1896年4月1日，日本天皇颁布了一项改组军队的法令，要在七年内使军事力量增加一倍。1903年这一改组完成了。从统计上说，我们并未忽略这支庞大的海陆军力量的创建和成长；建造每一艘军舰和建立每一个新步兵师都在海军部和陆军部的报告中谈到了。但我们没有适当地估价这些发端的意义，因而就无法以任何欧洲的标准仅从数量上衡量其作战价值。关于日本军队编制和兵力的详细情报，以及对它的技术准备和动员能力的估价，都由司令部参谋部编辑在一本手册中，并且年年^{i.202}加以修订。这本手册包括日本军队1894—1895年参加对华作战和1900年远征北直隶的下列兵力数字：

1. 1894—1895年对华作战。——日本在这次战争中被迫拿出了它的全部军事力量。随着战争的发展，当时七个师中的每一个师都被动员起来，并从广岛派往作战战场。战争实际宣布之前，6月中即将第五师的一半派往朝鲜，战争开始之后，8月份又派了该师另一半和第三师整师前往朝鲜。这两个师组成为第一军，9月平壤击败中国军队，10月从鸭绿江夺路而过，通过满洲

东南部向奉天挺进。在鸭绿江口海军交战之后，由第一师和第六师的一半组成的第二军于9月30日在广岛集中。该军在皮子窝以北登陆，杀出一条路直抵旅顺。到1894年底，在南满已有三个半师，兵力共达五万二千六百人。1895年初，第二师和第六师的另i. 203一半又在山东半岛登陆；这支部队组成第三军，约有二万四千人。这样，到1895年初，已有七万五千多人在中国登陆。日本政府补贴一家轮船公司，租用了三十艘轮船来运送这些部队。由于作战地区崎岖不平，陆上运输主要由搬夫组织的运输队构成，这些搬夫大部分是在日本招募的，其余的是在朝鲜和满洲搜集的苦力。日本国库为这次战争预先拨出费用四百五十万英镑；后来又发行了一千五百万英镑的内债。全部临时支出加起来，估计这次战争消耗了日本二千万英镑，其中一千六百四十二万归陆军省，三百五十八万归海军省。

2. 1900年远征中国——最初，7月份在第五师和第十一师动员了一支三个营、一个骑兵连和一个工兵连的部队，共有三千人。约一个月后，接着动员了第五师。这些部队由从日本邮船公司租来的二十一条运输船运往大沽。最初的一支部队除外，运送了i. 204一万九千人（第五师全师，佐波列夫炮兵中队，从东京调来的一部分铁路大队，六千至七千穿着制服的雇用苦力）。总共运送了二万二千人——第五师的部队和苦力——而且一切军需供应都从日本发送。在整个战争中，约有六千病伤人员返回基地，而一半的骑兵和炮兵以及四分之三运输马匹都死亡了。这次远征估计消耗了三百八十万到四百万英镑，这笔钱是从用于制造军舰和应付紧急事件的大约五百万英镑资金中支取的。1894—1895年战争之后的七年内，日本的武装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它能够达到这一步，主要是从中国得到了战争赔款，这种赔款的缴纳是经我们从中斡旋的。

我们的司令部参谋部对日本与我国交战之前的军队兵力计算如下：

常备军的平时兵力(福摩萨守备部队除外)估计有八千一百一十六名军官和十三万三千四百五十七名士兵。但为节约起见,平时实际上只有六千八百二十二名军官和十一万名士兵服役,这些人中又经常有一万三千五百人休假。战时兵力固定为一万零七百三十五名军官(没有补充队)和三十四万八千零七十四名士兵。这样,要使平时兵力数量达到战时编制,就需要大约三千九百个军官和二十四万多士兵。1901年1月1日,在常备军、后备军和国防义勇军中,共有二千零九十八名参谋和将级军官,八千七百五十五名团级和准尉军官,三万五千二百四十八名军士,六千九百六十四名少尉和士官生,二十七万三千四百七十六名士兵,总共是一万零八百五十三名军官和三十一万五千六百八十八名士兵^①。假定常备军的平时编制为八千一百一十六名军官和大约十一万名士兵,显然在1901年1月1日就有二千七百三十七名军官和大约二十万零五千名士兵是在后备军和国防义勇军中。拿这个数字与将平时编制变成战时兵力所需数字相比,我们发现1901年1月1日在数量上未能达到;缺少相当于后备军所需数量的军官^②和三万五千名左右的士兵。如把大致上每年新兵分遣队(四万五千人)和部队各个年代入伍的士兵的服役期考虑在内,可以说到1903年1月1日,后备军和国防义勇军的士兵数字就接近二十六万五千人^③。最后,为了使军队在情况紧急时满员,可从后备军新兵中

① 除此之外,还有二千七百一十六个各部门的军官——军医、兽医、军需等。

② 到1901年1月1日,在后备军和国防义勇军中有军官二千七百三十七名,不算后备军,在战时需要增加二千六百一十九个军官;这样就充分完成了常备军和国防义勇军的军官编制,并有一百三十八个军官留给后备军。这是不足的——缺少大约一千个军官。

③ 十四万五千人在后备军,十二万人在国防义勇军。

得到大约五万人,其中大部分是非常缺乏训练的。尚未提到后备军的事,但对它的设立是做了准备的,而且按照营的数量来看,他们一定把常备军的编制增加了三分之二。对日战争以前我们得到的关于日本军队的兵力、组织和训练情况的最新情报是根据我国驻日武官、总参谋部的凡诺夫斯基上校的报告。1903年访问日本的阿达巴什上校曾向司令部参谋部的吉林斯基将军提供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即当时正采取步骤设立后备部队;但因这一情报与凡诺夫斯基上校所提供的完全不同,吉林斯基少将不幸并未考虑其可靠性。几个月后,我国驻日海军武官鲁森大尉,一个极为干练的军官,向海军司令部参谋部交了一份与阿达巴什所提供的非常

i. 207 相同的情报。他的这份报告由海军部转交给了司令部参谋长萨哈罗夫将军。后来确定,这两份报告都是准确无误的,但因吉林斯基将军和萨哈罗夫将军都不相信,因而就束之高阁了。结果出版的手册中关于1903—1904年日本武装力量的情报,对后备军只字未提。同样,我们对于日本数量众多的补充队也没有给予适当的估价。按照我们根据驻日武官提供的情报计算,日本可向常设部队、国防义勇军和补充队提供的兵力总共不过四十万多一点。

现在,日本军队的军医长官军医署长基普克已经公布了俄日战争中伤亡的官方数字。从这些数字似乎可以看出他们损失的总数:阵亡四万七千三百八十七人,伤十七万二千四百二十五人,总共二十一万九千八百一十二人。伤、亡、病的总数共达五十五万四千八百八十五人(这个数字比我们设想他们能够投入战场与我们作战的总数大得多),有三十二万病伤人员送回日本。目前我们从别的材料中得知,他们在东京荣誉公墓中埋葬了六万零六百二十四名阵亡者,此外还有七万四千五百四十五人死于病伤。所以他们

i. 208 必须承认有十三万五千人阵亡和死亡。由于军医署署长基普克说,伤、亡总数占他们总兵力的百分之十四点五八,似乎他们投入

战场与我国作战的军队总数超过了一百五十万，或者说比我们司令部参谋部预料的数字三倍还多。鉴于这些事实，我国关于他们作战兵力的情报显然是错误的。如前节所述，作为对后备军的设立不作任何考虑的一个例证，就是为在远东应付事变而于1903年11月在旅顺制定的关于我国军队战略分布的计划，该计划对日本为对付我们能配置军队的数目作了如下估计：

“战争开始之初，它的国防义勇军还没有完全组织起来，将只能从它的十三个野战师中拿出九个师来投入战场，兵力为一百二十个步兵营，四十六个骑兵连，十个工兵营和一个攻城营——共计十二万五千名战斗人员。”

这种估算与我国驻日武官、总参谋部的萨莫伊罗夫中校1903年的报告相符合，我在日本的时候，他曾告诉我，日本只能从十三个师中拿出十个师投入战场；对于后备军他一无所知。还有，司令部参谋部作战处编写的、并于1904年2月12日由总参谋长交给我的一份备忘录中也说，根据可以得到的情报，日本人能从十三个师中拿出十一个师投入战场，两个师留在日本。这份备忘录也没有提到后备部队。 i. 209

由于他们采用国防义勇军制度因而缩短了补充队必须经历的历程，所以他们军队的动员准备工作是异常完善的。我们知道，他们军队的动员工作三、四天就能完成，而供给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动员则需要七至十天。关于运输情况的情报说明，即使在1902年，他们也能在七天时间内聚集总吨位二十二万四千吨的八十六条船，并能在十四天内聚集九十七条船，总吨位二十六万八千吨。对于一个已动员的师来说，四十八小时以上的航程需要总吨位大约四万吨的船，少于四十八小时航程的，二万吨就够了。因此，他们可以聚集的船的总吨位，足以容许六个师完成动员后立即开始搭载，并行驶不超过四十八小时的航程，或者，几乎可以装载全部军队航

行较短的距离。

i. 210 至于日本人在战争以前的战术准备，我们在满洲的人是得到了某些情报的。我们的司令部参谋部对他们各兵种军队大的集团作战作了如下评论：

“从演习中看，由所有三个兵种组成的集团作战最显著的地方是——

“1. 倾向于占有过于分散的防御阵地。

“2. 离开当地条件的一成不变的、无适应性的攻击形式。

“3. 在行军和战斗中都缺少适当的侧翼掩护。

“4. 在运动中有使主力距前卫过远的趋向，因此前卫就会不得不在无支援的情况下进行长时间的作战。

“5. 攻击时缺乏明确的目标。

“6. 有过急地用完后备部队的趋向，结果常常没有部队可用来对付迂回和包围。

“7. 不相信冷武器。

“8. 有避免受包围的倾向，尤其是在丘陵地带。

“9. 倾向于采用直接正面攻击，而不用迂回运动。

“10. 防御中忽略野战防御工事；只有步兵散兵壕、火炮掩体以及肩墙。

“11. 完全没有任何追击的概念。

i. 211 “12. 过急退却的趋向：主力部队的步兵首先撤退，接着是全部大炮，然后是其余的步兵。

“13. 不愿夜战。

“14. 各师之间缺少联络：每个师都是独立作战，不与其他师保持接触；这是由于总司令官缺乏统一指挥。

“在回顾他们自己 1900 年对中国的作战时，日本报纸发表意见说，小的集团作战进行得很卓越，但部队如果大举作

战,恐怕就很不如欧洲部队。从1903年最近的一次秋季大演习中看出,部队是训练有素的。在低级军官中看到了相当高的独创精神,这种独创性可以说比高级军官大得多;对工作表现出很大的热忱,每件工作都异常彻底地完成。技术工作是杰出的。炮兵和步兵演习良好;骑兵在练习骑马,表现敏捷,但将军们不晓得如何使用骑兵,也很少使用它;不过教导是好的。最引人注目的是山炮进入战斗的迅速动作。一接到从行军纵队中散开的命令,他们在三分半钟内就投入战斗并且开火了。”

从上述评论中可以推断,那些被委以在现场研究日本军队重任的军官们是如何拙劣地完成他们的任务的;特别有缺陷的是他们所推论的高级军官指挥战争的无能。 i.212

日本对中国的战争以日本被逐出辽东半岛和我国占领关东而告结束,此后他们就开始急速地准备对我国的战争。他们的军事预算从1893年、1894年和1895年的二百万英镑多一点,增加到1896年的七百三十万英镑,1897年的一千零三十万英镑,和1900年的一千三百三十万英镑。到1902年,它的一切准备显然都已完成,军事预算又下降到七百五十万英镑。1896年至1902年增加给军队的经费,陆军省用了四百八十万英镑,海军省九年用了一千三百八十万英镑(为舰队建造战舰)。还要说明,日本在发展它的军队的同时,还用其他办法准备战争。一批军官被派到欧洲,包括到我们国家,研究他们的专业,对于可能作战的地区都煞费苦心地进行调查研究,并向各方面组织了侦察。很多在远东受我雇用的日本军官也以巨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从事极为卑贱的工作,以便对我们进行考察研究,而我们在日本的军事代表们这时却在以无限的优越感看待着他们的国家!

至于军队的组织,我们对他们常备军的一切都有足够完整的 i.213

情报；我们也明瞭他们补充队的数量和推测了国防义勇军的配置。但当我们自己准备以半数由后备部队组成的军队与日本人作战时，却从未想到他们也正在搞一个庞大的后备部队的编制，而且由于我们集中缓慢，他们就可能完成这种编制。在他们的后备部队中有各个阶级的人，当我们的“第二类”人（按照战场上将军们的说法）构成了一种特别薄弱的因素时，他们后备部队的士兵，由于爱国心和普及全国各阶层的尚武精神，非但作战不比正规军差，在某些情况下还比正规军好^①。他们的后备部队在初战中出现，的确完全使我们感到意外。我们也没有适当估价他们强大的补充队组织，这种补充队使常备军的每个团都有它的补充营，使它的消耗不间断地和迅速地得到补充。后来这些补充营很多都有了额外的连队，使其兵力超过了一千五百人，而且有些开进满洲，驻扎在靠近

i. 214 野战部队的地方。我想，他们甚至偶尔也将这些补充部队用于战场——例如守卫野战军撤出的一部分阵地——但是它们补充兵员消耗的主要任务是履行得十分成功的。他们的军拥有的营比我们少，但他们即使经过一系列战斗仍能保持兵力不变，而且经常在数量上超过我们。一般地说，拿来福枪兵的数目讲，日本的每个营相当于我们的一个半，有时是两三个营。而我们则相反，对伤亡的补充是一阵一阵的，也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尽管我们关于敌人军事实力物质方面的情报很难说是不错的，但我们也过分低估了——如果不是完全忽视的话——它士气方面的情报。我们没有注意，多少年来日本人民的教育就贯彻着一种尚武精神和爱国的方针。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国家的教育方法，在小学校就教育孩子们热爱自己的国家，并成为英雄人物。这个国家对军队的信任与尊敬，个人乐于服兵役和为此而感到自豪，各阶层保持的铁的纪律，以及武士道精神的影响，这一切我们都未

^① 有些正规兵是个子小的新兵。

曾注意到；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着重视因我们剥夺日本人在中国 i. 215 的胜利果实而引起的强烈怨恨情绪。我们从未认识到朝鲜问题对他们是如何至关重要，“青年日本人”党早就下决心和我们作战了，只是由于他们政府的明智行动才加以制止。的确，战争开始后我们才看到了这一切，但是已经太晚了。那时，当战争在我国不受欢迎也不为人们所理解时，日本全国的男子都一致热情地响应号召，拿起武器。由于儿子因健康原因被拒绝参军而母亲自杀的事是不乏其例的。发出一个征求志愿敢死队的号召，就会有数百人准备面临必死。许多军官和士兵在开赴前线之前都为自己举行了葬礼，表示要为国捐躯，作战开始时被俘虏的就自杀。日本青年一心要在军队中服役，所有的名门望族都试图为国效力，或送子弟从军，或捐献钱财。这种精神产生了一大批人，他们高喊着“冲呀！”猛攻我们的障碍物，冲破它们，将他们战友的尸体扔进陷阱^①，翻过尸 i. 216 体冲向我们的工事。不仅士兵而且全体国民都感到这场战争的极端重要性，了解进行战争的理由，不惜一切牺牲争取胜利。使日本获得胜利的力量就在于此，就在于全体国民与军队和政府的合作。而我们却必须以一支被本国反战情绪削弱了的军队，去对抗这样一个国家武装起来的力量！

当他们以数百名秘密的和直认不讳的公开特务在研究我们远东的陆军和海军情报时，我们却把情报的收集交给总参谋部的一个军官，而我们的人选不幸又是很差的。战前，有所谓“日本问题专家”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宣称，我们一个俄国兵可以顶得了三个日本兵。打了最初几仗之后，他的调子变了，承认一个日本兵能顶得上一个俄国兵。一个月后，他又断言，我们要想胜利，对付每个日本人就得拿出三个人来。1904年5月，我们的一名前驻东京武

① 由一排锥形坑形成的障碍物，坑中央有尖桩，通常有铁丝网穿过顶部。——编者

官象专家一样地预言，旅顺很快就会陷落，紧跟着就是符拉迪沃斯克。我申斥了这个怯懦的胡言乱语的人，威胁说如果他不克制自己不合时宜的有害言论，就要把他从前方送走。

在我曾仔细加以研究的中日战争结束之后，我个人产生了对日本军队极大的尊敬，以相当惊恐的心情注视着它的发展成长。1900年他们的军队与我国军队在北直隶并肩作战的行动只不过是证实了我对日本军队评价的意见而已。我在日本度过的短暂的时间，无法使我了解这个国家和它的军队，但我所看到的已足以向我说明日本人在过去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期间所取得的成果是多么惊人了。我看到了一个充满无数勤劳人民的美丽的国家。巨大的活动到处可见，一切都使人感觉到这个民族的快乐的性格、对国家的热爱和对未来的信心。我亲眼看到的军官学校的教育制度是一种斯巴达式的教育制度，未来军官的体操锻炼我在欧洲从未看见过，那真是最凶猛的战斗。用武器对打一个回合结束时，敌手就徒手搏斗起来，直到胜利者把对方打倒在地并把他的防护面具撕下。

i. 218 这种锻炼本身就需要最大的敏锐性和果断精神来完成。这些人们互相殴打，一边发出野性的吼叫；但战斗一完，或停止战斗的信号一发出，战斗者的脸上又恢复了平时那种呆板的冷淡的表情。在一切学校中，军事体操都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儿童和青少年都很有兴趣。即使他们的徒步旅行，也总是因为有适合当地情况的战术活动功课而生气勃勃；迂回运动和突然袭击都用快步练习进行。在所有的学校中，对日本历史的学习加强了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并对他们灌输日本不可战胜的根深蒂固的信念。到处歌颂战争的胜利，那些战争中的英雄不断地受到赞美，孩子们被教导说，日本的战争事业没有一次失败过。我在轻便武器工厂看到，造出了大量的步枪，工作进行得迅速、准确、经济。在神户和长崎我参观了造船厂，这些工厂不仅建造着远洋驱逐舰，而且也建造着装甲巡洋

舰；一切都由日本工人在他们自己的工头和工程师领导下进行。全国的行业在大阪展览会展出，壮观而有指导性，有大批的各种制 i. 219
造品，包括纺织品和复杂的器械，如大钢琴、机器、重型武器。这些产品都是在日本以日本劳力制造的，原料除原棉和铁来自中国 and 欧洲以外，主要来自日本。挤满展览会的日本人秩序井然，举止庄重，给人印象之深刻至少不比他们产品的进步差。农业耕作仍处于原始状态，但很严密。虽然耕作极为精细，但对每块土地的角逐，对夺取山区产量所进行的斗争，以及国内食品的普遍缺乏（尽管采取精耕细作的耕作），都表明日本的人口已是如何稠密，朝鲜问题对整个国家来说是如何至关重要。我在日本渔民阶层中消磨了十天之后，按照欧洲人的观念，我有了对日本迅速发展的反面的看法，很多人都向我倾诉怨言：近来税收增加太快和生活必需品过于昂贵。

我参观了他们一些部队的检阅（警卫师、第一师的两个团、几个炮兵中队和两个骑兵团）。差不多一切都是杰出的，士兵步伐整齐，很象我们的士官生，但马匹体质羸弱是非常明显的。即使经过 i. 220
这样短暂的相识，很多军官和士兵也给人印象：他们训练有素，具备专门知识，在任何军队中都能胜任光荣的职责。我在日本会见过陆军大臣（寺内将军），1896年在法国大演习时我们都属于第十七军团，那时我就认识他，此外，我还会见了山县、大山、儿玉、福岛、野津、长谷川、村田等将军、藤间亲王、闲院亲王和其他人。我也会见了其他各界的许多领袖，其中有伊东、桂和上村，而且尽管可悲的战争在似乎天生应成为朋友和盟邦的两个国家之间设置了障碍，我对东京的那些熟人还是感到深情厚意的。我特别记得那种渗透一切并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君主的忠诚。我在访问后所写的报告中说出了我的意见：日本军队完全抵得上欧洲军队；我们的一个营在防御中能顶得住日本的两个营，而在进

攻中我们就需要比他们强两倍的力量。战争的检验说明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当然也有值得遗憾的事例，那就是日本人以少于我们的营把我们的部队从阵地上赶走；但这是由于我方领导能力低劣，i. 221 由于我们的营战斗力差。例如奉天之役的后一阶段，我们的一些旅^①只能集中一千多一点的来福枪兵，要胜过这样一个旅，日本只需要二至三个营就够了。

我在这个国家所见到的一切以及我对这个国家的研究——它的武装力量，它在远东的工作——都使我确信，我们多么需要和日本达成一项和平协定，即使这种和平协定乍看起来是以有损我国自尊心的让步为代价也罢。我在第五章中已说过，我甚至毫不犹豫地劝告将关东和旅顺归还给中国，并将中东铁路的南支线出售掉。我预见到，一场对日战争在俄国将是极不得人心的，由于人民不会理解战争的理由，战争就将得不到民族感情的支持；我还说明，反对政府的政党将会利用战争增加在国内的骚乱。但是就连 i. 222 我也没有想到敌方所显示的活动力、勇敢和强烈的爱国心，因而在考虑这场斗争将会持续多久时，把事情弄错了。由于我们的铁路交通非常低劣，我们本应考虑使陆地作战有三年的时间，而不是我们所估计的一年半。我们所做的没有达到世界对我们的期望，而日本人做的则超过了世界的预料。

柏林军事学院讲师、德国陆军少校埃马努埃尔在其关于俄日战争的著作中，对日本的军事力量作了如下评价：

“战争开始时日本拥有一支按照德国典型组织训练而又注意适合本国特点的军队。这支军队装备优良，效能颇高，由一批训练有素的军官指挥着，非常值得尊敬。不过舰队是这个国家必不可少的，而每个日本人又都是天生的水兵，由于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获得的实践经验，灵巧地掌握着最现代化的船

① 一个俄国旅通常包括八个营。东西伯利亚步兵旅是六个营。——编者

舰。日本在使现代方法与本国特性相适应之后，它就把一支绝对服从的军队派到战场上去，这支军队又是全然了解现代战争情况的。日本士兵在优异的天赋才智和长于学习的本领之外，又有猛冲、蔑视死亡和喜欢进攻的特点。”

战时被派到日本人那里去的英国将军伊恩·汉密尔顿爵士认为，一个日本营在欧洲军队中是无与伦比的。关于他们的一般特性，他说：i. 223

“……在他们吃母亲奶时就吸取的爱国精神中，政府很小心地把主动精神，敏捷和聪明才智结合在一起。这种工作是在学校完成的，学校把尚武品德列为优先学习的课程。”^①

* * *

不过，日本人虽然有很多长处，但也有他们的弱点，在这里我就毋须一一列举了。俗语说，“胜利者是不能审判的”，我们必须向胜利者行礼致敬。我只是要说，作战的结局常常是拿不稳并稍有利于我们的，而有时候我们仅免于严重失败是由于他们指挥官的错误。

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在战前低估了日本物质的尤其是精神的实力。但我还要进一步举出它致胜的一些原因。在战争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无疑应该是我们的舰队。海军司令部的参谋部和陆军司令部的参谋部的确存有一份日本所有军舰的详细说明材料，但我们在远东的海军代表们是以吨位、以大炮的数量和口径来计算的。他们这样得出了统计总数，又满足于以同样的数字与我们的太平洋分舰队相比较，在 1903 年得出结论说：i. 224

“我们的作战计划应以这种假设为基础：考虑到当前俄、日两支舰队的比例，我们的舰队被击败是不可能的，日本人在牛庄登陆，在朝鲜湾登陆都是办不到的。”

① 《一位参谋官的杂记》，第 1 卷，第 11 页。——编者

我们在陆地所需兵员的数量取决于三件事情：

- (1) 日本能够开进满洲和我国领土的兵力；
- (2) 我们自己舰队的实力，以及
- (3) 我们铁路交通的运载力。

当然，假如我们的舰队初战获胜，陆地作战就不需要了。但撇开这点不谈，日本人只是因为实际上获得了制海权，就能使自己的海岸不用人防守，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能够冒险在辽东半岛登陆。如果他们调动军队不得不通过朝鲜，我们就有时间集中兵力。他们对旅顺口的舰队进行决死攻击(宣战之前)从而取得装甲舰的局部优势，就暂时掌握了制海权，并加以充分利用；而在战争最有决定性的这一时刻，我方舰队却毫未阻止他们的集中。尤其在海军上将马哈罗夫死后情形更是如此，甚至日军作战逼近旅顺时也毫无阻碍。这种无所作为的后果是极为严重的，因为敌人并不是如我们海军部所设想的不能在朝鲜湾登陆，而是能够威胁辽东半岛的全部海岸。

由于我军数量太少，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决定加以分散，以便能够在牛庄、关东和鸭绿江抗击敌军登陆。他还允许舰队分散，结果我们分散各处，在任何一点上都太薄弱。日本人由于运输便利，使他们能在辽东半岛登陆三个军，而在朝鲜只登陆一个军。他们派遣一个军到旅顺，便用其他三个军开始向我们在满洲的军队进攻，这时我军正在海城、辽阳地区缓慢地集中着。他们已在海上取得了主动权，也在陆地夺取了主动权，由于他们迅速集中前进，因此从一开始就能以优势兵力向我展开进攻。这样取得的初战胜利也使他们士气高涨而使我军情绪沮丧。他们拥有极为便利的交通，军需供应的运输我们需要几个月才能办到的，他们轻易而迅速地就实现了。而且同样重要的是，由于我方舰队的绝对无所作为，战争物资和供应品源源不断地从欧洲和美国倾注到日本的港口和武

器库。也由于我们铁路交通的低劣,当我们缓慢地集中军队时,日本却能组成大量的新部队。

日本人自与中国作战以来就了解满洲战场。他们完全熟悉那里的气候、雨量、泥淖、丘陵和高粱地的特点。在丘陵中我们几乎是无法可想,他们却感觉很安适。他们准备战争已有十年之久,不但研究了该地区,而且在该地区布满了特务,这些特务对他们的贡献非常之大。尽管他们态度严厉,近乎残酷,中国居民在他们的作战中仍给他们以很大帮助;虽然我们在骑兵方面占优势,他们通常总能得到关于我军实力和作战计划可靠的情报。相反,我们则常常盲目作战。他们爆炸性很强的炮弹,他们的无数山炮和机关枪, i. 227 他们充裕的爆炸物和技术器材,无论是用于进攻还是用于防守的,如电线、地雷、手榴弹等,都远远超过了我们;而他们的组织、装备和运输又都比我们更能适应当地的条件。他们也比我们有较大比例的工兵部队。他们的教育体系就筹划着发展他们的主动精神和聪明才智。他们在战争开始时发出的战斗训令在战争进行中也有非常重要的改变。例如他们原来的条例不主张夜间进攻;但他们很快就确信这种形式的作战是有利的,因而经常进行夜间作战。由于他们对较贫苦阶级进行较高等的教育,他们的军士比我们强,许多人都很能胜任军官的工作,他们的军官团表现出坚决勇敢,深谋远虑,有知识,发挥了巨大的权威作用。就连他们的最高级将领,也在前方过着简朴而严格的生活。但使日本人致胜的主要因素还是他们高昂的士气。这种士气使人们觉得为了胜利任何牺牲都是值得的,而且直接导致夺取胜利的决心,这是从总司令到士兵上下一致的特性。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部队处于这样险恶的困境, i. 228 无论固守或进攻都需要非凡意志的努力。他们的军官具有要求作出这种几乎是不可能的努力的力量;他们毫不犹豫地枪毙那些企图后退的士兵,士兵因而奋勇前进,因此常常夺走了我们的胜

利。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不是全军都浸透着爱国精神，如果不是全军感到背后有国民亲切的支持，如果不是全军体会到斗争的极端重要性，那么它的领导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是徒劳的。进攻的命令可能已经下达了，但士兵没有整个国家和他们在一起那种感情的支持，就不会有力量完成几乎是超人的英雄业绩。

③

第八章

i. 229

我们失败的原因：舰队所起的作用不大——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运载量甚小——缺少允许我军不受阻碍地派遣和配置兵力的外交上的布置——援兵动员的拖延——“局部动员”的不利之处——战争期间俄国在欧洲的军区的正规军转入预备役——分遣队迟迟不到达前线——指挥官惩罚士兵权力的削弱——对有军功者晋级的迟延——技术上的缺陷

经过一系列大的会战^①，1905年3月，我军战斗着撤退到所谓四平街阵地，并在该地驻扎，增加兵力，直至和约缔结。缔结这个使部队感到意外和讨厌的和约时，他们正在为一次向前推进运动最后完成准备工作。以后在适当的地方，将描写我们1905年8月已经达到的高度准备状态——一个俄国军队历史上前所未闻的效率的顶点。

i. 230

利涅维奇将军在决战开始之前正在等待着第十三军团——最后要派遣的一个军团——的到达。该军团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哈尔滨，后卫部队已穿过车里雅宾斯克。此时军队总数已达一百万，组织良好，有值得称道的战争经验和公认的声望，正在准备继续血战；而敌人，据可靠报告，在实力和精神两方面都在开始减弱。日本的资源似乎已经枯竭。在俘虏中我们发现老年人和纯粹的少年；他们被俘的比以前增多，而且不再象1904年的俘虏那样明

^① 1905年3月10日，持续数日的奉天之役以俄军退却和日军占领奉天而结束。16日，日军进入铁岭，21日进入昌图府。后者是日军主力向北推进所达到的最远的据点。——编者

显地表现出爱国的狂热。另一方面，我们的部队却能够将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士兵大部分解脱出来，派往后方担负非战斗任务；因为我们已接收了大约十万名青年士兵，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自愿奔赴前线的。自战争开始以来军队第一次达到了满额。有些部队——例如第七西伯利亚军团——还超过了定额，因此连队在做好一切勤务准备后能将二百多名来福枪兵开往火线。我们已得到了机关枪、榴弹炮和一批战地铁路器材，这些器材使收集了几个月的供应物资有可能运送给军队。我们拥有电报机、电话机、电线、电缆、工具——什么都有。一个无线电装置已经安设起来，并且已在运转；运输部队满员，医疗设备是极好的。部队占据着坚强设防的四平街阵地，在该阵地与松花江之间还有两道设有工事的防御线——公主岭和宽城子。我们能够击退敌人的任何进军，而且根据我们的计算，能够以优势兵力采取攻势，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俄国在其整个军事史上还从来没有在战场上投放过象 1905 年 8 月将满洲第一、第二和第三军集中起来所组成的那样强大的军队。

这就是我们突然接到已与日本在朴次茅斯达成协定这个不幸的消息时我们存在的有利条件。

i.232 因此很明显，战争的结束对俄国来说是太早了，而且是在日本击败对抗它的军队之前。我们在对每一寸土地进行了坚守之后，退至四平街，经过一年的战斗，我们依然在南满。整个北满（包括哈尔滨）和南满的一部分（以及吉林和宽城子），都还在我们手中，除萨哈林外，敌人在什么地方都未触及俄国领土。但我们还是放下了武器，除割让萨哈林的一半给敌人外，将四平街和公主岭防御线——这些防御线在战略上重要得多——连同供养了我们军队的那些肥沃的地区，都完全拱手交给了他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羞辱、迷惑不解的感情交织在一起，于 1905 年 10 月退到了松花江的冬季营房。在我们遭遇过的许多不幸中，象这次过早的和约给

部队造成这样恶劣影响的还不曾有过。我在担任指挥时就向军队保证,不达到胜利,一个人也不许返回俄国,没有胜利我们大家就无颜在家乡露面,而士兵们也确实被这种思想所浸染,即战争一定要继续下去,直到取得胜利。就连预备役士兵也认识到这一点,他们很多人都对我说:“如果我们打败了回家,娘儿们就会耻笑我们。” i. 233

当然,这种感情并不象战争行动之前所表现的爱国浪潮和英勇精神那样宝贵,但在这次战争不得不进行的条件下,整个军队都有不胜利就不可能回俄国这点认识。这种认识就能预示未来的任何作战要取胜的征兆。这就是当时的状况,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承认,尽管第一次战役未能胜利,但我国陆军在数量上已经增多,已经取得了经验,并在最后得到了这样的实力,因而胜利是无疑的,而在他们被真正打败以前和约就缔结了。我军从未经受充分考验;它只能缓慢地集中,因而遭到准备充分得多的敌人的打击而被各个击破。我军遭到巨大牺牲后,最终还能够聚集力量,并得到了为发动一次决定性战役所需要的一切,就在这时,和约缔结了。

不能真正认为日本陆军打败了我国陆军。在辽阳、沙河和在奉天,我们以比较小的一部分军队对抗着日本的整个强大兵力。即使在1905年8月和9月,当几乎所有援军都已齐集在满洲作战地区时,我们也只把我国所有军队的三分之一左右投入战场。我 i. 234
国海军在旅顺和对马战斗中几乎全军覆没,然而我国在远东的陆军非但未被摧毁,而且由于得到援军,由于奉天战斗后将三个营的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扩展成为四个营的来福枪团,由于第十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师的组成,陆军已逐步加强起来。单是这些措施就使我国在远东的军队实力增加了七十六个步兵营。所以我们必须从更远处而不要从我军兵力人数上来看我们遭受灾祸的原因。为什么直到1905年3月我军还不能打一次胜仗?这很难回答,因为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在若干次主要会战中的兵力。我们大体知道战场

上平时军队的营数，但不知道前线上后备部队的营数，因而不知道来福枪兵的实际人数。在战争中，战争的结局不是决定于士兵在场的人数，而是决定于实际投到火线上的来福枪兵的人数。

很可能当一部根据日本资料编写的可靠的战争史出版时，我们的自尊心将受到严重打击。我们已知，在很多情况下我军兵力 i.235 优于敌军，但仍不能取胜。要解释这种现象也很简单。虽然日本物质上比我们薄弱，但士气比我们高，所有历史的教训都表明，最后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士气的因素。当然也有例外，即士气薄弱的一方能将压倒优势的兵力投入战场，以此耗尽对方的力量。美国北部联邦同盟对南部同盟，英国对布尔人^①，都属于这种情形。这确是一支幸运的军队，战役开始时士气极为低落，却能够同时在精神和数量上都得到改进。

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奉天之战与战争结束之间，我军人数几乎增加了一倍，占据着坚固的阵地，作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而在日军方面，实力已经耗竭（他们不得不以 1906 年的新兵补充队伍），很多情况显示他们精神上已在虚弱下去。由于日本是一个卓越的海军强国，我们的主要作战应在海上进行；如果我们摧毁了敌人的舰队，在中国领土上就不会有战争。正象我已经指出的那 i.236 样，我们的舰队几乎没有帮陆军什么忙；因为它在旅顺隐蔽时，并没有试图阻挠敌人登陆。日本的三个军——奥、野津和乃木的军队——畅行无阻地在辽东半岛登陆了；奥和乃木的部队实际上就是在紧靠我们分舰队停泊的地方登陆的。虽然我们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拥有极好的海军基地，但主要舰队是聚集在旅顺口。从海军意义上讲，旅顺是一个蹩脚的地方，因为它既没有船坞，又没有工场，也没有防护内湾的设施。

① 非洲南部荷兰人后代。——译者

至于我们的海军实力,我无法引用官方数字,因为我是在乡下写作的,但我引用了1905年比尤伦发表在《俄罗斯通报》上的一篇文章,因为他所说的很多情况和我以前所知道的相符。中日战争以后我国舰队开始增加,1904年海军预算达到一千一百二十万英镑。战争爆发时我国舰队包括二十八艘远洋战舰和十四艘海防战舰,十五艘远洋炮舰,三十九艘巡洋舰,九艘远洋驱逐舰,一百三十三艘较小的驱逐舰和一百三十二艘不甚重要的辅助船舰。1881年至1904年,我们为创设这支舰队花费了一亿三千万英镑。以百万英镑计算,战争以前两国的海军预算为:

	1899	1900	1901	1902	1903
俄国.....	9	9.6	10.8	11.2	12
日本.....	6	4.5	4.1	3.2	3.2

日本舰队包括:

i. 237

远洋战舰.....	6
海防战舰.....	2
装甲巡洋舰.....	11
非装甲巡洋舰.....	14
驱逐舰.....	50
炮舰.....	17

战争开始时我国太平洋分舰队包括:

远洋战舰.....	7
大型巡洋舰(其中只有4艘是装甲巡洋舰).....	9
小型巡洋舰和小船舰.....	4
驱逐舰.....	42

我国舰队既未作好准备也未集中。四艘巡洋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一艘在仁川,而旅顺分舰队大部分停在内停泊处。2月9日袭击的前几天,它开到外停泊处进行蒸汽机试验,尽管外交关系已经破裂,但它并未遵守正当的警戒规定。

远在1901年,我们的司令部参谋部就估计过,一旦发生战争,我国太平洋舰队将比日本舰队薄弱,但在作出这一估计的两年内,

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我国远东部队战略分布计划^①中说,在目前情况下我国舰队败北是不可能的。

在2月9日的夜袭中,日本人使我们最好的几艘军舰失去了作用;但尽管损失严重,如果我们在旅顺有适当设备,还是能够迅速修复的。虽然我们在大连修建船坞与码头花费了数百万,旅顺却没有一个船坞,修理工作只能缓慢地进行。尽管如此,当海军上将马哈罗夫到达时,我们的太平洋分舰队已修复原状,而且在一段短时间内胜利的机会大大增长。马哈罗夫死后,指挥权交给了维特杰夫特将军,他奉命夺路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入海与东乡的分舰队交战。维特杰夫特阵亡,该舰队使东乡的分舰队遭受了一点损失,然后安然返回旅顺,未曾损失一艘战舰。8月10日的战斗是胜负未决的,虽然我们的水兵与数量优势之敌竟日英勇战斗,并击退了驱逐舰的多次进攻。舰队返回旅顺后,终于担负起守势任务,并逐渐解除武装——象塞瓦斯托波尔被围时那样——以加强陆地要塞的保卫战,水兵们在那里发挥了极为卓越的作用。舰队在其活动范围内可能达到的成就可以从埃森将军指挥下的英勇的小巡洋舰分舰队的表现来衡量,这个分舰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日本海岸进行了勇敢的出击。埃森出击的成功不仅在日本造成很大的惊恐,而且对陆军作战也产生了有实际价值的作用,因为分舰队击沉的一艘船正在运送用来进攻旅顺的攻城物资。1904年10月14日,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将军指挥的舰队,包括七艘战舰、五艘一级巡洋舰、三艘二级巡洋舰、十二艘驱逐舰,以及全体人员,五百一十九名军官和七千九百名士兵,离开利鲍开往太平洋,1905年2月16日,涅鲍加托夫将军指挥的分舰队前往加入这个舰队。后者包括一艘远洋战舰、三艘海防战舰和一艘一级巡洋舰,人员共有一百二十名军官和二千一百多名士兵。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分舰队必

^① 《对日战争中远东我军战略分布计划》,1900年11月18日(旅顺)。

须航行一万六千四百英里才能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尽管沿途缺少加煤站，面临异常的困难，它最后还是成功地到达了日本海，于1905年5月27日和28日在对马海面全军覆没。在二十四小时内，我们四十七艘战舰中损失了三十艘，有的沉没，有的被俘获，总吨位十五万七千吨中，损失了十三万七千吨。只有轻巡洋舰“阿尔马兹”号和两艘驱逐舰——“格罗兹尼”号和“布拉维”号——抵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根据海军上将东乡的报告，他只损失了三艘驱逐舰，伤亡人数总共是，七名军官和一百零八名士兵阵亡，四十名军官和六百二十名士兵负伤。我们的水兵在战斗中表现了很多英勇事迹：战舰“苏瓦洛夫”号直到沉没时还在继续开火，“纳瓦林”号的全体人员只有两人得救；小铁甲舰“乌沙科夫”号以偏舷齐射来回答日本人向他们的招降，铁甲舰与全体船员一同沉入海底。比尤伦结束他的出色的文章时写道：

“毫无疑问，造成对马之役这次大灾难的原因中，有许多战术上的错误，如最初让运输舰与舰队在一起的错误，军舰不适于航海和显眼的色彩；以及诸如此类的细节；但真正的原因乃是舰队无战争准备，和我国政府应受谴责的目光短浅。象战争这样的意外事件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而舰队完全是摆样子给人看的。

“我们的水兵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才；他们勇敢，善于学习，但他们除了对使用现代化武器（如自动瞄准器等）不熟练以外，也不习惯于海上生活。我们的军官具有强烈的责任感，高度重视他们所负任务的巨大重要性；但他们对水手和船舰不熟悉，而又要突然指挥这些水手和船舰对经过军事学校严格训练的舰队作战。天生就是水手的日本水手，从未离开过他们的船舰，而我们的船舰既不是常备的，水手又没有满员。甚至我们的舰队在航行的最后八个月中，由于缺少弹药，我们的

舰长们也未能使水手们完成射击技术课程，也不能考查训练情况。军舰仅仅运载着足够进行一次战斗的弹药。是的，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舰队，这是因为最重要的因素——人员——没有准备。我们在战争中失败了，丧失了我们在太平洋上的优势，因为即使我们在准备纪念塞瓦斯托波尔英勇保卫战周年时，也完全忘记了，一支海军的实力只能建立在隶属于它的每个成员的精神之上。

“那么是否在具有训练士兵秘诀的圣安得列的十字下骄傲航行的那些英勇的水兵一个也没有剩下呢？如果这样，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决不会建成一支舰队。不管花多少钱，也只能建设成象现在躺在日本海海底那样的一个船舰的集合体。光有军舰还不能构成一支舰队，也不足以形成一个帝国的强有力的右臂，一国的实力不在于装甲、大炮或鱼雷，而在于使用这些武器的人的精神。”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非但没有帮助我们陆军，他还给陆军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损害。正是他的分舰队在对马的溃败引起了谈判与议和，这时我们的陆军正以百万之众准备进攻。象1855年在塞瓦斯托波尔一样，我们的舰队除在金州外，对于旅顺唯一的援助就是让水兵和大炮登陆。

除了缺少一支俄国舰队之外，有助于日本攻势战略和妨碍我们的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状况。如果这些铁路效率高些，我们就能更快地把部队运上来，而且象事实表明的那样，起初就集中起来的十五万人，要比九个月期间逐渐聚集起来而只不过牺牲于各个击破的三十万人对我们有价值得多。1900年（在日本完成军备之前）我在关于陆军部的报告中写道，日本能够动员三十八万人，一千零九十门大炮，其中约有一半能运过海；现成的只有七个师，按战时兵力有十二万六千名步兵，五千名

骑兵和四百九十四门大炮。1903年3月(访问日本之前),我曾经计算过,如果当时我们海军当局关于双方舰队实力对比的见解正确的话,一旦发生战争,我们就应准备在满洲投入一支三十万人的军队。辽阳之役和沙河之役,我们却只有十五万到十八万人。如果我们有一条较好的铁路,并能在辽阳集中起规定的人数,那么尽管我们有错误,我们无疑还是能得胜的。

i.243

至于铁路问题,在1901年8月我们指望,中东铁路能在二十四小时内为军事运输行驶二十辆车,而在1903年夏,我们计算应当有七十五辆。从1904年1月1日起,我们有希望有五对^①军用列车,每一列车有三十五辆车,即每个方向上有一百七十五辆车;同时还设想西伯利亚铁路二十四小时内可以行驶七对军用列车,但这些希望没有实现。让我们看看实际上是怎么回事。

1903年,我们在西伯利亚铁路上只能指望有四列直达军用列车,在中东铁路上只能指望有三列短途列车。到这年年底,与日本的关系变得紧张了;日本已经完成了一切准备,似乎正在寻找借口发动战争,因此以提出新的完全无法满足的要求来回答我们的一切让步。我们对战争的无准备是太清楚了,然而当时似乎还能以两三年始终不懈的工作,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并改进铁路、舰队、陆军和旅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要塞,使日本难于取胜。一旦有事,我们打算首先(除已在远东的部队之外)从俄国欧洲部分派出包括四个军团(两个正规的,两个后备的)的援军。由于铁路无准备,改进铁路所需要的时间又不能确定,因此无法拟定准确的军队集中时间表。按照这种时间表,就需要五百列军队运输列车和大量货车,从俄国欧洲部分将部队运往远东,其中有分遣队,有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的第三营、几个炮兵中队、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师

i.244

^① 因为是单线铁路,一个方向上的列车数取决于相反方向的列车数;所以说是成对的。一对列车指每个方向一列的两列车。——编者

的地方部队和弹药军需库、第四西伯利亚军团,以及从俄罗斯去的两个军团(第十和第十七军团)。而且,一旦动员,西伯利亚军区就需要在当地开辟一段相当长距离的运输线。这就会使上述直达增援运输所需要的时间增加大约三个星期。

i.245 我已说过,我们希望从1904年1月起,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每天每个方向上能给我们五列车;但实际上从宣战之日起,集中援军的半数运往远东就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因此陆军大臣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尽快使西伯利亚和中东两线有更高的效率。我的计划是改进铁路,起初二十四小时内每个方向上能达到七列车的运载量,中东铁路的南支线(沿该线运行经过哈尔滨的就须有来自两个方面的列车,即来自沿阿穆尔地区的和来自外贝加尔湖的)达到十四对列车。沙皇批准了我的建议,并对十四这个数字加了一个批注:“或者甚至达到十二对军用列车”。1904年1月中,他任命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考虑建议所提出的立即改进铁路运输所需金钱和时间的问题。委员会由工兵部队的彼得罗夫将军主持,成员包括陆军大臣、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和国家主计长。委员会接到指示,须确定应采取何种措施,才能使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能够行驶七对军用列车,南支线(哈尔滨至旅顺)能够行驶十二对军用列车。

i.246 1904年1月29日,总督对中东铁路的状况写道:

“根据我所掌握的情报,对于中东铁路的运载能力和应付已增加的运输量的能力,有理由怀疑官方的数字。铁路车辆不足,很多机车都坏了。供水非常靠不住,因而最近铁路职员已被迫拒绝接受货运。士兵是隶属于铁路的人员中的唯一可靠的部分,由于这种原因,高级职员已经感到有点担心。但是最严重的还是燃料储备的不足。煤的大部分储藏在大连,从那里每天必须分配给铁路线一千吨,其总数中只有一半用于

增加储备，另一半则用于当前的消耗。要从大连用火车将全部储煤运走，就需要大约二十五天，但即使如此，铁路也只能应付为期三个月的已增加的运输任务。在战时，我们很难指望能满足铁路的这种大量需要，因为煤是从海上运输的。”

特别委员会在战争开始前四天举行会议期间，一份说明当时铁路状况的正式报告书送到了委员会。按照交通大臣（希尔科夫亲王）的说法，西伯利亚铁路只能行驶六对直达列车，其中四对为军用的，一对是客车，一对是铁路公务车；由于车辆缺少，四对军用列车中只有三对能运载部队，第四对要用于货运（无盖货车）。但与会的陆军部管理运输的代表指出，在外贝加尔湖一线，从卡里姆站到满洲里站，不管是运兵还是运货，总共只能行驶三对列车。这样，交通大臣提供的情况就与铁路军事代表所提供的不同。中东铁路的代表说，该线不久就可能共计行驶五对列车，而他是指望到4月才能完成该路主线六对、南支线七对列车的运行量。谈到要达到这一目的所需工程的细节时，发现由于西伯利亚和中东两铁路各支线的设备异常低劣，所需增加的车辆，要建造的傍轨、过轨口和供水设备将花费大量金钱。中东路工厂的设备简陋，机车车库还远不够数，而所需要的大量铁轨、接合板、枕木和铺道石碴都必须在军队运输过程中运送去。3月9日，我写信给当时主持陆军部的萨哈罗夫将军指出，据我所知，总督辖区机车库不够，为了便于军队集中，我认为最根本的是，直到满洲里车站，每天货运车辆不超过一列，其余的车辆都留作运送部队之用。

贝加尔湖是西伯利亚铁路的大障碍。破冰船未正式工作，修建绕贝加尔湖铁路线进展缓慢。希尔科夫亲王设想并采取了一种办法，即在湖的冰上铺一条临时铁路，使车辆从冰上通过。他还建议把火车头拆开，零件用马匹牵引，拉到湖的东边再重新安装。2月16日，我接到他的来信说：

i. 249

“我视察外贝加尔湖铁路线已返回。该路即可行驶各种列车六对。已开始为行驶九对列车修建傍轨，但要到天气暖和起来，我们有了车辆，九对列车才可运行。几乎所有河道现在冰都结得很硬。目前十三个临时供水站正在兴建中。关于天气转暖与列车增加到十二对的问题，我再写信告诉你。我在满洲看到霍尔瓦特，他告诉我，该线^①可行驶下列数字的军用列车：西部三对，南部五对。进一步加速运输几乎完全取决于能否得到车辆。猛烈的暴风雪使贝加尔湖上铁路线铺设工作稍有耽搁；但有成功的希望。正在满洲里车站安排临时接待四千至六千人的营棚。”

显然，这封信说明，战争开始时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只有三列军用列车用于动员、集中军队和运输供应物资，因为中东铁路西支线满洲里至哈尔滨一段的运载能力决定着从欧洲到哈尔滨全线的运载容量。因此战争初期贝加尔湖并不是迅速运输的唯一障碍。外贝加尔地区诸河流的冰冻也是一种须认真对待的困难，需要在许多车站临时设置供水设备。但是最需要的还是及早将车辆交给外贝加尔湖和中东两线，那里行车能力很大，但运载量因缺少车辆却局限于每二十四小时三对军用列车。在正常情况下我们就会在车辆从贝加尔湖开始向东运送之前被迫等待春天该湖解冻，这就是说直到3月中，我们只得满足于三对列车的运输。但希尔科夫亲王的才干和无穷的精力从这个严重的困境中援救了我们。尽管健康状况极为不佳，他还是不顾气候恶劣和其他困难，亲自处理这些事务。3月6日我收到他的这样一封信：

i. 250

“(2月)17日，我们开始通过(贝加尔湖的)冰面运送车辆。一百五十多辆车已运过湖面，大约还有一百辆现正在运送中。如天气有利，即开始将机车运过。”

① 疑为中东铁路——编者

3月9日我收到他的另一封信，信中详细谈到温度经常巨大变化所造成的困难，由于湖上的冰裂开得很厉害，常常需要将刚铺设的线路重新铺设。他要求我从军队中派些杂务班帮助他，我派了一些。

为使在满洲的铁路稍有改善，必须办的事，都在专门委员会于1904年3月9日交给我的报告中记录下来。中东铁路的职员计算，要使主线的运载量增加到七对军用列车，南支线增加到十二对军用列车，就需要花费四百四十二万四千英镑。用这笔钱可使 i. 251 铁路实际运输量的改善达到：在主线，七对军用列车、一对客车、一对铁路公务车；总共九对；行车能力是十对；为十对列车供水。在南线，达到十二对军用列车，一对客车和二对铁路公务车，总共十五对列车；行车能力是十六对；为十六对列车供水。在主要项目中有一项是铺设八十多英里的傍轨，这就需要在沿线运交和分配九千到一万吨铁轨、枕木、接合板，还要建造二百二十四个机车房、三十七万三千四百平方英尺的工场和二十六万五千六百平方英尺的月台。兴建宿舍需要四十万英镑。南支线的供水量要增加百分之六十，要供应价值二百三十万英镑的车辆，包括三百三十五辆机车，二千三百五十辆有盖车，八百一十辆无盖货车和一百一十三辆客车。当然，这种使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运输量增加到七对军用列车、南支线增加到十二对军用列车，还只是第一期的需要。1904年6月我在满洲时，使各线分别达到上述运载能力的指令已经颁发。

在前往接任远东军队指挥之前，我曾在3月7日上书沙皇，说 i. 252 明要使我们能够战胜日本，最紧迫需要的是什么。沙皇本人赞成我的意见，并批转给陆军大臣萨哈罗夫将军。以下是报告书的摘录：

“我荣幸地向陛下报告，我认为，最迫切需要的措施如下：

“1. 改善西伯利亚和中东铁路，以逐步完成在二十四小时内全线有十四对军用列车通行，南支线有十八对军用列车通行。每一对增加的列车都不仅会缩短军队集中的时间，而且同时还会帮助供应工作。要完成我所建议的措施，特别是在中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线路上增加行车能力，将会遇到巨大的困难。一旦克服了这些困难，必需的运输量的增加就能够以从别的铁路线上借用车辆的办法轻易加以解决。我不揣冒昧地认为，在所有迫切的问题中，改善俄罗斯与西伯利亚之间的铁路交通，是最为重要的。所以不管代价多大，必须立即进行。钱是不会白花的；相反，它将在更大的意义上产生收益，因为它会缩短战争的时间。

i. 253

“2. ……在以铁路运输军队和货物的同时，必须在旧的西伯利亚公路上以及中东铁路沿线的公路上把运输服务事业组织起来。因为要成功地集中军队和迅速运输供应物资，我们就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三十列军用列车。即使我所建议的措施实现了，我们总共也只有十四对列车，还不到我们真正需要的半数。所以我们当前的危险处境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贝加尔湖到哈尔滨之间，我们所能指望的军用列车总共是四对。”

1904年3月，当我在西伯利亚铁路和满洲铁路上旅行时，管理西伯利亚铁路的巴夫洛夫斯基陪伴着我。他告诉我，如果能给他借用车辆，他就能以六十五万英镑的代价在那一年将军用车辆增加到十对，往后还能增加到十四对。接到他的报告后，我于3月19日给萨哈罗夫将军写了这样一封信：

“我正在把下列电报发给枢密顾问米亚塞也多夫·伊凡诺夫：

“我诚挚地请求你对早日改进西伯利亚铁路的行车能力

和运载能力作出安排。管理西伯利亚铁路的工程师巴夫洛夫斯基告诉我，他已提出，为了在夏季期间使西部达到十三对，中部达到十四对、丘陵地段达到十五对(其中九对、十对和十一对为军用)这样的列车数目，六十五万英镑的开销费是绝对必需的。请你尽快给他准备这笔款项，并为外贝加尔线路筹办同样数目的款项。我已把我的意见呈报沙皇：自伏尔加河 i. 254 至哈尔滨全线最后需要达到十四对列车，虽然起初只有十二对。巴夫洛夫斯基认为达到十七对直达列车是值得想望的，也是能够办到的。除非到哈尔滨的铁路改进到我所建议的程度，我是不能希望采取有力行动的。从哈尔滨向前，最终有十八对、暂时有十四对列车，是绝对必需的。我恳求你支持这个要求。’”

到3月中，希尔科夫亲王通过贝加尔湖的冰上线路成功地将六十五辆拆开的火车头和一千六百辆货车运了过去。(我见到他时，他重病在身，但他成功地完成了一件巨大的工作，此事希望国家将会予以重视。)部队分成梯队^①，每天行军二十九英里通过冰面，每四个人有一架小雪橇运送他们的行装等物。当我过这个湖时，二十四小时内穿过湖面的还不超过四个梯队。外贝加尔线路的工作很差，加上这个湖，成为延误的一大原因。

为了在南满加速运送军队，我在3月16日打电报给总督，强调必需在哈尔滨与奉天之间的许多公路上临时筹办公路运输，以 i. 255 便从哈尔滨运送部队和给养，并强调南支线承装货物每天不要超过一列车。同时我注意到下列事实：不应让部队携带超过他们战地勤务所需要的行李。在我去前线的路上，视察了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兵的第三营，看到他们带的行李过多，好象是在通常的换防中行军。3月27日，我抵达辽阳，在那里开始厌倦地等待援军的到

^① 一个梯队是由若干列火车运载的部队组成。——编者

达。第一批要到达的部队是为七个东西伯利亚来福枪旅增援的第三营,起初每天是一个营,然后每天是两个营。接着就是为第三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师各旅增援的炮兵部队和分遣队。在这个期间,为改善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所需要的款项没有按时尽快地拨发。5月19日,我收到财政大臣15日的一封电报,另一封转给了总督。这封电报表明,要使中东铁路列车达到七对、南支线达到十二对的问题,似乎在专门委员会的多次会议上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发送下列物资给这条铁路的必要性得到了承认:一百九十英里带接头的铁轨、七百七十套过轨口、三百五十五辆机车,八十八辆客车,二千七百五十五辆有盖货车和无盖货车。此外,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要求三十英里铁轨、二百六十五套过轨口和一千六百二十八辆有盖货车。财政大臣说,为了改善和发展该铁路,需要供给该铁路三千辆货车的各种物资。但由于在4月份只能派遣二百辆无盖货车,5月份只能派出二百零一辆,总共四百零一辆,因此他认为,“在秋季以前总数没有可能得到保证。”到5月18日,一千辆有盖货车中只派出了六十辆,三百五十五辆机车中只派出一百零五辆,从这一事实可以看出,发送物资被延误的程度是明显的。到7月30日,又派出一百二十辆机车,但下余的一百三十辆机车并没打算要发送,那是要晚得多才有这种打算的。

由于西伯利亚第一师的三个团整个4月份滞留在哈尔滨,在满洲的军队连一个营也没有增多。这期间,我们已于5月1日在鸭绿江被击败,6日,奥的军队开始在皮子窝登陆。

虽然西伯利亚第二师于5月下半月到达辽阳,我们依然很薄弱。5月23日,吉林斯基将军给我带来了总督的一封信,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信中说,在满洲的军队向鸭绿江或旅顺进军的时机已经到来。不顾我所提出的对任何进军的准备都不足的意见,不顾十二师援兵只有一师到达的事实,不顾铁路运输效率的低下,以

不足的兵力进军的命令下达了，并付诸实施。其结果就是6月14日在得利寺的灾祸。第十军团的先头部队直到6月17日才到达辽阳；因此自战争开始之日起，远东我军等待了三个多月，才得到来自俄国欧洲地区的援兵。在这个拖得很长而又特别重要的时期内，五个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师承担了战役的重担和激烈的战斗，而它们两个营的团直到3月和4月才扩充为三个营的团；西伯利亚第四军团5月到达，并未参加任何战斗。敌人利用我们数量上的劣势，特别是利用我方舰队在这三个月中的无所作为，在辽东半岛和关东登陆了三个军。黑木率领的第一军从朝鲜进入南满，日本在鸭绿江、金州和得利寺打了三个胜仗。如果战争开始时我们的铁路运输就有准备，那怕只能行驶六列直达军用列车，我们在得利寺就会有三个军团，即西伯利亚第一、第四军团和第十军团，而不是只有西伯利亚第一军团。这次战斗的结局就会不同，而这无疑又会影响战役的整个进程，因为我们将掌握主动权。 i. 258

第十军团的第一批部队的到达是很合时宜的，但事变不允许我们等待其全部集中。黑木的军队正在前进，而他所大举挺进的赛马集、安平、辽阳一线，只有我们的骑兵和一个团的步兵防守着。因此，第九师的先头旅一到达辽阳，就派往那个方向。同样，第十七军和西伯利亚第五军团一下火车未等该军和该军团集中就直接投入战斗。直到9月2日，即在七个月之后，从欧洲派来增援野战军的三个军团（第十、第十七军团和西伯利亚第五军团）才全部集中在满洲战场。在辽阳决战中，第八十五团是第一军团已到达的唯一的部队，它一下火车就直接投入战斗。如果战争开始时我们每天能多开一列军用列车，我们在辽阳之役就会出现第一军团和西伯利亚第六军团，有了这额外的六十个营，肯定会打败敌人。但铁路在其他方面也不幸地影响了我们，因为当我们正以一些生力军作为援兵补充军队时，我们同时却找不到为遭到伤、亡、疾病等重 i. 259

大损失的前锋部队运送分遣队的车厢。例如从5月14日到10月14日漫长的五个月的战斗中，在满洲的军队因伤亡和疾病而损失的超过十万人，在此期间，我们只得到二万一千人作为补充。而在敌人方面，补充伤亡则是迅速而又不停顿。

到10月初，第一军团和第六西伯利亚军团已经到达。我利用这批援兵，命令展开进攻。在沙河的浴血战斗中，我方伤亡共约四万五千人，双方都不能说自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1905年2月之役的前四个月中，军队得到分遣队以补充消耗，除五个旅的来福枪兵外，还有第八和第十六军团前来增援，但在2月份仍缺少五万人即整整两个军团的编制。换言之，第八和第十六军团就数量而言，可以说只是弥补了别的军团的消耗。不错，这些军团给我们带来了附加的炮兵；但单纯从战斗价值的观点看，我宁愿作为分遣队的形式接收它们；这样我可以把它们编入经过战斗考验的军团，而不是把它们作为独立的无经验的部队使用。即使有这些可观的增援，在1905年2月，我们的地位还是比以前差，因为旅顺的陷落使得日军的数量因乃木的军队而得以增多。紧接着第十六军团，野战军将要接收两个来福枪旅、一个哥萨克步兵旅和第四军团；但派遣这些部队延误了一个多月，为了好让在铁路线上已搜集到的一些必需品运走。直到3月5日，即第十六军团最后一批部队到达后的五个星期，第三来福枪旅（第九和第十团）的先头营才来到奉天，他们立即参加了战斗。但为了这一突破，我们就应当在奉天会战中有一支六十多个营的主力后备部队，这样，即使考虑到我们有错误，也可以使力量的平衡转向有利于我方。从1904年3月初到1905年3月初，整整一年，我们才将八个军团，三个来福枪旅和一个后备师运送到前线。这样，每个军团在路上平均需要大致一个半月的时间。这一数字表明，我们是在特别无能的情况下努力聚集优势兵力的。由于我们集中兵力太慢，我们的军队

非被各个歼灭不可,因为我们是被迫应战的。和运输部队同时,还要运送改进铁路所必需的器材,从8月以后,这一工作的进展也是显著的。1904年10月,我接到萨哈罗夫将军的一封信,大意是说,按照交通大臣的意见,在10月28日以后西伯利亚铁路主线就会有十二对军用列车的运载能力。但这一许诺几乎一年也没有实现,尽管10月和11月交通是很拥挤的。从10月28日到12月14日的一个半月时间(四十七天)里,到达哈尔滨的,有二百五十七列军车,一百四十七列货车(军需部、炮兵、红十字会和铁路服务部门)和二十三列医疗车,总共四百二十七列车,平均每二十四小时九对,其中只有五对半是运送军队的。在十个月的战争中,铁路运输将军用列车从三列增加到九列,平均一个半月多增加一对列车的运输量。最后,到1905年夏季,在十六个月的战争之后,铁路运输的军用列车在主线达到了十二对,在南支线达到了十八对,这就是说,即使到那时主线也没有达到我在1904年3月7日前往前线时所要求的数字(十四对)。

以上所述一切十分清楚地表明,铁路运输是多么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每天一列额外火车将使我们在决定性的战斗中多有一两个军团供我们支配。因此一项异常重大的责任——不失一切时机地改善铁路线——就落在了交通大臣、财政大臣、在某种程度上也落在了陆军大臣的肩上。回顾这些部门以往的工作,必须承认,所取得的成果是非常巨大的,铁路人员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战争结束时我们在总督辖区内已有了一百万人的军队,所有生活和作战需要的必需品都供应良好。由于这支军队的运输是在铁路线施工同时进行的,所取得的成果尽管大部分是靠强制劳动,但对一条铺设很差的单线铁路来说,成绩还算是显著的。现今军队的动员和集中,利用良好的铁路线很快就能实现。德国和奥地利能够在十至十四天内将二百万军队投入我国边境,而他们军队的迅速

集中又会使他们掌握主动权。我们的军队可说是零零星星地到达前线的，结果我方丧失了所有的主动权。

考虑到陆军大臣 1904 年 10 月给我的关于铁路问题的通知（我于 11 月 8 日收到）意味着实现了我 1904 年 2 月的建议，我认为向沙皇陈述我对下一步工作的必要性的观点正是时候，因为我认为将铁路全线立即铺设成双线是极为必要的。我在 1904 年 11 月 12 日呈交沙皇的一封信中陈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由于这封信无秘密可言，现逐字引证如下：

“陛下：

“在我前往部队之前，许可我就保证战争的胜利，我们主要需要什么东西提出意见。我的意见是于 3 月 7 日的备忘录中提出的，并由陛下作了边批。八个月之前，我在这份备忘录中表示了这样的意见：为了成功地集中和迅速地运输一切必需供应物资给战场上的军队，二十四小时之内行驶三十对军用列车是十分必要的。我认为作为第一步，应当办理改善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工作，以便使主线的列车数每二十四小时达到十四对，南支线达到十八对。对于‘二十四小时内达到十四对’一语，承蒙陛下批注：‘非常需要’。11 月 8 日我收到的陆军大臣的一封信中通知说，从 10 月 28 日起，西伯利亚和外贝加尔铁路线将会有每天十二对列车的运载能力，并打算进一步使西伯利亚主线达到十四对，而且已向财政大臣交涉^①，催促改善中东铁路，以便与西伯利亚铁路相适应。这样，我们在八个月中就没有达到我上次备忘录中所提出的必需的数字。现在我恳求：作为第一步，西伯利亚主线全线和直到哈尔滨的中东线应达到十四对列车的运载能力，南支线达到十八对。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但这又是绝对必要，不容延

^① 中东铁路是归财政大臣管理的。——编者

缓的。这十四对列车决不会供应我们一切需要的东西。战场上增多了的人员对运输的要求增加了。据计算，要供应军队的各种需要并把不需要的东西运回，必须要有四十八对列车，i. 265而不是三十对。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正常情况下最低限度的数字。假如二十四小时内行驶四十八对列车，每一支在满洲的军队都应当有自己的铁路线（就象波洛戈伊-谢德尔策铁路一样）^①。当然，我们必须屈服于不可能办到的事，但我们将不得不在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付出生命和金钱。每一列额外火车的迫切性都是容易看得出来的。假如战争开始时我们多有一对列车可供利用，我们在8月的辽阳战役中就会有二个额外的军团——第一和第六西伯利亚军团，我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有了保证。这一列额外的火车能够在9月和10月间给我们另外带来现在我们是这样急需的五万人的分遣队。

“在将来，更加加强铁路线的需要将与日俱增。当野战军还小时，我们的供应几乎全部从当地资源中取得（小麦、大麦、干草、麦秸、燃料和牛），但这些物资很快就会枯竭，军队的粮食将依靠欧洲来供给。当我们向前推进时，我们的地位就会变坏，因为我们就要进入一个被战争破坏了的满洲地方，进入一个粮食从来就不充裕的丘陵地带。每天为目前编制的部队运输粮秣（面粉、燕麦片、燕麦、干草和肉类）就要装载五列车，而且不久我们还非得为家畜准备车辆。但军队不能来一天吃一天。除满足当前需要者外，一定要收集一些给养，足以形成一种储备，可供部队几个月之用，而且一定要分布在前方仓库和i. 266总仓库中。聚集一个月的储备；就需要在一个月中每天用另外的五列火车来运送。只有有了一大批列车，我们才能以必要的速度建立我们的前方仓库，并把这些仓库移向新的地点。

^① 俄国欧洲部分的一条战略铁路线，全长约七百英里。——编者

在战斗正在进行的那些日子里，对列车的需要是最多的。提出对列车的紧急要求之频繁——有时两三天内即达数百列，不仅是为了运输给养，而且还要运输军事和工程必需品、部队、炮兵辎重、以及分遣队和伤员。在战争中一支军队的需要是多样的，数量也非常庞大，以致在欧洲，认为每个军团有必要有一条每二十四小时行驶十四到二十对列车的专门铁路线（单线）。我们的九个军团只有一条单线铁路，（过去几周）二十四小时内只能行驶八至十对列车。铁路无力应付战争需要是战争拖长和胜负不决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增援部队是零星到达的。春天从俄国运出的给养还在西伯利亚的铁路上。当我们需要皮大衣时，为夏天使用送来的雨衣才到；而皮大衣却是在需要雨衣时到达的。不过在迄今为止的几个月里，我们和敌人接触了，也战斗了，退却了，但并没有挨饿，因为我们一直依靠所在的地区生活着。现在形势完全改变了，因为当地的物资只能维持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们的马匹不久就得喂干草和麦秸，如果我们不特别努力改善铁路，不在前方基地上集中大量的粮秣，我们聚集在狭小地区的大量士兵就会继马匹之后开始遭受困顿和饥饿，就会病倒。铁路的任何意外损坏人们都会强烈地感觉到。

i. 267

“作为指挥三个军的军官，我以完全的坦率表示坚定的信念：为了军队能胜利作战，我们必须立即在西伯利亚干线全线和中东铁路线上铺设复线。我们的军队必须由一条每天能够行驶四十八对列车的铁路线与俄国连结起来。

“我在自己的职业方面有一些经验，而且管理过八年外里海铁路，我确信，如蒙陛下颁布命令，这一切困难都能克服。很可能我们的铁路复线只铺设了全长的一小分段多一点战争就结束了；另一方面，战争也可能持续很久，以致只有一条铁

路复线才能挽救这局面。也只有一条铁路复线才能在战争结束时将来自俄罗斯的所有部队迅速遣返和复员。我们生活在具有巨大重要性的事件中,这些事件不仅关系到远东的未来,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关系到俄国的未来。我们决不可规避保证胜利、从而也保证远东和平的牺牲。除非俄国有力量能够比现在更迅速地向远东派遣军队,无论是被打败的日本,还是沉睡着的中国,都不会容许有这样的和平。而只有复线铁路 i. 268 能做到这一点。以此为最后的主要目标,我们现在就应尽一切努力来完成运载量,使之到哈尔滨能有十四对列车,哈尔滨以远能有十八对列车。

“一旦开始铺设复线,我们必须试行安排,使我们在一个区间能有十八对军用列车(也许最好从丘陵部分开始)。复线铺设好后,我们就能够在远至哈尔滨的全线和哈尔滨以南,起初完成二十四对,然后三十六对,最后完成四十八对列车的行车能力和运载量。”

接到我的这封信后,圣彼得堡当局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铺设复线详细拟定下初步安排的细目。他们试图做出一种计划,在不减缩军用列车数字的情况下在铁路上运送必要的建筑器材。有人提议铁轨经北冰洋运送,而且显然为此做出了某种努力,但后来在战争期间铺设复线的一切设想都放弃了。这是很可惜的,因为土方工程可以在不妨碍交通运输的情况下完成。如果我们实现了这项重大措施,就可以使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比现在强固得多。

当日本人准备同我们作战时,他们和英国缔结了一项条约,保 i. 269 证他们不受其他任何强国的干扰。相反,我们不仅没有准备在东方作战,甚至也没有考虑这场战争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削弱我们西部、高加索和中亚的边境。我们的外交官既未避开与日本的战争,也未保证西部不受干扰。结果,当日本全力向我们进攻时,我们只

能从俄国欧洲地区分出些微的一点军队增援远东。我们不得不一面作战一面看着西方。驻在俄国西部的军团，按军队士兵人数和大炮、马匹等方面的数量而言，都比内地部队处于更高的准备状态，而且他们使用的是速射炮。然而我们接收的军团，平时编制人数较少(第十七和第一军团)，他们的炮兵是从边境军团中拨给的；我们所接收的一些部队，连的平时编制从一百六十人到一百人，实力悬殊得很。正是由于这种对西部边境十分自然的担心，派往远东的五个军团中，有三个是由后备师组成的。我们必须留下部队

i. 270 维持国内秩序；日本就无须这样做。我们精锐的部队——近卫军和掷弹兵都没有派往前线，而在日本方面，第一次在鸭绿江向我们进攻的就是它的警卫师。因此，尽管我们有一百万常备军，但却把后备部队和编制人数较少的军团派往前方，不是把战场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正规常备军，而是交给从预备役人员中召集起来的部队。在一场民族战争中，当群众激发起爱国热情，国家内部一切平静时，这一方针可能是稳当的；但在同日本的战争中(这场战争并不为全国国民所了解，并且为国民所厌恶)，将主要任务交给后备部队，就是一个大错误。1905年夏季，我们改正了这一错误，以年轻的士兵、1905年的新兵和来自正规军的分遣队补充了军队的缺额。这些青年士兵来到前线，愉快，满怀希望，与预备役士兵的心情完全不同。看到正规军的分遣队乘火车开赴前线真令人高兴——他们唱着歌，充满着活力。他们多半是志愿兵，如果他们有机会打仗，他们的表现无疑会是极好的，但由于过于匆忙的议和，他们中三十多万人没有上过火线。

i. 271 1870年普鲁士在与法国作战时，由于确信我国保持中立，无后顾之忧，所以它能在我国边界只留下少数人员，而以其全部兵力进行战争。同样，日本从战争一开始，就能够以全部兵力投入战斗。而我们则认为应以主力防备一场欧洲战争，只把驻在俄国欧

洲地区的一小部分军队派往远东。从我们最强的警备部队华沙军区的部队中，我们连一个军团也没有得到。就连我提出的从那里派遣第三警卫师到前线来的要求也没有得到批准，而我们虽有许多龙骑兵团，却只派来了一个单独的旅作为代表。我们将龙骑兵保留在西部边境，而把由骑着矮马的老兵组成的外贝加尔和西伯利亚哥萨克部队的第三类团队派来作战。他们看起来更象是骑在马背上的步兵，而不象是骑兵。在1904年3月7日给沙皇的报告中，我要求复活节后立即同时动员从俄国派出的援兵，我申述了如下理由：

“这一措施能使部队特别是后备部队获得时间得以安定 i.272 下来。也有可能使他们进行步枪射击练习和受其他军事训练，并将使人们有时间组织运输，组织炮兵辎重、军需品的放置场以及医院。”

我认为，重要的是要使选派到远东的部队尽可能长期地安顿下来，并在开赴前线之前接受一些训练。

上述有沙皇批示的备忘录交给陆军大臣，作为他的指导；但萨哈罗夫将军或者没有实行我最强调的某些重要建议，或者加以更改，并且实行得太晚。关于动员援兵的日期，他对于(1)同时动员的必要性，和(2)复活节后立即动员的必要性，都和我观点不同。他在1904年3月18日起草的一份备忘录中，请求援兵分三批动员，而不是立即进行。首批分遣动员的是六个哥萨克团，在4月底，接着5月1日是第十军团，5月1日或稍晚是第十七军团，6月底是喀山军区的四个后备师。在第二份备忘录(7月31日)中，又提出了所有援兵应同时动员还是分期动员的问题。司令部参谋 i.273 部认为还是后者好。其理由是，除西伯利亚铁路运载能力低下外——

“……政治上的见识或许会变得模糊不清，使报告书所述

一切部队的同时动员成为不适宜的。”

针对备忘录的这一部分，我写道，“最好还是同时动员。”在往前方的路上，我收到了萨哈罗夫将军3月21日一封电报，电报中他说我提出的要求要想从喀山军区的一个师中提供部队护卫到哈尔滨的铁路线，以及我要求该师在复活节后立即与其他增援部队同时动员，这些要求都无法同意，因为这样过早的动员会给该地区的人民造成麻烦。他建议护路部队可从西伯利亚第四军团的一个师中抽调人员来建立，换言之，该军团应当分散。与我的愿望相反，援兵分期动员的结果是，当先头部队抵达前方时，他们尚未完全安
i.274 定下来；士兵不了解他们的军官，军官同样也不了解士兵。能够研究步枪射击教程的军团很少，第二类后备部队不懂来福枪，几乎没有部队受过战术训练，或者即使受过，也不过训练了几天。一些师和军团未经过三个兵种的演习。第六西伯利亚军团是在相当有利的情况下动员的，第五十五和第七十二步兵师在1904年进入兵营，但这些师是在没有炮兵和骑兵的情况下训练的。^①

从前，部队在到达战场之前，必须按完全战地勤务的序列进行长途行军。这种行军如果指挥得当，能锻炼士兵，并能使部队安定下来；一切多余的行李丢弃了，体弱的掉队了，军官和士兵也能得到相互了解。但现在是铁路运送，结果就很不一样了。我们的士兵在去远东的路上，挤在火车车厢里，一次长达四十天之久，他们的
i.275 军官都在车厢各个隔间里，无从控制。这在老部队和训练良好的部队里，不会产生特别的危害，但对新成立的部队，其预备役士兵——尤其是那些刚从家中征集来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是由农民和城里人组成的，大家在车厢里混在一起，而不是和正规兵在

^① 西伯利亚第六军团前指挥官索波洛夫将军1906年10月19日给陆军大臣的报告中说：“构成我军团的第五十五师和第七十二师于1904年7月全面集中决不是有益的，因为陆军大臣拒绝让我们有任何炮兵和骑兵。在塔姆鲍夫和莫尔尚斯克，多达一万六千人的步兵进行演习，却没有一门炮和一队骑兵。”

一起,那是很有害的。这一事实,如果再加上他们原来就不愿上前线,缺乏战斗精神,以及受他们中流传的大量煽动性宣传品影响的心情,这些援兵战斗价值之微小就可想而知了。许多这类团队的指挥官告诉我,不仅他们不了解自己的士兵,而且尽管经过了四五十天的旅程,就连连队的指挥官也未能了解他们的连队。

野战军各种不同部队的指挥情况是够糟的,因为干部多次变化,有很多新任命的指挥官;而在后备部队中,情况更糟,因为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是新人。由于所参加的预备役士兵的比例和军龄,就连正规部队的价值也更加降低了。例如,第十军团的一些连队只有六十名正规兵,其中有三十名是好容易才完成新兵训练的年青士兵;当一百五十名波尔塔瓦地区的预备役士兵——他们全是年老的人——参加到这个单位时,它就几乎完全不象一个正规连队的样子了。波尔塔瓦预备役士兵的精神起初特别差,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参加过农民骚动。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俄国欧洲地区、一下火车就直接投入战斗的增援部队不象经过适当的辛劳训练的部队那样有用,又有什么值得惊异呢?

那末,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是什么动机促使陆军大臣(萨哈罗夫将军)与我这个 1903 年的陆军大臣、1904 年满洲军队的司令官所提的忠告背道而驰呢? 在 3 月 18 日所写的一份备忘录中,他在阐明他认为第十军团和第十七军团开赴前线路上所需时日的观点之后说,如果象我所要求的,后备部队象普通部队一样都在 4 月中旬同时动员的话,他们在派遣之前就得不必要地等候很长时间,而如果后备部队

“……完成了动员,进行两三周时间的野战训练就足够了……部队在 4 月初动员,就必须在派遣之前等候大约三个半月的时间。这样做,除因过早让人员离开春耕生产外,还会使陆军部为维持大约六万人而承担巨大而不必要的费用。安顿

动员的部队当然不需要这样久的时间。”

这样，不顾事情的重要性，不顾我们能将前往远东的士兵训练好的事实，我的要求就以财政上的理由被拒绝了，而且这样就可以不让要去当兵的人在播种季节离开。萨哈罗夫将军认为安顿新成立的后备部队只需两三周而不是三个半月，这种意见的根据也是不明白的。难道他不知道军队现在使用的三分^①来福枪对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完全是新东西吗？

1904年的复活节来得早，在4月10日。我要求所有增援部队的全面动员应在复活节后——即在4月中——立即进行，但萨哈罗夫将军把日期定在一个月以后；因此第十军团和第十七军团的预备役士兵在开赴前线之前就比我所规定的少受了一个月的训练。动员的实际日期是：第十军团和第十七军团在1904年5月1日；西伯利亚第五军团在6月14日。先头梯队上火车的时间是：第十军团在1904年5月18日；第十七军团在6月14日；西伯利亚第五军团在7月12日。因此第十军团的先头梯队就只有十天的时间来完成动员和作好准备工作。如果从中除去举行检阅的天数，就能看到，该军团的先头部队既不能完成最短期限的步枪射击教程，也完不成任何战术训练，而军团的其余部队则只有大约两周的时间来进行这项重要工作。第十七军团的先头梯队也是同样的情形。由后备师组成的西伯利亚第五军团的首批部队从动员令下达之日起到上火车止有一个月的时间。如果将检阅和动员的时间除去，则只有两周时间用来训练和安顿。战争的全部经验表明，这是不够的，特别是对第二类预备役士兵来说是不够的。只要西伯利亚第五军团和第十、第十七军团同时动员，它的先头部队就会有大约两个半月的时间完成这一准备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它的团队

^① “三分”，是指来福枪的口径，俄国的一“分”等于十分之一英寸，“三分”等于零点二九九英寸。——编者

的初战效能就会比他们在辽阳的奥尔洛夫将军的部队中所表现的高些。延迟动员的另一个后果是，6月30日到达前方的第十军团的第一梯队（第九师）比规定兵额少得多，特别是军官。不仅波尔塔瓦的预备役士兵没有与正规兵一起安顿好，而且在一些连队中，在初战之后他们几乎与正规兵互相打起来。正规兵责备预备役士兵在战斗中离队，后者回答说：“你们是兵；那是你们的事；我们是农民。”这两种士兵情绪都非常激昂，在实际斗殴中很难抑制自己。说句公道话，这些农民在能干而英勇的赫尔舍勒曼将军的指挥下，受到了锻炼，后来战斗非常勇敢，尤其是在奉天。西伯利亚第五军团的部队到达前线时士兵的情况完全一样，在最初几场战斗中该军团的一些团未表现出应有的坚定性，但后来，尤其在奉天，第五十一师和第五十四师打得极好。

尽管我们有大量的预备役士兵可供使用，但有些地区不是动员最年轻的，而是不问年龄大小，而在另一些地区又不舍弃上年纪 i. 280 的人。一到前线就可看出，年纪较大的预备役士兵在身体和士气方面都不如其他士兵靠得住。的确，正如他们的军官所说，他们实际上是他们所参加的部队的薄弱的根源，而不是力量的源泉。几乎所有在战斗中离队的士兵都是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当然也有值得赞美的例外，但这些人大多数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能分配他们到交通线或运输工作中担任非战斗性的任务，或让他们担任医院看护，而在最初的战斗后也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我们的农民一般都发胖，长着胡子，年过三十五岁就不象士兵的样子了。自然他们也感到不如年轻人能忍受出征的苦恼。波尔塔瓦地区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小俄罗斯人”身体太重，爬不过陡坡，在他们本乡平原上过惯了，感到很难克服满洲丘陵地的困难。在7月和8月的战斗中，矮小而敏捷的日本山民确实比我们的士兵有很大的优越性。也应当记住，三十五岁以上的乡下人一般都是结了婚的，有许多子

女。我们的预备役士兵常常想念他们丢下的家庭和子女，这未必能增进士兵极为需要的愉快心情。除了所有这一切，加之他们不了解战争的理由，国家根本没有鼓励他们建立英雄业绩，他们又受了煽动性宣传品的影响，这些宣传品劝他们杀死军官，而不去打仗。从奉天退却期间，一些部队是在混乱中撤退的，很多人扔掉了他们的来福枪。我的参谋听见其中一个问道：“去俄国的路从哪儿走？”当他听说自己是一个卑怯的家伙时，他回答道：“我为啥要打仗？我有六个孩子要养活。”

事实证明局部动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但它不仅是这次战争的一个无关重要的事件。由于我们边界广阔，我们可能象陷入一场只需要局部动员的战争一样，同样容易地陷入一场需要全面动员的欧洲战争。因此，除了有一个全面的征集兵员的计划外，我们必须制定各种局部动员的计划，以应付某种意外事故。给这些局部动员规定了基本原则，即它们的实施不应妨碍一次全面的动员，只要这种全面动员也被证明是必要的。因此必须选择一些地区召集预备役士兵，这样就不会妨碍更加重要的全面计划。只有从这些地区召集最高额的预备役士兵（即不问年龄大小的所有各类预备役士兵），才能压缩地区的数目。第一批按这种方针形成的局部动员计划，是1896年万诺夫斯基将军任陆军大臣时拟定的，并得到批准。当1903年发现需要制定一些新的计划以防与日本发生纠纷时，这些计划自然都是以老计划为根据制定的。因为那时完全信任第二类预备役士兵的可靠性，我（当时是陆军大臣）赞同这已被采纳的总方针，并将新计划呈奏沙皇批准，但这只关系到第一批派往远东的增援部队。我在看到实际到达前线的第一批预备役士兵之后，就要求不要再派遣第二类预备役士兵或者有一大堆子女的人了。在第二次局部动员（第五十四、六十一和七十一师）时，半心半意地拒绝了有一大堆子女的人；而直到第五次和第六次动

员，由于皇上的意愿，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和有妻室的人才被舍弃掉。无论是人民或是预备役士兵都无法理解，为什么在一个地区或一些村庄征集有子女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而在另一个地区或另一些村庄却拒绝刚从现役转入预备役的单身汉。将来的局部动员 i. 283 计划必须根据完全不同于 1896 年和 1903 年的方针来制定。虽然第二类预备役士兵正在送往前方，我们还是继续准许士兵照常从正规军转入预备役，甚至在他们服满五年现役之前就让他们转入预备役。这种状况对军队极为有害，但可以部分地被解释为：——在 1904 年春季，战争刚开始不久，那一年的新兵开始要参加俄国欧洲部分所有的各部队。在平时，步兵在五年服役（四次演习和三个冬天）中只干完三年零几个月，通常就在演习结束时从现役转入预备役。司令部参谋部并未想到在战场上使用这些人，虽然他们之中有二十多万——训练有素的年轻士兵——或许已在后备部队中入伍，然后作为分遣队派往前方。这件事司令部是受与战争完全无关的考虑所支配的。在正规部队中把快要转到预备役的士兵保留下来，这种明智办法的确是考虑过，但被认为不利之处很多，故被搁置了。此事的政治方面在司令部的考虑中最占份量；而且还牵涉到财政问题，因为新兵一到，保留在现役中的士兵就会 i. 284 成为超编的多余人员。但是，由于建立新军团所造成的缺额，感到很难执行警卫任务和其他任务，在某些部队中，预定要离队的士兵仍被保留在现役，一直到年轻的士兵入伍。当问到对此事的意见时，负责各军区指挥的陆军将官们所作的答复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赞成要保留这些士兵，有的赞成让他们走。1904 年夏季，陆军大臣请求沙皇允许授权各军区司令官，如果他们认为合适，就可将步兵、野战炮兵和工兵的士兵转入预备役，条件是这些士兵服现役的期限不超过 1905 年 3 月 31 日。在其他兵种服役的，转队照常。因此在队伍中保留这些服役期满的士兵就成为一种例外，而且也不

是取决于战争。由于老是害怕发生一场欧洲战争，我们就以预备役士兵组成大量的新师来代替从俄国派往前方的部队。这种方针在保持国内秩序方面也是需要的。1904年8月23日，授权各军区司令官将其管区内保留在现役中的士兵转入新成立的步兵和炮兵部队，这样就免除了同样数量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这样，为俄国国内服役而建立的后备师，在前方各师之前就以好兵补满了名额，并免除了第二类预备役士兵。1904年秋季，根据战场军事当局的要求，授权他们将保留在现役中服役期可到1905年3月31日的士兵转入七次局部动员中所动员和扩充的部队中去，并使这些部队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和多子女的士兵退役。直到1904年12月27日青年士兵入伍时，才做出安排，将保留在现役中的士兵转入未动员或未扩充的部队。这些士兵在1904年夏秋即可作为分遣队派往前线，但过了一年，到奉天战役之后他们才到达。这些优秀的士兵来得太晚了，根本没有经历战斗。

我曾尽力阐明(第七章)，日本人以何等巨大的规模来利用他们的后备部队，和他们如何迅速地替换伤亡人员。而另一方面，在战前，俄国军队后备部队的组织是并不十分完全的，因为我们只能在资金许可的范围内进行这项工作。起初，远东后备部队的数量是与该地少量的驻军相称的，但当我们增加那里的军队时，没人认为增加后备部队是方便的，因为住在那里和西伯利亚的预备役士兵的数量不足以补充后备部队。但如果我们在那里有大量后备部队的干部，从俄国欧洲部分派遣预备役士兵给他们就很容易。驻在阿穆尔沿岸的六个后备营在初战中损失了他们的大部分常任干部。由于以下各种原因，军队经常不得不在不断减少编制的情况下作战：

1. 作为援兵开到的部队有时缺少百分之十五到百分之二十的士兵和百分之二十五的军官。尤其是第十军团，到达时缺额很

多——这一事实我立即报告了陆军大臣。

2. 由于后勤部门和辅助部队缺少人手,许多工作不得不由战场上的团队来担任——即后方工作、野营工作、交通线上的工作、医院工作、军需部门和运输部门的工作、以及各种仓库的警卫工作。曾利用这些工作以免除第二类预备役士兵。

3. 大量人员不得不分派去看守留在总督管区参谋部营地的财产,看守为在铁路、桥梁工作的部队以及执行其他临时任务的部队所收集的必需品、给养和牛群。 i. 287

4. 交战激烈的时候,缺额成万名地增加,即使在战斗比较沉寂的时期,有些部队伤亡的数字也是很高的。

5. 疾病。

所有这一切原因加起来,就需要有川流不息的增援部队派往前方。但由于铁路的状况,有时增援中断了,而且是长时间的中断,那时我们就接不到分遣队,——例如在1904年7、8、9月份,如前所述那时我们损失了十万人,而只接收了二万一千人。

1904年10月初,当军队编制大量不足,有些团只有固有人数的一半,甚至还不足一半的时候,我们展开了进攻。这种士兵的不足又因作战前夕大量人员留在运输部门、参谋部营地和留作军官的勤务兵而加剧了——这些士兵实际上都是战斗人员。奇怪的是,很多指挥官并不特别急于使他们的部队尽可能强地投入战斗。但最严重的是有些部队刚一遇到炮火就迅速消失;只要一发生伤亡,这种瓦解就开始了。士兵们在他们的指挥官知情的情况下,被派去帮助连的和师的担架兵抢救伤员。如果伤兵数量很大,大量并无损伤的士兵也到了后方。胆小鬼和躲避战斗的人想尽一切办法使自己被选派担任此项工作,或者并没有命令就随伤员走开,或者连任何借口都没有就离队而去。我曾看见一些抬伤员的担架,伴随的未受伤者就有十个之多。有些团从战场上这样自动退却的共 i. 288

有数百人；有一个团^①在其参加的初战中离队者就有一千多人。这些一般都是预备役士兵，主要是第二类预备役士兵。现役兵通常是奋力作战的，而且战斗表现是极好的；有时连队即使减少到没有几个人，他们依然继续战斗下去。当然，预备役士兵中也有一些是英勇的，但任何英雄业绩都是现役兵和第一类预备役士兵创造的。

i. 289 即使是送往前方的分遣队的士兵也没有注意挑选，很多人都很不适合于服现役。1905年给第一军送到的大约七万六千名士兵中，就有四千一百人有病或在其他方面不合格。该军高级副官的下列报告是很有趣的：

“在奉天战役之前给这个军派送的分遣队是由约在1887年就离开现役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组成的。他们根本不懂今天的步枪，他们的训练是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的，远远低于构成他们部队的常任干部的水平。他们之中很多人的身体非常不适合于艰苦的战斗或任何艰苦的军事工作，因为他们患有例如风湿症这类慢性病。但在奉天战役之后送来的分遣队却很好。预备役士兵有时被选派到他们转入后备部队之前没有服役过的兵种中去；例如派往炮兵部队的士兵以前一直是在骑兵或步兵中服现役的，而派往工兵部队的士兵以前是在步兵中服役的。这当然对训练造成了相当大的混乱，不能不影响我们的作战，特别是对于技术部队。”

以上所述是对事实的一个确切的说明。直到奉天之战为止，派往前线的分遣队其可靠性要比后来到达的差得多，可是后者来得太晚了，没有经历任何战斗。由第二类士兵组成的分遣队往往

i. 290 太差，以致如果一场战斗逼近，指挥官就要求把他们调走，因为他们的坚定性是靠不住的。这些军官感到，他们多少有点儿经验的老部队即使数量较少，但在战场上的表现要比刚刚在战斗前补充

^① 俄国的团一般有四个营，等于一个英国旅。——编者

的这批士兵好得多。第一军团和其他许多军团的指挥官都向我提出过这种要求。

缺少军官也是我们工作安排中的一项不足之处。尽管不断派出部队接换伤亡人员，许多部队在整个战争中仍不足于本来有的全体军官人数。战争开始时，实际在远东的部队和派出的增援部队都还是平时编制。的确，战争初期是有这样的事例，即有些连队初次参加战斗是由少尉指挥的。随着事情的发展，甚至那些名册上人员超过本来有的全体人数的部队也发现存在着这种领导者不足的现象。而且初战之后，由于军官伤亡尤其严重，由大尉和少尉指挥营和连战斗的情况是十分普遍的。前线上的这种缺员现象由于许多军官被吸收到后方各部门和其他工作中，由于增援部队把很多军官——有军医也有战斗军官——留在各基地而加剧了；后者当然是打算要让他们在全面动员时在新建立的部队中担任一般工作和团的工作。这些情况尤其适用于步兵。在骑兵和炮兵中，军官数量虽少于编制，但一般还是够用的。这是由于这些兵种伤亡较少。毫无疑问，给战场上的军队提供军官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被许多外部情况弄得复杂了的问题。我们发现，当遇到大的战斗，军官的损失因而严重的时候，名册上军官的数目与实际和团队在一起的军官的数目之间的差别就迅速地增加了。大量伤病员的名字长期留在名册上。有些待在战场上的伤病员逐渐漂流回他们的团队，但大批前往俄罗斯的人员仍留在那里，即使身体完全恢复了也不再归队。有这样的情况：有些前往俄罗斯，身体渐愈而又不归队的团指挥官，在名册上还仍然被列为指挥官，而且仍然领着指挥官薪金。有些因病或因伤回家的人在我们的城市或大市镇的大街上成几个月地游荡着，奇怪的是，对这种行为似乎无人过问。尽管为免除这种现象采取了各种措施，军医和医务部门对那些想回家的人还是非常之宽大，而且给他们各种便利。另一方面，许多在野战

勤务中被认为无能因而送回俄罗斯的人,又以胜任称职重新出现,并回到他们的军团,因此那些曾经光荣地经受了一切战斗艰苦,获得了战争经验并得到加速提升的人们就从营连指挥中被排挤了。格林斯基曾就这个主题写过一篇精辟的文章《复活的死者》,发表在1906年的《探索者》上。然而应当对我们的军官说句公道话,如果说有很多人能回到前方而老不到职的话,那么有一大批人是即使负过伤也要尽一切努力归队的,的确,往往是在他们完全复原之前就这样做的。一些军官负伤两三次都归队了,这些勇敢高尚的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会称赞的。在第一军团,负伤的军官归队者超过八百三十七人。由于这一切原因,我屡次坚持要求派新军官到军队中来,但陆军大臣不一定总能答应我的要求。他们得在俄国欧洲地区、在高加索、在土耳其斯坦——在一切能得到军官的地方把军官集中起来,又不能总是挑挑拣拣。他们之中有些人相当无用,有的是由于酒精中毒,有的由于过着不正常的生活,有的甚至在来远东的途中喝得酩酊大醉,粗暴狂乱。这种人在哈尔滨能呆多久就呆多久,他们只能危害他们指定加入的军团,什么事也不做,最后被撤职完事。我们最可靠的军官是现役军官,尤其是自愿上前线的,他们中很多人都大大地出了名。最不可靠的是那些后备军官,他们在军役中已被除名,由于我们不该有的宽厚,又设法挤进了后备部队。

在我任陆军大臣职务时,曾命令军事委员会的一个成员纳尔布特将军制定出一项计划,使我们在战时能有一批后备的军官。此项计划的主旨是,我们各军官学校在动员时应拨出一大批学员当军官,然后着手尽快地训练第一类和第二类志愿军官,也训练具有中等教育程度的正规兵,他们当中有好几千人都够得上授予中尉的军衔和职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项计划在战争中没有实行,但除非今后对这类事情采取某种步骤,我们将会处于困难之中。

在宣战的时候,或者甚至紧接着在宣战之后,我们没有利用把军事学校和军官学校一大批高级班学员分派出来的这种可能性。1902年这些专门学校向军队提供了二千六百四十二名军官;因此我们能够在1904年和1905年初接收五千多名青年军官用以补充战场上的缺额。日本人正是这样做的。由于预见到我们的处境将会如何,我在1904年3月19日要求陆军大臣,在演习前可从军事学校和士官学校中任命军官,比例是每营两个,每个炮兵中队一个,每个哥萨克团四个,后备部队一百个。但没有这样办。经再三说明增加供应军官的迫切必要性,我于1904年得到了一个敷衍了事的答复,大意是说,保持军官数字达到编制是陆军大臣的职责,不是战场上的军队的司令官的职责。当军官最后增加时,我们只得到了比较少量的刚得到任命的军官。这些军官在军队中形成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成分,而且在多数情况下战斗表现都是卓越的。 i. 295

总之,由于上述原因,我们的部队在大多数战斗中都是非常缺少军官的。尽管陆军部向前线派送大量军官完成了巨大的工作,但在对他们的挑选上却表明识别力不强。也必须承认,我们很少利用我们的军士,训练他们代替军官;也很少使用我们所得到的军事学校和军官学校的学员中的优秀人材。

我们部队在战场上的表现总的来说是极好的,但离前方阵地越远,纪律就变得越糟。即使在前线,也象我说过的一样,各类士兵也各不相同。当然,如果第二类预备役士兵服役的部队纪律严明,他们就决不会象有时也发生的那样,在战斗中离开战场。然而士兵,即使是最好部队的士兵,当他们看到周围发生抢劫和暴行而不受惩罚时,他们自己也容易受这种违法乱纪的精神的感染,而且无法控制。这种情况特别适用于交通线,因为前方阵地上保持着严格而坚决的纪律。在腓特烈大帝时有句谚语,“应该使士兵怕班长的棍子甚于怕敌人的子弹”,但在今天,虽然人人义务服役是进步 i. 296

了,士兵的一般道德也提高了,但要使无知无识的农民重视纪律还是不容易的。信仰上帝、效忠沙皇和热爱祖国迄今为止是使大群士兵在每一个部队结合为一家并使他们勇敢无畏,服从命令的因素;但这些原则近来在人们中间已严重动摇,当然,其结果在最近的战争中已被人们感觉到了。最引人注意的是懒散和不服从的人数增加了,这些人批评他们的上级,在他们的同伴中普遍起着一种坏的影响。这种人员只能用严酷的手段加以控制,因为对他们起作用的唯一的東西就是恐惧。然而当纪律在全国已在败坏的时候,我们对纪律的保护却减弱了,因为1904年夏季,军队废除了体罚,甚至在现役军人中也废除了。我本人就支持在平时废除体罚——诚然,通过军事委员会处理了此项方案;不过我们很多人都认为更改在战争中允许刑罚的现行法令是不明智的。因为害怕刑罚,使许多歹徒免于犯罪,并防止胆小鬼在战斗中离队。但我们的军官制止此种行为的手段却被剥夺了,又没有用什么去代替。

在战争中,象在兵营或单人牢房中关禁闭和罚以额外工作这样轻微的惩罚是完全做不到的。因此我们对于许多犯罪行为例如不服从等,就没有当场有效的惩治办法。有些罪行可以处以死刑,但缺少的正是判处死罪与全然无罪之间的某种适当的刑罚。使我们的局面变得更糟的是,那些受到处分要到惩戒大队服役一段时期的士兵继续呆在部队,只要略有一点勇敢的表现,我们好心的军官就要求免去或改变他们的处分。好象这还不够,常常还要把有不服从行为的水兵送到陆军中去作为惩罚;军事法庭的行动是令人不能满意的,他们的程序纷繁而缓慢。撤销军官施行笞刑的权力的通常结果,是军官完全不加惩罚,或者将法规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事实上在某种情况下体罚还在继续施行,有时由士兵裁决,并由他们自己提议;不过抽打罪犯用的是通条而不是棍子。考虑到进行这次战争的特殊条件,由于在战争中缺乏国民的同情,由于反

政府宣传遍及全军士兵，这种对军官惩罚权的削弱总的来说是鲁莽的，而且不管实际指挥部队的军官意见如何就实行了。

战争不得民心的这些原因也影响了部队在战斗中的坚定性。在很多真正表现英勇的事例中，支队，尤其是个人表现怯懦的情况也是引人注意的。士兵，甚至军官，还未受伤就投降的事实是太多了，不幸他们偏偏又受不到法律的严厉制裁。许多军官被俘释放后不是马上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而是立即让他们指挥开赴前线的部队，于是他们刚一重返部队，就担任起指挥连营的任务。这种对待投降者的态度只能引起军队中那些一直表现很好的人的反感。当大家都知道各种因为无能——甚至因为怯懦——而被军队撤职的人在俄国获得高官时，这种恶感尤其加剧了。这种行为毁坏了一切纪律。例如，格里彭伯格将军刚刚丢弃了他的指挥职务就用专车将他送走，这本身就充分鼓励了决战前夕的违抗命令；它确实破坏了总司令的权威。报刊上对各级官兵大规模的批评，谩骂军官，尤其是对负责高级指挥的军官进行谩骂，加上唆使士兵不作战而反叛和杀害他们上级的卑鄙活动，这一切毁坏了他们对长官的信任，败坏了纪律，并使部队在战斗中表现怯懦。这种状况就足够使最优秀的军官的一切努力减低效果了，而且对那些早就显示过胆怯的人也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

战争是可怕的；因而在部队中维持纪律使之有效的方法也必须同样可怕。我们肯定渴望胜利，但我们是怎样经常避免采取使胜利成为不大可能（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行动呢？破坏军队中的权威的真正原因就是那些不让我们取得胜利的东西。平时的名望不是战争中有能力的标准，许多一生以“才气焕发”“超出常人”而闻名的人，证明在体力和性格力量上用处很小。另一方面，那些太平时 i. 300 期默默无闻的人，在战争的紧要关头却表现出巨大的性格力量和卓越的军事素质。后者之中就有旅顺英雄康德拉坚科将军。

在初次交战之后就发现需要尽快地从军队中撤销那些不称职的军官的职务,并在不过分着重于资历的情况下,把在战场上称得上干练军人的那些人提拔起来。6月3日,我向陆军大臣报告了当时指挥开赴前线的军团的两位将军不胜任的情况,但未引起注意。在我摆脱军团和师的无能指挥官的道路上充满了各种障碍,其中就有从圣彼得堡得到的通知,认为我要求调换军团指挥官太频繁了。我撤销一个指挥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师的将官的命令招来一连串的问题,责问我什么理由。这个将官在战斗中容易发精神病,并在某次大的战斗以前离开了他的师。我已说过,因为无能、疾病、或者甚至是怯懦而离开军队的人往往在俄罗斯作了高官,而

i. 301 我提出将这些绅士尽快撤职的一切建议却被束之高阁。现在讲另一方面的事,有些团有十二个多月是由临时指挥官指挥的。典型的事例就是一个里海团指挥官F上校免职的故事。这个军官在他的团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受了一点轻伤(挫伤),于1904年10月初回俄国休养,离职将近一年才归队,而在这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安然无恙的。在他离职期间,该团由一个优秀的军官某上校指挥,由于在奉天战斗中带领该团作战英勇,他得了圣乔治勋章。在这十二个月中,我曾十次提出意见,要求将F上校免职的消息在公报上发表,指挥职务可由代理他的该上校担任。利涅维奇任总司令时,支持我的要求,并加上他自己的意见,转交给陆军大臣和司令部参谋长。但后者不同意,并询问F上校(他当时已归队)

i. 302 为何不在指挥里海团。我再次提出意见,又再次遭到拒绝。因我早已得知指挥圣彼得堡军区部队的军官并不反对任命我所提名的人,根本拒绝我的要求就更加令人费解了。最后,这个等待许久的任命公布了,但司令部参谋长却通知我说,这是因最近指挥第一军团的麦延多尔夫将军的请求而公布的。有几个指挥团队的上校在早期作战中特别超群出众,并表现出优良的军事素质,由于

缺少旅长,我多次提出,可将他们当中当时指挥团队的几个人——例如,其中有列沙、里耶德科、斯捷尔尼茨基、杜什凯维奇——提升为少将,我也提请注意旅长的职位有空缺。司令部参谋部拖延了很长的时间,不断地要求进一步提供情况,而弄到最后,指挥鄂木斯克团的团长奥斯托洛波夫上校却在上述几位上校之前提升了,奥斯托洛波夫是个很好的军官,但他在战场上的表现决不是卓越的,他的名声是通过普通道路起来的。

我所提出的加速提升与我在一起的总参谋部最优秀的军官的建议被否决了,因为这样一来,这些先生就要超越他们在俄国坐办公室的同辈。例如,克鲁伊莫夫大尉是总参谋部在西伯利亚第四军团工作的一个极有能力的军官,该军团司令官扎鲁巴耶夫将军和我曾几次建议,由于他在战场上的卓越工作,将他提升为中校^①。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但使我本人和在前线的总参谋部的军官吃惊的是,我查明,扎鲁巴耶夫的一个同辈,并未参加战争,没有提升的资格,却被提拔为中校。这只是许多事例中的一个。至于将战列步兵的大尉提升为中校,司令部参谋部倒不持异议,而通过这种途径,我们得到了很多奋发有为的青年参谋。他们之中有些人确实具有这样卓越的军事才能,可以立即派他们去指挥团队。为了公共事务的利益,我试图要一些我所了解的好军官派到野战军来。有的派来了,有的未派,理由是军队人数能够充分满足一切公务上的需要。

要成功地组织好情报工作,就需要有专门经验。我对这项重要工作的进行方式很不满意,要求指派某个总参谋部的军官,特别是十分胜任的军官来担任此项工作,但被拒绝了,理由很不充分。还有,司令部参谋部很少注意他们允许发表的来自战场报告的东西,散布了包括军队驻地地名、部队番号等方面的情报,这就必然

^① 在俄国陆军中没有少校一级。——编者

使敌人容易确定我军阵地的位置。同时，尽管司令部知道我军奉天作战中死伤总数和丢弃大炮的数目，他们却长久不去反驳报纸关于我军损失数百门大炮的报道。指挥部队的军官们长期离开军队，迫使我多次提出要求，要定一个限期，过时不归队的就要丧失官职。这个建议终于被批准了，很多长期仅仅是执行旅、团指挥工作的将军和其他军官得到总司令的确认，确定了他们的职位。然而此后不久复员开始了，于是从圣彼得堡发出一道命令，大意是
i. 305 说，总司令要发一个有损于自己威信的命令，废除以前确认军官职位的那个命令，因为“复活的死者”企图重返军队，并且愿意指挥他们离职太久的部队。重要的是，司令部对在战场上军队的这种有害的干涉必须停止，应当给现场负责实际指挥的人以充分的权力。

我还没有提到我军在技术部队与器材方面对敌军的明显的劣势。这种劣势主要在于工兵的比例。所有各兵种的每个日本师都配有一个强有力的工兵营，而我们每个军团只有一个工兵营。但由于在同一时间内交通线和构筑桥梁、铁路等工程的需要，我们的军团通常实际上只有该营的两个工兵连。换言之，每师有一个连，这个比例是十分不足的。日军的电报、电话部队也远比我们多，而且他们的器材也比较好，只有到了奉天战役以后，我们才能补救此种缺陷。由于敌人是由海上运输，他们当然能够容易得多地往作
i. 306 战地区运送轻便铁路器材，以及为构筑工事和进攻所需要的器材。我们只是在奉天战役以后才得到了一批足够的战地铁路器材、电线、电缆、炸药、工具等物资。

尽管我军大炮占优势，但我们只有一种类型的榴霰弹是一个错误。当然，我们希望在着发爆炸时它会产生良好的效果^①，但这样使用的结果是无效。为此我们付出的代价太大，因为我们严格来说还无法用炮兵来对筑垒阵地进攻，甚至连对匆忙建立的筑垒

^① 大概使用的是一种着发引信。——编者

阵地也无法进攻。当日本人用炮兵攻击我们占有的村庄时，则是彻底地加以摧毁。日军在1904年10月发给黑木的部队的指示中，有关于我军炮兵的这样一段话：

“敌人显然没有普通炮弹；他们的榴霰弹是无效的，由于弹皮太薄，弹片造成的破坏不大。”

我们长时期没有山炮，虽然在地作战时我们常常得从野战炮无法通过的道路上调动。在这一点上敌军远远胜过我们。只是为了奉天战役，我们在东方高地作战的一些军团才能够备有少数这种炮队，但即使在那时，供给伦南坎普夫将军部队的这种炮队也 i. 307 不充分。

战争开始时日本人没有机枪。我们有少数机枪连隶属于几个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师，就在第一次作战中——在鸭绿江——隶属于东西伯利亚第三来福枪师的一个机枪连是极有价值的。日本人很快学到了这一经验，并在9月辽阳作战之后在战场上使用了大量手提式轻机枪。这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尤其对加强匆促建立的由少数人防守的阵地的防守有用。给我军供应机枪的工作进行非常迟缓，实际上到和约缔结时才完成。比例也太小了，每师只有八挺。

我们的四轮运输马车对高地作业和满洲的泥泞道路都不适用；我要求在从俄国来的部队中代之以两轮马车，但未引起注意。大炮弹药的数量也不够继续作战之用。尽管有储备，但在辽阳、沙河、奉天作战中速射炮差不多把一切弹药消耗殆尽，而在每一次这种大的战斗之后弹药的补充都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我们也发现需要发射高爆炸药炮弹的榴弹炮。和约缔结时一个炮兵中队才到达。手榴弹是一种新发明，由当地临时制做，但在战斗中威力不够强大。 i. 308

我去前方之前呈交的并已在上面摘引过的备忘录，详细陈述

了为保证胜利我们最迫切需要什么,我强调——

1. 除根据我以前的建议业已定货的四十八门外,需要九十六门山炮的定货。这项要求被批准了,也已定了货,但交货不够迅速。

2. 需要毫不延缓地发给已在远东和正开往远东的各师每师八挺机枪。

根据官方数字,1904年定货和交货情况如下:

	定货	完成
驮载机枪.....	246	16
带轮机枪.....	411	56
梅利尼特炸药炮弹.....	25,600	0
六英寸口径野战迫击炮炮弹.....	18,000	0
速射榴弹炮.....	48	0
山炮.....	240	128

i. 309 1905年定制了大量的机枪,其中有一些是设计低劣的丹麦货;但在作战持续期间——直到1905年3月——我们不得不在机枪很少,没有高爆炸药炮弹,没有足够的山炮和没有榴弹炮的情况下尽力战斗。在1905年,这一切都供应了,或开始供应了,但已经太晚了。

第九章

ii. 1

我们失败的原因(续): 我们军队战术准备之不足——采取的改进办法

我已经谈到过在克里米亚战争和第二次土耳其战争中暴露出来的我们是如何缺乏战术训练。尤其突出的是，我们的高级指挥官们——象他们通常那样，关于敌人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是依靠十分不充分的情报——没有能力为了一个目的而使不同的兵种协同作战，并且不知道在哪里发起主攻。我们的骑兵发挥的作用较小和我们比较地擅长于防御，也是值得注意的。最后，引起人们注意的事实是：我们机动能力的缺乏迫使我们在面对土耳其人的战场上部署了优势兵力，这种办法在以前并不是必需的。

在 1877 至 1878 年战争之后，我们就开始研究我们的弱点，以便消除我们的缺点。自从那时以来，一定已经完成了很多事情，因为在最近这次战争开始时，军队的战术训练，与它在二十五年以前的情况比较，无疑是有较高的水平。但是，在某些事情上，我们并没有进步，而在其他事情上，我们实际上已经退步了。训练军队的责任，是由各级指挥官担负的，而且由下而上，直至各个军区的司令官，皆须担负这种责任。虽然全军使用着同样的操典和教范，然而由于军区司令官们所持的看法不同，因而施行战术训练的办法也随之而大有差异。我曾参加过许多次演习，并且于 1902 年在库尔斯克举行的大演习中担任了司令官，我记下了我认为在这方面是我们的主要缺点的事项。1903 年 10 月，我就这个问题呈送一

份报告给沙皇,在报告中,我对于某些要点的结论如下:

“1. 在大演习中主力部队与分遣队的参谋工作

ii. 3

“一般地说, 参谋工作不能被描述为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其主要原因如下: 对于被任命为各参谋部门首脑的军官的挑选多少有点不适当; 各参谋部门本身的组织不健全, 这是由于工作人员有限, 也由于供部队和参谋部门使用的交通工具(电报和电话设备)的供应不足; 以及忽视利用骑马的传令兵、汽车、或自行车在各个部队之间建立适当的联络。关于敌人的情报和我军其他部队的部署情况, 有关人员收到时总是为时已晚, 因为骑兵部队组织得不好, 又不能很好地执行其命令。

“各参谋官起草的文件数量极多。他们整个黄昏和整夜地工作。这些文件被石印或铅印出来, 并送往各方。但是这些命令难得被部队及时地收到。在 1899 年华沙军区的演习中, 我注意到, 担任各师指挥官的将级军官们在早晨接到开拔的命令时, 已在指定的出发时间两小时之后。

“在许多事例中, 与部队在一起的参谋官们似乎不知道应该怎样进行侦察, 因此不能充分准确地估计敌军的部署情况。这种情况又影响到主要的指挥官们作出的部署, 尤其是对他们使用预备队有影响(库尔斯克的演习以及普斯科夫和弗罗达瓦的演习)。同样的, 他们不知道怎样安排才能在前线各部队之间和前线与后方之间保持接触, 这个缺点使命令和情报不能及时收到, 而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ii. 4

“2. 在大演习中骑兵部队的工作

“在我看来, 目前那种认为骑兵部队的战略任务或独立任

务日益重要的意见，对于骑兵部队在军队中的工作已经起了有害的作用。在大部分情况下，战略任务的精神并没有被适当地理解，而且双方骑兵部队官兵们的主要看法，似乎是互相符合的。因此双方都忽视了将有关敌人的情报提供给他们们的指挥官们（在采取行动以前，这是十分必需的），并且使步兵部队在实际战斗的过程中得不到他们的合作，不管步兵是在从事进攻还是防御，都是如此。远距离的侦察兵常常做了有用的工作，但是由于缺乏迅速传递搜集到的情报的适当办法，在情报送达某些部队（这种情报对这些部队或许是有用的）时，已在敌人改变了部署之后。近距离的侦察兵不与远距离的侦察兵相配合。我们的骑兵部队常常被准许在夜间同敌人失去接触，其借口是人和马需要休息。天黑以后，要使用十多个骑兵，也不愿给，而在白天，整个师和整个军团的骑兵徒劳无益地前进和反方向行进，而且分派的任务并不总是与总的作战计划相一致。

“骑兵部队的工作应该比现在更严格地同其他兵种的工作相合作，而且所有指挥骑兵部队的军官们都应该记住：他们的任务是辅助性的，主要在于依靠他们送回的情报的完整性^{ii. 5}和准确来协助指挥军队的将军作出适当的决定；应该记住：骑兵部队应该帮助指挥官们，首先，草拟一项作战计划，其次，在战场上粉碎敌人。

“3. 进攻与防御

“在这方面，情报也是缺少的。当指挥官们下决心进攻或是坚持防御时，从他们获得的关于敌人和当地的情报来说，他们从来也不觉得他们是彻底了解他们在做什么，或这种决心真正是同总的计划的精神相一致的。我们在防御方面是强有

力的，但是我们难得发起一次稳妥地制定或执行的进攻。在进攻中纵队指挥官们并不总是费力地去获得关于敌军部署和兵力的足够准确的情报，以便能够如实地了解局势并起草一项合理的战斗计划，选择主攻的方向，为主攻分派部队，并采取步骤欺骗敌人，使之摸不清精确的主攻方向。当他们为了主攻已经集中了足够的第一线部队时，他们并不把各兵种的预备队也调到前面来。

ii. 6

“尤其是，我们不知道怎样指挥部队前进，以及在有了大炮和来福枪炮火准备之后，怎样发起攻击。不幸的是，许多指挥官似乎墨守这样的观念，即进行持续进攻而不使用来福枪。如果我们遭遇到象德国人那样的敌人（他们系统地训练他们的部队在他们自己猛烈的来福枪火力掩护之下进攻），我们就将被打败，因为在和平时期，我们常常在演习中进攻到距离阵地一千步或甚至八百步的地方还一枪不发。

“大炮也常常在同样的危急时刻——即当他们正在进攻的步兵接近敌人的时候——停止轰击。我就这种情况询问原因，通常都得到这样的答复，即他们的弹药用完了。如果现在还没有认识到这种绝对必要性，即没有认识到在手头保留相当数量的炮弹有助于决定性的步兵攻击，那末虽然我们拥有连发炮，在战争中我们的炮兵在最需要它合作的时刻将成为无用之物。

“我们在防御方面比攻击方面要好些，我们知道怎样充分发挥大炮和来福枪的火力。阵地前面的射程通常都加以测量并清楚地标志出来。但是没有适当地使用预备队。我们没有象我们应该做的那样把预备队投入火线，以便在敌人的主攻展开以后增强我们火力的强度；我们也没有在敌人来到决定性的射程以内之后把预备队投入凶猛的反攻之中。预备队常

常保持着集中在一起，并且在没有任何来福枪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被派去抵御进攻。被分派担任一个防御阵地的预备队的许多团和旅，在整个演习中未发一弹。

“4. 在进攻中纵队队形的恢复

“其他欧洲各国军队目前正在尽一切可能把现代来福枪和大炮火力给与自己的杀伤力减至最小限度，同时，正在努力把自已的火力发展到最大限度，不论在进攻或防御中都是如此。的确，德国人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作的努力中，已走到了极端：把他们所有的军队都散开，使之成为长而稀疏的横队——有时甚至牺牲了他们的预备队。在另一方面，我们根据对上次演习的判断，我们正在走向另一个极端，因为我们是在几乎没有任何火力掩护的情况下将士兵密集成为四路纵队来发起决定性的进攻。”

“如果对于我们的进攻队形的日益增长的密度不予以制止的话，我们将为此而蒙受惨重的损失。这对于我们是格外危险的，因为我们不用大炮和来福枪的支援火力来适当地帮助我们进攻的步兵。”

“5. 炮兵的工作

“在大部分情况下，大炮阵地选择得很好，但是射击训练常常是不好的。由于炮兵在战场上只能携带数量有限的炮弹，因此应该教导炮手们节约每一发炮弹，这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就连发炮来说，这是尤其重要的。但是我们常常发射比实际需要更多的炮弹：过于匆忙地开火，射向完全不重要的目标，其结果是，在进攻的关键时刻，炮兵只得用信号通知说，他们正在射击，因为他们所有的炮弹都已

用完了。^①

“6. 工兵的工作

ii. 8

“普列夫纳和戈拉·都布尼亚克战役的血的教训把新生命注入我们的军事工程之中，这种情况在土耳其战争之后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的工兵在挖掘战壕和构筑棱堡方面，熟练起来了，其他部队也受到构筑工事的训练，并且开始喜欢挖掘战壕来保护自己。但是不久一个反动时期就开始了。这主要是由于德拉戈米罗夫将军，他在导致回到事物的旧秩序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在事物的旧秩序时代，主张一切都决定于刺刀）。他非常反对利用掩护物，并且使他在这个问题上的命令达到十分愚蠢可笑的程度——他甚至禁止他手下的士兵在向前进攻时卧倒。

“挖掘战壕来保护自己意味着要花费劳动，并且要花费很多时间。而且，经常下命令，规定所有挖掘的战壕都必须填满，所有构筑的棱堡都必须拆除。这立刻在陆军中限制了战壕工事的范围。挖掘战壕的工具（在土耳其战争之后，这些工具之被重视，仅次于弹药和干粮）被丢弃到机动仓库里去，而不再为了应用或甚至为了检查而拿出来。在许多演习中，士兵们完全不练习构筑阵地的防御工事；在其他演习中，仅仅画出战壕的准线而已。我虽然充分相信工兵部队受到极好的训练，但是我不得不表示我的担心：他们在许多细节方面过于专业化了，以致忽视了这个事实，即他们在战争中的主要任务是以各种方式同步兵合作，不论在加强防御阵地和攻击敌人阵地方面，都是如此。

^① 在演习中，为了节省炮弹，炮兵有时用信号通知说，他们正在射击，而不是真的这样做。——编者。

“在大规模演习中省略掉一切讲评，正在逐渐地成为习惯。因此，被不加注意而忽略过去的种种错误，以后又屡次重犯，并且有成为长期错误的倾向。我记得古尔科将军所作的某些非常有教育意义的演习评论，我曾经怀着兴趣倾听罗普将军所作的其他讲评，并甚受其益。在过去，基辅和圣彼得堡军区在每次演习以后总是要举行讨论的，但是现在某些担任军区司令的军官们在演习出席时既不自己发表任何评论，又不要求在演习中指挥双方部队的军官们或其他高级军官们发表评论。在过了一段长时间以后所发出的各项命令——虽然这些命令可能会列举已被注意到的各项要点——和最后印出的关于大规模地集结和演习的报告，对于接受教训来说，是比较地没有用处的。如果要有用的话，必须由指挥官们作出讲评，并且当场作出。

“不过，认识到具有作出合适讲评的能力的人是如何稀罕，是很重要的。通常发表的评论，或是十分平淡，或是调子定得太高。我们某些最有才能的将级军官由于发表意见的方式太严厉而不必要地伤害了指挥部队的军官们的感情，这也似乎是特别‘不幸’的。他们忘记了，在一位高级军官的下级面前降低他的威信总是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尤其是在战争时期。他们忘记了各种不同的战术环境的条件的无限差异，并且忘记了，在和平时期的演习中，没有必要要有一方部队战胜或战败。此外，独立的行动，虽然它本身肯定是不错的，常常被认为是一项错误行动，并且被判定是错的，因为高级指挥官在这个问题上有他自己的意见。这种心胸狭窄的讲评使指挥部队的军官们丧失了独立、主动和渴望承担责任的精神。

与这些精神相反，他们试图发现司令官的癖好，以便‘谄媚’他们。

“8. 对于我们军队的战术训练的结论

“虽然担任各军区司令官的将军们对于与军事训练有关的一切问题的意见应该受到重视(而且事实上也受到重视)，然而对于个人的行动必须有某种限制。例如，准许他们之中的每一个人完全按照他自己对于在战争中什么是最重要的这一问题所持的看法来训练他指挥下的军队，就是不可能的，因为对于进攻和防御的训练，在不同的军区不应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进行。然而过去所实行的，或多或少正是这样。由于战地勤务手册和供各兵种联合训练使用的条令的延迟出版，我们在司令部工作的人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作为我提到的情况的一个例子：德拉戈米罗夫将军曾经训练在他指挥之下的基辅军区的军队按照他自己的一套方式去进攻，而这种方式是否稳妥，是值得怀疑的。如果他的某些理论在战争中付诸实行，它们将招致惨重的损失，因此在和平时期按照这些理论来进行训练看来是完全错误的。他有一条命令规定护卫大炮的散兵应与大炮排成一直线，这种办法只会使大炮过早地沉默。他的另一条命令规定，向前进攻的散兵各战斗部队在停止时不应卧倒，这种办法是绝对不可能执行的。当枪弹横飞时，一支散兵部队在停止时会立刻自动卧倒，而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人们在卧倒时比站立时更容易得到掩蔽。而现在，格里彭伯格将军遵循着德拉戈米罗夫将军的先例，在维尔纳军区已经开始按照他自己的理论来行动，并且背离了教本。在他今年^①的《军区命令》(其中发表了他对于在各次演习中

ii. 11

^① 1903年。——编者

所做工作的讲评)中,他建议:排列成密集队形的步兵应以各个射击^①而不是以齐射来迎击骑兵。他也坚持:当一支战斗部队以短距离猛攻向前进时,这些猛攻应从左右两翼开始。

“不幸的是,当我在各军区和大演习中检阅军队时所看到的很多情况使我得出这样的结论:指挥部队(从团以上)的军官们的战术训练(尤其是指挥方面)既不扎实,也不一致。”

令人遗憾的是我对于陆军在和平时期的战术训练的严厉批评在这次战争中得到了极好的证实。

满洲战场在气候、地形和居民等方面呈现许多特点。它同我们曾经研究过的任何“可能的”战场都不一样,因此,对于来自俄国欧洲部分的军队来说,它是十分陌生的。日本人不仅是陌生的和实际上是不了解的敌人,而且关于他们,我们拥有情报的性质有显示我们具有很大优势的倾向,因此诱使我们轻视他们。我们现在这一版的《战地勤务条例》业已作废,而修订版仍在印刷中。因此,必须发布特别的条令,以便帮助我们的军队来应付他们被派往作战的完全陌生的环境。这些条令是在我指导之下编辑和印刷的,并分发给指挥所有部队(步兵连和骑兵连以上)的军官们,也分发给所有的主要的参谋官们。在这些条令中我强调了了解敌人的必要性,列举了他们的优点和弱点,并指出他们的爱国精神和传统的不怕死的精神,以引起注意。我陈述说:他们的优点是占统治地位的,而且即使以欧洲的标准来评价,我们也应该认为日本人是非常强大的对手。我继续写道:

“这是极为重要的:在最初的交战中(在这些交战中,他们肯定会拥有优势兵力),我们不应让日本人因取得胜利而感到满足,因为那样只会更进一步振奋他们的精神。”

“不需要采取特殊的或新的战术来对付我们现在的敌人,

①、各个射击是难以控制的,而且在战斗中几乎是不可能令其停止的。

但是我们必须不再重复在演习中所犯的种种错误，这些错误在1877至1878年的土耳其战争中使我们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

我然后提到我们在普列夫纳战败的原因，并且对于最重要的原因进行详细的评论。在攻下尼科波利斯以后，我们的军队在不知道敌人的兵力和部署的情况下向普列夫纳移动。就有关获得这种情报的工作来说，我们的骑兵并没有被很好地使用。在普列夫纳的最初的交战中(1877年7月20日)，我们用于进攻的人数太少，而且以分遣队方式进行。在7月31日和9月12日的交战中，我们进攻的方式也是一样，但是范围甚至更大一些，而且进攻时队形过于密集，又没有受到射击效果充分的掩护，而我们自己的人数众多的骑兵和罗马尼亚人的骑兵实际上没有做什么事。1877年9月10日和11日的进攻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的军队分布得不好，又没有经过训练。我在这些条令中附带写了对于我们军队在土耳其战争中的工作的评价，其内容如下：

ii. 14

“在这次战争中，参谋工作并不总是成功的。部队接到命令时，常常是太晚了。由于要等接到命令才开始行动，把时间都浪费掉了。部队在夜间到达被指派的阵地时，并不总能找到他们的军官，这些军官本来是应该先在阵地上等待他们到达时领导他们的。指挥部队的军官们在关于敌人的兵力和部署、或关于我们自己的邻近部队的情况方面，常常得不到参谋部门的情报。情报的缺乏是我们惨败的主要原因。我们有时是在完全不知道敌人的兵力和部署、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兵力和部署的情况在进行攻击时也有一部分不知道的。

“可以引证攻下卡尔斯要塞的战役作为说明我们的军队在进攻中能取得何等辉煌的战果的一个例子。这是一个非常有教育意义的实例。虽然普列夫纳易于攻破的野战工事抵御

我们的进攻达五个月之久，然而在卡尔斯要塞不论是坚固的护墙或是深沟都不能阻止我们的猛攻。我们的英勇的高加索士兵在夜间向要塞前进。他们有很好的领导，并且总是熟练地派出一队侦察兵走在前面。他们攻下了要塞，而这个要塞曾经被大言不惭地说成是‘坚不可摧的’。

“在从事防御时，我们的军队总是打得很好。让我们牢记希普卡隘口的防御战，并且效法它。”

我在简短地评论了我们在土耳其战争中的错误以后，列举了在我们和平时期的历次演习中仍然值得注意的事项。

随着战争的发展，我们对于敌人的特点逐渐地了解了，就象了解我们自己的特点一样，因此我能在1904年8月、9月、10月和12月发出了补充训令。

虽然我们的骑兵人数众多，我们的侦察兵也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我们还没有把敌人的总的部署和兵力探查清楚。间谍们带来的情报是被夸张了的，因此是不可靠的。其结果是：当我们进行任何攻势战斗时，我们是在完全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下前进的。我的训令如下：ii. 15

8月份发出的训令

“在我们进攻时，我们过于迅速地前进，并没有巩固已占领的阵地，也没有得到炮兵的充分合作。而在我们停止前进时，我们在总预备队和团预备队中仍有大量的士兵。在退却时，我们退到以前被我们占领的阵地上去，但我们并没有在任何这些阵地上采取步骤来准备固守，这种准备工作不仅会大大地帮助退却本身，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会使我们能够重新发起进攻。

“另外一点是，我们的很多防御阵地同被派去防御这些阵

地的士兵人数(当他们散开时)不相适应。虽然如此,敌人的正面攻击(即使我们是十分偶然地守住了阵地)通常都遭到失败,而我们却常常由于敌人的迂回运动而被迫放弃我们的阵地(敌人的优势兵力使他们有可能采取迂回运动)。

ii. 16

“在进攻时,尤其是在高地之间进攻时,步兵必须等待,以便突然袭击可能得到炮火的掩护,这也是为了获得喘息的时间,或是为对一次迂回运动进行配合提供时间。步兵停止前进也有另外的和自然而然的原因——这就是敌人的炮火。由于敌人的炮火,部队停止前进,或者,更坏的是开始无秩序地退却。这时通常发生的情况是这样:在处于特别猛烈的炮火之下来到的某一个连中,有少数人开始慢慢地退走,然后他们本连的人跟随着他们,最后左右两边的其他的连又跟随着这一个连,即使其他的连或许正在固守坚固的阵地。的确,这样的时刻是危急的,除非某一位卓越的军官挺身而出,他有把正在退却的士兵重新集合起来的秘诀,并成功地使这个连固守住它的阵地,战斗就会遭失败。但是,除为退却的士兵树立一个个人榜样外,指挥官必须立即命令他的一部分预备队冲向前去,以制止那些退却的士兵中间的沮丧士气。在这样的危急关头,最重要的事情是军官们或最坚定的士兵、尤其是圣乔治勋章^①获得者所树立的榜样。一个连长的榜样对他的连是最重要的。因此,尽管他在和平时期或许是有功的,一个在战斗中没有表现个人英勇行为的连长应该立即被免去他的职务。

“防备在进攻或防御时发生突然的紧急情况的最有效的办法——而在丘陵地区这尤其准确——是在手中掌握一支强大的预备队,但不要太轻易地使用它。在最近的战斗中我们

^① 圣乔治十字勋章相当于英国的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但更容易获得些。——

并没有这样做；我们派出了缺乏战斗力的预备队，而且太快地就把它用完。我们有时派出整团的人去支援前线，而实际上只须派出两个连或一个营就足够了。^①

“在所有各种战斗中，指挥官们必须向他们的上级和左右 ii. 17 两翼的邻近部队不断地报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幸的是，我们不习惯于这样做。在战斗以前，连最小的细节都报告，但是战斗一开始，我们就如此全神贯注于战斗，以致这种最明显的责任也被忘记了。今后各级主要参谋官在战斗中应担负经常传递报告之责。”

此外，并提请指挥官们特别注意在战斗中必须以热的饭食供给他们的士兵，并注意我们在战斗中过度消耗弹药的情况。

9 月份发出的训令

下面是在 8 月份战斗以后正在准备一次进攻时我发出的主要训令：

“迄今为止，每当我们采取攻势时，总是遭到失败，这是值得遗憾的事。由于我们情报的缺乏（对于这种情况，我已经引起大家注意了），我们不是按照明确制定的计划充满信心地发起进攻，而是以半心半意的方式来进攻。我们常常过早地发起主攻，而忽视敌人的企图。曾经发生过的实例是：我们曾经分派象一个营那样规模的突击小分队；其他的实例是，我们曾经没有制定任何明确的作战计划而从事战斗。最后，也有 ii. 18 过这样的事例：在向目标推进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决心。”

在训令中特别注意的几点如下：在一次前进运动开始时，对于敌人的先头部队取得即使是小胜的重要性；在阵地进攻时，始终应

^① 俄国在欧洲的团通常由四个营组成。参加最近这次战争的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则每团有三个营。——编者

该采取迂回运动，与正面进攻相配合；一旦开始前进就加紧推进的好处。此外，强调坚决固守获得的每一码土地的必要性，并警告在正面进攻中的先头部队，要等到与之配合的迂回运动充分发展时才发动袭击。也强调要尽量利用各种各样的火力。我写道：

“缺乏配合(我们因此遭受极大的损失)的一个显著事例是9月2日的作战，^①那时左面的部队过早地开始战斗，因此结果以混乱地退却告终。这对于整个战斗的成败产生了最坏的结果。

“我必须再一次提醒各级军官：节省弹药、尤其是炮弹具有极端的必要性。在辽阳，我们在两天以内把十万多发的特殊炮弹储备都用完了。把炮弹输送到前线是非常困难的，而用完了炮弹的炮兵只不过是军队的负担。”

ii. 19 在训令中，对于由于在长有很多象高粱这样的谷物的地区进行战斗而产生的种种特点，也详细地加以评论：

“不论何人，凡在战斗中以伴随或抬走伤员为借口离开队伍者，都应予以严惩。

“为了进攻，必须使步兵连和骑兵连尽可能地强大。为达此目的，必须采取最严格的预防措施来限制使用于外加任务和运输工作的人数。临时为军官们服务的哥萨克骑兵，不应被当作传令兵和警卫兵来使用。患病的哥萨克骑兵所有的强健马匹，应交给没有马、但身体适宜于执行任务的人使用。

“指挥官们对于这项命令——即士兵随身携带的应急干粮不应随意食用——没有给予适当的注意，这是遗憾的事，而且我已不止一次地批评过了。这种储备干粮不断地被吃掉，而没有采取步骤立即加以补充。许多指挥官无动于衷地让士兵们把携带的全部储备干粮都消耗掉，他们的一厢情愿的想

^① 辽阳的战斗。——编者

法是：把新的储备干粮运到团供应部来，是另外某些人的责任。

“上述训令仅仅说到战地工作的少数细节。供战斗时使用的主要指导是《战地勤务条例》，但是这些条例当然不能适合我们目前正在那里战斗的完全新的环境里可能会发生的每一种情况。因此，我希望各级指挥官在履行他们的责任时表现出更大的主动性。”

我在10月份发出的训令中，包括了对于我们在9月底进行的 ii. 20 攻势作战的批评。我在其中写道：

“我仍然注意到在指挥进攻的方法上的种种缺点。在密集的散兵部队后面，就紧跟着支援部队和预备队，它们之间的距离太近了。进攻的队形通常都不适应于地形，而且形成极易被攻击的目标。如果这种密集队形是在即将进行拼刺刀的攻击时采取的，那么，尽管会蒙受惨重的牺牲，还可能有某些用处，因为会在进行攻击时得到额外的力量和推动力，但是这是还处在远距离进行攻击中采取的，因此造成了毫无价值的和惨重的损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效法日本人，并且象我们过去在高加索经常做的那样去做——尽量利用掩护物。必须尽量努力去很好地进行侦察，以便可以利用每一处地形的起伏，利用每一根树枝和每一块石头，可以使进攻的部队以最小的损失前进到尽可能接近敌人的地方。这样做的办法是由个别的士兵或成群的士兵以短距离的冲锋前进，直至进攻的部队能够集结。在开阔的地方，如果进攻的步兵必须等待炮兵的掩护，他们应尽快地挖掘壕沟来保卫自己。

“在退却时，大群的士兵一齐移动到后方，给敌人提供一个极好的攻击目标，为此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再者，为了在退却时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我们常常顽强地固守阵地的若干

ii. 21

地段，直至能在黑夜的掩护下实行撤退为止。如果这些地段左右两边的阵地碰巧已被放弃，而日本人有足够的机动能力来利用这种情况，那么，对于阵地的任何一段的这种孤立的防卫可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我们必须学习怎样在白天退却——用上述为进攻所规定的同样的方法（用冲锋的方法），并且在这样做时要避免密集的队形。

“我和其他高级军官们在一次战斗中曾注意到成百成千的没有受伤的人离开队伍，把伤员抬送到后方去。在10月12日至15日的战斗^①中，我亲眼看见，参与抬送一个伤员到后方去的，竟达九个人之多。这种弊病必须十分严厉地加以制止，并须规定，在一次战斗尚未结束以前，只有抬担架的人才应把伤员抬送到后方去。

“日本人正在沿着我们的前线构筑防御工事，建立阵地，把村落、小山和山顶变成强固的、可以防御的据点，并以各种障碍物加强他们的阵地。这些阵地应仔细地加以研究，注意他们的强固据点，而且在我们阵线的每一段都应制定针对敌人阵地的相应部分的作战计划。对于这些挑选出来的敌人据点的任何进攻，都应及早组织炮兵掩护，这是重要的。

“在进行攻击时，应派遣工兵和侦察兵的分遣队走在前面，要把构筑了防御工事的村落周围的障碍物摧毁，这些村落应好好地炮轰一番。在发起突袭以前，部队应在火力掩护之下前进。如果先头部队发现他们不够强大，难以攻下他们想要夺取的据点，那么，他们必须固守一个尽量靠近敌人的地点，以便在得到增援时重新向前推进。”

ii. 22

最后，在我于1904年12月发出的训令中，我扼要重述了由于我们最近的经验而得出的最重要的要点，例如：

^① 沙河的战斗。——编者

“1. 为了避免损失，我们的进攻队形更好地适应于地形的必要性。

“2. 节省炮弹。

“3. 更聪明地使用来福枪火力，以及在夜间使用齐射火力的必要性。

“4. 夜战的重大价值。

“5. 所有高级指挥官之间须有适当联络。

“6. 所有各兵种互相配合和在战斗中保持接触的必要性。

“取得胜利的最可靠的道路，是继续战斗的决心，即使在最后的预备队已被用完时，也是如此。因为敌人或许也处于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坏的）困境，而且在白天不可能办到的事，在夜间或许可以办得到。不幸的是，在最近的各次战斗中，即使是拥有大量部队的某些指挥官，也自认为不能把付托给他们的战斗进行下去，虽则当时他们手中也掌握有未曾发过一弹的大量预备队。”

当然，当我们的惨败开始时，各种报纸马上就谴责我们的军队训练不足，而这些报纸是并不很错的。首先，大部分士兵是预备役军人，他们已经忘记了很多东西了。其次，在这次战争中，我们是第一次获得使用无烟火药、速射炮、机关枪和所有的最近发展起来的毁灭性武器的经验，很多东西是陌生的和料想不到的。我们先有的观念都被推翻了，我们受到了挫折，即遭到致命的火炮间接瞄准射击，以及新的进攻队形——很少看得到在前进的步兵，一次只有一个士兵，在几乎没有人觉察的情况下爬上去，利用了每一英寸的掩护物。我们的军队是受过教育的，但是他们所学习的东西由于这个或那个军区司令官的个人癖性而有所不同。军区司令官越强，他就越感到不一定必须服从现行操典中规定的经过审定的教

育方法和训练方法。格里彭伯格将军并不是例外。尽管有使用齐射来击退夜间攻击的规定，尽管战争经验充分证实了齐射火力的必要性和价值，尽管总司令就这一点曾发过训令，他在一次战斗的前几天下决心要重新教育在他指挥之下的部队。他命令在夜间使用各个射击。他的铅印出来并发给部队的《关于步兵作战的训令》（他是于1905年1月4日签署的）在整个陆军引起了惊愕和嘲笑。

ii. 24 在这本书中，实际上规定了：只是在敌人突然出现在附近地区时才能使用齐射，而且在一次齐射以后就应立即发起拼刺刀的攻击。他谴责我们的军队在鸭绿江方面的作战方法，在上述的《训令》中，他提出了一个战斗的秘诀，依靠这个秘诀，我们的两个营就可以摧毁一个日本师。在简略叙述了我们的小型武器所耗用的弹药总数以后，他写道：

“如果我们的两个营散开并迅速地开始各个射击，这个日本师就将被摧毁，我们就可以取得胜利。”

格里彭伯格将军认为消灭一个日本师是这样简单的事，但是几天以后，当他率领一支一百二十个营的强大部队向黑沟台阵地前进时，他自己提出的处理办法就被证明是毫无价值的。在最初几天里，当他被不超过两个师的日本军队所抵抗时，他不能攻下沈且堡，他的部队陷于混乱，给了敌人调集强大的增援部队的时间，而自己退却——退到圣彼得堡去了。

就从俄国来的部队所采用的攻击队形来说，第四十一师在过去特别被教导采用非常密集的队形，而没有被教导利用地形。该
ii. 25 师是从维尔纳军区来的，该军区在这次战争以前是由格里彭伯格将军指挥的。我们的炮手到达前线时也只抱有炮兵战术的这一种概念——把他们的大炮安置在开阔的地方，并利用直接火力。为此我们在最初的战斗中付出了很高的代价。

第十章

ii. 26

我们失败的原因(结论): 战略形势的特殊困难——在编制和人员方面的缺点——在军队中缺乏尚武精神, 和缺乏把战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在战斗紧张的情况下打乱我们部队的编制

每一个司令部参谋部的责任是: 把一切可能发生的事估计出来, 并且不管当时的国际关系如何, 在每一个可能的方面, 为战争作好准备。因此, 我们已及时地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关东区的参谋部门共同拟定了万一与日本发生战争时我们作战的总方针, 并且被批准了。下面是从论述这个问题的文件中摘录出来的:

“日本利用它的军事地位——因为它将比我们对战争更有准备, 因此在战役的最初时期不论在海上还是陆地都将在数量上拥有很大优势——只能一般地规定它的目标。它可能 (1) 把它的注意力限于占领朝鲜, 并且对我们不采取攻势(情况很可能就是这样); 或者 (2) 占领朝鲜并且对我们也采取攻势——

(a) 在满洲进攻。

(b) 进攻旅顺口。

(c) 在乌苏里区南部(符拉迪沃斯托克)进攻。

“如果日本决定采取第一项目标, 那么, 考虑到我们将需要的增援部队的人数, 和我们把增援部队输送到前线所处的不利情况, 我们最初将被迫允许它夺取朝鲜——在我们这方

面将不采取报复行动,只要它仅以占领那个国家为限,并没有进一步危及满洲和我们的领土的计划。如果它选择第二项目标,我们将被迫应战,并且应该立即下定决心,在我们完全摧毁它的陆军和舰队以前,绝不结束战争。不过,鉴于在战争的最初时期它在数量上的优势和较多的准备,我们将必须一般地采取守势。我们在作战地区以内的任何军队应该尽可能地避免决战,以便避免在我们能够集中兵力以前被敌人各个击破。

ii. 28

日本舰队在数量上的优势可能会阻止我们的分舰队从事于任何较重要的活跃的战斗,因此我们的分舰队将必须把它的行动限于尽可能地推迟敌人登陆这样的比较地适度的任务。我们自己领土的防御应由在乌苏里区南部和关东区的部队担任,这些部队是为了那个特殊目的而组织起来,并以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的要塞为基地。除此以外,所有剩下的部队(除分派保护交通线和在满洲维持秩序的部队外)应集中于奉天-辽阳-岫岩地区。在日本人前进时,这些部队在尽可能地迟滞他们的同时,将逐渐地被迫退向哈尔滨。如果在战役的初期可以明显看出日本人的全部努力是针对我们在满洲的军队的,那么,原应首先集中于乌苏里区南部的部队(西伯利亚第一军团)应转移到满洲去。”

在这个文件写成以后的两年中,我们在远东的陆、海军的兵力、部署和准备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我们开始采取的活跃的政策的结果,满洲和北朝鲜的政治情况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因此在1903年感到有必要根据这些改变了的情况来考虑修改上述计划。在这两年中间,由于我们的陆上部队和舰队的增多,和铁路效率的改进,我们在远东的兵力已有所增长。我们已经看到,为了改进铁路的效率,已经做了什么事情。在这里,这样说就够了:

在 1901 年,陆军部在整个中国境内的铁路线上在二十四小时内可以利用的车辆只有二十节货车,而在 1903 年,在同一时间内就可 ii. 29 以得到七十五节货车,而且根据作出的许诺,可以希望到 1904 年年初时就能得到五列直达军用火车。我们的舰队在 1901 年是被认为不及日本舰队的,到 1903 年年底,据说(根据总督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意见)这支舰队是如此强大,因此它被日本人打败的任何可能性是不能承认的。但是就在那两年里,日本并没有闲着无所作为,而是不断地增强了它的海、陆军的力量。由于这种情况,这两个国家在当地相对的兵力在 1903 年仍然和 1901 年时大致一样,因此,据认为坚持在两年前拟就并经批准的总的作战计划,是慎重的。为了说明那时的官方意见,我从我于 1903 年 8 月 6 日呈送给沙皇的报告中摘引一段于下:

“在即将由司令部参谋部呈上的报告中,在仔细评价俄日两国的资源以后所得出的结论,与两年前所得出的结论相同——这就是:万一与日本发生战争,我们应采取防御态势;我们军队的集中和总的分布,应与两年前的计划相同;虽然我们可以把军队调到奉天-辽阳-岫岩战线,但是,如果满洲南部被全部的日本陆军所侵犯,在战争的最初时期,我们将不能坚守我们在那个地区的阵地。因此我们还应该估计到旅顺口会在 ii. 30 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被切断联系。为了避免被各个击破,在从俄国来的增援部队使我们能够采取攻势以前,我们应该向哈尔滨撤退。但是我可以补充一点意见:我们虽然象两年前一样接受同一个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对于战争的结局现在能够抱有大得多的信心了。我们的舰队比日本人的舰队强大,而且由于增援部队将比以前更快地来到,我们将只需较少的时间就能从事进攻。”

在司令部参谋长于 1904 年 2 月 12 日——即敌人攻击我们在

旅顺口的舰队以后几天——送给我的备忘录中，萨哈罗夫将军描述日本人的意图如下：

“日本人的计划似乎是：

“1. 给予我们的舰队以粉碎性的打击，以便使其活动彻底瘫痪，这样来保证他们运输的行动自由。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毫不犹豫地宣战以前就攻击我们（2月8日和9日的夜间战斗）。英国人把威海卫移交给他们，也给了他们一个有利的海军基地，我们的分舰队从事任何战斗时，这个基地都恰好处于我们的侧翼。

“2. 攻陷旅顺口，以便达到同样的目的——摧毁我们的舰队。

“3. 继续前进并攻陷哈尔滨，以便把阿穆尔沿岸地区同俄国的其余部分隔离开来，并破坏铁路。”

ii. 31 我们对于交通当局许诺的改进铁路的希望，不幸没有实现，而我们的舰队，被敌人在宣战以前的袭击所损伤，不仅比敌人的舰队为弱，而且甚至未能执行在1901年期望它执行的普通的任务。因此我们军队的集中比我们原来设想的要慢得多，而日本人由于取得了制海权，把他们的全部陆军都投到大陆上来。这样，敌人在海上和陆地都取得了主动，并且为极大的爱国精神所激发，在物质和士气方面都比我们居于优势的情况下发动了战争。不过，虽然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极端艰巨的，但是我们的资源比敌人的资源优越得多，而且我们为战争完全作好准备的时刻只不过是延迟了而已。尽管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处于不利的境地，然而在十五个月的战斗以后，我们仍然固守着四平街阵地，而且虽然我们实际上采取攻势，但我们决没有一直退到哈尔滨，而在原来的计划中，是承认有这样一种可能性的。只要我们抱有彻底贯彻这个计划所必需的决心，我们就不应在完全击败敌人以前就结束战争。因此，我们所

完成的一切事情,只能被认为是为决战所作的准备。我们原来的作战计划中的设想之一是:如果一支强大的日本军队侵犯满洲南部,在战争的最初时期,我们将不能固守它。在这次战争中,日本的全部陆军侵犯了那个地区,但是我们的军队在辽阳、沙河和奉天所表现出来的抵抗是如此有战斗力,因此,虽然敌人占领了满洲南部的大部分,但是他们在长达六个月的时间里,没有对我们重新采取攻势。如果日本人企图把我们赶到哈尔滨去,那么,他们在通过我们在哈尔滨南面构筑的三道防线^①时所面临的困难,远非他们从大石桥进军到铁岭时所克服的困难所能比拟。我把我在以前各章中屡次说过的话再说一遍:战争虽然结束了,陆军并没有被打败。在1905年8月份,我们在四平街阵地处于准备状态的强大军队,其中有二分之一是从来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下面我将解释,为什么在战争持续的十五个月中间,我们从未获得击败敌人所必需的物质方面和士气方面的优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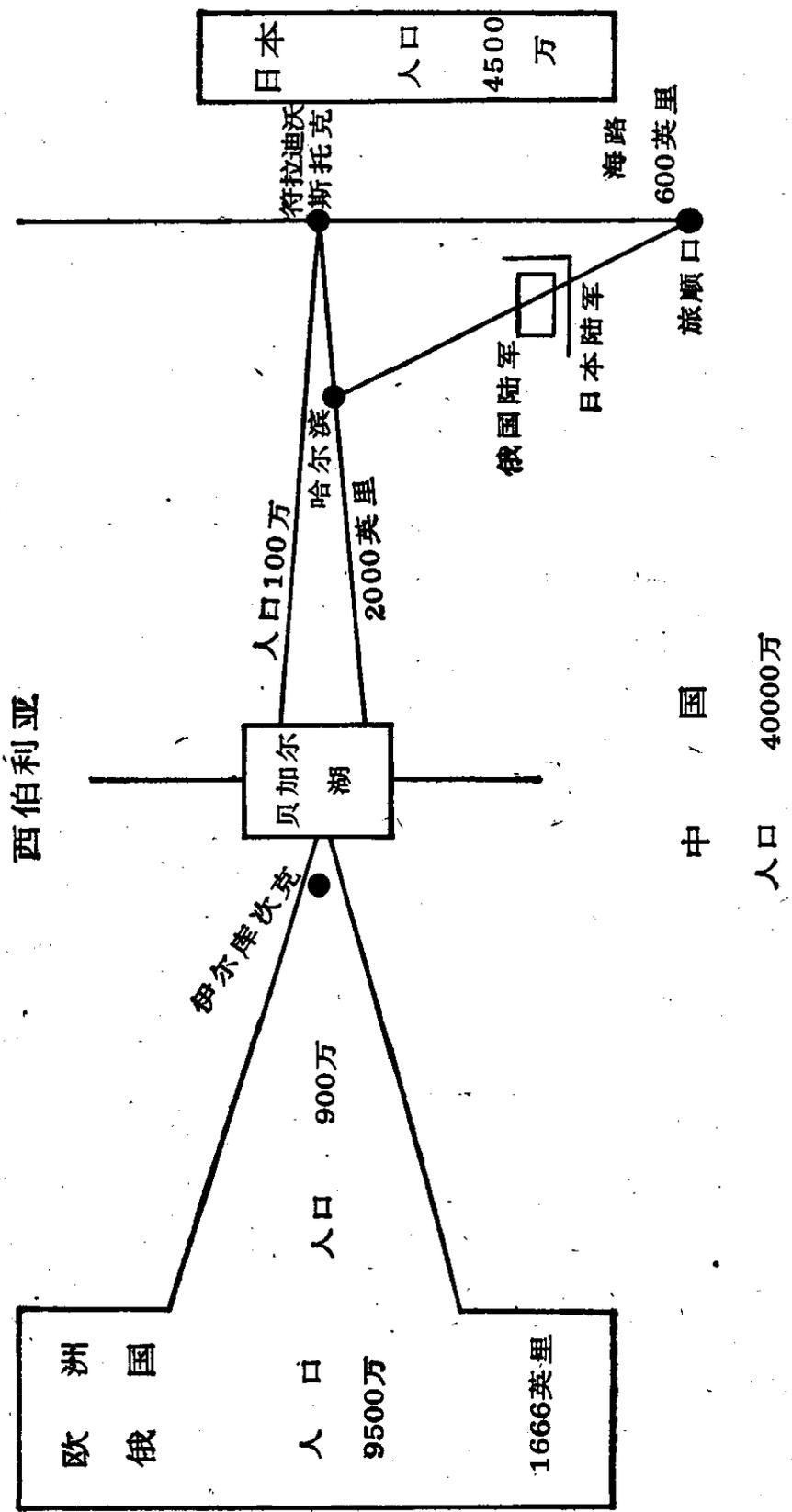
当我在日本时^②所写的日记中,我画了一幅图解,附以解释性的注解,来说明日本问题,并显示我们能以武力保卫我们在满洲和朝鲜的利益的可能性。我把这幅图解和注解全部复制于下:

“这幅图解显示日本对于战场的比较有利的形势。它的基地——的确,即它的整个国家——距离我们的海岸只有大约六百英里海路,距离朝鲜只有一百三十五英里。

“我们在亚洲的领土如此广大,人口如此稀少,因此我们将不得不以欧洲俄国(这里距离战场有三千四百至六千英里)作为我们的基地。为了对日本进行持久战,单轨的西伯利亚铁路将不能满足需要,是明显的事。我们将被迫铺设第二条轨道,并增加在二十四小时内通过列车的数量。而且,由于这条铁路有相当长的距离

① 四平街、公主岭和宽城子。——编者

② 1903年。——编者



俄国和日本的战场位置图

是沿着中国边界并通过中国领土铺筑的，因此，万一在同中国和日本同时作战时，是不能依靠它的。”

我们是离不开这条铁路的，离开铁路，就要冒得不到供应的风险。我们的野战炮和笨重的四轮运输车不能通过大部分的山路。夏季的雨水使携带有笨重的行李车和炮兵辎重的军队行动极端困难。一门大炮，需用二十匹马来拉；甚至空的运输车也必须由人来拉。但是在我们所有的困难中，日本人在战争刚开始时所取得的完全的制海权产生了最大的困难。他们使用了三个军，切断旅顺口与我军的联络，并开始从这个被包围中的基地向我军进攻，这时我军仍然被束缚在铁路上。我们为了解救旅顺口向南的进军，受到以朝鲜为基地的黑木(为楨)的军队的威胁。要对黑木采取任何行动，是绝对办不到的，特别对于那些从俄国来的军团来说是如此，因为他们十分不习惯于丘陵地区。我们对于通过满洲的交通线的防护是脆弱的，任何时刻都可能被中国人切断，而那些更西面的交通线，也是容易被阻断的（桥梁被摧毁、罢工、严寒、等等）。我们军队的粮秣是依靠当地物资来供应，而怀有敌意的居民能够容易地把这些物资隐藏起来、运走、或甚至摧毁。由于从俄罗斯得到的供应品数量极少，而且是不可靠的，我们的军队很容易地会有陷于饥饿之虞。在鸭绿江和得利寺的遭遇战中，我们最可靠的军队被打败了，这更进一步地提高了敌人的士气，并降低了我们的士气。

由于我们的军队中缺乏适当的尚武精神，以及在军队中流传的许多反对战争的煽动性的宣言的恶劣影响，由于很多部队在最初的战斗中所表现的不坚定，以及由于上面提到的所有其他缺点，因此，我必须完全坦白地说：为了打败被激励得狂热地兴奋到极点的敌人，必需要有一支在数量上具有很大优势的军队。但是待到 we 获得这种优势，为时已太晚——这时我们正在四平街阵地等

待着，而和平谈判正在朴次茅斯进行。按照营的数目来看，迄至12月为止，我们似乎有相当多的部队参加战斗，但是这些营的名额大大地不足，因为在战争的最重要的早期阶段——从5月至10月——我们损失了很多士兵，而只得到少量的补充部队。在许多情况下，日本人的营比我们的营强大两倍。我们所有的战斗都由于对敌人的情报不充分而受到牵制，而我们接到的关于我们后方——蒙古和满洲各省——情况的情报是如此惊人，因此迫使我们分派一支大部队去保护我们的交通线。而且，当敌人完全控制了海上交通时，我们还必须分派足够的军队去防守符拉迪沃斯托克区和乌苏里区，以防敌人登陆。所有这些事情使我们的处境复杂，并在战争开始时给予敌人以主动权，而他们的整个国家非常勇敢地努力夺取他们的利益。他们的陆路交通是安全的，他们同他们的基地的海上交通是迅速的和可靠的。而我们则与之相反，只能把我们的陆上军队的一小部分投入战场，而且在我们能够集中足够的士兵以便进攻以前，只能限于采取一定的行动方针。我们做了以下几件事：

1. 保证并保护正在调来的增援部队的集中，以便不让他们在调来时被摧毁。
2. 采取步骤解救旅顺口。
3. 在我们的后方维持秩序，并防守铁路。
4. 供应军队——主要依靠当地的供应。
5. 防守乌苏里区。

如果日本人占领了我们的交通线，那么，就会发生军事史上空前未有的大灾难。即使日本人在战场上没有取得任何胜利，只须破坏了在我们后方的铁路，并切断当地物资的来源，就会使我们受到饥饿的威胁——这就是大灾难。这些就是我们战斗了十五个月之久所处的不利境地。我们的军队不仅没有被完全地打败，而且

力量成长起来了,而我们同俄国的交通线逐渐地得到更好的保证,并且更有效率。我们曾经始终认识到被赶回哈尔滨和哈尔滨以北的可能性,但是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而我们仍然固守着四平街。ii. 38
只有一种办法能够改善这种形势——迅速集中足够的军队,在全线采取攻势。当这些军队正在集结时,如果每一次的战斗——其实际结果是完全互不相关的——都能削弱敌人,它就会真正地帮助我们。但是,在战争开始时,我们就开始背离了我们已经接受的作战计划。这时,扎苏利奇将军不是打一次后卫战,而是同黑木在鸭绿江沿岸的全部军队进行激烈的交战,并且被打败了。

在5月份,当西伯利亚第三师^①单独到达辽阳时(阿穆尔沿岸军区的军队除外),总督担心旅顺口的命运,命令我朝鸭绿江方面采取攻势,进攻黑木的军队,或向南进军,以解救旅顺口的要塞。但是,什塔克尔伯格将军向前推进的兵力不足,由于不知道日本人拥有优势兵力,在得利寺陷于苦战,并且被打败了。由于西伯利亚第四军团的所有部队和第十军的一个师的到达,看来似乎可能做到下面几点:牵制黑木的军队,在大石桥的方向迅速地集中五十至六十个营,试行猛攻奥(保巩)的军队,把它赶回南方去。看来似乎我们的军队有了在内线作战的极好机会。敌人沿着三条战线前进——大连、盖平、大石桥一线(奥);大孤山、岫岩、大岭(音译)、海城一线(野津〔道贯]);鸭绿江、凤凰城、分水岭、辽阳一线(黑木)。我们占据着中央的位置——辽阳、海城、大石桥——把前卫派到前面的分水岭高地。我们可以用佯攻牵制两路敌军,欺骗敌人的办法,集中力量打击第三路敌军。由于我们对山地战缺乏训练和没有准备(我们没有山炮,我们的辎重是沉重的,而且由于运输工具不足,我们没有把握能得到供应),打击黑木或野津恐无成功之望。ii. 39

^① 在它之后到达的是:第二步兵师、第十和第十七军团、西伯利亚第五军团、第一军和西伯利亚第六军团。

其他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打击奥(他的军队以铁路为基地),但是这样的作战是要冒风险的,因为黑木和野津可能会打退我们的掩护部队,并向我们的交通线进攻。6月26日和27日,当只有第十军
ii. 40 团^①的第三十一师的一个旅到达辽阳时,在东线的日军(黑木和野津)采取了攻势,并夺取了分水岭高地上的几个隘口(分水岭、莫都岭〔音译〕、达岭〔音译〕)。我们抵抗他们的兵力不足,甚至未能使他们暴露他们兵员的数目。东路军的部队向特哈沃普退却,而列维斯塔姆将军的部队则向析木城退却。这样,我们的掩护部队的位置如下:在黑木的进军线上,距离海城仅有二日行程;在奥向大石桥的进军线上,距离辽阳有四日行程。^②我们的阵地是危险的,如果我们接到的情报被证实,即日本人要进攻海城,正在集结相当多的部队,则情况尤其是如此。虽然如此,如果我们能够迅速地打击奥,我们就可以剥夺敌人的主动权,而在迫使奥的军队后退以后,可以向野津进攻。在我们把这些路敌军赶回去以后,黑木的阵地就将过于突出,同其他敌军隔开过远,因此他突破防线进攻辽阳的危险就将减至最小限度。但是为了进行这样的决战,首先的必要条件是要集中足够的军队,以便进攻奥。

在6月底,我们可以用来对付三路日军的军队一共有一百二
ii. 41 十个营,不论在营的数量上还是在士兵的数量上都比敌人居于劣势。由于我们在大石桥的军队中发生了痢疾传染病,死掉了相当多的士兵,使我们的地位更为恶劣。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团^③是最大的受害者,在6月底该团因传染痢疾而病倒的士兵达一千五百人之多。但是,耽误我们进军的主要原因是下雨,这使一切行动都困难,而且有些地方运输是绝对不能通行的。甚至把供应品运送

① 第十军团的先头部队于6月30日到达。

② 距离辽阳六十英里,由于下雨之故,道路非常难走。

③ 这是一个欧洲俄国的团,辖有四个营。——编者

到我们的距离不足一日行程的各个驻军点也是困难的。尽管缺乏驮鞍,还是不得不放弃车辆运输,改用驮载运输,然而即使是牲口驮载,在二十四小时内也不能走到七至十一英里以上。在辽阳至浪子山的道路上,情况更坏,因为山间小河上的桥梁都被冲毁了。东路军(在凯勒伯爵指挥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与辽阳之间的交通中断了一些时候。因此,指挥着西伯利亚第一和第四军团的军官们不但没有准备进攻,反而在以口粮供应他们的军队方面遇到极大的困难,并且于6月29日请求向铁路附近的大石桥阵地撤退,并请求把铁路以东的地区留给骑兵防守,只留少数的步兵部队予以支援。^① ii. 42

凯勒伯爵将军坚持要求,他的部队与辽阳之间的交通应予保持,但是我们既没有材料和交通工具,也没有时间来依从他的愿望,这愿望就是意味着要铺设一条轻便铁路,并加固道路上的桥梁。由于我担心日本人可能会再一次向海城进军,因此我命令三十九个营于6月29日在析木城附近集中。从海城出发的短距离进军于28日完成了,由于道路一片泥泞,行军极为困难。29日,由于山洪泛滥,析木城被暂时地切断联系。以粮食供应集结在那里的军队是如此困难,因此刚一得知敌人不但没有前进,而且已向分水岭(隘口)退却的消息,某些部队就奉命返回铁路附近。7月18日,我们利用由第十七军团的一部分所组成的掩护部队,企图对黑木的一部分军队进攻,希望我们的军队能强行推进,并能获得部分成功。凯勒伯爵拥有在他指挥下的四十三个营,来实行这项计划,但是这个企图失败了。他在我们的任何大量的军队参加交战以前,就停止了战斗。29日,奥的军队采取了攻势,我们在进行微弱的抵抗以后,不得不撤出大石桥和牛庄,并听任奥和野津会师。当我在7月23日检阅第十军团的部队(他们正在防守胡家子 ii. 43

^① 我于6月20日的报告。

〔音译〕附近的阵地)时,我发现刚从俄国来的部队是如何绝对地不能在丘陵地区作战。在把他们派到前方去以前,必须训练他们从事山地战斗,并以驮载运输队供应他们。7月31日,所有的三路日军都向我们进攻,我们在进行了一系列战斗以后,集中于辽阳周围。尽管我们进行了抵抗,但三路日军还是能在这里会师了。他们向太子河左岸的进攻被我们击退了,但是由于我们在右岸的战斗的不幸的性质,环境对我们是如此不利,因此我被迫下令向奉天退却。我们实行这次撤退,没有损失一门大炮或一辆运输车,而敌人损失的士兵,比我们损失的士兵还多。我在前面三卷关于辽阳、沙河和奉天的战斗的书中所作的详细叙述,已经解释了我们的困难和我们战败的原因。事件的经过显示:我们原来的作战计划是一种十分正确的预测,因为在这个计划中,有可能必须向哈尔滨退却这一点,已经预见到了。的确,对我们来说,在辽阳、沙河,尤其是在奉天的情况,很有可能要比实际发生的情况坏得多,而且早在1904年10月,我们就很有可能必须退到哈尔滨,而事实上,那时我们还留在满洲南部。

克劳塞维茨曾经正确地主张:一支军队应该同它的基地不隔地联系着,但是我们的基地是俄罗斯,远离五千多英里。单单为克服这一困难而作的种种努力,其真正价值或许最终会得到正确的评价。随着这一困难而来的非常复杂的情况,要求全国上下作出极大的和耐心的努力,以便使这些情况转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的失败是能够加以解释的,而且即使在我们的失败中我们仍然消耗了敌人,而我们自己的力量却日益增长。一旦环境变得对我们更为有利时,事物的面貌将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形势。

在编制方面的困难

这次战争显示:同我们规定的部队的总人数相比较,我们军队

编制给予我们的实际战斗人员的百分比是太小了。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尽管在困难面前我们维持着庞大的人数，我们却不能把足够的士兵投入战斗，以求胜利。在这次战争中，由于缺乏任何有组织的保护交通线的部队，由于必须进行大量的铁路建筑工程，由于必须指派军官们和士兵们到新成立的供应和运输部队中去，我们的各兵种、炮兵辎重队、医院、运输队、战地炊事班、参谋部门和所有的办事处和机关的编制（非战斗人员在其中占很大的百分比）大大地膨胀起来了。即使如此，在各个单位的编制中所规定的非战斗员的人数，还不足以执行它们需要承担的任务。由于下面将要提到的种种原因，分派战斗员去执行内部任务，就成为必要的了。由于在战斗中只有很少的非战斗员受伤，因此在每一次大的战斗以后，他们对于战斗员的比例就更大了。当一次战斗即将来临时，通常的办法是命令所有执行团外任务的士兵都回到他们原来的部队去，但是尽管采取了所有这些步骤，参与战斗的人数从来没有超过士兵名册上的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五。在1905年4月初，当我们正在为一直延伸到松花江的战场作准备时，满洲第一军的战斗员人数实际上降到士兵名册总人数的百分之五十八。当然，象以前的各次战争一样，步兵担当了绝大部分的战斗，并且也承担了过多的杂务和额外任务。由于步兵在战斗中也损失更多的士兵，因此他们的战斗力量在比例上比其他兵种减少得更多。^①在1905年4月，满洲第一军中来福枪兵在规定的士兵总数中所占的百分比为百分之五一·九。当士兵康复后回到队伍时，该军的兵力到12月初共计为十九万二千名士兵，其中有十万五千八百七十九名士兵是来福枪兵；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任务、杂务等等，我们只能把数

^① 据满洲第二军的指挥官说，他的部队的全部战斗力量（来福枪兵、骑兵、炮兵的总数〔一门大炮配备二十五名士兵，一挺机关枪配备十名士兵〕）平均只构成实际人数的一半。

目小得多的士兵投入战斗。在 1905 年 8 月,该军来福枪兵人数为规定的士兵总数的百分之五八·九。

ii. 47 为了消除这种状态,并保证各连在战斗时应尽可能地强大,我于 1905 年 6 月 9 日〔当我在指挥满洲第一军时〕下令规定:每一个辖有四个营的团,派出执行额外任务的战斗员,不得超过三百六十九名。这个数目中包括一百二十八名抬担架的,三十五名乐队队员,四十八名行李警卫兵。除上面这些人外,下列许多工作,如交通线上的筑路、建桥工程,各仓库的警卫兵,协助供应和医疗业务的工作队,维持各村落的治安,与临时成立的运输队一起执行任务,等等,还需要大量的人。的确,这样做可以得到补偿,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第二类的预备役士兵从队伍中清除出去;但是这样我们也感觉到在我们能投入火线的来福枪兵人数方面的损失。当然,此外还有在部队里和在医院里的患病的、受伤的和在康复中的士兵。这样,被分类为战斗员但不在火线或不做战斗员工作的所有各级官兵的总数,在每一个辖有四个营的团里,平均共计达八百名,或约为其兵力的四分之一。如果没有适当地组织起来的保护交通线的部队,没有足够的宿营警卫兵,不筑路和建桥,不准许士兵从事于运输和保护行李的任务,要继续进行战斗,是不可能的事。尽管我们提供优厚的报酬,当地人并不爽快地前来工作,尤其是当战斗即将来临的时候。在运输方面雇用了一些当地人,但是他们非常不可靠,听到第一次警报就会逃走,而且常常把他们使用的马匹和车辆带走。例如,在奉天战役中,第一军所雇用的由四百辆车组成的全部运输队,就完全地失踪了。我们获得俄国雇工的

ii. 48 企图失败了,虽然我们提供的报酬是非常慷慨的。

运输任务对削弱军队的战斗力量应负责任的程度,可以从这个事实看出来:在进行战争的十五个月中,共组织了一百二十二个运输队,并购买了八千六百五十六辆车、五万一千匹马和二万头驮

载牲口。为了从事这些运输任务，派出了三百二十八名军官、二万二千名士兵，雇用了一千七百名平民(俄罗斯人)和九千八百五十名中国佬。这一百二十二个运输队是在不利的情况下由少数干部临时组织起来的，由于它们不得不在匆忙中建立起来，因此，除了从军队中指派士兵和军官去运输队之外，别无他法。

各部队的兵力在战斗中也极为奇怪地减少了。这部分地是由于伤亡，但常常也是由于这个习惯：士兵们离开火线把伤员抬送到后方去。有的时候这是得到准许的，有的时候则并未得到准许。而且，常有这种情况：士兵们并没有这种借口，但却退下了火线。

我曾经指出(在第七章中)：我军没有及时地获得补充兵员，因此不得不在兵员不足额的情况下作战。由于下列原因，这种不足额的情况更进一步地有所增长：一个连的战时编制是二百二十名来福枪兵，但是从这个数目中必须除去各部队到达前线时的缺额、^①病员、和分派从事营地和其他任务的士兵——这种程序虽然 ii. 49 在“条例”中并无规定，但是这是指挥官们所准许的。因此各连进入第一次战斗时，常常只有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名来福枪兵的兵力。长时期以来，指挥官们为了保证部队在出战时尽可能地强大而行使的个人监督非常松懈。反之，看来似乎他们的努力完全与此相反，因为他们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可能就要把士兵(尤其是最需要的人——即负责发放军饷和定期分配口粮的人)留在后面。这样，除团的副官外，团的参谋人员很少参与战斗；而被分为战斗员的士兵，如各连的文书、军械士、炊事兵、军官们的仆人勤务、屠夫、守护牛群的卫兵和军官们的马夫，总是留在后面的。为了组织骑兵侦察队，调走了一些士兵，而抬担架的和乐队队员当然是不参与战斗的。最后，由于满洲地区的特殊性质，每一个连都备有若干头驮水的驴，这些驴需要有人照料它们；此外，由于我们的交通不

^① 在某些部队中，这种缺额总计高达百分之二十(士兵)和百分之三十(军官)。

ii. 50 安全，每一个团必须分派一个或两个整连作为行李警卫队。指挥员们认为，为了上述种种目的，把如此之多的士兵留在后面是必要的，因此对于规定这些人要上火线的命令，不是完全予以忽视，就是仅仅不完全地执行。不久就发现，每连八个抬担架的抬送伤员是太少了，因此准许队伍中的士兵帮助抬送他们受伤的伙伴到后方去。由于这个原因，在一次战斗中某些连就真正地消失掉了。可以举出许多实例，在这些例子中，不受伤的士兵在抬送伤员的借口下到后方去，其比例为六个、八个、或十个不受伤的士兵对一个伤员。这些自愿的帮助者回到前线，就不如设想的那样迅速及时，并且是难以控制的。其结果是，一个激烈地交战的连，在几小时的战斗以后，通常只剩下一百名或不足一百名来福枪兵，虽然其伤亡可能不是很大的。

在这期间，由于我们只要求补充兵员能使各连补足战时编制，而没有考虑到上述的额外漏洞，因此我们获得补充兵员以后，并未能使各连补足它们应有的作战兵力。

为什么在战场上的交通线^①从我们的战线吸取如此大量的人员呢？其原因是：我们没有专门的交通部队，因此为了建筑轻便铁路、道路和桥梁等工程而必需的大量工程队不得不从战斗部队调派。我们能够从事战斗，同时又能铺筑几百英里长的道路以供各军团之间互相联络之用，完全是由于我们小心地挑选了交通线上的指挥官——尤其是在工程师中间的指挥官。例如，在1904年年底和1905年年初，当第一军在浑河以南时，在十八万人中，有七千人派往交通线上。1905年7月初，当第一军的兵力增长到二十五万人，而交通线向后延伸一百五十英里达到松花江时，有一万人在交通线上从事工作——即这一军的兵力的百分之四。在四平街阵地上，单是由第一军建筑的道路，其长度共计达一千英里，道路上

^① 各军后面和各军之间的交通线。——编者

有宽二十多英尺，跨距五十英尺的桥梁几座，此外，并建筑了大约四十英里的堤。虽然这些工程中大部分是由雇用的中国劳工做的，但即使在这比较平静的时期，第一军的军队从事于工程的时间达三万个工作日。

如已经提到过的，供应部门也吸收了大量的人员。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战地供应部由于缺乏人力，不能办理烤面包的食堂。因此，所有的食堂都由部队接收下来，这样，部队就不得不建造烤炉，购买面粉，并自行烘烤面包。就这样，到达哈尔滨和辽阳的八个战地面包房（其中有四个在辽阳），既无运输工具，又没有人，最初不得不由军队接收下来。但是，从1904年5月份起，总督坚持，食堂的大部分工作应交还给供应部。由于需供应的人数继续不断地增长，而运供应品的火车数量不足，供应部开始发现它自己处于困难的境地，战地监督官古伯将军很有活动能力，在当地获得了供应品，把它从困难境地拯救出来。古伯将军在巴钦斯基将军和安德罗将军协助之下，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一切资源。为了这方面的工作，又必需有一些军官和士兵来守卫供应仓库以及搜集和护卫牛群，这些军官和士兵仍然是从战斗部队中调派。大部分的饲料和肉食是由部队自行觅取，但是这样就需要设立强大的饲料队，这些饲料队在野外走出很远，并且常常在远处逗留相当长的时间；此外并需设立常设警卫队，来看守各团的牛群。当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部队集中在满洲时，他们留下若干士兵在后方，作为“基地分遣队”，以看管他们的建筑物和财产。在整个战争期间，在这些基地分遣队和在前线的部队之间始终保持着接触；在冬季部队从基地分遣队那里得到他们的保暖的衣服，在1905年夏季又把这些衣服送回给分遣队。所有这些都意味着要使用士兵。最后，还必须分派士兵们从事测量地形的的工作、侦察，并作为军官们和其他人的护卫队，等等。

把执行所有上述任务的人数加在一起，再加上留在部队里的伤员和病员，其人数每团平均达四百至五百人之多。这个数目，加上上面提到的准许“使用”的三百六十九人，使总数增加到八百人。显然，在评价军队的战斗工作时，必须考虑到人数方面的如此巨大的丢失。

促使造成这样结果的其他情况是：各种参谋部门和行政机构、附属机关（例如供应辎重队和医院）的极大的发展；道路上由于大量行李聚集到一起而引起的交通拥挤；由于丘陵地区和到处泥泞，以致我们的车辆和驮载牲口运送的东西比原来设想的要少。在激烈的战斗以后，我们的军（特别是由只辖有三个营的团组成的军）
ii. 54 的人数总计只有少于一万名至一万五千名来福枪兵，然而，为满额的军团而设的庞大的组织、军事辎重队、行李、运输队，等等，仍然须加警卫。甚至团的军旗（在战斗中这应该是力量和鼓励的源泉）在许多情况下过早地由一个连或半个连的士兵护送到后方去，在前线的军队在战斗的最重要时刻由于减少了这些士兵而缺乏战斗力。我被迫作出项规定：在战斗时，各团的军旗应由团的预备队保管，并应采取步骤，使这些军旗对于拥有它们的部队来说，在战斗的最危急阶段应成为胜利的象征（象在过去各次战争中的通常情况那样）和力量的源泉，而不是示弱的根由。

在1905年9月和10月，我们组成了三个满洲军（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三军），而不仅只有一个满洲军了。它们都是打算在奉天地区作战的，并且都是以同一条铁路为基地，这条铁路构成了它们的共同的交通线。各军指挥官的权力由条例加以规定。给予各军指挥官的权力（《1890年战地勤务条例》），几乎与以前授予总司令的一切权力相同。关于战斗，条例规定：“在指挥战斗时，各军指挥官应受总司令的训令之指导，但应独自行动。”在欧洲作战时，给予
ii. 55 各军指挥官的这种自由可能是非常合适的，在那里每一个军会有

它自己的不受他人控制的交通线；但是在奉天的现有条件下——一个共同的阵地和一条共同的交通线——以及在各军指挥官之间对于处理事情存在着不同看法的情况下，这样安排至少是极端不合适的。对于某些重要事情，或许是容易发生不同意见的，这时就必须：或是命令军的指挥官进行一次他认为是不必要的、不合时机的、或甚至是危险的战斗，否则就请求把他撤换掉。例如，我们于1月25日采取攻势的两周以前，在一切事情都已解决，所有的计划都已拟定以后，格里彭伯格将军突然提出他的意见，使我十分惊奇。他的意见是：这次战役是失败了；我们应向哈尔滨退却，固守那个据点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从那里以两个军向其他方向移动。向哪些方向，他不能加以解释。总司令对于许多要点的训令，例如固守不连接的战线的危险性和各军拥有强大的预备队的必要性等^{ii. 56}等，各军的指挥官都不执行，因为固守各军占领的防御阵地的责任是由各军的指挥官承担。因此，我想从第三军至少抽调出二十四四个营——如果不是第十七军团的全部的话——编入预备队的企图失败了，因为那一军的指挥官认为，如果第十七军团的若干团（这些团的位置在阵地的前头）被西伯利亚第六军团的预备队的团替换的话，他在中央的阵地就将是不安全的了。如在关于第十四步兵师在黑沟台作战的叙述中提到过的，尽管我发出训令，要把我们攻击敌人左翼的意图尽可能久地隐蔽起来，但是格里彭伯格将军，既没有明显的理由，而且甚至没有请求批准，在我规定的时间几乎两周以前就采取了攻势，于1月13日调动第十四师向四方台（在沈旦堡高地上）移动，并于16日将第十军团开入第三军右翼与浑河之间的前头阵线。这样，在我们开始前进运动以前，敌人就知道了我们的意图，而第二军的战线则伸展达十三英里。

除利涅维奇将军外，我们的军长们对于干涉他们的权力都不^{ii. 57}必要地敏感，在某些情况下，以前可以发给军团长的命令，现在就

必须考虑到军长的个人意见，并且谨防伤害他们的敏锐的感情。在格里彭伯格将军离开军队时的盛大仪式和列队欢送以后，各军军长们和总司令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起来了。他们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他们的权利，他们是如何奇怪地解释他们自己的权力，从下面的事件可以说明：2月19日，我请三位军长和他们的主要参谋官们来开会，弄清他们对于作战计划的看法，这项作战计划是在由于旅顺口陷落和格里彭伯格将军在黑沟台的不成功的作战而引起的不利情况下应该着手实行的。乃木的军队，在关东半岛不再需要它的情况下，下面几条进军路线可供它选择：它可以同已在战场上同我们作战的四个军会合；它可以连同在日本组成的若干个师和在朝鲜的军队，组成一支拥有七十至八十个强大的营的军队，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进攻；或者，它可以在波谢特湾登陆，向吉林和哈尔滨进军，以便包围我们在奉天的阵地。我也继续不

ii. 58 断地接到奇恰戈夫将军的报告，其大意是说：敌军已侵入蒙古，而且在许多帮的红胡子帮助下，已开始攻击我们后方的铁路，这些报告迫使我分派一个步兵旅和四个哥萨克团去增援铁路警卫队并保卫我们的阵地，这就削弱了我军的力量。尽管有这些报告，利涅维奇将军和考尔巴斯将军表示这样的意见：我们不应改变我们的计划，而应执行我于1月25日发出的命令——即攻击敌军的左翼。但是，当我的参谋长问第二军军长——这次战斗要由他开始——他建议怎样使用他的骑兵时，考尔巴斯^①认为这个问题是干涉他的权力，恼火起来，并且说了许多不必要和离题很远的话。象后来证明的那样，参谋长有充分理由为使用骑兵担心，因为在奉天战斗中骑兵的工作决不是令人满意的。

在关于授予勋章方面给予各军军长的很大权力，既是不必要的，也是有害的。他们被授权根据他们召集的委员会的推荐授予

^① 他继格里彭伯格之后担任第二军军长。——编者

第四级圣乔治勋章；他们能够授予士兵们以殊勋十字勋章；授予第 ii. 59
二、三、四级圣安妮勋章；授予第二、三级圣斯塔尼斯拉夫勋章，连
同军刀和绶带。由于各军的驻扎地点是如此接近，因此不久就注
意到，各军颁发勋章的情况大有差异，根据不同的指挥官的个人倾
向性而有所不同。在某一个军中，他们是如此慷慨地颁发勋章，以
致激起了普遍的嘲笑，因此勋章的意义被大大地降低了。在这一点
上，最坏的冒犯的人是一位著名的将军，为了同一次战斗〔黑沟
台战斗〕他就授予若干军官们每人两枚勋章，而且，他违反条例的
规定，在每一个连和每一个炮兵中队中授予十五名以上的士兵以
殊勋十字勋章。我在日记中记下了我在检阅第二军的若干部队以
后的印象。在其他事情之中，我注意到他颁发了三十枚殊勋十字
勋章给一个炮兵中队，在这个炮兵中队中，只有七十名士兵曾参与
战斗，而且即使在那个时候也几乎没有遭到过炮火攻击。的确，使
我惊奇的是，当他们列队接受检阅时，排在前面一排的士兵几乎全
部都佩戴着十字勋章。指挥官告诉我：宣布给这些士兵这些奖赏，
还不得不试图为他们挑选出某种特殊的条例，使他感到不好意思。
我告诉这些士兵们：我希望他们在未来的战斗中将表明他们自己
是值得佩戴这些特殊功勋的标志的。

ii. 60

在只有一条铁路而且只能从一个地区获得供应品的情况下，
各军军长在关于供应方面所拥有的巨大的独立的权力也是多余的。
唯一的结果是：由于各军竞相出价，价格全面地抬高了。在这
方面，格里彭伯格将军的行为是最不可理解的。由于在 12 月份肉
类非常缺乏，我劝告他把肉的配给量从一磅削减为二分之一磅。
他不但不这样做，反而于 1 月 3 日发出一项命令，把肉的配给量增
加为每人每日一又二分之一磅。根据在沙河一般地获得的种种条
件，而且如果我们的军团是在较广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话，那么根
本就不需要三位拥有特殊权力的独立的军长。但是，事实上是

任命了三位军长。然而，在奉天的惨败以后，一般都认为总司令应为一切承担责任。

人员方面的缺点

ii. 61 关于人员方面，我将把我在这次战争的经验记忆犹新时所写的关于满洲第一军的报告中记载的种种印象全部写在下面。我的意见大体上同其他高级指挥官们的意见相同。

(a) 指挥——现在不能(或者,的确,不应该)对高级指挥官们——这就是说,个别的军团长、师长和旅长们所做的工作——作出评价。个人的要素太突出了。我们必须等到个人的感情平息下来,才能根据确凿的事实得出公正的结论。至于发生了什么事情,谁应该负责,只有根据事实。虽然如此,我们可以说:我们的高级指挥官们中间的最显著的弱点(特别是在这次战争的初期)是:缺乏主动性,不知道指挥进攻的方法、缺乏决心。在若干大部队作战时,从来没有任何协作,这些部队之间绝对不联系的情况,真正是十分惊人的。对于邻近部队的处境漠不关心,是习以为常的。在一次战斗没有真正战败以前就趋向承认失败是令人痛苦地明显的。即使是我们最好的指挥官们,也宁愿他们的邻近部队被派去进攻,而他们自己则留作支援部队。如果一支纵队在困难处境下退却,在附近的任何其他部队也将撤退,而不是赶来支援它。而且 ii. 62 实际上没有一次勇敢地进军的例子。团级指挥官的工作无疑要比团级以上的指挥官的工作好一些,但是不注意到下面的缺点是不可能的:他们没有充分利用形势并从中找出办法的能力。一位被派执行特殊任务的团级指挥官,如果得不到总参谋部的一位军官的帮助,就难得能够作出他的部署。通常他不亲自看地图,更难得教导他的下级怎样看地图。在战争初期,情况尤其是这样,并且对于指挥战斗有相当大的影响,因为各团常常或是到达集合地点时

为时已晚，或是开到并不需要它们的据点。我们的军官对于地形缺乏观察力，一定程度上可用这个事实来解释：他们十分不习惯于山地环境。虽然随着时间的消逝这个缺点无疑越来越不明显了，但是在奉天周围的战斗中，它仍然可以看得出来，甚至在以后也还是如此。

虽然军官们缺乏适当的尚武精神，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一般地是好的，尤其是正规军的军官们。第一军从1904年11月至1905年9月蒙受损失的数字，提供了他们的英勇精神的最好证据。从这些数字可以看到，他们死伤的比例，比士兵们的死伤比例要高得多。

	军官		士兵	
	人数	平均人数的百分比	人数	平均人数的百分比
死	167	4.1	4,779	2.5
伤	905	23.8	27,425	14.6
失踪	89	2.1	5,684	2.9
	1,151	30	37,888	20

ii. 63

第一军在战争的整个时期的损失要高一些：

	军官	士兵
死	396	10,435
伤	1,773	56,350

除志愿上前线的人外，预备役的军官远不及正规军的军官那样合格。他们在战术训练方面比正规军军官落后很多，而且并不总是热情地执行他们的任务，而现役军人则是应该表现出这种热情的。预备役的许多掌旗官被证明是不能令人满意的，他们接受这个职位，完全是在动员时为了逃避成为士兵。他们对军职没有同情心，并且憎恨服兵役。他们完全没有受过训练，而且他们之中的某些人在士兵面前毫无威信。由于特殊功劳而从士兵提升的掌旗

ii. 64

官和代理掌旗官^①，在各方面都是极好的。由于他们是从士兵中挑选出来的，他们通常都重视他们的职位，并且在士兵中享有相当高的威信。他们同军官们相处很好，并且被证明是连长们的有效率的和勤快的助手。代理掌旗官为执行任务而自我牺牲的程度，由下面的事实可以得到证明：在2月份，第一军中的六百八十名代理掌旗官中，在奉天战斗中死伤的有一百九十二名——即占百分之二十八以上。军官们的品格是十分令人满意的，在战争的整个时期中，只有十九名军官由于不好的行为而被免职。大多数高级指挥官们在评论总参谋部的军官们所做工作的报告中表示这样的意见：他们的理论训练和智力是高水平的，他们的工作是不自私自利的，但是他们同部队没有充分的接触，并且缺乏亲身经历的、实际的知识，要使他们能适当地判断可以期望士兵们做到什么程度以及一项命令要以什么方法来执行，是需要这种知识的，而且如果在传递命令等工作中要避免小的错误，这种知识是必需的。他们

ii. 65 建议，为了给予这些参谋官以必需的实际训练，他们应该在所有三个兵种的部队中做大部分工作，而在参谋部门只做一部分工作。而且，为了防止他们被部队看做只不过是抄写员，应该把他们从现在归总参谋部承担的大量抄写工作中解脱出来。象其他军人团体那样，在这些参谋官中，可以发现有一些人特别适合于野外工作，而另外也有人则宁愿做纯粹的参谋工作。我的意见，应该把这两种人分开。一般地说，在第一军中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完成了要求他们做的一切工作。从1904年11月至1905年9月，他们在死、伤方面的损失共计为他们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二。如果把在第一军组成以前的死伤人数计算在内，则百分比高达二十五点七。在整个上述时期内，只有四名参谋官由于患病被送回俄国，而受伤的则大部分都回到前线。

^① 或军士长。

至于高级指挥官们，许多将级军官在和平时期曾经非常成功地指挥过独立的部队，可是在战争的紧张环境下，就完全不适合于指挥大部队。高级指挥官在实际指挥若干师和若干个军团方面甚至也没有几个有充分的平时实践经验，而大多数人则对于现代战争需要的东西缺乏最新的知识。大多数人所表现的一般特点，是 ii. 66 缺乏作出决定的能力，和不愿承担责任。某些人来到前线，实际上担任重要的指挥职位，对于这种职位，他们是完全不适合的——或是由于健康不佳，或是由于其他原因。由经验丰富的团组成的三个军团比其他部队较早来到战场，在三个军团中，最初几次战斗以后，就有一个军团长、四个师长和几个旅长辞职或被送回俄国。在造成作战的指挥复杂化的各种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常常更换总司令，在十九个月中，有过三个总司令。从战争开始至 1904 年 10 月底——八个半月——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担任总司令；从 1904 年 10 月底至 1905 年 3 月中旬——四个半月——我担任总司令；从 1905 年 3 月中旬至战争结束——六个月——利涅维奇将军担任总司令。

去年以小册子和报纸上的文章——显然写这些东西的唯一目的是要证明，既作为总司令又作为陆军大臣的我是应为我们的不幸承担主要责任的人——泛滥于俄国的那些人是不考虑这个事实的：在十九个月中，我担任总司令的时间只有四个半月，而这段时间是处于战争的中间阶段。我于 1906 年 2 月 21 日从双城堡村 ii. 67 (音译)奏呈沙皇的信中，谈到这一点，内容如下：

“我知道报纸上对于我的严厉责难。虽然在这些责难中有许多是我不屑于答复的，我应该为降临到我们头上的灾难乐于承担全部责任，但是这么办在历史上将是不正确的。这么办也将是一项错误，因为这样将降低全军的普遍愿望，即：彻底研究我们局部失败的一切原因，以便我们将来能够避免

它们。

“我敢于冒昧地说‘局部’失败，因为不可能这样说：我们在满洲的陆军遭受到象舰队那样的失败。当缔结和约时，我们拥有一支几乎有一百万士兵的军队，仍然固守着在奉天战斗以后被我们占领的阵地，并且不仅为了防御，而且为了一次最为活跃的进攻而作准备。

“从日本送达我们的情报表明：日本为它的陆军吸取兵员的来源已经枯竭；它的财政业已完全耗尽；在它的人民中间，对拖长了的战争的不满情绪已经表现出来了；由于这些原因，它的陆军面对我们的优势兵力，已没有获得进一步胜利的希望了。因此，对于我们的一切弱点进行最仔细的和最彻底的研究，并不能动摇军队中的普遍信念，即：只要战争继续下去，我们在满洲的军队就会取得胜利。

ii. 68

“下面这个问题，须由将来的历史学家去决定，即：为了取得胜利，我们在1905年3月以前投入战场的军队是否足够了。

“现今，由于现代军队的组织复杂，最高司令官的个性，已不象从前那么重要了。如果没有可信任的、能干的和精力充沛的部下，如果各级军官没有主动精神，如果没有优势的兵力，而且，最重要的，如果军队中没有一种尚武精神，全国上下没有爱国心，那么，总司令的任务是如此困难，以致一位仅仅有才能的领袖是万万承担不了的。或许可以说：一位军事天才可能会克服我们不得不遇到的士气方面和物质方面的种种困难。可能是这样。但是一位阿列克谢耶夫，一位库罗帕特金，一位利涅维奇，一位格里彭伯格，一位考尔巴斯和一位比尔德林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我敢于冒昧地提醒陛下：我在接到任命我为总司令的命

令时,并未高兴地表示我的谢意。我的答复大意是说:只是由于指挥官的缺乏,才使陛下挑选我担任总司令。如果在奉天战斗以后我仍然坚决地相信能获得胜利,那末我这样的看法的确是有充分根据的。”

有一篇标题为《关于指挥官的一切》的文章,写得很聪明,作者写道:

“缺乏主动性,总是依靠上级的习惯,只是在接到上级的命令时才行动,这些都是低级指挥官们的特点,这些特点使军队首脑的工作更为困难。时间要素在战争中的价值也被忘记了。” ii. 69

现代的战略理论家布卢姆说:“即使由最伟大的天才担任最高司令官,也不能代替个别领导者的独立行动。”

甚至还在实际进行战斗期间,报纸上就出现了许多文章,完全是以破坏军官们的名誉为目的。军官们被描述为傲慢自大的、粗暴的、卑鄙无耻的醉汉。的确,我们最有天才的作家之一——**缅希科夫**——在这一点上走得很远,因为他把一大群从来不吝惜他们的生命并且几乎象笃信宗教的人那样虔诚地执行他们的任务的军人描写成为“缺乏责任感、放纵、道德松弛和积习已久的懒惰”的人。在**库普林**所写的标题为《决斗》的一篇恶骂军队生活的文章中,士兵们被描述为被极端残酷地对待的人,文章并暗示:在连队检阅时打他们的士兵是我们军官们的习惯。作者以下面的话作为结语:这个时刻将会到来,那时军官们在小路上将被捉住并被殴打,那时妇女们将嘲笑他们,而士兵们将拒绝服从他们的命令。当然,在大伙军官们中——象在其他阶层中一样——是有若干坏的例子的,但是不能根据这个例子就对整个阶层作出概括。如果在交通线上或在**哈尔滨**看到某些军官喝醉了,就匆匆得出结论说,所有的军官都喝醉了,这是不公平的。应该根据所看到的他们在战斗中、在战 ii. 70

壕里、在行军队伍中的情况来判断他们，而不仅仅根据在后方发生的事情来判断他们，象他们常常被这样判断的那样。但是，坐在圣彼得堡或哈尔滨讲坏话，要比在前线观察情况容易得多。我曾经提到军官们中间死伤的比例很高，这表明他们的英勇精神并没有比以前降低，而且他们无疑地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照管士兵们的福利。他们照管士兵们的伙食、服装，鼓励士兵们，使他们情绪很高。低级军官们是热心的，他们很快就在新的和陌生的环境中站稳了。当他们逐渐习惯于当地的地形时，就能很好地看地图。最严厉的批评家也必须承认：自从俄土战争以来，我们的军官（参谋和团级军官）的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了。

但是，按照这些同样的观察家们的意见，与此相反，在过去这二十七年中间，士兵们却是退步了，因为，士兵虽然在体格方面比以前好了，但在士气方面却比以前坏了。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现役士兵是十分可靠的，但是许多预备役士兵——尤其是第二类
ii. 71 预备役士兵——不论在进行战斗或不进行战斗时，都需严加监督，最难掌握的是来自制造业中心和大城市的士兵。现今，士兵们比以前需要更多的监督，因为在以前，只有少数人是识字的。感谢上帝，迄今为止，我们的军官仍然能很好地控制住士兵，这是建立在互相尊重的基础之上的。但是在这次战争开始时，却有人竭力想破坏这种互相尊重的精神。

基里洛夫和其他人猛烈攻击我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在这次战争中的行为，但是，大部分参谋官极端毫不自私地工作，并且在指挥部队方面或在参谋部门作出良好的贡献。他们其中许多人由于他们对专业的热情和英勇精神而著名，而某些人则在战斗中光荣地为国捐躯。居他们首位的，可以提到康德拉坚科将军，他是旅顺口的英雄。在阵亡的人中，还有英勇的凯勒伯爵将军，参谋官扎波尔斯基、璠门科、日丹诺夫、佩库蒂、瓦西利耶夫、莫杰伊科；在因负

伤而死去的人中,则有安德雷埃夫和亚戈德金。在负伤的人中,则有四位师长——陆军中将伦南坎普夫和康德拉托维奇,陆军少将莱明和奥尔洛夫;此外还有参谋官马科夫、克伦博夫斯基、古特、罗西斯基、格科、因内夫斯基等人。总参谋部共计约有二十位军官阵亡,四十位军官负伤。报纸敌视军官们的态度、各色各样的人要破坏军官们的威信的努力、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对于在满洲发生的事情的漠不关心、尤其是反政府的运动(其目的是在军队中制造叛变),所有这些都不是以提高士兵们的士气,或是鼓励他们作出英雄业绩为目标的。在军队中是没有尚武精神的。 ii. 72

士 兵

象军官一样,士兵分为两类:现役士兵和预备役士兵。前者在各方面都是好的,他们在战斗中坚定,耐劳,并受过良好的训练。但是预备役士兵在各方面水平要低得多。首先,年龄较大的士兵不能忍受战地勤务的艰苦环境和满洲的严酷气候。在炎热天气里在山岭之间行军时,由于中暑和心脏病,他们病倒了许多人。在大石桥、海城和辽阳的战斗中,这些士兵离队的如此之多,以致他们的部队简直不能行动,而且对于任何攻势作战毫无用处。再者,第二类预备役士兵不懂得使用来福枪的方法,并且把他们当现役士兵时曾一度学过的东西全部忘记了,要教育和训练他们,使他们达到现役士兵的水平,需要真正艰苦的工作。我在上面提到过他们的不坚定。几乎完全由预备役士兵组成的部队——这就是说,由扩充预备役士兵的团而组成的那些部队——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要使他们投入战斗,几乎是不可能的。西伯利亚第四军团的各个团是一个例外,他们在大石桥、海城和辽阳干得非常出色。这些部队是完全由西伯利亚的预备役士兵组成的,这些人虽然是倔强的家伙,并且不善于徒步行军,但却是有品格的人,而且在战斗中 ii. 73

非常坚定。由年轻士兵组成的分遣队是极好的。他们之中大部分刚刚学完了他们的新兵课程，是单身汉，既有持久力，又有活动力，而且由于是正规士兵，因此习惯于战地勤务的环境。不幸，只是在奉天战斗以后，这些分遣队才开始到达。这些年轻士兵既然在小规模的战斗中干得如此之好，在一次决战中将会干得更好。

业已在我们人民的所有阶层中呈现着的普遍不满情绪，使这次战争如此可恨，因此它是绝对激发不起爱国心的。虽然社会上所有阶层的人都仍然漠不关心，许多好的军官却赶紧贡献出他们的力量——这不过是很自然的事。几百名普通老百姓志愿参军，但是我们的高官显贵们的、商人们的、或我们的科学家们的儿子却没有表现出参加军队的热心。在当时无所事事的成千成万的大学生^①中（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花用俄罗斯帝国的费用），只有一小撮人志愿参军^②，而就在那个时候，在日本，连最著名的公民的儿子们——甚至是十四、五岁的儿童——也努力争取参军。如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日本的母亲们当她们的儿子被发现在体格上不适于服兵役时，由于羞愧而自杀。俄国对于它的儿子们正在进行的流血战争——为了一点也不了解的目的，并且是在外国进行的——的漠不关心，即使是最好的士兵也不能不为之泄气。他们的国家对他们的这样一种态度，是不能激励他们作出英雄业绩的。但是俄国不仅是漠不关心。革命党的领袖们以非凡的活动力力求扩大我们失败的机会，希望这样可以更容易达到他们自己的卑劣的目的。出现了秘密出版物的大量印刷品，这些印刷品企图减少军官们对他们的上级的信任，动摇士兵们对他们的军官的信任，并破坏整个军队对政府的忠诚。由社会革命党人出版并广为散发的《致俄国军队的军官们》中，所表示的主要意思如下：

① 由于大学生的骚动，导致关闭各大学。——编者

② 医科大学学生。

“俄国人民的最坏和最危险的敌人——事实上，是它的唯一的敌人——是当今的政府。正是这个政府正在进行对日本的战争，而你们正在它的旗帜下为一项非正义的事业而战。你们赢得的每一次胜利都使俄国受到灾难的威胁，这就是必然要维持政府所谓的‘秩序’，而你们遭受的每一次失败都使解救的时刻更靠近我们一些。因此，当你们的敌人获得胜利时，俄国人为之高兴，是值得奇怪的吗？”

但是同社会革命党人毫无共同之处并且真诚地爱他们的国家的人们，则以这样的行动来帮助俄国的敌人：在报纸上表示意见说，这次战争是不合理的，并且批评政府所犯的未能防止战争的种种错误。在一本题为《最近的作战引起的想法》的小册子中，戈巴托夫先生提到这种人，内容如下：

“但是更加可悲的事情是：当我们英勇的士兵们正在进行生死斗争时，这些所谓人民之友对他们悄悄地说：‘各位先生，^{ii. 76}你们是英雄，但是你们是毫无理由地面向死亡。你们将为俄国的错误政策付出代价，而不是为保卫俄国的必需的利益而死去。’还有比这些所谓人民之友以这种方式破坏正在拚着命在打仗的英雄们的精神上的忠诚时所起的作用更可怕的么？人们可以容易地想象，一位正要投入战斗的军官或士兵，在阅读报刊上以这种方式谈到这次战争的愚蠢和无益的文章以后，会怀有怎样的心情。革命党在其破坏我们军队的纪律的努力中，正是从这些自称的朋友们那里得到支持。”

预备役士兵们在被征召时，就得到反政府的政党印发的企图使他们对他们的军官抱有偏见的种种宣言，同样的宣言也被送到在满洲的军队中去。在战场上的军队接到一些信件，告知他们俄国国内普遍骚动的情况。因病住院的士兵和在我们的前进阵地上值勤的士兵，在报纸上看到一些破坏他们对他们的指挥官和领导

的信任的文章。有人劲头很大地在进行破坏军队纪律的活动，当然，它并不是完全没有效果的。这个运动的领袖们指望达到的理想，乃是被“波将金”铁甲舰上叛变的水兵们引起的那种状态。军队和国家的这些敌人得到其他某些人的帮助，这些人只不过是愚蠢和不懂道理。人们可以想象，如果告诉 M 先生们、K 先生们和另一些 K 先生们，他们在军队中所起的作用，同煽动“波将金”铁甲舰上的水兵起来反抗的人所起的作用一样，他们将感到如何地愤怒，然而情况正是这样。虽然俄国人在精神上可能是坚定的，但是，人民中一个阶层的漠不关心，另一个阶层的煽动，不能不对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有一种影响，而这种影响对于成功地进行战争是不利的。

西伯利亚军区的指挥官们早在 2 月份就报告说：编外军队和预备役士兵的若干分遣队曾抢劫了几个火车站，后来，正规军队在开赴前线的途中，也犯了同样的不良行为的罪。当战争正在进行的时候，大量的士兵流入后方（尤其是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士兵），这与其说是由于怯懦，不如说是由于士兵们的心情不安定，由于他们不想把战争继续打下去。我可以补充说，当我们正在为决战作准备的时刻，在朴次茅斯开始了和平谈判，这对军队中最好的士兵的士气起了很不好的影响。

马蒂诺夫在一篇题为《两个军队的精神和心情》的文章中指出：

ii. 78 “……即使在和平时期，日本人也受到如此的教育，为的是发扬他们的爱国和尚武的精神。同俄国打仗的想法是非常普遍的，在整个的战争时期，军队都得到全国同情的支持。在俄国，真实的情况恰好相反。爱国心被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裁军的观念的传播所动摇，在一次困难的战争中间，国家对军队的态度如果不是实际上敌意的话，也是漠不关心的。”

这种判断是正确的，当然，这是明显的：由于俄罗斯社会和在满洲的军队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要希望后者有任何爱国精神，或者有为祖国而牺牲生命的任何准备，都是不可能的。在1906年《俄罗斯残废者》上刊登的一篇题为《责任心和爱国》极好的文章中，比尔德林表示了如下的某种深刻的真实思想：

“我们未能获得胜利可能部分地是由于各种各样和复杂的原因，由于个别人的处理不当，由于拙劣的指挥，由于陆海军缺乏准备，由于物质资源的不足，并由于装备和供应部门中的贪污盗窃。但是我们战败的主要原因隐藏得更深，须在缺乏爱国心这方面、在对祖国缺乏责任心和缺乏热爱这方面去寻找。在两个民族之间的一场斗争中，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物质资源，而是士气、精神的发扬和爱国心。最高度发扬这些品质的民族多半会获得胜利。日本久已准备同我们打仗，它所有的人民都渴望进行这场战争，一种崇高的爱国的感情普及全国。因此，在它的陆海军中，每一个人，从总司令到最后一个人，不仅知道他是为什么而战，他可能为什么而死，而且清楚地了解：日本的命运、它在政治上的重要性和它在世界历史中的前途，都依靠在这场斗争中的成功。每一个士兵也知道，整个民族做他的后盾。日本的母亲们和妻子们，热情地把她们的儿子和丈夫送去参加战争。当他们为国战死时，她们是引以自豪的。在我们这方面，情况恰恰相反，这次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不得人心的。我们既不渴望进行这场战争，也没有预料会发生战争，因此我们没有为战争作准备。士兵们被匆忙地塞进火车车厢，在持续了一个月的旅程以后，当他们在满洲下车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在什么国家，不知道他们要同什么人作战，也不知道这场战争是怎么回事。甚至我们的较高级的指挥官们在去前线时也是不愿意的，只是由于责任

感，不得不去。再者，整个军队感到祖国对他们是漠不关心的；他们的艰苦生活没有由全体人民来共同体验；他们只是孤立的一伙，同祖国隔离开来，被抛掷到六千英里以外的地方，丢弃在那里，听凭命运去摆布。因此，在决战开始以前，敌对的两军中的一方，抱着满怀希望和深信不疑的信念前进，相信他们将获得胜利；而另一方则怀着有损士气的疑惧心情前进，不信他们自己能获得成功。”

一般地说，在战争中获胜的人，是最不怕死的人。同在这次战争中一样，我们在以前各次战争中也是没有准备的，而且在以前各次战争中我们犯了种种错误。但是当士气的优势在我们这边时（象同瑞典人、法国人、土耳其人、高加索山地人和中亚细亚土人的战争中那样），我们就获得了胜利。在这次战争中，由于极端复杂的种种原因，我们的士气比日本人的士气差。正是这种劣势，而不是指挥方面的错误，使我们遭到失败，并迫使我们作出巨大努力，以便争取胜利。我们的士气不旺盛（同日本人相比），影响到我们军队中从最高直至最低的各个级别的人，并大大降低我们的战斗力。如果在不同的环境下进行一次战争——军队得到国家的信任和鼓励的一次战争——同样的军官和同样的军队会比他们在满洲干得好得多。缺乏尚武精神、没有昂扬的士气，又没有英雄业绩的推动，这些特别影响到我们在战斗中的顽强性。在许多情况下，我们没有打败象日本人这样的敌手的充分决心。我们的军队不是以不可动摇的顽强性坚守分派给他们的阵地，而是常常退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有各级指挥官毫无例外地都没有力量或办法来加以整顿。他们不是重新作出格外的努力从敌人那里夺取胜利，而是准许军队在他们的指挥下退却，或者他们自己下令实行这样的退却。然而，军队从来没有失去其强烈的责任感。正是这种精神，使我们的许多师、团、营能够随着每一次战斗而增长它们的抵抗力

量。这次战争的这个特点,以及我们最后取得了数量上的优势,和日本人的热情的显著衰退,使我们有理由怀着信心瞻望未来,并且对于我们的最后胜利没有怀疑的余地。

在俄国和外国报纸上,出现了许多文章,在这些文章中,责备总司令在指挥各次战斗中缺乏决心。这些评论家说(他们的说法并无任何真正的根据),他在胜利在握的时刻,不止一次地为了某种未知的原由发出退却的命令。对于他的优柔寡断和经常改变命令的批评是如此一致,以致这种想法成为普遍的了:正是库罗 ii. 82 帕特金,而且单单是库罗帕特金一人,妨碍了军和军团的指挥官们击败敌人。

本书前三卷对于这些责难中的最严厉的攻击提供了答复:在这三卷书中,描述了我们不得不作出巨大的努力,来阻止我们作战的结果比实际的结果更坏。有些人相信,一道命令一旦发出,就不应收回成命或修改,我从来不属于这些人之列。在战争中,环境变化如此迅速,接到的情报如此经常地被证明是不确实的,因此,如果不管变化了的环境,而坚持要严格执行一度发出的命令,就会是根本不妥当的。在黑沟台的作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例子。西伯利亚第一军团的指挥官接到的命令是:安排他的军队于1月27日休息,并占领黑沟台-苏马堡(音译)-北台子(音译)一线。这道命令是以满洲第二军军长的不正确的假定即沈旦堡已被攻下为根据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团的指挥官不止一次地被告知说不要进攻。然而,即使得到消息说,沈旦堡并未被攻下,他仍然坚持要执行发给他的命令。在执行命令中,由于一项错误,一个被敌人以武力坚守的村落被指定为我们的休息地点。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我们战斗了一整天,损失了七千名士兵,并于1月28日黎明被迫退却。关于 ii. 83 前总司令^①继续不断地撤销他自己发出的命令这样的责难,注意

^① 即库罗帕特金将军本人。——编者

到下面的情况是饶有兴趣的：格里彭伯格将军在他写的题为《关于黑沟台战斗的真实情况》一文中指出：虽然他不同意总司令的命令，即必须撤退第二军的右翼，以便占领一个更为集中的阵地，但是他没有向总司令表示他的意见，因为他和他所有的参谋人员都知道，库罗帕特金从来不撤销他一度发出的命令。

对于我们在辽阳或奉天是否可以击败日本人的问题，尽管我写的这几卷书出版了，但是在我们详细地知道日本人在这些战斗中的实际行动以前，我们将仍然是弄不清楚的。至于辽阳，我只能表示我个人的意见。象导致撤退军队的命令这样的重要决定，是不能根据一刹那间的灵感就作出的。所有有关的情况都必须予以考虑，即：以前各次战斗的结果；部队在身体和精神方面的状况；敌人的兵力和部署；如果战斗继续下去，会得到什么结果；从前线、两翼和后方送来的报告；预备队耗用的程度，他们为战斗所作的准备；手头所有的弹药的总数等等。在辽阳的战斗中，除野津的军队外，黑木的军队也可能容易地强渡到太子河右岸。（这种情况，正如同在奉天的战斗中一样，那时除乃木的军队外，日本人大胆地也把奥的大部分军队投入战斗，过渡到浑河右岸。）由于我们想以驻扎在左岸的部队于9月2日采取攻势的企图以损失惨重告终，这就更有可能了。如果以一次反攻来击败敌人的希望不存在，对于象我们这样处境的从事防御的军队^①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适当的时候退却，而不坚守下去，直至不可能实行有秩序的退却。我们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退却的，路上泥浆很深，但是我们没有丢下一样战利品，也没有丢下一个俘虏、一门大炮、一辆运输车。

如果我们耽误了一天，我们的退却就会象第二军和第三军在奉天那样，那时他们是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在奉天的战斗中，由于在本书第三卷中加以解释的种种原因，3月7日，第二军的两翼

^① 我们的交通线受到威胁，在侧翼的烟台煤矿是在敌人手中。

和后方几乎被包围了。我们必须作出重大努力，才能从我们所处的境地摆脱出来而不被完全击败。但是并未作出这样的努力。3月7日、8日和9日，我们全军的处境更坏了，而第二军相当大的一部分部队被乃木的军队包围的危险更加迫在眉睫。我比较我们和日本的士兵在3月7日和8日的状况，以及双方军队在8日所占的阵地，并考虑到日本人在士气方面的优势，就应该放弃在7日和8日的战斗中获得胜利结局的希望，并在军队瓦解以前为撤退到铁岭作出安排。将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责备我坚持的时间太长了。我一直到3月10日才发出撤退的命令，而根据发生的种种事件和我的参谋人员的意见，这项命令应该早一天发出。如果我们是在9日撤退的，我军或许就可以完全有秩序地退却，而不损失任何东西(除伤员外)。的确，那样我们或许就可以带走相当多的俘虏和俘获的大炮和机关枪。我在就奉天战斗呈送给沙皇陛下的报告中，承认了我应为我们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并且承认，我应该更准确地估计敌我两军士兵之间的差别和指挥官们的条件，我在作出决定时应该更为仔细。我不顾第二军在3月2日至7日之间的作战遭到惨重的失败，对于击败敌人抱着万一的希望，因此发出撤退的命令太晚了。我应该早一天就放弃在奉天获得最后胜利的一切希望，那样，我们就将秩序井然地实行退却。因此，我的意见，关于辽阳和奉天战斗的总结论可以表达如下：如果我们从辽阳撤退晚了一天，结果就会同在奉天的情况大致一样；如果我们从奉天撤退早了一天，结果就会同在辽阳的情况大致一样。^①

我或许也被指责，没有在铁岭坚守较长时间，并在那里战斗，而命令我军一直撤退到四平街阵地。对于这种指责，我在本书第三卷中已详细地给予答复。在这里只须简单地说一下就够了：在

^① 从辽阳撤退是有秩序的，而从奉天撤退更接近于溃败。但是，在作出从辽阳撤退的决定时，俄国人并不一定是真正地被打败。——编者

3月12日和13日决定从铁岭撤退时，根据第二军和第三军的在奉天战斗中损失最惨重的那些部队的指挥官们的说法，在一百十四个营中，我们仅有一万六千三百九十名来福枪兵的战斗兵力。^①如果那时我在这种情况下在那里应战，将会是极为危险的，因为我们可能会把许多部队的干部全部损失掉。我们为一次新的战斗而重新整编军队需要多长时间，可从下面的事实推测出来：第三军军长在迟至5月17日（在撤退之后两个月）方才召开的一个委员会上说，他认为即使在那时在四平街阵地与敌人进行一次全面战斗，仍然是不可取的。^②

* * *

我想逐字逐句地引用我向满洲第一军的军官们的告别词，作为本章的结束。在这篇告别词中，我根据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经历过的和实际感觉到的一切新鲜印象，略述了妨碍我们在可以利用的时间内击败敌人的那些缺点。但是，我在指出我们的弱点的同时，也指出我曾指挥过的军队的优点——这些优点使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我们最后会取得胜利。

ii. 88

致满洲第一军的军官们

“几天之内，满洲第一军就将被解散，我现在必须向我曾极为荣幸地指挥了两年的光荣军队告别。在这次战争开始时，艰巨的任务落到你们肩上：抵挡数量上占优势的敌人的攻击，为了争取时间，使我们来自俄国的增援部队得以集中。你们有幸能够参加鸭绿江、得利寺、大石桥、羊子岭（音译）、浪子山的战斗，也参加辽阳、

① 原文如此。这好象几乎是不能相信的。——编者

② 本章从此处开始极为详细地叙述打乱部队编制的情况。现将这一部分从本文抽出，作为《附录二》，附于书后。——编者（在翻译本书时，将《附录二》删去。请参阅本书《出版说明》。——译者）

沙河和奉天的长时间的战斗。由于你们在那些战斗中的行为，博得了我军其余部队的赞扬。

“满洲第一军只有五个半军团(一百六十个营)的较弱的编制，或是十万名来福枪兵和二千二百名军官的平均战斗兵力，截至1905年3月14日其损失如下：

	军 官	士 兵
死	395	10,435
伤	1,733	56,350

或者，以百分比来说，在平均战斗兵力中，军官的死伤数为百分之九十一，士兵的死伤数为百分之六十七。在各个部队中，死伤的损失如下：

	军 官	士 兵
东西伯利亚第三十四来福枪团	89	3,243
东西伯利亚第三十六来福枪团	73	2,531
东西伯利亚第三来福枪团	102	2,244
东西伯利亚第四来福枪团	61	2,170
东西伯利亚第二十三来福枪团	50	2,290
东西伯利亚第一来福枪团	71	1,920

ii. 89

“从下面的事实来看，军官们在战斗中的特别英勇的行为是很明显的：军官死伤的百分比比士兵死伤的百分比高得多，而许多个别的部队证明，在战斗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以后，仍然可以继续战斗。然而，尽管经受了这些牺牲，尽管作出了一切努力，我们仍然不能打败敌人。无疑，我们必须同一个非常勇敢、精力旺盛和极富于尚武精神的敌人作战。日本人是如此不顾惜生命，以致他们把伙伴们的尸体堆在我们的障碍物上，力图从这些大堆尸体上爬到我们的阵地。再者，长时间以来，他们能派出优势兵力来进攻我们。但是，我们由于不幸而受到了锻炼，由于经验而得到了智慧，而且我们的兵员数量日益增多，直至我们最后在去年夏天心情上和精神上是如此强大，因此胜利似乎是有保证了。

“在大的战斗之间的比较平静的间歇时间，被用来加强军队，

而且，虽然极端困难，一直到(并包括)奉天的许多阵地都被加固了。在奉天战斗以后，全军左翼的防御任务被付托给你们，而且你们构筑了直至松花江的三条非常强固的防御线。这些防御线，尤其是第一条和第二条防御线，由于它们的防御工事和土壤的性质，
ii. 90 在各方面既适合于坚守，也适合于进攻。虽然我们的军队到了去年5月份还未完全准备好采取攻势，但是它是会欢迎进军的命令的。敌人为他们在奉天的损失所震动，防守他们的阵地达六个月之久，等待我们前进。我们根据在战争中获得的经验，开始采取了许多改进措施，军队的战术训练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们不仅以到达这里的分遣队补充了我们的兵员不足的部队，而且把所有的来福枪团都扩充成四个营的编制。以增援的方式派到第一军来的，则有第五十三步兵师、哥萨克步兵旅和顿河哥萨克师。

“在去年8月份，第一军的火线上的士兵比战争开始时，比前年9月份沙河战斗之前为强，而且，由于指挥官们的极大努力，和医务人员的无私工作，军队的健康状况自始至终都是极好的。的确，这是幸运的，因为如果发生了任何严重的疾病，由于那时到达的分遣队很少，我们在战场上就将只有非常弱的干部力量了。因此，这是绝对重要的：为了使每一个人适应于部队生活，不应吝惜费用或努力。我很高兴地说：我们的共同努力获得了非常的成功，因为我们由于疾病而遭到的损失，比由于死伤而遭到的损失为少。截至1905年8月14日止，满洲第一军在战斗中死伤的损失为：军官二千二百十八名，士兵六万六千七百八十五名，而由于疾病的损失为：军官二千三百九十名，士兵五万八千零九十三名。我想请你们注意这个事实：虽然在因战斗而损失的百分比这方面，军官很自然地应比士兵为高，然而，由于军官较好的生活，因疾病而损失的百分比则军官应比士兵为低。我们的情况与此相反，这表明我们的军官不够吃苦耐劳，并且不知道如何保持他们的健康。对此我
ii. 91

们必须给予特殊的注意。

在去年8月份，我军在物质方面处境也是极好的。服装和各种装备储存在现场，并且是丰富的，而各种技术方面的供应品已经积聚起来。从各种意义来说，我们在过去从来没有象在1905年夏季那样的强大。这时我们忽然听到，在朴次茅斯进行了不愉快的谈判，并且已经缔结了和约了。无疑地，由于俄国内部的状况，这是必需的。但是对于我军来说，这是令人心碎的。我记得，各级军官听到这个消息，是如何伤心。我们的营地里生气勃勃的气氛似乎消失了，我们所有的心灵里都充满着一个悲哀的想法——这场战争在敌人被打败以前就已结束了。回顾我们最近经历过的种种考验，我们可以在这种心情中得到安慰：我们已竭尽全力为沙皇和祖国尽了义务。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给予我们的时间被证明是不充分的。我们必须毫无顾虑地探索这些原因，并且发现什么事情——除单单是数量上的劣势外——妨碍我们在缔结和约以前获得胜利。比一切其他原因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你们的上级指挥官，我是有罪的，因为我在战争期间在纠正我们许多精神上的和物质上的缺点方面以及在充分发挥我军的无可怀疑的优点方面都未能成功。物质方面的缺点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在火线上，每一连 ii. 92 的来福枪兵人数少(部分地是由于没有注意把尽可能多的士兵投入战斗);在战争初期山炮不足;缺乏烈性炸药制造的炮弹、机关枪和各种技术备用品。到了去年8月，由于陆军部的极大努力，这些缺陷大部分已被弥补了。我认为我们精神方面的缺点是由于下列原因所致：在各个部队中训练的标准各不相同;各个部队在技术方面的准备处于劣势;各部队在战斗中人数很不足。我们也由于在战斗以前对敌人阵地的侦察不充分，以及因此对于如何指挥战斗(特别是在进攻时)心中无数而遭受很大损失。而最重要的，则是由于个别的指挥官们缺乏主动性和独立思考，军官和士兵缺乏尚

武精神，缺乏干劲，各部队之间缺乏互相合作，以及缺乏不惜任何牺牲完成任务的共同决心，使我们遭受了很大损失。过早地承认失败——仅仅在先头部队遭到损失以后——的倾向，以及不重新进攻就实行退却并以此树立一个榜样的倾向，是非常有害的。这样的退却，并不能唤起邻近部队更加努力，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作为促使它们退却的信号。

“一般地说，在各级军官中都非常缺乏这样一种人：即他们具有强烈的尚武性格，神经足够坚强，使他们能经受持续数天之久的几乎连续不停的战斗的紧张生活。显然，在过去四十至五十年间，不论是我们的教育制度的性质还是我们的国民生活的性质，都未能造就具有坚强的独立性格的人，要不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军队中就会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了。现在沙皇已将自由的幸福给予我们。我国国民已从官僚政治的管束下解放出来，现在能够自由地发展，并且把它的精力用于国家的利益。让我们希望，这种自由的幸福同考虑十分周到的教育制度结合起来将提高俄国国民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力量，并在国民活动的每一项领域内都造就忠于俄国的人，他们是有事业心的，有主见的，有主动性的，并且是身心强壮的。由于这种人参加进来，军队的质量就会提高。但是，军队如果需要无所事事地等待进行一个世代的工作的结果，那是不可能的。既然现在知道了我们的优点和弱点，我们就能够而且应该毫不迟延地着手自我改进的工作。这次战争使许多人——特别是在第一军的各级军官中——露了头角，从最低的连级军官直至军团指挥官，他们的精力、热情和能力是俄国国民能够依靠的。我愉快地注意到，第一军中有不少的人被任命在远东和在俄罗斯担任好的职位。这应该可以作为一项新的证据，即：对我们的努力沙皇一直没有松懈地在注视着，并且正在不失时机地为了整个军队的利益而任用你们之中的最杰出的人。

“你们对于现在指挥战争时通常所处的困难环境,以及进行一次持续数天之久的几乎连续不停的战斗所需要的精神上 and 体力上的努力,有了第一手的知识。你们由于经验也知道所有的各种技术装备在战斗中的确实价值。所有这些都使你们必须努力锻炼自己。除士官学校外,我们的学校不在儿童的体育锻炼上花费力气。ii. 94 因此,象在这次战争中明显地表现出来的那样,我们的许多军官在体格上是弱的。应该注意于体操、击剑、单棍搏斗和步枪射击。一位军官不应仅仅是士兵们体育运动的一名旁观者——我常常注意到这种事情——而应以身作则,为他的下级在这方面树立榜样。

“我军官兵之间的关系始终是极为密切的。我们的军官象父亲那样对待士兵,已赢得了他们衷心的尊敬。要记住,对我们的士兵来说,‘父亲般的指挥官’并不仅仅是一句空话,他们是深信这句话的。还要记住,一位指挥官,只有当他是士兵们的父亲般的指挥官时,才能赢得他们的心。军官对待士兵严格,同时又照顾到士兵的福利,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们的士兵不怕严格,而是遵守严格要求。在大多数情况下,公平的严格是可以制止犯罪行为的。但是心地单纯的士兵对于不公平特别敏感,并且会很快地看穿对他的任何欺骗。你们之中同士兵一起经受了战地勤务的一切困苦和危险的人,处境是非常好的。看到了你在战斗中的表现——始终坚守在你的岗位上,树立了一个公而忘私的榜样——的士兵们,将会原谅你的许多错误,并且将会跟随你赴汤蹈火。把军队连结在一起的这些链环必须小心地保持下来,而且,除非绝对必要,曾经同部队一起在战场上经历过战争的军官们必须不要被调离各该部队。要维护各团所获得的尚武传统,并且竭尽全力记住各连、各骑兵连、或各炮兵中队集体作出的、或它们的个别成员作出的英勇业绩。ii. 95 要同士兵保持密切的接触,努力赢得他的充分信任。依靠你对他的经常关心和爱护,依靠你对他的严格的同时又是父亲般的

关系,依靠你了解你自己的工作,以及依靠你自己的榜样,你就会得到他的充分信任。只有依靠这些,你才能发挥他的一切优点,纠正他的缺点,并且防止他受到有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将来会比以往更多。应该经常记住最近兵变的若干事例。我特别向团长们说几句话。你们知道在战斗中落在你们肩上的重大责任。战斗的结局常常取决于领导一个团进行战斗的方式。一个精力充沛的、英勇的、能干的人担任了团长,就常常足以完全改变这个团的特性。因此,对于这个职位的人选必须慎重考虑,而被挑选任职的人必须不停地工作,教导在他们领导之下的所有的人。

“不幸的是,迄今为止,我们的团长们过多地忙于处理日常的和办公室的工作,不能腾出充分的时间来处理他们职务中的实际军事方面的工作,来从事官兵之间的沟通联系,而这种联系是极端重要的。某些指挥官似乎认为,他们的主要责任是对象运输车的颜色和重新涂油漆这样的琐事关心,而不是有关士兵的训练这样的事情。为了筹划如何使拨给的经费收支相抵,如何维持服装基金和其他基金而引起的经常紧张的情绪已增强到这样一种程度,并且如此严重地困扰着某些指挥官,以致他们几乎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军官们,并且由于他们试图以牺牲士兵的口粮因此也就牺牲他们的健康的办法来增加基金,就使他们的士兵受到确实的损害。在这次战争中,供应部门这样好地完成了它们的困难任务,因此它们已经证明了:在和平时期它们应受到绝对的信任。因此,我们可以把许多供应军队的工作(服装、装备、运输、食物)交给这个部门办理。这样,团和连的指挥官就将作为在真正意义上的名符其实的有血有肉的指挥官而突出出来,并将不再是在“办公室”机械地工作的人和仅仅是仓库和弹药库的检查员,而训练和教育的工作将取得进步。

“我想请所有的指挥官都特别注意彻底研究他们领导下的人

的性格的必要性。在我们这里，具有独立性格和主动精神的人是罕见的。找出这样的人，鼓励他们，提升他们，这样就鼓励所有的士兵们都不可缺少的优良品质的成长。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具有坚强个性的人常常被忽视，而不是得到迅速的提升。因为，在和平时期，他们是某些军官忧虑不安的来源，他们由于倔强而受到压制。其结果是，他们离开了军队，而其他人（这些人既没有性格的力量，也没有信心，而是些阿谀奉承的人，并且总是准备同意他们上级的意见）被提升了。要记住，我们对于我们领导下的人提出的意见和证据不予注意，使我们付出了多么昂贵的代价。

“第一军的大部分部队将留在远东，我深信，过去在战斗中曾 ii. 97
是如此可依赖的柱石的满洲第一军的那些光荣的西伯利亚团，现在和平的新环境下，将仍然是俄罗斯在那个地区的屏障。

“我在战场上的亲爱的伙伴们：在向你们告别的时候，我真诚地希望，你们获得的战争经验将会对全军和我国大有裨益。我相信，你们——你们热爱沙皇和祖国，总是准备维持法律和秩序，并支持政府的权威，超然于各政党的阴谋之外，并且了解由我们都经历过的这次战争所暴露出来的你们自己的弱点和优点——将迅速治愈你们的创伤，并且在我军为改进部队而进行的斗争中起带头作用。虽然你们将来可能没有曾获得胜利的回忆，但是你们能够回忆——而这应该是一种安慰和一种鼓励——你们准备不怕牺牲继续同英勇的敌人战斗下去，直至你们击败了他。军官们：你们相信，你们会赢得胜利，而且你们成功地把这种信念灌输到我们伟大的士兵们心中去。

“愿上帝帮助你们完成摆在你们面前的各项任务。即使是在和平时期，但是对我们亲爱的祖国来说，这些任务是同我们已经完成的任何任务同样重要的。再见。请接受我对你们在战场上的一切无私工作的真诚感谢，并且请向士兵们转达我对他们的工作和

对他们流露出来的对沙皇和祖国的热爱和忠诚的许多证据的感谢心情。

于双城堡

“1906年2月18日”

第十一章

ii. 98

为改善高级军官、为改善正规兵和预备役士兵、为改编后备部队、为在步兵团中增加战斗员的人数而建议采取的措施——机关枪——后备部队——保卫交通线的部队——工兵——炮兵——骑兵——步兵——一般的编制

我们最近的经验提供了充足的材料，在我们为改进战斗训练和增进我们军队的效率而作的努力中，这些材料可以指导我们。陆军部，在曾在满洲服役的军官们和军事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的帮助下，已经开始办理许多项改革工作。在这里我仅就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并应首先予以解决的改革工作表示我自己的意见。这些改革工作可列举于下：

1. 改善高级军官。
2. 改善正规兵和预备役士兵。
3. 后备部队在编制上的改革。
4. 在我们的步兵团中增加实际的战斗员的人数。
5. 扩大团、旅、师和军团的战时编制，并且用分权的办法，使它们更为独立。

ii. 99

关于第一项工作：我们在过去五十年中的三次战争暴露了我们军官的许多缺点。大部分缺点无疑是由于国家的不发达状态，和由于普遍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造成，它们影响了作为整个人口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军队。因此，把我们的军官作为一个整体来加以改善的任何认真的企图，只是在我们的社会条件方面开始总的

改善的时候才能成功。我国为改善各个阶层的各行各业人民的公民地位而开始进行的许多根本性的改革，使沙皇为之高兴，而军官阶层的改革也应同时着手进行。

为什么我们在低级军官和居于比较下级职位的军官中拥有如此之多的能干的、敏锐的和有才智的人，而我们只有如此之少的有创见的、敏锐的和有能力的高级军官？如我在上面说过的，军队中各级军官的水平如何完全取决于全国的水平。随着全国人民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智力普遍地增长，军队在这方面的能力也将相应地增长。但是只要全国苦于缺少见闻广博的、有主见的和热情的人，那么军队大概也不能期望成为例外。如果军服能吸引人民的精华，那么，在一个拥有千百万人口的国家（不管是怎样落后）里，至少会有几百个最优秀的人——从每一种意义上来说——完全能够在战时指挥军队。因此，似乎必须注意下面两点：

1. 采用一种能吸引我们青年中的精华的军服。

2. 坚持有特权穿军服的人当中的最优秀的人应在军队中服役，并在那里获得从事战争所必需的军事知识和性格力量。

上面的第一点，我们已经成功了，因为在俄国，多少年来军服特别受到尊敬。但是，迫切需要的第二点我们还决没有接近于解决。在穿军服的最优秀的人当中，大部分人不仅从未在军队中服役，而且同它绝对没有关系。在十八世纪，一种风俗不知不觉间流行起来，这就是给贵族的儿子穿上军服，而且当这些孩子只有骑着玩具马在客厅里绕圈子的年龄时，就可以得到升级。然后，逐渐地，军服、军阶、甚至将军的军阶，不再是军队绝对的特权了，或者，的确，不再表示同战争有任何关系了。教会的成员是唯一的不穿军服的人。御前会议的成员、大使、枢密院大臣、各部的大臣和他们的助手、总督、地方长官、市长、警察局长、政府各部门和军事机关的官员，全都穿军服，并且分为不同的军阶。除少数例外，他们所

能对军队做的事情只不过是成为它的弱点的根源。在将军的长长的名单中的许多名字中间,只有少数人是属于现役名册中的军官。而且,更坏的是,那些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反而得不到军阶,而不在军队中服役的人却得到了军阶,而前者所得薪金也比后者为少。因此,军队中的最优秀的份子很自然地渴望离开军队。内务部、财政部、交通部、教育部大臣和国家主计长的职位,通常由陆海军将军担任,驻君士坦丁堡、巴黎、伦敦和柏林大使的职位,也是如此。因此,在所有的外交集会和部长们的集会上,军服是引人注目的。对于若干其他部门,军服也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中的几个部门试图把它们制服做得尽可能同军官们的制服一样。在这方面,最坏的冒犯者是内务部,该部为警官以及甚至警察采用的制服,同军官所穿的制服十分相似,很难辨别。士兵们很自然地不能辨别这么多的制服,并且根本不知道要向谁敬礼,或者要服从谁。的确,警官们的大衣和缀有帽章的军帽,足以使最有辨别力的人为之迷惑。所有这些似乎是不能理解的。但是,想穿军服的野心是容易解释的。这大半是由于人民的无知。不久以前,即使是戴着一顶缀有帽章的有边帽的任何人,在乡下也被认为是一位有权力的人物。乡下人脱下帽向他致敬,在冬季,路上的装满东西的雪橇会转向路边的雪堆中,为他让路,而他的粗俗的辱骂也会被耐心地予以忍受。

三十年前,当我是一名年轻军官时,曾同法国人一起在阿尔及尔服役,度过了大约一年的时间,并且曾到许多地方旅行。我惊奇地发现,即使是在共和国统治下,对当地土人——阿拉伯人和卡比尔人——维持一种半军政府的制度是方便的。在这种情况下,主要是委托军队里的军官来统治,而那些也被任命的文官,必须采用一种同军官所穿制服相同的制服。这些官员非常严肃地告诉我:在他们同阿拉伯人打交道时——征收捐税、解决土地纠纷和其他事情,他们靴后跟的踢马刺和软帽周围的金绳对他们是有帮助的。

我国的情况也是如此。无疑地,在从前,穿军服可以使我们的警官必须做的困难工作容易办理。但是最近我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单单是一套军服现在不足以使人服从了。这种倚仗军服的办法有时是一项缺点,如果不是一项危险事情的话。当然,我们希望这样一种不自然的状况将不会继续下去。但是,利用现在老百姓显示出来的对于军服漠不关心的状况,禁止所有实际上不在军队中服役的人穿军服,是大有希望的。这个时刻已经到来:专属于我们的军服的威望应予恢复,在军队中服役的人的地位应予提高。

由于同样的目的,我们必须继续竭力改善军官们的物质境况和前途。一项重要的事情,而这也是我曾十分注意的事情——迄今为止尚未完全成功——是:在参谋部门、办公室和陆军部各部门服务的军官所得薪金,不应比在部队里服务的军官的薪金为高。目前被使用于半文职职务上的许多军官,完全可以用文官来代替。

ii. 104 再者,在边防军、海关、警察机关、宪兵队、铁路服务的以及从事征收捐税的军官,其收入应不再比在部队里服务的军官的收入为优越,这也是重要的。

当高级军官在部队里工作的时候,必须不允许他们把以前学过的东西忘掉,这种事情现在是极为普通的。下面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在和平时期他们应该练习指挥军队,而不仅是行政官、检阅官、观众和裁判员。因此,他们应该能够同部队一起在野外和营地度过他们大部分的时间。根据我们的军事制度,指挥军队的权力目前几乎完全掌握在团的、旅的、师的、军团的和军区的指挥官手中。^①这样,我们的步兵团和骑兵团经常是处于五个主人的指挥之下。但是,正如谚语所说的,“厨子多了煮坏汤”,在作战时,在我们所有的团里,并不是一切都是为了最好的目标而奋斗的。常

① 当设立了监察长官这个职位时,在监察长官的与军区指挥官的权力之间发生了某些混乱。

常有这样的情况：烹调的作料和炉火都准备好了，而厨子们却不知道该做什么。这样一种状况如何能加以解释呢？人们会说，指挥官的选择并不总是恰当的。那样说是正确的。但是，必须记住，我们不得不在按照规定是合格的和各指挥官呈送的报告认为是合格的那些人当中选择。在某种情况下，资历本身就被认为是升级的 ii. 105 一种资格。我们确实已作出这一类的努力来求得我们所拥有的最优秀的人才，但是这种人才是不够的。在我们的军事体系中的团、旅、师、军团、军区这五级的所有的指挥官是如此地忙于他们的日常工作和通讯联络工作，而其中的许多人由于他们职位的行政琐事而如此地负担过重，以致他们很少有时间照料有关实际战争的事务。然而，当他们在部队中工作的时候，要求他们具有更多的关于战争的知识。在夏季集中演习的短时期内（只有几天时间进行攻守两方面的教学），只提供很少的练习指挥军队的机会，而在其他时间内，与行政有关的很多负责职务则把指挥艺术置于比仅仅尽职要高得多的水平之上。而最为重要的是：我们服役的整个时期——几乎是我们整个的一生——是在做着不能形成特性的种种事情中度过的。在上面提到的五种职位中，只有两种职位——师长和军团长——在任何情况下是独立的，而担任这些职位的人只是埋头于办公室的工作。花费在各种不同种类的职务上的时间的比例，有使团长变成一位行政官而不是一名战士的倾向，而一位旅长则绝对没有独立性，事实上，他在与不在是几乎没有人注 ii. 106 意的。最后，甚至在阶梯的最高几级的那些人——指挥着军区的将级军官——的工作中，产生坐办公室的人和官僚的同样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某些人虽然长期负责军区事务，却一次也没有在演习时指挥过军队，而且几年以来甚至从来没有跨上过一匹马。这种无法忍受的状态怎样能加以纠正，以及一批领导者——他们须经常去实践，即执行那些指挥军队的任

务，在战时，会要求他们执行这些任务的——怎样能形成？

在现役军队中，团长的任务既广泛而又重要。为了在现代战争的考验中得到成功的结果，他必须具有特性和经验，并且能在战场上熟练地调动他的部队，必须非常了解他的士兵，因此，他必须腾出时间既同他部下的军官们交往，又使他自己精通他的职业。在进行战斗时，他必须处理的是人，而不是文件卷宗和仓库。但是，象他目前所处的境地，他由于重要的行政琐事而如此地负担过度，以致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处理征用命令和财产清册而不是同人打交道中度过的。他由于忽视他的行政职务而受到的处罚，比

ii. 107 他由于忽视他的团的战术训练而受到的处罚要重得多，而且更为明确。应该把这些职务的大部分——如与服装、运输和口粮有关的职务——从他的肩上卸下来。应该使他成为这些职务部门的主管人，而不是具体负责的人员。在人员方面，他的处境也不容易。军官极端缺乏（尤其是那些驻扎在较为简陋的兵营的部队中），是许多困难的原因。当下动员令时，在已经太少的军官中，有一些被派去承担数不清的各种各样的职务，有一些被派到分遣队；营长和连长互相对调；许多士兵转到其他部队去，大量的预备役士兵参加进来。如果没有时间使新来的人同少数老人熟悉起来，指挥官就不得不领着一个他不了解的、而且它也不了解它自己的团投入战斗。因此，我们的动员计划在这方面需要修改，每一个团在和平时期它的军官和士兵应该有一个持久的编制，这些军官和士兵在战时将随着这个团参加战斗。尤其不应该把连长从他们的连调开。但是，要使这样一种安排成为可能，就必须使高级上尉之一

ii. 108 (他可能被任命参加参谋部门)办团的教练队。使团长尽可能地不卷入日常事务中去，也是重要的。应该使他经常认识到委托给他

的任务的特殊重要性,以及由于这些任务而给予他个人的尊敬。

二

在满洲,正如在十九世纪后半世纪的各次战争中一样,在所有的大规模战斗中,步兵旅作为一个独立的战斗部队的巨大价值初次明显地表现了出来;步兵旅旅长对于战斗的结果的巨大影响也同样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军团的先头部队和后卫部队一般是由若干个旅组成的。通常是由一位旅长开始进攻;通常也是由一位旅长来结束进攻(指挥后卫部队)。然而旅长的职位并不被人认为是一个重要职位。他的权力是不足道的,他的地位不允许他有充分的独立性,使他能训练他自己或他的部队。师长和他们的主要参谋官在和平时期常常忽视旅长,仿佛旅长是不需要的人,是马车的第五个轮子。旅长们从事建筑兵营、筑路等等工作,整年不在,并不被认为对在他们指挥下的各团的成功的训练有任何不利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即使是热情 ii. 109 的人和渴望执行他们的任务的人,也变得迟钝、松懈,并失去了工作能力。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纠正这种不自然的状态(从军事观点看,这种状态是极为有害的):在和平时期,必须把旅长在战时必须独立指挥的那些部队交给他们独立指挥。这项办法不仅适用于步兵,也适用于骑兵。每一个旅应该有一个小的参谋部门,如目前独立旅中那样的组织——即两名副官,一名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办理有关作战的事宜,另一名则办理有关行政的事宜。每一个旅长在与他们的职务有关的这两个部门中,都应拥有与目前授予师长的权力同等的权力,而他们的惩戒的权力则应保留,与目前的情况相同。

三

我们的师长是独立的并且是同军队直接接触的,但是他们也

ii. 110 由于日常的通讯联系工作而负担过度。由于他们常常被任命担任夏季野营的指挥，实际发生的情况是，在军队演习时他们更多地是作为观众出场，而不实际从事指挥。在军队分为攻守两方进行作战演习时，担任师长的将军很少有人感到可能由他指挥一方，部分地是由于对于他自己的能力的被人夸大了的概念；部分地是由于具有足够的资历能担任裁判员的军官的缺乏。因此，他只是在集中大队士兵的时候，才得到在野外实践指挥军队的机会。这是不够的。步兵师的师长们特别地远远不够了解其他兵种，这是由于他们在指挥混合部队方面很少有实践的机会。因此，在给予旅长以更大权力的同时，把目前由军团长行使的权力（除惩戒的权力外）授予担任师长的将军们，也将是适当的。师长们应该始终记住：他们指挥的一万六千名来福枪兵是一个能决定任何战斗的命运的数字。在各个师里，包含有炮兵、工兵和骑兵部队，在夏季和冬季都可以在这些部队内安排极富有教育意义的演习，军队和它们的指挥官在演习中可以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为准备战争而受到训练。由总参谋部派到每一个师的四名军官^①应该从所有的日常工作（除与作战有关者外）中解脱出来，他们应该把他们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在军队的战斗训练方面为旅长和师长所作的准备工作上。

ii. 111

四

军团长是相当独立的，但是，象师长一样，他们也由于日常的通讯联系工作等等而负担过度，而且在野外指挥军队方面，没有得到充分的实践。某些军团长，在数年之间，由于调动工作而担任过种种职务，从来没有在演习时指挥过军队。由于某些军团并不包括骑兵，因此，要求所有的军团长都充分熟悉这个兵种，是不可能

^① 两名派到两个旅里，两名派到师的参谋部门。

的。他们和他们的参谋人员，特别是总参谋部的军官，在使用技术装备和战争的现代辅助工具（电报、电话、地雷、汽车、气球、等等）方面，完全没有实践，或是只有很少的实践。这次战争的经验显示，必须扩大军团的编制。由于军团长的行动将会有这样一种重要的（在许多情况下是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对于这些职位的人选，必须极端慎重地加以选择。被任命的人，必须不仅能自己学习，而且也能教导别人。象担任师长的将军们那样，军团长们的权力也应予以扩大，把目前由指挥军区的军官们行使的一部分权力授予他们。

五

军区的指挥官是实际负责主持军队的高级军官，同时负有作为各行政首脑的重要任务。在这里，同样的，行政工作以及与军队有关的通讯联系工作，占去了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只是在特别有利的环境下（集中各区的军队举行大演习），他们才能得到一些在野外指挥军队的实践机会。但是，由于他们也必须执行总督的任务，他们不能把充分的时间用于军队方面，即使是检阅军队，或是自己进修，也没有时间。我完全确信，不管这样一种兼任两职的办法——每一种职位都需要一位具备特别的能力和性格的人——从政治观点看可能会有多大好处，对于军队来说，这种办法有最严重的不利之处。人类的精力是有限的。由于我们的总督们把他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于行政事务，因此他们把他们大部分的军事任务委托给各军区的参谋长主持。很容易了解，这样一种安排对军队是不利的。例如，就与军队有关的事情来说，最重要的军区——华沙军区——在几任总督的期间里，就是被忽视的。的确，在一个时期里，这个军区里的军队是由军区参谋长控制的，这样，就大大地破坏了指指挥军区和军团的军官们的权力。因此，如果我们

希望各军区的指挥官——我们在战时选择军队指挥官的最自然的人选——应该有时间为了这项重要任务而自己准备条件，我们应该把他们从行政任务中解放出来，否则我们将得不到改善。也必须解除他们对于某些问题的许多负责的管理工作，所有这些问题在战时主要是由指挥交通的军官管理的。

视察医院、军需仓库、工兵和炮兵部队、炮兵辎重队、办公室——这一切事情过多地侵占了为军队和为他们自己的实际训练而进行演习的时间——应该从他们的任务中排除出去。由于现代战争的种种复杂情况，这些任务变得如此繁重，而且对于军队和国家是如此重要，因此在战时必须执行这些任务的人在和平时期必须不断地为自己准备条件。但是，由于我在上面已经说过的种种原因，很少的军官有时间来赶上他们职业范围内的种种发展。这就是为什么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我们在使用炮兵、在利用从事联络的各种技术工具、在判断不同的进攻队形相对的价值等等方面的知识落后的原因。必须给予我们的高级军官以充分的闲暇时间，以便在改进他们指挥下的军队时，同时也改进他们自己。

正规兵的改进

我曾不止一次地指出，正规兵在军事条件方面是如何好，在最初若干次战斗中正规兵是如何比预备役士兵（特别是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士兵）要可靠得多。但是，对于正规兵和预备役士兵都具有的缺点，我们必须在我们民族本身寻找其原因。士兵的情况，就反映出农民是缺乏教育的。在群众中间缺乏尚武精神，以及群众对于战争的厌恶，导致我们在满洲的军队缺乏尚武精神。士兵的无知，使得指挥现代战争（现代战争要求个人比以前要具有大得多的协作精神和主动精神）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因此，虽然我们的士兵在排列成密集队形时作战极为英勇，但是在没有军官而只剩下他

们自己时,则更倾向于后退而不是前进。在排列成密集队形时,他们是难以战胜的,但是他们之中很少人适合于个别战斗,而这一点日本人要强得多。尤其是他们的军士比我们的军士受过较好的教育。在许多俘虏——不仅有军士,而且还有士兵——身上,我们找到了日记,这些日记不仅写得合于语法,而且对于当前形势和日本人企图达到的目标,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他们之中许多人画得很好。一个俘虏——一名士兵——在沙上画了一幅极好的表明敌我阵地的简图。 ii. 115

在短期内把一名无知识、不识字的新兵转变成一名能个别作战的聪明、敏锐的士兵,决非易事。而最近把服兵役的期限减短,^①使这项工作更为困难。不过,最大的困难是得到好的军士;即使服役期限为四至五年,我们也不能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大部分新兵是如此地无知,而在军队的学校里又要求我们的军士如此之多的书本知识,因此有一种自然的倾向,即根据教育程度和敏锐的外表来挑选担任军士的人。这是一项错误,因为这些品质常常是表面的。具有最深沉和最坚强的性格的纯朴的新兵,通常是迟钝和粗鲁的,并且在外表上是不超群出众的。因此,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从未被选任军士之职,直至服役期满仍然是士兵。但是,一个具有某种性格的脾气不好的人常常能成为一名比他聪明伶俐的伙伴更好的军人。由于服役期限减短,我们如果没有相当多的超期服役的士兵,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目前把超期服役的士兵留在部队里的条件是够好的,但是士兵们不喜欢超期服役(或他们描写为所谓的“雇佣”服役)。我们必须克服这种不喜欢,因此要尽可能地提高军士长和其他军士的地位。 ii. 116

另一个紧迫的而且我们将来越来越会碰到的问题是: 如何把革命党的破坏性的学说摒除于我们兵营之外。当然,须采取激烈

^① 俄国服兵役的期限一般地从五年减为三年。——编者

的行动,但是如果我们不能把人民中间的这些政党打垮,我们就难以期望能使军队免于感染。

我们实行较短的服役期限的最重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是:不应为了治安任务而把我们的士兵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调开。军队如此频繁地参与以武力镇压民间骚动,对于纪律是特别有害的。现在转而谈谈另一个问题。由于分配的经费不足,我们军人的待遇总是比外国军人的待遇为差。例如,德国人花费的维持他们军队的经费,以每一个人计算,相当于我们的两倍。在这方面,我们已经作了一些改善,特别是在伙食方面。如果有由超期服役的军士长和军士充任的合用的干部,如果士兵的生活条件有了改善,即使实行三年的服役期限,我们也能平静地面向未来。但是,倘若我们能使军队从落到他们肩上的大量额外的团的工作(缝衣、制鞋及其他工场工作,看管储藏库,等等)中解脱出来,倘若我们减轻他们的站岗任务,我们才能成功。我们的新兵只是在服役的第一年才免于做这些工作并免于站岗。

预备役士兵的改进

在最近这次战争中,我们的步兵按照编制中年龄大的正规兵和预备役士兵相应人数的多少来区分,可分为四种类型:

1. 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在和平时期几乎保持战时编制。^①
2. 第三十一师第一旅和第三十五师第一旅的步兵,在战争开始时,以正规兵补足缺额,达到战时兵力。
3. 正规军团的步兵,以预备役士兵补足缺额,达到战时兵力。
4. 以预备役士兵组成的步兵部队。

ii. 118 按照参加过这次战争的有能力的军官们的意见(我完全同意这种意见),如其他条件相等,在一个部队里正规兵越多,在战斗时

^① 运输尚未完全使用马匹。

这个部队就越能够依靠。我们拥有的最好军队是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其次是第三十一师和第三十五师的各个旅。至于说到从俄罗斯直接开赴前线的军团的情况，则是没有充分注意调整正规兵对预备役士兵的比例。某些部队——例如第十军团——到达前线时，士兵的缺额为百分之二十，军官的缺额则更多。在这个军团进行的第一次战斗中，它的几个连只有六十名正规兵——三十名训练过的士兵，三十名新兵（这些新兵甚至还没有通过新兵的步枪射击课程）。其余士兵全是预备役士兵，其中有很多是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因此，无论从那一点看，这些正规部队只不过是后备部队而已。最后，我们的后备部队到达时，几乎没有任何和平时期的常设干部，他们仿佛被大量的预备役士兵吞没了。在初期的战斗中，这些预备役士兵，尤其是第二类预备役士兵，比正规兵差得多。他们之中的许多人利用每一个机会离开队伍，不管是否得到批准。这是不容怀疑的：如果这次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如果举国上下支持它在前线的子弟，而不是做相反的事情，这些士兵在初期的战斗中是会打得好些的。但是这也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如其他条件相等，服现役的人作为一个军人一定比其他人要好些。他不是在他已开始认为他的军事义务已经完毕的时刻被迫离开他的家庭的，他受过较好的训练，并且具有集体精神。因此，改进我们的步兵的最好办法是使它保持比现在较强的平时编制。 ii. 119

由于在现役中易发生的各种原因，在满洲，每连一百名士兵的平时编制是太弱了，以致于各连投入战斗时，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正规兵，而其余的三分之二都是预备役士兵。在名义上是正规部队，而实际上它们却更象后备部队。在每一个连，正规兵应占多数，但是使军队保持强大的平时编制的巨大困难和费用迫使我们对于改进我们的预备役士兵的问题给予特殊的注意。现代战争必须主要由临时从人民中间征召起来的士兵来战斗。

可以保证开赴前线的预备役士兵热爱他们祖国的唯一的东
ii. 120 西是国内有爱国精神的存在。人民中间的不满和受压迫的感觉，很自然地会在出发作战的人们心中反映出来。但是，除这些十分重要的一般考虑的事外，还可以做某些具体事情来改善预备役士兵的士气。按照目前的制度，当一个人从现役转入预备役时，他同他自己的部队——事实上，是同整个军队——的联系几乎就停止了。进行集中演习的规模是不够大的，而且虽然这种演习是有价值的，但是由于财政方面的考虑，常常被省去。因此发生的情况是这样：一个人带着他的军服转入预备役，但是，除了很少的例外，他从来不穿军服，即使他的步兵便帽也不戴。一般地，他把这套军服送给某个邻人或亲戚——从来不是一名士兵——穿。预备役士兵自己极乐意穿农民的衣服或其他便服。感到他重新又是一个农民，他是高兴的。他开始做工作，从事于和平职业，并且抚养家庭。当他到了四十岁时，开始发胖。正是在这些情况下，突然地不让他在家享天伦之乐，并被送到一块陌生的、“租用的”^①土地上，为了一个
ii. 121 他并不抱同情、也不了解的事业去打仗。除这些情况外，再加上在他周围存在着普遍不满的气氛，以及充斥着大量的革命的宣传品。在预备役士兵一旦离开军队以后，就切断他同军队的一切联系的制度，无助于使他从“庄稼汉”迅速地重新转变为有训练的士兵。以满洲的情况来说，他在战争的学校中锻炼了若干月以后，肯定地会成为一名好士兵，但是，在将来，恐怕不能指望有如此之长的宽限期。

由于我于九个月以前来到我国的心脏地区，并继续逗留在这里，因此我能够观察我们的从战地返回的预备役士兵。当返回的浪潮最初于3、4、5月开始时，预备役士兵的数量是很多的。有的时候，当我经过他们面前时，他们就排队——排成横队——按照军

① 这一措辞的意思是指一块不属于俄国的土地。——编者

礼的方式来迎接我。他们戴着皮帽,常常穿着军大衣,看起来仿佛是一群漂亮的年轻士兵。在田野辛苦劳动九个月以后,很快就把他们重新转变为农民。现在,当他们由于公务或其他事情到我这里来时,他们就不行举手礼了,而是脱下帽子并称我为“老爷”。

在日本,如果儿子们由于体格上不适合到前线去而遭到拒绝,母亲们就认为是耻辱。在我们这里,情况是何等的不同啊!妇女们常常来诚心诚意地感谢我“怜悯”她们的儿子和丈夫,因为这些人被派到运输部队或医院等处执行任务,而没有被派去进行战斗。^①当她们的亲人平安地、健全地回来时,她们也同样地来感谢我。在日本、德国和其他国家里,在教育方面作了些努力,谆谆教诲,向人灌输爱国精神。早在儿童时期,就使人们产生爱国和对祖国感到自豪的感情。如上所述,日本的学校采取一切办法来引起并培养青年人的尚武精神,并且使青年人在军事事务方面受到锻炼。在日本和其他国家里,组织各种爱国团体是得到赞许的,各种体育运动是受到鼓励的。当局毫无畏惧地发给人们数千枝来福枪,以供练习来福枪射击等等。我们则不做这样的事,由于政治原因,我们是怕的。在我们的学校里的教育很少向学生灌输爱国精神;而教会学校、农村学校和政府办的学校之间的悬殊使事情更坏。最高学府的大学生很早以前就放弃了对政治的研究。诋毁俄国的一切事情,久已成为风气,而服兵役则被认为是耻辱的事。我们的步兵个子是小的,而且背的东西过于沉重。他通常是不整齐的,常常是肮脏的,穿着一套难看的和不合身的军服。当他懒散地在街上走着的时候,他引起人们的怜悯,而不是自豪,这有什么奇怪的呢?然而,俄罗斯帝国的完整,正是依靠这个个子小的人。如我们知道的,经费是紧的,但是事实仍然是,我们没有使士兵在

^① 由于在战争爆发前数年之间霍尔姆军区发生饥荒,该军区的预备役士兵比邻近军区的预备役士兵召集得晚一些,因此他们之中的大部分驻扎在交通线上。

服兵役期间里保持足够的清洁和漂亮,当我们把他编入预备役时,我们发给他一套军服,而这套军服他却不能以自豪的心情向他的邻人或甚至他自己的家庭夸耀。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希望,他以后会突然转变成为一名英勇的战士呢?

只有改革我们的学校,并在较低阶层的人们的生活中推行改革(这样做除增加他们的舒适外,将促使他们爱国并对他们的国家感到自豪,并且怀有必须为保卫它而作出某种牺牲的深厚感情),我们才能在预备役中得到合适的、地道的士兵。要达到这样一种结果,不能完全依靠陆军部的任何行动,毕竟,陆军部的行动必须是第二位的。但是,陆军部所能做到的事情仍然是重要的,我在下面列举一些看来是最迫切的事情。

- ii. 124 在军队中,纪律是一切效率的基础。但是,当全国的群众都不尊重权威,而当局实际上畏惧他们的下属时,要在军队中维持纪律是不可能的。目前服兵役的期限是如此之短,因此没有时间来克服士兵所带来的人民的无秩序的习惯(他是从人民中间来的)。然而要在预备役士兵中间实行改进,就要求执行一种铁的军事纪律。必须一时一刻也不允许一名士兵无须畏惧他的军官。目前纪律的最大敌人是把士兵使用于现在正进行的政治斗争中。一方面,军队被宣传所败坏;另一方面,士兵们被调离军事任务,被派担任几乎持续不断的警察工作,不仅从事于扑灭诸如兵变这样的具有军事性质的骚动(这种骚动,局势只能由于可靠军队的协助才能得到挽救),而且还从事于扑灭应由警察和宪兵来应付的各种暴动。军官们被调去坐在军事法庭^①上,从事审判、枪决并绞死政治犯和其他罪犯。这些任务使老百姓仇恨军队,而在遭受到死、伤的士兵们中间,则引起了仇恨的感情,他们不仅仇恨向他们射击的老百姓,而且
- ii. 125 也仇恨命令他们杀害老百姓的军官。结果是,军队的纪律非常

^① 在戒严期间的简易军事法庭。——编者

败坏。如果一个人在他服兵役的两三年期间里，曾经借助他的来福枪用各种办法“维持秩序”，那么，当他转入预备役回家时，人们对他会有什么印象呢？军队能够而且必须做一切为镇压兵变和粉碎一切有组织的反抗所必需的事情，但是，在这之后它应立即回到它的日常工作中去。如果这类任务成为频繁的事情，如果士兵们看到，即使得到军队的帮助，政府也无力恢复秩序，他们心中对于政府的政策是否适宜，对于他们自己的指挥官，就会发生怀疑。根据我听到的消息，似乎最近落到军队身上的沉重任务现在即将告一结束，在我们伟大的国家里，秩序正开始再一次得到恢复。祈祷上帝使这种情况早日实现，因为，否则军队必然会日趋退步，而不是得到改进。

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工作应该达到这样的结果：使转入预备役的人在抵达他出生的村镇时有很好的纪律，了解他的工作，对他的旧部队感到自豪，并且尊敬他在服兵役时领导他的军官。因此，我们必须努力防止他同部队失去联系并且迅速地忘掉他在部队里学到的东西。在某些部队里，为了消除这种情况，实行所谓的地区制度，根据这种制度，预备役士兵同他们曾在其中服过兵役的那些部队保持联系，直至他们预备役的期限结束。这种制度，我们不可能全部实行，但是可以部分地实行，并且相当大规模地采用。它的重大优点之一是：在动员时，预备役士兵可以立即参加他们以前曾在其中服过兵役的部队。他们将不是陌生的人，而将为超期服役的干部（军士和军官）所了解，并将很快安定下来。来自同一地区的士兵在炮火下将会更倾向于团结在一起，而且每一个人将会感到，如果他作战不力，他的伙伴将会把这个消息传到他的家乡去。其士兵来自同一地区的部队，将会比从各个地区征召士兵的部队更为勇敢。当然，将会有许多困难，在能够采用这种制度以前，必须加以克服。例如，从某一地区征召来的士兵，如果被派去镇压那

ii. 126

个地区的骚动，将会比从另一地区征召的士兵更可能发生动摇。大家知道这样的事例：平日对待他们的士兵严格的军士们，在转入预备役时提出要求，在被送回家乡时，不要把他們同他們过去的部属(士兵)安置在同一个火车车室里，这些士兵曾经威胁，一旦

ii. 127 他们同军士一起转入预备役时，就要从事“报复”。在实行地区制度的情况下，我们就会容易地发生这样一种算老帐的事情，根据这种制度，军官和士兵在服满兵役以后都将一起回到一个地区。

必须经常使预备役士兵记住，他们仍然是士兵。应该为他们组织地方性的集中演习，以便他们可以得到一些训练。这些集中演习应该安排在尽可能少妨碍农业劳动的时间里。当然，这就须按照各地情况的不同而安排在不同的时间。我们掌管募兵事务的军官，象别的人一样，目前主要是忙于办公室的工作。他们应该更多地同预备役士兵接触，而预备役士兵则应把这些军官看做是他们的指挥官、顾问和保护者。目前募兵军官与预备役士兵之间的关系是过于纯粹的公务关系。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预备役士兵在和平时期的分类。我的意见分为三类是必要的。在士兵离开军队以后的头两年，他应被认为是在休假。应该使他穿着军服，并始终准备在局部动员或全面动员时被召回。后二类的预备役士兵应处于不同的地位，在动员时应被用来在后方、医院、食堂、炮兵辎重队、运输部队服务，并警卫在交通线上的营地，等等。

ii. 128

后备部队编制方面的改革

我们已经看到(见第六章)，当战争开始时，由于没有通过外交布置获得防止其他意外事故的任何保证，我们如何发现必须在我们的西部边界准备应付任何军事上的不测事件。因此，在派往远东作战的军队中，包括了过多的后备部队。这种情况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们并不真正了解我们在各个不同地区的军队的质量。

我们的精锐部队(从军官和士兵的质量来看),三个近卫师和三个掷弹兵师,共计六个师,被留在俄国的欧洲地区,而由后备部队组成的新成立的军团则被派往远东战场。我已提到过,我提出的动员援军并于复活节后立即派到我们这里的建议,如何地由于各种原因而遭到拒绝,援军如何地比它们应动员的时间晚了一个月才动员,而且在到达满洲时还没有安定下来,没有受过训练,对于新式来福枪简直毫无了解,没有上过步枪射击课程,并且没有同其他兵种举行过任何联合战术演习。

西伯利亚第六军团的部队(这个军团的部队在出发以前肯定曾经露营过一个短时期)未曾被发给一门大炮或派给一连骑兵,以便使它们能够举行联合演习。在西伯利亚第四军团的部队(这个军团的部队是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动员的)中,只有鄂木斯克团曾用大炮训练过,而这种炮是一种旧式的炮,然而这个团却必须用新式的速射炮参加战斗。骑兵是几乎看不见的。的确,如果我们考虑到随意选任指挥官、在军官中间普遍缺乏任何共同的思想、几乎完全没有适当的战术训练、大量的第二类预备役士兵的存在、对战争的普遍厌恶、以及缺乏尚武精神等等情况,那么,某些后备部队为什么遭到失败,其原因就会是明显的了。在最初的战斗中,西伯利亚第四军团的部队在军队中赢得了好名声。其原因如下:

1. 这些部队的士兵具有极好的性格。他们是西伯利亚的直爽的、倔强的人,身体强壮,作战勇敢,并且比其他部队较好地了解我们在远东作战的原因。

2. 谨慎地选任指挥官。

3. 军官们的勇敢。

4. 与其他部队相比,它们有充裕的时间来从事训练并达到团结。

但是,来自俄国欧洲地区的后备部队,在接受了它们的战火洗 ii. 130

礼以后，也打得很好。只要想起第五十四师和第七十一师各团在奉天的作战情况，以及第五十五师和第六十一师各团的作战情况，这一点就可以得到足够的证明了。但是，这种结果只是到了战争后期并牺牲了许多生命以后方才获得。在一次欧洲战争中，决定一个战役的命运比在满洲要迅速得多，因为在宣战以后所进行的最初几次战斗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最近这次战争中，由于在一条单轨铁路上只能缓慢地集中，后备部队可以较早地召集，并给予几个月的时间使之安定下来，这样，在到达前线时可以更加作好战斗准备。在一次欧洲战争中，后备部队就必须在动员后的很短时间内运送到战场去。我们把后备部队组成为独立军团，是犯了一个大错误。我的意见，如果把后备部队编入现有的军团中去——或是作为第三师，或是作为独立旅——可能会好得多。这样将会改进我们军团的编制，对于仅仅二十四营的兵力来说，现有的军团编制是太臃肿、太庞大了。有了由有效率的、独立的旅组成的强大的军团，在战斗中各部队的混乱状况就可减至最低限度了。

ii. 131 在这次战争前，没有为后备部队拟定军团的编制，不过，已详细拟定了一项师的编制。我的意见，不论是军团还是师，都不是必需的。把后备部队编成辖有八个营的独立旅，并把它们作为军的部队或军团的部队来使用，将会更为有利。后备炮兵、工兵和骑兵，应与后备步兵一起实行动员。每一个辖有八个营的后备旅（八千名来福枪兵）应有两个炮兵中队（每个炮兵中队拥有十二门大炮）、一连工兵、和一个后备骑兵连或一连哥萨克骑兵。这样的安排将容许把后备部队使用于次要目标，而不须把军的编制拆散，这样也将不再需要物色如此之多的师长和军团长以及他们的为数众多的参谋人员。

在我们的步兵中增加战斗员的步骤

在我们惨败的原因中，我曾经提到过(第六章)，与日本人相比，我们在从事战斗时每连的来福枪兵人数较少。我们常常比他们拥有较多的营，但士兵的人数比他们少。关于这种情况的各种原因，我已经列举过了。为了减少辅助任务(执行这些任务，须把正规部队的士兵从火线上调开)，我们必须为部队设置担任后方勤务的干部。我们并且必须安排以后备部队迅速补充伤员的缺额，而后备部队应经常跟随着正规部队，并与正规部队紧密联系。(每一个正规团应有一个后备营。)为了增加从事战斗的人数(同我们供养的人数相比)，特别是为了增加火线上的士兵，我们必须把我们连的战斗员编制从二百二十名提高到二百五十名来福枪兵。如果每连的编制为二百二十名来福枪兵，我们甚至绝不可能派出二百名来福枪兵参加战斗。在把每连的兵力增加到二百五十名来福枪兵时，我们必须采取步骤，使这些士兵全部都能真正地从事战斗。按照“战时编制”，一个火线上的步兵团有三千八百三十八名战斗员和一百五十九名非战斗员^①的编制(共计三千九百九十七名)，这样，每连就有二百三十五名来福枪兵。但是，在三千八百三十八名战斗员的总人数中，还包括三十五名军乐队队员、三十三名鼓手、一名号手、三名辎重军士、一名非战斗连的军士长、五名行李军士，此外，还有二百四十名(每连十五名)被派担任供应工作，等等。除去这些，剩下三千五百二十名战斗员，这样，每连有二百二十名战斗员。但是经验表明，在这项数额中有很多缺额。

满洲的特点，使我们有必要把士兵使用于执行种种任务上，而在一场欧洲战争中，这些任务将会是完全不必要的，或是不那么必要的。这样，除了规定的运输外，我们还有驮运，为了这种运输，每

^① 如使用双轮行李车，则非战斗员的人数须另外增加五十四名。

团就占用了五十名士兵。各团所有的大量牛群，需要二十四名士兵照料和看管它们。每团有九名屠夫。每连派给两匹或三匹驴子。（的确，驴子把水和弹药运送到火线有这样大的用处，因此我认为俄国欧洲地区的军队的编制中应包括驴子在内。）每连须派一名士兵照料这些驴子。团的编制中的军官数额，包括受了伤并离队疗养的军官在内，在这些军官中，有许多人在离开前线时把他们的勤务兵也带走。单单是这项带走的勤务兵，总数就达一百多名士兵。为了特殊的驮运（这是为侦察队而组织起来，以便运输弹药和供应品的），每团需要派出十三名士兵。根据这次战争的经验来判断，我认为，在每一个团，除一百五十九名非战斗员的编制外，还应该准许设置执行下列任务的人员：

ii. 134	各连文书	16
	伙食管理员	18
	军官伙食炊事员	4
	士兵的炊事员	18 ^①
	屠夫及照看牛群的	12
	军官的马夫	27
	随同侦察队的运输司机	13
	教官	4
	抬担架的	128
	行李警卫员	48 ^②
	照看运水的驴子的	16
	军官的勤务兵	80
	非战斗连的军士长	1
	运输司机军士	5
	送信员	20
	军乐队队员	35
	鼓手	33
	预备员(以备有病员和伤员时补充缺额)	13
共 计		491

① 炊事员和伙食管理员，各为十八名——即十六名派往各连，两名随同侦察队，一名骑马，一名不骑马。

② 每连三名。

所有这些人员必须归入非战斗员一类。这些人员再加上原来规定的一百五十九名非战斗员的编制，我们每一个辖有四个营的团就将共有六百五十名非战斗员。他们应全部予以武装，不论在前线或是同行李在一起时，他们都应随时准备战斗。

机关枪的价值现在是如此之大，因此我们经不起没有它们。我的意见，每一连应有一挺机关枪，并应派六名士兵运送机关枪及其弹药。这样，每一团就将有一百名士兵照管机关枪(包括四名预备员)。侦察队在最近这次战争中也作出了如此有用的工作，因此我们当然应该在每一个团里拥有不骑马的和骑马的(少量的)侦察队。这就将再占用二百名士兵。最后，除所有这些额外的名额外，每一连的定额应规定为二百五十名来福枪兵，这样，每一团就将有四千名来福枪兵。因此，每一团的总人数就将如下：

战斗员(分配在十六个连)	4,000
侦察队	200
机关枪队	150
非战斗员	650
<hr/>	
共 计	5,000

目前一个辖有四个营的团的编制为三千八百三十八名战斗员和一百五十九名非战斗员，总人数为三千九百九十七名。因此，每一个团共计增加一千零三人是合适的。包括每一连有十五名士兵担任供应工作在内，目前每团规定的非战斗员的人数共计为：

非战斗员	159
军乐队队员、鼓手、号手	69
军需军士	3
军士长和行李军士	6
担任供应工作的	240
<hr/>	
共 计	477

我把所需非战斗员的总人数确定为六百五十名，这样就在目前编制所规定的名额之外增加一百七十三名。这些人，包括抬担架的在内，是决不会参加战斗的。这样，把一个团的兵额提高到五千名

所需增加的战斗员名额如下：

每连增加三十名来福枪兵(以便每连有 250 名来福枪兵, 而不是 220 名来福枪兵)	480
侦察队	200
机关枪队	150
<hr/>	
共 计	830

增加这些战斗员,就将大大增强每团的战斗力。

机 关 枪

在这次战争开始时,军队只有少量的机关枪。日本人认识到这种武器的价值,就迅速地采用了它,并大量地供给他们在战场上的军队。我们也做了同样的事情,在 1905 年夏季,几个机关枪连和机关枪队从俄国来到了。但是这种武器的型式不能满足战术的需要:(1)关于它的重量;(2)对于地形的适应能力。必须发明一种型式,以便甚至能把它带进前哨线。我们的高而笨重的机关枪,连同它们的盾板,更类似于轻野战炮。它们的不合适的构造,以及 ii. 137 使它们适应地形的困难,是作出下列决定的原因:这些机关枪应编入炮兵中队,并且象对待和使用大炮一样地来对待和使用它们。这样一种意见是绝对错误的,因为它们的火力密度大,这就使我们有必要把它们分配到火线上的所有最重要的据点,所以,它们就可能同各个攻击部队一同前进。机关枪连的编制不能满足上述战术需要。每一营应有四挺机关枪。

后 备 部 队

后备部队应该发展起来并给予一种编制,在一次战斗以后或在一系列战斗期间,后备部队将使部队的消耗(军官和士兵两方面的消耗)立即可以从它们得到补充。每一个步兵团应有它的后备营,在动员时组织后备营,应规定其名额为每团的战斗员编制的百

分之四十——即一千六百名士兵。^①在这个名额中，四百名士兵（或每团战斗员编制的百分之十）应在战场上。这四百名士兵应组成一个连，并应构成它的特别的团的后备连，并且继续不断地补充 ii. 138 这个团。对每一个师来说，这些连应合在一起编成一个拥有一千六百名士兵的后备营，以便能立即补充该师所辖各团的伤员。所有未送回基地的伤病员都应隶属于这个后备营，直至他们复原。在大的战斗以后，这个后备部队将会耗尽，并需从基地的后备队获得补充。其他兵种的编制，应通过相同的安排，使之保持一定的名额。在非战斗员中间，伤员较少，但是按照他们的情况，也必需有后备部队（与战斗员的后备部队不同），以补充他们的消耗。这种后备部队应主要由第二类预备役士兵和被认为不适合于从事战斗的复原了的战斗员组成。

这次战争非常清楚地表明在一场战斗以后立即迅速补充部队消耗的极端重要性。日本人在这方面做得成功了，其结果是他们在兵员人数上大大地超过了我们。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以分遣队补充伤员而不是接受援军^②，这样就会使我们比较强大。例如，以二十四小时内可以利用五列军车计算，运送一个携带着行李和炮兵辎重的完整的军团需要二十天才能到达前线，这个军团可使我们的兵力增加二万五千名左右的来福枪兵。如果在这二十天里把分遣队已派往前线，而不是派一个完整的军团， ii. 139 则我们就可以得到九万名至十万名士兵。这样我们就不是得到骑兵、行李、大炮、炮兵辎重和少量的步兵，而是得到大量的步兵。我们需要的乃是步兵，因为在我们的大规模战斗中，遭受伤亡

① 这是指每团的战斗员编制四千名士兵——即实际在火线上并且不被使用于特殊任务（如侦察队等等）的士兵。——编者

② “援军”是用以表示派往前线的建成了编制的部队，“分遣队”是指派往前线补充消耗的成群士兵（未建成编制）。参阅本书《英译本译者前言》。——译者

最重的正是步兵。在军团的编制中，为每一千名来福枪兵配备的大炮太多了，而运送士兵和行李的数量是巨大的，其结果是，军团里剩下的一万名至一万二千名来福枪兵，就好象是一支护卫着大炮、炮兵辎重、行李、等等的护卫队。^①

在后方的部队——交通部队

我说的后方部队是指在休养营地的部队、铁道部队、筑路部队、电报部队、摩托部队、各种运输部队，所有这些部队都应归指挥交通的将官统率。此外，在一切战地后方勤务机关的各部门、各机构、各仓库中，也有大量的士兵，但是，由于在满洲这些士兵大部分是由核准了的编制所规定的，因此我就不谈他们了。不过，对于护

ii. 140 卫交通线的部队没有任何核准了的编制，这就导致牺牲步兵的战斗兵力来组成这种部队。各团团长埋怨他们的士兵在执行后方的任务上遭受巨大的消耗，而在后方的军官则埋怨他们拥有的士兵人数不足。当然，执行后方任务的部队应在动员时组成。在我的关于第一军的报告中谈交通部队的编制的那一部分里，有许多根据战争经验提出的有价值的材料，可以作为将来的有用的指南。到了1905年8月底，单单是第一军的兵员就达三十万人。第一军本身在后方的交通线深度为一百五十英里，宽度为三百三十英里，这包括守卫着极左翼的分遣队和在伦南坎普夫将军指挥下的左翼诸军团（我们经常以这些军团占领着一条七十英里左右的阵线）在内。在第一军（它由六个军团组成）的指挥交通的将军领导之下的，有六百五十名军官和官员，一万二千名士兵，二万五千匹马，而这个数目被认为是不充分的。在我的报告中，我估计一个军团在

^① 我几次向陆军部报告，派分遣队来补充前线部队的消耗，要比派给我们新建成编制的部队更为必需。

一天行军的交通线上所需交通部队如下：

	士兵数
1. 半连步兵	120
2. 运输队	320
3. 修路部队	25
4. 邮电工作队	5
<hr/>	
共 计	470

工 程 部 队

ii. 141

科学应用于战争方面的巨大发展是非常显著的，但是这次战争并没有迹象使用了科学部队，而如果在两个欧洲国家之间发生战争，是会使用这种部队的。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情况比我们要好得多，但是即使是他们，技术装备也还不足以应付不久将来的需要。迅速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铺设铁路（尤其是战地铁路）、建筑碎石路面的道路、组织无线电通讯、组织以日光反射信号机、灯光和旗传达信号，使用气球、汽车和自行车，对于所有这些工作的需要正在日益增加；而对于现在需要的人造障碍物、铁丝、地雷、手榴弹、炸药、挖战壕的工具、等等也必须大量储存，以备使用。建立比我们在满洲所能够利用的多得多的工程部队（包括工兵、电报部队和铁路部队），是必需的，这样所有这些技术装备就可以充分予以利用。在这里且不提为发挥交通的适当作用所必需的铁路部队（铁路部队人数之多少，必须视现有铁路及在战争期间建议铺设的铁路的长度多少而定），让我们来考虑一个辖有三个师的军团所需 ii. 142 工兵和电报部队的人数问题。

自从土耳其战争以来就被忘却了的铁锹，现在再一次重新获得了它的真正地位。由于现代炮火的火力很大和杀伤效果，除非适当地和聪明地利用挖掘工事，无论是从事进攻还是防御都不能不蒙受巨大的伤亡。为了进行长期防御，拥有不掩蔽的和掩蔽的

工事的坚固防御阵地和一切可能设置的各种人造障碍物是绝对必需的。因此,为了进攻这种阵地需要特殊部队,这种部队受过使用炸药、破坏障碍物和筑路的训练,因为重炮需要良好的道路和坚固的桥梁。

ii. 143 日本的每一个拥有十二个步兵营的师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兵营,而我们平均每一个师仅有一个工兵连。这个比例被证明是太小了。我们的工兵在构筑土木工事和筑路方面,做了卓越的工作,但是在同敌人实际接触方面做得很少,而且,显得非常奇怪的是,当一次战斗开始时,他们常常就被忘记了,甚至在我们进攻敌人的坚固防御阵地时,也是如此。我们在第二军里有几个工兵营,然而在突袭沈旦堡^①时,一个工兵连也没有被派随同强击部队前进。由于我们的工兵是如此稀罕,我们非常照顾他们,这从他们与步兵相比伤员人数之少可以得到证明。在我看来,为了从这个兵种获得最好的成果,必须使他们同其他部队有更多的联系,因此须使他们隶属于师,而不是把他们包括在军团里。如果我们成功地得到拥有四千名来福枪兵的强大的团,那么,我认为每一个团必须拥有一个由二百五十名士兵组成的工兵连(这既是为了防御,也是为了进攻),这就是说,每一个师将拥有一个辖有四个连的由一千名士兵组成的工兵营。这些工兵应该受过非常迅速地设置障碍物的训练,并且应该拥有破坏这些障碍物的必要工具和装备。铁丝的大量储备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假定,每一个师应拥有供应两个防御据点所需铁丝(比方说每个据点需要一吨铁丝)的充分储备。

此外,每一个师应拥有一个由六个排组成的战地电报连,以便在派往前线的每个部队与师的参谋部门之间组织迅速的通讯联系。每一个团应有一个电报排,这个排应有电话^②、旗、自行车或汽

① 黑沟台战斗。——编者

② 我曾在满洲试用过的陆军上校尤金驮载电话系统,是很好的。

车等装备，以使用以建立通讯联系。每一个辖有三个师的军团应 ii. 144
拥有一个由三个营组成的工兵旅、一个由五个连组成的战地电报
营、一个地雷连、一个气球排和一个铁路营。电报营五个连中的两
个连应保持军团与军部、其它军团、本军团的各个师、炮兵辎重队、
行李队与后备队之间的通讯联系。

如我曾屡次提到过的，我们的主要缺点之一是情报的缺乏。由
于这个缺点以及因此而失去联系，使指挥官们不能明智地指挥战
斗，或不断地向军团长、军长和总司令报告正在发生的事情。日军的
每一个团在它前进时随即就装设了电话；我们经常在我们的陷阱中
发现他们的死去了的电话员，这种情况表明，这些电话员是紧
随火线士兵的。而我们则甚至在整个军团和军之间也会常常失去
联系；补救这种严重缺点的必要性是明显的，我们必须在和平时期
就练习怎样做到这一点。在演习中，每一个团前进时应立即用电话
与其旅长和师的参谋部门取得联系，重要的是，当情报通过电报
和电话传递进来时，师和军的参谋部门应立即在地图上确定双方
部队的位置。在以前，指挥官们能够通过望远境从高处观察整个 ii. 145
战场，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部队，并且能够根据硝烟来探索敌军步
兵和炮兵的位置。但是现在看不到任何东西。部队常常是看不到的，
眼睛所看到的只是爆炸的榴霰弹所发出的阵阵硝烟。因此，必须
根据地图拟定命令和部署，我们必须学会如何使这些地图经常
准确及时。为了使所有的情报可以立刻受到注意，除骑马的通讯
员传递来的通常的报告外，可以利用汽车、自行车尤其是电报和电
话组织一个“联络处”。为了获得这些重要的结果，在建立这个具
有以一切办法满足战斗、行军和休整的种种需要的性质的“联络
处”或“情报处”方面，我们必须支付相当多的费用。

在各团里有足够数量的工兵部队，将不仅帮助我们攻克由障
碍物加固的设防阵地，而且在攻克以后将帮助我们迅速地使这些

阵地适应于防御的需要。地雷连在未来战争中的工作无论在进攻还是防御方面(尤其是在防御方面)都将是十分重要的。它应负责保管爆破所需要的一切爆炸物,包括地雷、火棉弹和手榴弹。革命ii. 146 党和无政府主义者所扔炸弹的巨大效果,显示了炸弹在未来的战争中会有广泛的用途。如果能够找到愿意冒必死的危险以便炸死和平市民的狂热者,也一定可以找到愿意冲在火线前面并把炸弹扔进敌军障碍物的献身的士兵。

除以战地铁路材料供应各军外,每一个军团应拥有足够铺设三十英里铁路线(用蒸汽牵引或用马匹拖拉,按照环境而定)的材料。

炮 兵

我们根据经验知道,使用大炮的熟练技能比大炮的数量更为重要。在现代战争条件下,炮兵部队的阵地看不到时,在双方炮战中往往发射大量弹药而没有任何结果。一个炮兵旅如果有两至四门隐蔽得很好的大炮巧妙地从一个阵地转移到另一阵地就能固守他们自己的阵地,而且只要这些大炮能首先瞄准敌军的大炮,迅速的炮火就能使这些大炮具有使敌军蒙受惨重损失的威力。我们的最敏锐的和最有经验的炮手曾多次卓有成效地弄清楚敌人的炮位,但是我们的炮兵的破坏力一般不大。我们炮兵的一次非常没有效果的作战是在黑沟台进行的,在那里,由于我们力图占领沈旦ii. 147 堡,我们向每一个方形区^①发射了七万发炮弹,只有实际包含沈旦堡的方形区没有遭到炮击。我们的弹药的巨大消耗,也向我们强调指出:大炮在一支部队中的适当比例的问题是如何地必须加以仔细考虑。在这次战争中,由于在派遣分遣队前来补充消耗时间耽误太长,我们实际上常常是由于拥有太多的大炮而受到阻碍。我

^① 大概是在地图上划分的方形区。——编者

们常常必须以这样的师作战：师下面的四个团里只有大约六千至八千名士兵，而大炮却有完整的四十八门——其比例为每一千名来福枪兵有六至八门大炮，这是太多了。我们的大炮简直是一种障碍，尤其是当它们用完了弹药的时候。即使假定我们将能把拥有四千名来福枪兵的兵力的团（如我建议过的那样）投入战场，我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大炮的比例为每师有四十八门，或每一千名来福枪兵有三门，将会完全足够了。目前，从速射大炮发出的炮火是相当有威力和有足够效果的，因此四门大炮就可以被认为是一个战术上独立的战斗单位；但是组织这样大小的炮兵部队花费太大，并且需要太多的士兵。因此，放弃炮兵师的编制，并回到以前的拥有十二门大炮的炮兵中队的编制，把它分为三个连，每一个连在战术意义上将是独立单位，这样似乎是更为可取的。同一个步兵师在一起的这四十八门大炮——即四个炮兵中队——就可编为在师长指挥之下的一个炮兵团。每一个连可以由一名陆军上尉指挥，炮兵中队可以由一名陆军中校指挥，炮兵团可以由一名陆军上校指挥。 ii. 148

我们发现，为了在战斗中进行相互的和顺利的合作，最重要的是，各个炮兵中队应尽可能地与同一个步兵团一起作战。这样，密切的接触建立起来了，每一个兵种无私地支持另一个兵种。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我们的炮兵中队”，“我们的团”，在这些简单的说法中表示出一种深厚的感情。每一个炮兵中队应能不依靠它所属的炮兵团而独立作战。为进行山地战所需的山炮，应以与我对野战炮所建议的相同比例分配给步兵。

我们的大炮被证明是一种极好的武器。但是我们的榴霰弹对于在开阔地方的目标和军队虽然非常有效，对于看不见的目标、土木工事和泥墙却没有用处。因此，我们向敌军占领的村落发射的炮火产生的结果很小。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弹壳较厚和炸药较 ii. 149

重的新型炮弹。但是即使那样，象我们的野战炮炮弹那样的轻型炮弹，对于土木工事（目前，这种工事可以非常迅速地在阵地上构筑起来）的效果也将不会是很大的。为了为攻击这种防御工事扫清道路，并为了在进攻设防地点方面取得任何迅速的结果，我们必须拥有现代型的野战榴弹炮。这些榴弹炮应编在辖有两个炮兵中队的炮兵团（二十四门榴弹炮）之内，并隶属于军团，作为军团的炮兵部队。最后，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军应拥有一个轻装的攻城炮兵队，以便协助攻取坚固设防的哨所和异常坚固的防御工事。

炮兵辎重部队的组织是筹划得很好的，但是车辆不适合于满洲的道路。我对于表示赞成进一步增加机动车辆的意见是有顾虑的，因为我们由于各种各样的行李已经负担过度了。我想，在火车站和铁路交叉站临时组织地区性的炮兵辎重队，象我们在满洲所做的那样，是更为可取的。

小型武器的弹药是很少用完的，但是大炮的弹药常常极为缺乏，在辽阳、沙河和奉天的战斗以后，我们为补充炮兵和炮兵辎重队而储备的弹药耗尽了。据计算，来福枪弹药的平均消耗量如下：

ii. 150 一个营全日战斗，消耗二万一千发，最大消耗量为四十万发；一个营一小时的战斗，消耗一千七百发，最大消耗量为六万七千发。一个辖有四个营的步兵团所携带的弹药储备总数为八十万发。每一门速射野战炮在一天的战斗中弹药的平均消耗量为五十五发，最大消耗量为五百二十二发；一小时的战斗，消耗十发，最大消耗量为二百一十发。

在这次战争的早期战斗中，炮兵的工作变动很多，并且不是很成功的。但是当他们获得经验以后，许多炮兵中队就打得很出色，不仅在还击敌军大炮方面是如此，而且在还击敌军来福枪火力方面也是如此。与我们的炮兵在 1877 至 1878 年间的工作（在欧洲战场上）相比，我们在技能方面有了相当大的进步，并从许多炮

兵中队的死伤方面非常惨重的损失，证明了我们的炮手们是知道如何为国捐躯的。骑炮兵的工作完全依靠于炮兵中队所隶属的骑兵部队的指挥官们，当这些指挥官们真正打算战斗时，炮兵中队就发挥很大威力。作为这种情况的证明，只要回忆一下隶属于米斯琴科的外贝加尔哥萨克旅的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骑炮兵中队的英勇行为就足够了。这个炮兵中队及其年轻的指挥官是全军闻名的。它不止一次成功地同敌军的几个炮兵中队作战，而它的损失却是轻微的。有的时候我们的骑兵指挥官们不必要地急于退却，象第二军的骑兵在奉天战斗中的情况那样，在这次战斗中，同该骑 ii. 151 兵部队在一起的两个炮兵中队在十一天的战斗中的损失只有两名受伤和一名失踪。象我们过去拥有的四个骑兵团那样的兵力，只需有一个拥有六门大炮的炮兵中队就足够了。如上所述，每一个步兵师应有一个辖有四个炮兵中队的炮兵团(四十八门大炮)，或是每三个师应共有一百四十四门大炮。这三个炮兵团可以编为一个炮兵旅。每一个军团也应有一个拥有二十四门榴弹炮的炮兵团。

骑 兵

虽然我们的骑兵为数很多，但是它的工作并不副我们的期望，然而当它得到适当的指挥时，它可以干得很好。我的意见，骑兵所必需的主要改革是改进他们的训练。在教育骑兵使它感到应该象步兵那样顽强地作战以前，我们花在骑兵上的钱就会是白白地扔掉。如果步兵在损失了百分之五十的兵员以后仍然能够继续作战，骑兵应该也能够做到同样的事。在战斗时我们对骑兵照顾得太过分了；在不战斗时我们对骑兵又没有给予足够的注意。虽然他们并没有损失一名士兵，当第一颗榴霰弹在他们附近开始爆炸时，整个骑兵团就立即向后方转移。在奉天战斗中，四个骑兵团 ii. 152 (两团龙骑兵，两团哥萨克。获取情报并且抵抗乃木包围我军的主

力部队的最艰巨然而是最光荣的任务落到这四个骑兵团肩上)死亡的损失如下:

	士兵数
2月25日	2
3月2日	1
3月4日	1
3月5日	7
3月6日	2
3月7日	6
3月8日	1
3月9日	1
3月10日	1

共 计

22

上面的数字表明, 每一个骑兵连的死伤还不到一名士兵。几乎每一个步兵连的死伤人数都比这二十四名骑兵连要多。十分清楚的是, 这些骑兵部队并没有战斗, 而只是避开敌人。同样清楚的是, 由于回避战斗, 骑兵既未阻止敌军的移动, 也未获得关于敌军的任何情报。组成我们骑兵的士兵是极好的, 但是一切都取决于指挥官。在得利寺的战斗中, 西伯利亚第一军团的步兵损失了二千五百名士兵, 而隶属于同一个军团的普里莫尔斯克龙骑兵团却只损失一名士兵。

ii. 153 但是我再说一遍: 当他们的指挥官打算战斗时, 骑兵就执行了他们的任务, 并且遭受到严重损失。这可以举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在米斯琴科指挥下, 这个部队干得非常出色)和高加索骑兵旅为例。在桑索诺夫指挥下的西伯利亚哥萨克部队, 在辽阳和烟台煤矿比奥尔洛夫指挥下的某些步兵打得更为勇敢, 而顿河和奥伦堡部队的独立骑兵连与斯塔霍维奇指挥下的龙骑兵丝毫不比他们逊色。的确, 普里莫尔斯克龙骑兵团的士兵是很好的, 而是军官们未能发挥他们的长处。所有由哥萨克人组成的独立部队都干得很好, 但是, 期望诸如组成第三类哥萨克骑兵团的年龄大的士兵有

尚武的热情或怀有作出英勇业绩的强烈愿望，是完全不可能的。然而，当熟练地指挥时，即使是这些第三类哥萨克骑兵团也能作出好的工作。一般地说，哥萨克的马(尤其是外贝加尔的马)是太小了。顿河骑兵团的马虽然是强壮的，但不大能忍受艰苦。看到骑在他们的粗毛蓬松的小马上的外贝加尔哥萨克骑兵，使人们想到这是骑马的步兵，而不是骑兵。不过，整个说来，我们骑兵的作战，比俄土战争时丘洛夫将军和洛什卡雷夫将军指挥的骑兵在普列夫纳的作战要好得多。目前最大的困难是物色和训练骑兵军官。根据大多数的报道来看，在满洲，低级军官是好的，校官是中等的，将级军官(除了少数的例外)是不好的。 ii. 154

指挥一个骑兵团的军官的品格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由于他的优点和弱点会很快地被人所知，一旦一个在这样一种职位上的人显示出他自己不称职时，就应立即把他撤换掉。(这也适用于将级军官。)但是我难得看到一位师长或军团长会报告他们下面的高级指挥官的不称职；他们甚至隐瞒怯懦的事例。只是在战事结束时才泄露出来：有几名军官不仅显示出缺乏敏锐的精神，而且甚至缺乏个人的勇敢精神。有些团长年龄很大了；对一个五十五岁的人来说，指挥一个团作战，年龄是太大了。象在步兵中一样，骑兵旅长的工作应予改进，并且任命更有能力的人担任此职。应把现由骑兵师长掌握的执行权和行政权授予骑兵旅长。

三个骑兵旅应编为一个骑兵师，骑兵师长应被授予军团长的权力。不需有比骑兵师更高的编制了。每一个辖有三个骑兵旅的骑兵师应被配给一个拥有十二门大炮的骑炮兵中队(由三个各拥有四门大炮的骑炮兵连组成)。每一个辖有三个师的军团应增添一个骑兵旅或哥萨克旅。这个旅下面的一个团应作为师的骑兵，即每师有两个骑兵连。如果认为步兵师的师长在和平时熟悉骑兵的情况是可取的，那么，两个骑兵连应驻扎在他们指挥的步兵师 ii. 155

的驻在地区。

步 兵

象在以前的历次战争中一样,在满洲,战争的重担也是由我们的步兵来担负的。毫无疑问,在将来,步兵将仍然保持它作为主要兵种的名声。其他兵种的重要性如何,完全取决于它们帮助步兵击败敌人的程度,因为步兵是胜利或失败的最后决定者。但是步兵不能单独行动,而在现今,如果它在战斗中得不到炮兵、骑兵和工兵的帮助,如果现代科学的每一项资源没有发挥作用,不能减轻其繁重的任务,它就将或是失败,或是以过高的代价获得胜利。正是对于作为主要兵种的步兵,我们必须给予主要的注意。然而,在我们这里,人们认为,在战列步兵中服役不如在其他部门中服役那样光荣!我们从挑选步兵新兵的时刻起,就做一切事情来削弱步兵。甚至我们战列步兵所穿制服的式样也特别难看。人们看到步兵穿着旧式的不合身的军服,背着行军粮袋和各种各样的装备,负担过于沉重,一点也没有勇武的样子。这是不能忽视的一个方面,一名士兵的制服应该舒适和吸引人,几乎是同制服应该满足一切纯粹的军事需要同样重要。应该使各个军阶的军人都赞赏他们自己的服装并引以自豪。迄今为止,大多数的战列步兵军官都没有受过足够好的普通教育或军事教育。各兵种的军官都应受到不低于国立学校的中等标准的普通教育和不低于军事学校的程度的军事教育。我们应该教导战列步兵军官热爱并尊重步兵这个兵种,并懂得步兵在战斗中的特殊任务,因此必须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以便他们在任何社会中都可以成为受欢迎的客人。我们必须供给他们一套舒适的、廉价的和漂亮的制服。我们必须保护他们,不让他们的上级当他们的下级的面辱骂他们,并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鼓励他们发展独立精神。现今,单凭勇敢不足以取得胜利,知识、主

ii. 156

动性和乐于承担责任也是需要的。在过去，步兵在战斗中总是担负困难的任务，并且总是遭受巨大损失，但是，持续若干天的现代战斗对于他们的精神和身体的持久力提出比以前更高的要求。由于士兵中大部分是预备役士兵和短期服役的士兵，我们不能指望士兵会达到完善的程度。因此，更为必要的是，我们应采取步骤使我们的军官获得这样的持久力；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是幸运的，因为我们有极好的和积极响应的军官。在我们大部分的部队（团）不得不在其中作战的一切艰难环境下，最大的考验落到了步兵军官身上，而他们非常好地执行了他们的任务。为了了解主要的困难和危险落到谁身上，只须将步兵军官的死伤人数同他们在骑兵、炮兵和工兵中弟兄们的死伤人数加以比较，就完全够了。在某些步兵团里，甚至全部的军官更换了几次。下列数字可以说明他们遭受损失的程度：

	军官死 伤人数
东西伯利亚第三来福枪团	102
东西伯利亚第三十四来福枪团	89
东西伯利亚第三十六来福枪团	73
东西伯利亚第一来福枪团	71
东西伯利亚第四来福枪团	61
东西伯利亚第二十三来福枪团	50

回忆起这些军官和许多其他步兵团的军官的英勇作战情况，而不怀着深深的敬意和深厚的感情是不可能的。

必须始终记住，战列步兵不但在战时而且在和平时期也是我们军队的中坚力量。因此，我们应该比现在更重视在步兵中服役的人，并给予他们以较好的机会。目前团长的名单中包括过多的近卫军的军官或总参谋部的军官。我确信，如果要保持战列步兵中服役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消除目前近卫军和总参谋部的军官比他们兄弟部队的军官加速提升的这种不公平的情况。兄弟部队

的军官中产生许多能够成为优秀团长的人，需要做的事情是要知道如何挑选他们。自上一次俄土战争以来，他们无疑有了相当大的进步，我们应该从事安排，以一切办法来培养他们，使这种进步继续下去。

ii. 159 由于死伤很多，连长的更换过于频繁，不免影响效率，但是他们一般地都很好地执行了任务，象通常一样，他们的主要缺点是缺乏主动性。为了军队的利益起见，最重要的是，显示出特殊军事能力的(所有兵种的)大尉级军官应该迅速提升为校级军官。然而，送往圣彼得堡的推荐报告如果曾经处理过的话，也往往拖了很长时间。对于这样一种事务，应准许总司令有某种处理权，应授权给他可以由于在战场上的特殊功劳把低级军官提升到陆军中校的军阶。这样，有特殊能力的人就可以担任独立部队和团的指挥官，在这些职位上，指挥官的品格是十分重要的。常常有这样的事情：一个过去干得不好的团由于更换了团长而完全改变了它的特性。资历不应成为升级的唯一标准，而在满洲设立了陆军校官，就拥有了完全足够的人数，从这些人当中可以充分地挑选优秀的团长。在我们占领四平街阵地期间，在所有各军的团长中，有许多是优秀的军人，在这一点上，第一军特别幸运。虽然在参加这次战争的步兵旅长中有许多人被证明是一种失败，但是在团长当中有许多有能力的校官，他们升到将军级就使我们有了一些第一流的旅长。单是在第一军中就有莱奇茨基、斯捷尔尼茨基、杜什凯维奇、列沙、里埃德科、多博廷等少将。这样，即使他们是在不利的情况下作战，我们仍然在步兵军官中发现足够的优秀人才，这使我们对将来抱有一点信心。如果这次战争继续下去，在由于特殊功劳而升为将军的上校中，有许多人将会成为师的指挥官的。这是应该如此的，因为，如果一名团长有十分卓越的才能，他应该可以在一年以内升到甚至是军团长的职位。

ii. 160

我再重复说一遍：现今在战斗中落到步兵身上的任务是这样的特别困难，因此由于特别战功而提升步兵军官也应该特别迅速。我知道，即使是一位好的团长，也可能成为一位坏的师长；但是我也坚持：一位曾经成功地指挥过几次战斗，曾经显示出对他的工作有认识，敏锐、有进取心和个人勇敢精神，并曾经赢得他部下士兵信任的团长，应该尽可能迅速地予以提升。他最初可能发现作为一个高级指挥官在新的和更为复杂的环境下难以掌握他的工作（在这种环境下他必须依靠地图和别人的报告，而不是依靠他自己的眼、耳获得的直接证据），但是他仍然会掌握局势（即使是一位军团长所掌握的局势），要比其经验仅限于办公室工作和平时演习的某些将军好得多。

最后，为了赋予主要兵种——步兵（尤其是战列步兵）——以应有的重要性，我认为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ii. 161

1. 给予参加步兵的军官以较好的教育。
2. 改进他们的物质的和社会的地位。
3. 供给军官和士兵以较漂亮的制服。
4. 加速他们的提升并消除这样的制度——根据这种制度，近卫军和总参谋部的军官得到更迅速的提升，因而阻塞了他们的在步兵中的不幸兄弟们升迁到团长和师长的道路。
5. 尽可能地使卓越的连级军官在战时升迁到校官级的特别提升易于推行。
6. 将在作战中有特殊功勋的团长迅速提升到将军级，而不顾虑他们的资历如何或他们的升迁是否过于迅速。

这些建议中的最后两项显然也适用于其他兵种的军官。

编 制

按照我的意见，我们在这次战争中的种种经验已经显示，在我

们的陆军中必须实行下述编制：

ii. 162 步兵团：下辖四个营，每营有四个连。每连拥有二百五十个战斗员的兵力。每团除拥有十六个战斗连外，应有侦察排（骑马的和
不骑马的）和机枪队（携有十六挺手提机关枪）。每团兵力共计五千人。

骑兵和哥萨克团：仍如目前的编制，不予变更。

步兵旅：下辖两个团，共拥有八个营。

骑兵旅：下辖两个团，共拥有十二个骑兵连。

所有的旅都应该能够独立作战。

步兵师：下辖两个步兵旅、一个炮兵团^①、一个工兵营、一个电报连、两个连的骑兵、运输兵、炮兵辎重队、炊事人员、医院人员。共计拥有十七个营、四十八门炮和两个骑兵连。

骑兵师：下辖三个独立旅、一个骑炮兵中队。共计拥有三十六个骑兵连和十二门炮。

ii. 163 军团：下辖三个步兵师、一个炮兵旅（包括一个榴弹炮团）、一个骑兵旅、^②一个工兵旅、^③一个运输营、一个营地设在交通线上的营。共计拥有四十八个营、一百六十九门炮、十二个骑兵连和三个工兵营。

后备部队：编为独立旅，炮兵、骑兵和工兵的后备部队都应隶属于这个独立旅。每一个独立旅下辖八个营、两个炮兵中队（二十四门炮）、一个骑兵连、两个工兵连、半个连的电信兵、运输兵、医院人员和炊事人员。这些在独立的基础上编制起来的旅，可以隶属于军。这些旅可以被派遣为军后备队的一部分，或被派担任独立

① 在指挥关系上，炮兵团在各方面都应隶属于（步兵师）师长。炮兵旅旅长则必须在技术上监督和检查隶属于军团的所有的炮兵中队。

② 每师拥有一个骑兵团。

③ 每师拥有一个工兵营和一个工兵连；一个地雷连和两个电报连则作为军团的部队。

工作,守卫侧翼和后方,或被派为军团的一部分,根据情况而定。

我想,这样将会给予所有的部队以很大的独立性,而且在师和军团的编制以外建立独立的后备旅,常常可以防止在战斗进行中把这种后备旅的编制打散。把后备的战斗部队预先编成战斗编制,如师(辖有三个旅)或军团,并不是一种方便的或合适的办法,因为这些师或军团将不会象正规军那样有准备地迅速参与战斗。

在可以提高军队工作的地位,因而可以吸引最优秀的人参加军队工作的若干措施中,我认为除提供有吸引力的军服外,必需设立有别于参谋部门、行政部门和科室的军官所得军阶。按照我们军阶的等级,各级指挥官(哥萨克部队的军官除外)的军阶如下: ii. 164

在各个不同兵种中,少尉、掌旗官、中尉、上尉是授予在步兵连、骑兵连和炮兵中队里的低级军官的军阶。

大尉指挥一个步兵连或一个骑兵连。

中校指挥一个营、一个炮兵中队,或一个骑兵师。^①

上校指挥一个团或一个炮兵师。

少将指挥一个旅。

中将指挥一个师。

中或将上将指挥一个军团或一个军区。

对在参谋部门和科室服务的军官也授予这些军阶。因此,上校这个军阶,本应只授予指挥团的军官的,却也授予在行政和警察部门服务的人,而从未指挥过军队或甚至从未指挥过小部队的人,却也得到了各种等级的将军军阶,在我们的将军名册中,充斥着这些人的姓名。当我起草一项条例(规定限制不是实际在军队里服务的人升迁到将军军阶的人数)时,我很受到许多军官的烦扰,这些 ii. 165

① 原文如此。“骑兵师”有点使人误解。作者的意思是指比团为小的某种编制。
——编者

人担心,他们再要升迁可能会受到阻碍。目前在军官阶层中如此之多的军阶是不必要的。很可以减少一些,并且对于在各兵种担任军队里的工作的军官,可以给予他们以旧的俄国名称(哥萨克部队现仍坚持使用这些名称^①),即: Хорунжий(掌旗官)、Сотник(中尉)和 Есаул(大尉)。后来采用的 Под-есаул(上尉)这个军阶可以取消。Есаул(大尉)可以指挥步兵连、骑兵连和炮兵连; Сотник(中尉)可以指挥半个步兵连和半个骑兵连; Хорунжий(掌旗官)可以指挥排。一个连的正规编制将为一个 Есаул(大尉)、两个 Сотник(中尉)和四个 Хорунжий(掌旗官)。骑兵也应采用同样的编制。对于不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掌旗官、中尉和大尉等军阶可以保留,而少尉和上尉的军阶可以取消。目前采用的属于校官的各种军阶,可以授予不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而 Войсковой Старшина ii. 166(中校)和上校的称号,则可授予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前者可以指挥一个营、一个骑兵师或一个炮兵师;而后者则可指挥各兵种的团。中校这个军阶可以保留,授予参谋部门和科室的军官,而少校这个军阶则应予以采用,以代替上校军阶。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的军阶名称,一般地与其职务的性质相对应,例如,指挥旅的军官应称为旅长,统率师的军官称为师长(将军),统率军团的军官称为军团长(将军)。军团长的军阶也应授予军区的指挥官和他们的助

① 在哥萨克部队中 {
 Войсковой Старшина = 中校
 Есаул = 大尉
 Сотник = 中尉
 Хорунжий = 掌旗官

(作者在这几段中表达的主要意思是:为了提高在军队里工作的军官的地位,必须使这些军官的军阶与不在军队里工作的军官的军阶有所区别。为此,并建议在军队里工作的军官可以使用几个旧的俄国名称,如 Хорунжий、Сотник、Есаул…等,而不用外来名称,如 Cornet、Lieutenant、Captain…等。在译文中,如将这些名称仍译为掌旗官、中尉、大尉……等,则与外来名称毫无区别,且使我国读者不能明了作者的意思,故将俄国名称写入译文中,而将中译名注于每一名称之后。——译者)

理人员。不是实际在军队里服务而能得到军团长称号的只应有三名军官：陆军大臣、总参谋长和司令部参谋长。对于不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只应保留将军的两个等级——少将和中将。步兵将军、骑兵将军等等称号应予废除。这样，军官的等级将如下所示：

1. 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

排的指挥官	Хорунжий(掌旗官)	
半个步兵连、半个骑兵连的指挥官	Сотник(中尉)	
步兵连、骑兵连、炮兵连的指挥官	Есаул(大尉)	
营、炮兵中队、骑兵师的指挥官	Войсковой Старшина(中校)	ii. 167
团的指挥官	上校	
旅的指挥官	旅长	
师的指挥官	师长(将军)	
军团的指挥官	军团长(将军)	

2. 不在军队里服务的军官

掌旗官、中尉、大尉、中校、少校、少将和中将。

除军区的参谋长外，应禁止把不在军队中服务的将级军官调到军队中服务。任命军团参谋长和军区军需监，应授予少校军阶。调到其他科室的军官应取得纯粹的文官官阶，而在退休时升级的办法应予废止。为了加速提升有突出表现的上校，应该可以任命他们为旅长。对值得提升的军官加速提升的问题上，目前存在着很大的混乱，因为按照目前的办法，上校能被任命为独立旅的旅长，然而却不能被任命为非独立旅的旅长。

● 由于在战争中军官比士兵更为紧张，因此，重要的是：在给予在军队中服务的军官以种种特权时，应该十分注意保证他们在身体方面有良好的健康状态。一种特别坏的不健全的形态是由于肥胖而引起的，而不幸的是，在满洲甚至我们的连级军官中也有许多 ii. 168 人由于这种情况而受到损害。我们一位团长是如此肥胖，以致他

实际上行动十分不便,因而虽然没有受伤,却在得利寺被敌军俘虏了。至于士兵,背着八十磅重的装备爬山,对于四十岁或四十岁以上的人来说,就使得行军非常费劲。连级军官和校官完全可以服务到五十岁,但是骑兵的指挥官不应超过五十岁,而步兵团级军官不应超过五十五岁。旅长和师长的年龄界限应为六十岁,而军团长的年龄界限则应为六十三岁。我们现有的关于年龄限制的各种规定的必要性,在这次战争中成为显而易见的了,因为由于这些规定的结果,我们的校官相对来说比较年轻。但是我们的经验证明,年龄限制应该按照我在上面提到的方向更进一步降低。

ii. 169 上面提出的各项建议(我认为这些建议将有助于增加我们的战斗实力)毕竟只是编制和准备方面的细节。有助于保证胜利的主要因素仍然和过去的情况一样——高昂的士气和迅速集中优势兵力的能力。外交必须为战争作准备,以便在必要时使帝国的所有武装力量能够投入战场,而且我们必须拥有许多有效率的铁路,使优势兵力易于迅速集中。战斗计划将视这两项最重要的因素情况如何而定。拥有采取攻势的能力可以取得极大优势,因为采取攻势的一方可以获得主动权。在攻势之下,防御者的主力军被迫后退,他的准备较差的军队或许被粉碎,而他的援军则被各个击破。其结果是,进攻者的士气高涨,而敌军的士气则不可避免地低落。在这种情况下,要重新建立均势,不仅是需要时间的问题,而且是极端困难的。采取防御的作战计划,必须具有对最后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和极大的忍耐力,以便克服一切困难,并且在最后采取攻势,击败敌军。

从我在本书上册对于俄国军队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完成的业绩的简短叙述中,可以看到,我们在从事的大部分战争中是采取攻势的。俄国虽然没有铁路,但是拥有庞大的平时常备军(服兵役的年限为二十五年),在装备和训练方面与敌军相等而且常常居于优

势，^①因此能够首先发动战争，并且把它的意志强加于敌人——即采取攻势。现在我们在备战方面已经落在我们的西方邻国的后面，而最近这次战争显示了这样的事实：我们也已经被我们的东方邻国所超过了。无疑，俄国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将会及时地寻得力量和办法，在战斗实力方面在其他列强当中重新恢复它从前的地位；但是这将需要若干年不停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的铁路系统没有很大的发展，军队的迅速集中和采取进攻的战略是不可能的。没人能够说，是否会允许我们等待到一切事情都尽善尽美以后再继续进行战争，或者我们是否将再一次在做好准备以前就被卷入战争。因此，不失时机地着手准备在象最近这次战争中那样不利的条件下进行战争，是绝对必要的。 ii. 170

在这里我不谈为了战争在外交上进行准备的必要性，也不谈俄国社会各阶层在战争中的态度，而想极为一般地谈论一些措施，按照我的意见，为了更有效地使用已可由我们随意使用的资源起见，应该采取这些措施。在战场上作战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即部队一旦参加了战斗就将不被调换下来）最后必须得到承认。因此，每一个投入战斗的部队应该知道，它将得到支援，但是不能被调换下来。这个原则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无差别地适用于参加野战军的所有各级官兵，在取得胜利以前，不应有一个人可以回家或在战场以外得到另外的职位。那些证明他们自己不适合于他们在前线的职位的人，应给予适合于他们的身体和智力条件的其他职务。在象卫国战争这样一种严肃的事业中，个人野心不应或不能有它的位置，而一个人从野战军中被撤职，应被认为是最大的耻辱——这是终身的服役也不能抹掉的污点。这样被撤职的军官应被褫夺军阶，被开除出军队，并应取消在军队中获得的一切权利和特权。这样被撤职的军官和士兵，应被剥夺在任何政府部门任 ii. 171

^① 在高加索同土耳其的战争，在中亚细亚同波斯的战争。

职的权利，而不管是否是在陆军部任职。

对怯懦的惩罚应为死刑。

我已谈过在战场上有良好表现的军官迅速提升的问题，而表现不好的军官也应有适当的处分。表明他们自己不称职的高级指挥官应立即被从他们的指挥岗位上撤换下来，并给予与他们的能力相称的职位。被认为不称职的军团长和师长，为了照顾他们的荣誉，可以呈请准予让他们留在军队里指挥师或旅。在战争中只有一种资历能够得到承认——即取得胜利的能力。不能胜任战场工作的将级军官，在交通线上、在指挥和训练后备部队方面、在管理医院方面、在管理当地居民方面、等等，能做非常有用的工作。如果我们想要能够打败强大的敌人，我们必须不允许一位被免了职的军团长和一位甚至没有表现个人勇敢的军官成为帝国国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我们也必须不允许经不起战争考验的低级军官在非动员的部队中获得职位；也必须不允许由于健康不佳和在各种各样的借口下离开前线的几百名军官逗留在外而迟迟不归队。我就不谈下面这样的事情了：一位军长在实际战斗期间甚至没有向总司令报告就擅自离开了他所指挥的军。

如果在和平时期设立荣誉法庭是必要的，那么在战时就更有必要了。除在各团组织荣誉法庭外，在各军团和各军也应组织荣誉法庭，以便审判直至师长一级的高级军官在战斗中的行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对于在战斗中表示怯懦的士兵或在战斗以外的场合犯有可耻行为的罪行的士兵免于追究的办法应立即停止执行。为了这个目的，我认为我们应在每一个连和独立部队组织士兵的荣誉法庭，作为镇压在士兵中发现的最坏份子的一项办法。因为，在现代，一般人缺乏道德修养，因此，设立若干这样的法庭，根据这些法庭的判决，可以给予士兵以体罚，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在帮助或运送伤员的借口下离开战场的士兵——除特地委派执行这项任

务的士兵外——应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把一次战斗进行到底，如有必要，军官们必须毫不迟疑地牺牲他们最后的后备队，甚至牺牲他们自己。对这样的事情必须引起注意，即在战争中发生过这样的事例：军官们接到撤退的命令后，他们自己首先走掉。这样一种事例总是会迅速影响别人的，并且会导致部队的瓦解和士兵对指挥官丧失信任。在战斗中能够支援邻近部队而不予支援的指挥官应予免职，交付审判，如有必要，并应处以死刑。各级指挥官应 ii. 174 充分认识士兵中每一个人的价值。因此，为了保持部队尽可能的强大，在进行战斗期间应尽一切努力。

最后，我想简短地谈几点。我想允许我自己表示这样的意见：关于在战争中授与奖赏的现行规定需要修订并作相当大的修改。目前授与的勋章是太多了。需要注意的另一点是装病的问题。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尽管军官的生活较好，但是疾病在军官中比在士兵中更为流行。同时，不幸的是，当我在视察医院时，军医们不止一次地提请我注意不仅在士兵中而且在军官中有装病的事例。当然，绝大多数病员是真正患病的，但是许多的病是由于个人没有适当地注意身体健康而引起的。军官们必须认识到，不管负伤是怎样光荣的事情，在他们的伙伴们正在战斗的时候，而他们自己却留在医院里，也是可耻的。应该为各级军官作出规定：在装病的情况下，患病期间应不计算服役期，而且在患病期间应不发给薪饷。凡离职两个月以上的军官和官员，应予免职，并任命他们在后备部队中任职。在这次战争中，值得注意的许多令人遗憾的事情之一是：士兵和军官常常在可耻的情况下被俘。现行条例（规定关于被 ii. 175 俘事例的所有情况均应予以调查）并没有遵照执行。曾经被俘收容在日本而直接回到俄国的军官们，甚至被陆军部任命为师长这样高的职位。只有一件事情可以为被俘辩解——负伤的事实。所有未曾负伤就投降的人，由于没有战斗到底，都应由军事法庭加以

审判。

关于要塞的条例应予修订，其中规定的准许要塞投降的各种原因应完全删去，因为要塞可能被敌人攻占，但是，在任何情况下，永远不应投降。以要塞让与敌人的要塞司令官、以军舰放弃与敌人的舰长、放下武器的部队的指挥官，都应被认为丧失一切权利，并应不经审判就被宣判枪决，而未曾负伤就投降的不担任指挥职务的一切军官都应自投降之日起被褫夺军阶。在这次战争期间，报纸不分青红皂白的揭露，在破坏指挥官的威信和降低士兵的士气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在下次战争中，只有可以有助于鼓励士兵的事件才能被准许在报纸上登载。当实际战斗结束，情况改变时，只是到了那时，为了有益于军队起见，对于一切缺点进行彻底调查，才是必要的。

但是，只是军队中各级官兵充满着坚持战斗直至赢得胜利的精神是不够的，还必须全国上下都怀抱着同样的感情，并且竭尽全力加以协助，使由军队进行的战争获得胜利才行。由于我们落后的状态(特别是关于铁路方面)，在下次战争中，我们注定了兵力的集中是缓慢的，因此注定了战争将是持久的。由于我们不能立即将大量部队投入战场，并夺取主动权，我们可能将再一次被迫承受无准备的后果——常常打败，并且退却。但是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坚信能获得最后胜利，不管在开始时情况是怎样不利。俄国的精神资源和物质资源是无穷无尽的，而军队和整个国家争取胜利的坚定决心乃是我们获得胜利的主要保证。

第十二章

ii. 177

战争总结

我在本书第八、九、十和十一章中已经评论过^①我们失败的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可以概括为三类：

1. 与陆军部无关的原因。
2. 与陆军部有关的原因，对于这些原因，在战场上的军官是没有责任的。
3. 只是战场上的军官负有责任的原因。

第一类原因包括：

(a) 缺乏任何外交上的布置，这样的布置会使我们能够按照情况的需要自由地派出和展开我们的整个军队（这样的外交布置与普鲁士从前的外交布置相同，那次的外交布置，使普鲁士于1870—1871年能够调动它的全部武装部队同法国作战）。

ii. 178

(b) 在战争期间，舰队所起的作用只是次要的。

(c) 西伯利亚铁路和中东铁路的运输能力很差。

(d) 俄国国内秩序混乱，这影响了军队的士气。

第二类原因包括：

(a) 在动员援军支援远东方面行动迟缓。

(b) 在战争期间，把俄国欧洲部分各军区受过很好训练的士兵——这些人仍然有义务服兵役——转入预备役，而没有受过训

^① 本章第一部分，是扼要重述第一至第七章中已经写过的内容，经删去未译。现在译出的，是更多地谈论战争本身的部分。——编者

练的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士兵却被送到前线去。

(c) 派遣分遣队到前线时，已经太迟了。(这种情况的原因，也是由于铁路的效率不高。)

(d) 迟迟不提升在战场上有特殊表现的人(许多推荐被忽视了)。

(e) 我们的技术装备不足。

(f) 编制上的缺点(没有保护交通线的部队、运输工具缺乏、军和军团的编制臃肿不灵)。

(g) 不论是军官还是士兵，人员均不足额。

ii. 179

第三类原因包括：

(a) 在军队中缺乏一种真正的尚武情绪。

(b) 某些部队在战斗中士气不高。

(c) 各级指挥官缺乏执行委派给他们的任务的决心。

(d) 在战争的压力下打乱了部队的编制。

我们军队的种种弱点(在十九世纪下半叶进行的各次战争中，这些缺点是十分显著的)，在自从克里米亚战争以来的五十年期间里并没有被完全消除，而在最近这次战争中又再一次是明显的，这就是：

1. 在技术部队和技术装备方面，我们比敌军差。

2. “指挥”不能令人满意。

3. 我军战术方面的训练不足。

4. 我们没有以相当大的优势兵力来保证胜利。

我们对于我们面前的目的，没有任何清楚的想法，因此在执行中没有表现出有足够的决心。

对于我们的失败提出了如此之多的各种各样的理由，因此很自然地发生了下面的问题：我的意见——如果我们未曾如此仓促地讲和，我军将会获得胜利的荣誉。在战场上的官兵大部分抱有

同样的意见——有什么真正的根据？

ii. 180

我抱有我们能够、而且应该在这次战争中获得胜利的信念，是根据下列情况：

- I. 我们的物质力量的稳步增长。
- II. 我们的精神力量的增长。
- III. 敌军在上列两方面的逐渐退步。

I

我们已经看到，我们铁路的低效率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危害。然而，虽然在战争爆发前六个月的时候，为了军事目的只能开出两对短列车，当讲和的时候，我们在二十四小时内已能开出十对甚至十二对长列车。因此，在战争期间铁路的运输能力增长了六倍，而且还可以更进一步地增长。尽管遭受到许多挫折，我们兵员的数目继续增长，当讲和时已达一百万名，而这些兵员（包括新到的分遣队、新的军团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队）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没有经历过战斗。再者，由于改进了的铁路运输和对于一切当地资源的适当开发，整个军队为了战斗和生活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都得到了保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我们已经得到了各种各样的大炮（各种大炮有适当的比例）、轻便铁路材料的储备、电报和无线电报器材的储备、挖掘战壕的工具和技术工具以及各种装备。我们在四平街、公主岭和宽城子已构筑了三条坚固的防线；我们在后方的交通是安全的；几乎每一个军团都拥有它自己的铁路线；在松花江和其他河流上都架设了许多桥梁。所有部队的战斗力都已大大地增强了。俄国为了继续进行战争所需人力资源，比日本的人力资源丰富，因为我们不仅没有调动近卫军和掷弹兵，而且我们陆军的大部分还仍然留在国内。

ii. 181

II

虽然提高军队的士气决没有改进其物质条件那样容易，但是同我们的士兵接触最多的军官们确信：我们做到了这一点。这可能是俄国士兵的一种特色：他具有缓慢地发展的潜在的精神力量，

ii. 182 这种精神力量是个人经受的任何考验所不能摧毁的。对于研究这次战争的人来说，显得非常清楚的是：随着战争的进展，我们的士兵表现出日益增长的顽强决心的精神。在辽阳战役以前的初期战斗——在得利寺和大石桥的战斗——中，我们在遭到较小的损失以后就撤退了。在大石桥战斗中，有两个军团撤退，在羊子岭（音译）战斗中，有一个军团撤退，虽然这三个军团所遭的损失加在一起，还没有东西伯利亚第一来福枪团一个团在奉天战役中损失的士兵那样多。在辽阳，我们的士兵打得比以前的那些次战斗好；在沙河，他们表现出比在辽阳更好的士气；而在奉天，许多部队表现得有更进一步的改善。因此，我们全都确信，如果防守四平街阵地，或是从四平街阵地发起攻势，士兵们将会打得甚至比在奉天更好，因为我们军队表现出来的在士气方面的改善，是持续不断地和稳步地提高的。士兵们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在沙河同敌人直接接触的长期对峙期间，学到很多东西。甚至在初期战斗中屡遭失败的后备部队，在奉天也以极大的勇敢和坚定从事战斗。这种情况，只须回忆第七十一师和第五十四师、最近到达的第五十五师和第六十一师的后备部队在奉天的英勇业绩，以及第十、第十七、

ii. 183 和第一军团的许多团的英勇业绩，就可以得到证明了。的确，西伯利亚第四军团的各个团和各个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在这次战争中自始至终是一个榜样。

沙皇在 1905 年 1 月 14 日给予陆海军的命令中以极大的远见预言了我军在士气方面的这种改善，尽管我军遭到了挫败。他对

于我军精神方面的信念,是在下列难以忘记的语句中表示出来的:

“虽然我们可能由于降临我们身上的灾难和损失而痛心,让我们不要沮丧。正是由于这些灾难和损失,俄国的力量会得到恢复,它的威力将会增长。”

当战斗持续下去时,我们在战术方面获得了相应的进步。我们学会了怎样进攻和利用地形,怎样使用大炮,并记得了在手中保持强大后备队的教训〔在四平街阵地,单单是满洲第一军的后备队就有八十个营〕。我们也学会了怎样获得敌军的情报。在战争结束时,我们关于日军部署的知识,比历来更为完全。的确,我们不仅对于他们的主力,而且对于他们的许多个别部队的确实的驻扎地点,都拥有准确的情报。(这主要是从俘虏那里获得的。)

我们得到了增援的三十万服现役的正规兵(其中大部分是自 ii. 184 愿到前线的)和 1905 年的新兵。这些年轻士兵是准备面临任何危险的;他们到达前线时情绪极好,他们的愉快和明显地渴望参加战斗的心情,使人高兴。年龄较大的预备役士兵大部分被分派担任后方的任务。其结果,当满洲第一军从四平街阵地向敌军发动多次袭击和进行侦察,或从事任何其他冒险工作时,总有志愿者踊跃参加。不过,我们士气方面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对于任命的指挥官进行了更为仔细的挑选。这些军官中有许多人现在开始显示高度的军事才能。在奉天周围的战斗造就了若干有才能的将军,在以后的战斗中,我们可以充分地依靠他们。关于满洲第一军在奉天战斗以后为新的战斗作准备的总的问题,我在关于这支军队的报告的结尾写道:

“由于占领四平街阵地,我军发现面临着大量的工作。

“没有邻近地区的地图,而我们拥有的关于敌军的少量情报,其主要的显著之点就是它的绝对模糊。没有通向后方的道路,当地没有存放我军的供应品的仓库,松花江没有可供涉

水过江的浅滩,这是一项经常性的威胁,因为在我们前面仍然还会有惯常的春汛。

“不过,各级官兵协同的和自愿的努力不久便改变了所有这些情况。从四平街车站到公主岭村的防线实际上成为不能攻克的,业已下令把它作为储存军火的仓库使用并在那里存放了大量的储备品。在5月份,在我军左翼后面有八十个营的后备队,实际上在五个军团中有二分之一是驻扎在那里的。

“一幅两俄里^①的地图已经绘制出来,地图不仅绘出了在我们后方的地区,而且也绘出了直至敌军阵地的地带。

“使用了侦察和间谍,我们逐渐地详细审查了我们的不准确的情报,直至我们的情报正确。我们能够首先查出敌人的军的部署,然后查出敌人师的部署,最后查出敌人小部队的部署。

“后方的工作也以同样的精力进行着:道路修筑起来了,松花江上架设了桥梁,仓库建筑起来了。

“在7月初,我军几乎已准备好进攻了。唯一缺乏的东西是用马拉的轻便铁路的装备。没有这种装备,就不可能以任何巨大力量进攻。

“在最近几个月中,一条用马拉的铁路已铺筑到牙木子(音译),这样,为进攻输送供应品的工作就得到了保证。

“已进行了一系列互有联系的侦察,以便了解阵地前面的地形。

“由于若干分遣队和新部队的补充,我军兵力几乎已达到满额。

“在8月份,我军为了战斗已完全准备好了,我军的各个经验丰富的军团现已恢复过来,又经过增援,怀着充分的信

^① 两俄里约等于1¹/₃英里。——编者

心等待着进攻的命令。”

指挥满洲第二军(在奉天,这个军遭受的损失最为惨重)的比尔德林将军在他关于这个军的报告的结尾写道:

“在奉天战斗中被击碎了和瓦解了的我军占领了四平街阵地,但是它非常迅速地恢复过来了。由于年轻士兵和预备役士兵的到达,所有各部队都得到了补充,达到了充分的战时兵额,只是在军官方面仍然极其缺乏。骑兵部队得到了新来的骑兵连和炮兵后备队的马匹的增援;失去的或损坏了的大炮和车辆得到了补充。每一个师都由用马拉的和不用马拉的机枪队予以加强,榴弹炮兵中队已经组织起来;沿着整个阵地和在阵地后方已铺筑了一条用马拉的轻便铁路;而且,由于从最近的经验获得了益处,现在军队对于各种运动和演习已彻底地熟练了。这样,我们这支军队,由于它的人数、物质方面的组织、和训练,在战争结束时比在战争开始时已为战斗真正地作了较好的准备,并且再一次对敌军构成了威胁。”

在巴蒂阿诺夫将军指挥下的满洲第三军,构成了第一军和第二军的后备队,拥有最近到达并且没有参加过战斗的若干军团,它 ii. 187也是一支庞大和可靠的军队。

当然,每一家都有它不愿说的事,在由三个军构成的这样一支庞大军队中,很自然地会有弱点。因此,可以发现在士兵甚至军官中有某些胆小的家伙,他们不相信胜利的可能性。但是即使是这样的人,在头一次打了胜仗以后,也会振作精神,做出好的工作。

从我参加满洲军队的时刻起,我总是告诉我遇见的或检阅的每一个部队:这次战争只是在我们获得胜利以后才能够结束;在获得胜利以前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批准回家;当充足的援军到达时,胜利是必然的。对于这些事实的信念已深入军官们和士兵们心中。在奉天战役以前和以后,我不止一次地听到士兵们

——特别是在医院里的士兵们——自己说，在敌人被打败以前，他们不能回家。他们的话是：“妇女们将会嘲笑我们。”另外一个重要因素，而且是俄国人特别珍视的因素，是对他身体上的需要和他的健康的经常和亲切的照顾。对于没有参加过实际战斗的任何人来说，要了解由于剧烈战斗而被瓦解和受到严重挫折的部队如果忽然发现为他们准备了热的饭食时如何能够重新振作起来，是困难的。一夜的休息，一顿饱餐，补充了弹药，一次安静的点名，和他们军官的镇定态度——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使我们的极好士兵再一次准备去斗争。至于我军士气的一般情况，我应该说，我们的士兵越接近敌人，他们的精神就越好，而且吹毛求疵的评论和批评就越少（这种评论和批评总是非常有害的）；他们没有时间看报纸了。当我视察第一军的先头部队（分别由特鲁贝茨基亲王、蒂霍米罗夫、雷德金等上校和喀什塔林斯基将军指挥的西伯利亚第二、第三、第四军团和第一军团的部队）时，我发现人们普遍地渴望进攻。士兵们得到很好的照顾，训练是严格的，士兵和军官的态度是平静的和沉着坚决的。但是，离开前线的距离越远，而且同敌人越是脱离了直接接触，就越有时间谈话和聊天。正是在交通线上（尤其是在哈尔滨），除了使军队丢脸的其他形式的放荡行为外，发生了喝醉酒和赌博的事情。正是在这样的地方，胆小的人聚集起来（他们在任何借口下离开前线，甚至在战斗正在进行时也离开前线），的确，还能期待他们有什么另外的表现呢？我们的某些新闻记者以他们在哈尔滨看到的情形来判断我们军队，而且甚至在俄国国内也以这种标准来判断我们，这是令人十分遗憾的。未能经受住烈火考验的许多军官和其他掌权的人在俄国住着，从他们那里是不能期待听到关于我军的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以及它准备把战争继续打下去的正确意见的。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中碰巧也有两位曾在前线呆过的将级军官。一位是他自己离开

了军队,另一位是被革去了军团长的职务。显然,象这样的人,对于这个新设立的和重要的委员会坚持必须进行战争的意见是不能有多大帮助的。

我采取的提高和维持我军士气的一个步骤,是迅速提升那些在战场上有突出表现的军官。我们将大尉提升,以此获得了若干最好的团级高级军官,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任命了许多有突出表现的军官担任团长,而不管他们缺乏资历,或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仅仅是中校这个事实。在很短的时间里,这些指挥官把他们的团改进得几乎认不出来了,这种情况充分证明了在战争中仔细挑选军官是何等重要。我们把那些在工作中有突出表现的上校提升为少将,以此办法,开始获得了一批优秀的值得充分信赖的旅长,而且这些人为从中挑选师长和军团长提供了极好的人选。 ii. 190

我为了赢得胜利而采取的进一步的步骤是对满洲的中国居民实行人道的待遇。我和在我下面一级的人坚持他们应受到保护,不使他们经受不必要的困苦(在战争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坚持他们的财产应受到保护,我并且认为,对于他们带来的每一样东西,都必须立即付给现款。这样做对我们获得供应品大有帮助,而且,尽管我们自己有时经受了巨大的困苦,我始终坚持,应该保持同中国人的这种关系。因此,我没有一次曾被迫求助于征用供应品和运输工具的办法,我也未曾使用武力来获得当地的劳工。这样做的结果超出了我的一切期望,因为,尽管敌人作出巨大努力来煽动中国居民反对我们,尽管许多中国当局自己对我们怀有不友好的感情,居民的大多数了解我们的态度,仍然保持平静,而且,由于他们把自己生产的东西自由地送来给我们,便拯救了我们,使我们免于饥饿。虽然他们可以用杀死独处的官员、袭击小分队、破坏电报线和道路的办法容易地使我们处于一种持久的惊慌状态,但是他们——只有很少例外——在战场上继续和平地生活下去,在某 ii. 191

些事例中甚至和我们一起同红胡子战斗。

这样，除继续进行战争的战斗计划——在计划中预见到甚至撤退到哈尔滨后面的可能性——外，我为了取得胜利而采取的主要办法如下：

1. 向各级官兵灌输坚定的信念：这次战争只能以胜利结束，在我们的努力获得胜利以前，我们之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家。

2. 所有掌权的军官要时刻想到作出一种慈父般地经常努力，照顾部队的生活舒适与保持部队的健康（在战争的紧急情况许可的范围内）。

3. 以一切办法帮助部队作好准备工作，特别是不考虑资历加速提升有突出表现的军官。

4. 对于满洲的中国居民保持一致的人道的态度。

III

敌军不仅在物质方面而且在精神方面也开始削弱了。

ii. 192 要把我军向北赶回到四平街，日本人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我已经说过（见第七章），我们司令部的参谋部估计，日本军队的平时编制共计为十一万人〔其中有一万三千人由于休假经常离队〕，后备部队和国防义勇军仅为三十一万五千人，因此我们考虑，能够服兵役的总人数不超过四十二万五千人。但是，根据日军医疗当局的数字，有一百万以上的人被征召服兵役，这一定要求国家（日本）极大的努力。而且，在战争期间，也发现有必要修改现行法律，以便使那些已经服完预备役的人在正规军中继续服役一个时期，并且于1904年和1905年不仅把1905年适龄服役的人征召入伍，而且也征召于1906年适龄服役的人。（在战争将结束时，我们在战俘中开始发现有老人和儿童。）他们的死伤数字是很高的。单单在东京的荣誉公墓，就有在战斗中阵亡的六万零六百

人被埋葬在那里,而且除此之外还必须加上因伤致死的五万多人。因此,单单根据这两项数字,他们似乎损失了十一万人——这个数字等于日本军队的全部平时编制。考虑到我们的平时常备军有一百万人,比较说来我们的损失要比日本人的损失轻微得多。战争期间在他们的医院里住过院的约五十五万四千人中,有二十二万人^①是因伤住院的。他们由于被击毙、因伤致死和患病共计损失了十三万五千人。他们在军官方面损失特别惨重,他们的士兵以如此顽强勇敢的精神作战,以致在某些情况下几乎整个团甚至整个旅被歼灭。例如,在下列战斗中,就发生了这种情况:10月15日攻击普蒂洛夫山^②的战斗;2月份攻击西伯利亚第三军团防守的胶土岭(音译)[隘口]阵地的战斗;3月7日在土洪屯^③及其他据点的战斗。在辽阳和奉天,大部分敌军在正面攻击我们的阵地时遭受惨重损失,而未能攻下。这些战斗的命运是由于迂回运动而决定的。在沙河战斗中,他们竭尽全力试图迫使我们退回到奉天,他们的许多部队一次又一次地从我们阵地前被赶走,只是在我们自动放弃这些阵地以后才占领它们。这些日本军队看到他们的个人努力未获成功,他们的士气不能不发生动摇。再者,我们的士兵显示的日益高涨的决心,一定已经影响他们的士气。他们的正规军已有相当多的人丧失了战斗力,不管怎样迅速地征召和训练新兵,也不能期待这些新兵能够象他们的伙伴在初期战斗中那样,在防御时表现出同样的顽强,在进攻时表现出同样的勇猛。这种情况,在奉天前面的战斗中是显著的,但是在四平街附近的战斗中尤其显著。当我们的侦察队和前哨部队越来越勇敢地进逼敌人时,我们开始注意到敌人比从前缺乏进取心,同时也缺乏他们以前那

① 原文如此。应为死、伤人数(参阅原书第I卷第207页)——编者

② 在沙河——编者

③ 在奉天——编者

种冒险精神，甚至也缺乏他们以前的警惕性。或许战争的紧张正开始对南方人的性情有影响。的确，有整整六个月他们给我们时间来加强我们自己并构筑工事，而一次也没有试图进攻我们并迫使我们退回到松花江边，使我们遭到惨败。当我们停留在四平街时，被我们俘虏的战俘人数开始增加，而且他们不再象在 1904 年被俘的人那样表现出狂热。许多战俘公开地承认，他们对战争感到厌倦，而且从在敌军尸体和战俘身上找到的来自日本的许多信件的性质来看，显然这种厌倦是普遍的。这些信件也诉说，在战争期间捐税猛增，生活必需品价格高涨，工作机会缺乏。有一次，整个一连敌军在西伯利亚第一军团防守的阵地前面投降了，这种事情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在物质方面，敌人的情况也不好。军费越来越不充足，而日益增多的军队的各种需要却增加了。在迅速补充大炮弹药方面特别困难。这种情况，在沙河战斗中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使日本最忧虑不安的必定是欧美各国对它所取得的成功开始表示冷淡。俄日发生战争，起初对英、德两国似乎是有利的，因为当俄、日因战争而精疲力竭时，俄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的双手将被捆住。然而，让日本在满洲战场上取得绝对的胜利，这一般说来是不符合欧洲的利益。战胜的日本可能同中国联合起来，举起“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这面旗帜。清除欧美在亚洲的全部企业将是这个新兴大国的第一个目标，把欧洲人赶出亚洲将是目的。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没有多少发展余地。欧洲如果没有广阔的世界市场便无法生存，“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非洲是非洲人的非洲”等呼声对欧洲有严重的含义。但是，这种危险正在逼近，而且是如此紧迫，以致欧洲列强将被迫消除彼此之间的分歧，团结起来，以便抗拒这些年轻国家^①把古老的欧洲

^① 作者可能是指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国家意义上来说是年轻的。——编者

赶回老家、赶回因为它的发展成长而早已容纳不下它的那个狭小的壳子里去的企图。我们本来可以利用国际上这种感情的变化，去设法封闭世界各国对日本的金融市场。只需我们这方面取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在日本国内和在战场上的日本军队中引起非常严重的反响。如果我们耗尽了日本的财政资源，而且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就有可能很快迫使日本寻求体面的和平，这种和平对我们会是有利的。

我们在奉天作战的军队，在编制上有三十万人的缺额；在这次战争开始时，我们只有微不足道的兵力；我们在最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争，得不到本国的支援；再者，我们被国内的骚乱所削弱，而且只有一条很差的单轨铁路同俄国联系。在这种不能忍受的情况下，我们使敌军三十万人丧失了战斗力，并且在敌军正在开始削弱的时候，在四平街集中了六十万名来福枪兵，准备出击。如果我们取得这些结果，能够说我们的军队成就很少吗？继续给这次战争加上“可耻的”这个形容词，难道是公平的吗？不能否认，各个部队及其指挥官在他们可以利用的时间内所做的，要比如果受到本国适当支援时能够做到的为少，但是到了1905年夏季，情况已开始转为对我们有利。战败者总是要受到严厉的评判，而指挥官很自然地应该为他们指挥的部队的惨败首先承担责任。我们只能由于准备继续进行战争而被宣判为无罪——这种准备是在虽然遭受惨败的情况下在军队中进行的，并且日益加强。我们相信获得胜利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如果不是由于俄国国内严重的骚乱，我们无疑地能够在战斗中证明我们信念的真实性。

甚至莫斯科（在那里，在我们国家过去经历过的所有的困难时刻，总是发出果断的和坚决的声音支持俄罗斯的荣誉和尊严）的居民也显示出这一次他们的情绪低落了。我们读到关于莫斯科市议会于1905年6月7日采取某种行动的消息时，感到惊奇和伤心。

ii. 198 这个消息对于我军有极大的影响，我听到这个消息后，把下面的信^①寄给莫斯科市议会议长特鲁贝茨基亲王：

“由于从国内传到我们这里的消息说，许多胆小的人士正试图促使早日讲和，使全军产生了十分混乱的印象。这些人士忘记了：在获得胜利以前讲和，就不能是体面的和平，因而也不会是永久的和平。我们的军队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如此强大，如此地为激烈的战斗作好准备。胜利似乎比原来设想的更为临近了。各个部队十分信任新的总司令；^②他们需要的每一样必需品都得到了保证，他们的健康是极好的。我们会欢迎敌军进攻的消息，并且准备在接到命令时，就怀着充分相信我们的力量的心情，去迎击他们。各部队都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即使是那些在初期战斗中由于种种原因不那么坚定的部队，现在也是完全可以依靠的。很多受过伤的军官和士兵虽然还没有完全复元正在急忙着归队。虽然我们失去了海军舰队；我们还拥有陆军，而且，我再重说一遍，它比以前任何时候更为强大了。我们的阵地全部都比以前强固，而且，从战术上看，地理位置比我们在辽阳或奉天的阵地为好，因为日本人不象以前那样包围着我们。虽然他们的军队在人数上也在增加，有许多迹象表明他们的力量正在衰退：他们的士兵队伍正以在以前不会被军队接受的人来补充，而且他们军队的整个士气已经起了变化。比以前有更多的人让他们自己被我们俘虏。他们的炮兵和骑兵比我们的弱，而且他们缺少大炮弹药。我们在他们的士兵身上找到的来自日本的信件显示：在日本人民中间，对这次战争感到不满的普遍感情正在增长，因为物价上涨了，他们正忍受着极端的穷困。正是在这样的情

ii. 199

① 疑为电报。——编者

② 利涅维奇将军。——编者

况下，我今天读到来自莫斯科的信件说：6月7日，市贵族会议讨论了采取这样的行动是否适当的问题：邀请全国人民的代表前来考虑结束战争的问题。去年2月，在我出发赴前线时，您以莫斯科全体代表的名义，以对俄罗斯的力量充满勇气和信心的讲话欢送我。因此，我认为把这封信寄给您是我的责任。如果莫斯科人感到不能象从前那样派遣他们的最可尊敬的子弟到我们这里来帮助我们打败敌人，那么，至少让他们不要阻碍我们在满洲尽我们的义务。

“虽然这封信里没有什么秘密性质的内容，但是把我签名的这封信在报纸上发表，是非常不需要的。”

特鲁贝茨基亲王于6月14日写给我的复信如下：

“我已把您的电报（这封电报使我非常感动）交给市长和市议会。我将把电报的内容传达给尽可能多的人，我也将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情，根据电报采取行动。如果沙皇可能考虑有必要结束战争，我不认为在各委员会中应预先讨论这个问题。愿上帝帮助您！我整个的心同您在一起。” ii. 200

但是，个人的努力是无力阻止事件的发展的。俄国国内事态的严重状况和人民带有敌意的——这还是对此所作的最善意的解释——漠不关心态度，使〔俄日〕和约过早地达成。缔结这样一种和约（由于这个和约，便承认了日本是俄国在亚洲的征服者），不仅对我们，而且对所有在亚洲拥有属地或权益的列强，都将具有严重的后果。仅仅在不久以前才预见到行将出现的“黄祸”，现在已经成为现实。虽然日本已经在战争中取得胜利，但是它仍然在匆忙地扩充它的兵力，而中国则正在日本军官的指导下按照日本的式样建立一支庞大的军队。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和日本将能够把一支一百五十多万的军队开进满洲，如果这支军队是来对付我们的，那它就会继续推进，从俄国手里夺去西伯利亚的许多地方，使

俄国沦为第二流国家。

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外交上事先缺乏任何布置是怎样迫使我们在战争期间把我们的大部分武装部队保持在俄国的欧洲部分，
ii. 201 这一事实构成了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近卫军和掷弹兵军团留在俄国境内，而后备部队却在满洲作战)。有一点使我们感到安慰，这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明白，我们的西方各邻国不是在执行任何对我们进行侵略的政策，因为如果它们愿意的话，它们在1905年和1906年^①本来是有极好的机会来改变现存边界的。因此，我们可以希望能够同欧洲列强达成某种谅解，借助于这种谅解，如果我们在远东再一次受到攻击，我们将能够把我们的全部武装部队都投入同日本或日、中联军的斗争中去。我们失败的另一原因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未能迅速地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因为俄罗斯和满洲之间的铁路交通很薄弱。十分明显，根据远东现在的情况来看，将西伯利亚铁路铺设双轨以及沿黑龙江岸修筑一条铁路，对我们是如此生死攸关，因此应该不失时机地立即着手进行。仅仅沿着黑龙江岸修筑一条铁路，对于我们的帮助是很小的，而一条双轨的西伯利亚铁路，即使在二十四小时以内开出四十八次列车，当然也不能满足万一发生一次新战争时我们必须投入到战场上去的大军的一切需要。到将来，我们的大量粮食供应将只能
ii. 202 能在很小的程度上依靠满洲，不仅我们的大部分军需品，而且我们的大部分粮食都将不得不从俄国的欧洲部分和西伯利亚运去。因此就必须利用我们的水上交通，因为1905年试图通过北冰洋和叶尼塞河来运输供应品的失败，还不能认为是最后的失败。增加西伯利亚的人口，因而同时也就增加军队所必需的地方资源，也能够给予军队以特殊的帮助。西伯利亚的金属、煤和木材的丰富储藏将帮助我们不仅把我们的粮食供应基地、而且也把我们的战争

^① 疑应作1904年和1905年。——编者

基地(储存军械、弹药、炸药、等等)移到比较靠近远东的地方。

在使我们遭受灾难的主要原因中，必须提到人民对这次战争的漠不关心的、甚至是敌视的态度。但是来自远东的对于我们国家的威胁现在是如此明显，因此社会所有各阶层都应该准备——在日本或中国对俄国发动新攻击的情况下——奋身而起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来保卫我们祖国的完整和伟大。

因此，为了在任何这样的未来战争(这种战争绝不是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中获得成功，我们应该力争——

1. 能够利用我们的全部军队;
2.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和俄国之间拥有充分的铁路交通; ii. 203
3. 准备西伯利亚的水道，以便把分量重的货物整批地从西部运到东部;
4. 把军队的基地尽可能远地从俄罗斯移到西伯利亚; 而最重要的则是——
5. 做好准备不仅同一个国家的军队，而且同这个国家的全体爱国人民进行一次新的战争。

历史显然已经注定了俄国从 1904 年至 1906 年在战场上和在国内都要经受一次严酷的考验。我们的伟大国家过去曾经受过多多次更为严重的考验，结果都能获得复兴并且更为强大，现在让我们不要怀疑，在沙皇走向新生的号召下，俄国将迅速地从它遭受的暂时打击中恢复过来，并且将不会从它在世界其他国家中间所占的崇高地位跌落下来。至于军队，它的惨痛经验这一次不应该不能结出果实，对于它的一切缺点进行最细致、彻底、和无所畏惧的研究，只能导致力量的恢复和增长。我们必须记住一点——而这是主要之点：我们的军官和许多士兵在最困难的环境下的行为是最无私的。这一点确定了，我们的所有其他缺点就能比较迅速地改正。但是比一切其他事情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无所畏惧地公 ii. 204

开承认我们的缺点。

力量存在于真理之中。

在目前为了人民和军队的利益在俄国正开始进行的这个重要的复兴工作中，我们必须记住沙皇将近两年以前对陆海军讲的伟大的话：

“俄罗斯是伟大的。在它存在的一千年中，曾经有过更大苦难的年月——这些年月遭到更大危险的威胁。然而它每一次经历这些斗争的结果，都得到新的光荣，得到更大的力量。

“虽然我们可能由于降临我们身上的灾难和损失而痛心，让我们不要沮丧。正是由于这些灾难和损失，俄国的力量会得到恢复，它的威力将会增长。”

A. N. 库罗帕特金，将军

于谢舒列诺^①

1906年11月30日

^① 此系库罗帕特金将军普斯科夫省乡间庄园的名称。——编者

索引

- Abdur Rahman, 阿卜杜尔·拉赫曼, 与阿富汗, i. 84, 85
- Adabash, 阿达巴什, 上校, 他的关于日本后备部队的情报, i. 206
- Afghanistan: 阿富汗: 它的边疆, i. 62; 英国的进军, i. 63, 84; 与俄国, i. 64—66, 87; 一个缓冲国, i. 85; 边界委员会, i. 86
- Alexander I., 亚历山大一世, 俄国皇帝: 给军队以更多自由, i. 14; 他的榜样, i. 20
- Alexander II., 亚历山大二世, 俄国皇帝: 吵吵闹闹地要求和平, i. 22; 农奴的解放, i. 23; 节约军费, i. 87; 西伯利亚铁路, i. 149
- Alexander III., 亚历山大三世, 俄国皇帝: 节约军费, i. 87
- Alexeieff, Admiral: 阿列克谢耶夫, 海军将军: 停止旅顺口的工程, i. 126, 128; 义和团叛乱, i. 154; 停止从奉天撤军, i. 169; 他与别佐布拉佐夫和皇家木材公司的关系, i. 173—185; 成为远东总督, i. 187; 他与日本的谈判, i. 188—198; 分散他的军队与舰队, i. 225; 他对于舰队的意见, i. 237, 238; 关于中东铁路的报告, i. 246; 催逼救援, i. 257
- Alien population, 外国人口的危险, i. 102
- Alma, battle of the, 阿尔马河之战, i. 17
- America, 美国, 俄国把它在美洲的领地让与美国, i. 35
- Ammunition: 弹药: 大炮弹药的缺点, i. 137; 步枪平均消耗弹药数量, ii. 149, 150
- Amur district, 阿穆尔区, 俄国并吞阿穆尔区, i. 35
- Armament: 军备(参阅 Army): 劣势, i. 15; 军备对于士气的影响, i. 107, 108; 炮兵, i. 121, 135; 旅顺口的军备, i. 129; 新的野战炮的试验, i. 136; 大炮弹药的缺点, i. 137
- Army, Russian: 俄国军队: 伟大的北方战争, i. 5, 6; 俄国军队的缩减, i. 8; 俄国军队的分布, i. 9; 同法国的战争, i. 10; 并吞芬兰, i. 12; 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军队, i. 13—21; 土耳其战争中的军队, i. 24—34; 在这两次主要战争中的死伤人数, i. 36; 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 i. 38; 动员速度比较, i. 88—90, 272—284; 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中的损失, i. 99; 将军们的无能, i. 101; 军队的改进, i. 113, 119—124; 西伯利亚军团的价值, i. 125; 铁路运输的缺乏, i. 131—134, 156, 242—268; 炮兵的重新装备, i. 135, 136; 大炮弹药的缺点, i. 137;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队人数, i. 144; 它的分布, i. 225, ii. 209, 210; 当宣布和平时它的有利形势, i. 230—234; 在鸭绿江、

* 索引页码前 i 系第 1 卷, ii 系第 2 卷。——译者

- 金州和得利寺的失败, i. 257, 258; 在沙河的损失, i. 259; 预备役士兵, i. 278—290; 军官的缺少与军官的才干, i. 290—294, 300—305; 军队的纪律, i. 259, 296; 体罚, i. 297—299; 工兵的缺乏, i. 305; 机关枪, i. 306—309; 对参谋工作的批评, ii. 2, 3; 骑兵在演习中, ii. 4; 进攻和防御, ii. 5; 纵队队形, ii. 6; 炮兵的工作, ii. 7; 工兵的工作, ii. 7, 8; 指挥官们的评论, ii. 9; 战术训练, ii. 10—25; 俄国和日本对战场位置的比较, ii. 33, 34, 37—40; 缺乏尚武精神和爱国心, ii. 35, 183; 不利的条件, ii. 37, 39; 雨季和痢疾的影响, ii. 41; 编制方面的困难, ii. 44—60; 指挥上的缺陷, ii. 60—72; 士兵, ii. 72—80; 库罗帕特金对军队的最后演说, ii. 88—97; 对改进军队的建议: (1) 高级军官, ii. 98—114; (2) 正规兵和预备役士兵, ii. 114—127; (3) 后备部队编制, ii. 128—131; (4) 增加实战步兵, ii. 131—136; (5) 机关枪, ii. 136; (6) 补充部队, ii. 137—139; (7) 交通部队, ii. 139, 140; (8) 工程部队, ii. 141—146; (9) 炮兵, ii. 146—151; (10) 骑兵, ii. 151—155; (11) 步兵, ii. 155—161; (12) 编制, ii. 161—176; 战争的总结, ii. 177—204; 士气的逐渐改进, ii. 183, 188, 189
- Artillery:** 炮兵: 重整炮兵军备, i. 121, 135; 机关枪, i. 306—309, ii. 136, 137; 建议改进, ii. 146—155, 162
- Asia:** 亚洲: 俄国与土耳其的战争, i. 26; 俄国在亚洲的地位, i. 34; 俄国的边界, i. 40—46; 反对俄国在亚洲扩张, i. 147
- Asia for the Asiatics,** “亚洲人的亚洲”, ii. 195, 196
- Austerlitz,** 奥斯特里茨, 俄国在该地的重大损失, i. 98
- Austria:** 奥地利: 与拿破仑的战争, i. 10; 克里米亚战争, i. 16; 它与俄国的边界, i. 51—54; 它的战略铁路, i. 55; 它的动员速度, i. 90; 它的军队的完善的组织, i. 103
- Austro-Hungary:** 奥匈帝国: 与俄国的边界, i. 44, 50—52; 与俄国的贸易, i. 52; 与俄国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i. 53, 54
- Azov,** 亚速海, 放弃亚速海, i. 6
- Baikal, Lake,** 贝加尔湖, 西伯利亚铁路的巨大障碍 i. 149, 248, 254
- Balashoff, Acting State Councillor:** 巴拉舍夫, 代理国务大臣: 他的好战的信件, i. 178; 对皇家木材公司的调查, i. 181
- Baltic Sea:** 波罗的海: 俄国的目标, i. 5, 9; 波罗的海的防御, i. 114
- Batianoff, General,** 巴蒂阿诺夫将军, 满洲第三军司令官 ii. 186
- Batoum,** 巴托乌姆, i. 32
- Bayazet,** 巴亚泽特, 巴亚泽特的防守, i. 26
- Berlin Congress,** 柏林会议 i. 32; 柏林会议的条约, i. 82
- Bessarabia,** 比萨拉比亚, 俄国吞并比萨拉比亚, i. 13, 24
- Bezobrazoff, State Councillor:** 别佐布拉佐夫, 国务大臣: 他与皇家木材公司的关系, i. 169; 他的建议, i. 172—174; 库罗帕特金关于他的报告, i. 177—179; 对皇家木材公司的调查, i. 180, 184
- Bilderling, General, Commander of the 2nd Manchurian Army:** 比尔德林将军, 满洲第二军司令官: 他的报告, ii. 186
- Black Sea, the:** 黑海: 俄国向黑海推进, i. 6, 12, 13; 俄国被剥夺在黑海保持舰队的权利, i. 19, 24, 34; 对黑海沿岸的防御, i. 114

- Blume, M, 布卢姆, 战略理论家, ii. 69
- Borodino, 鲍罗季诺, 俄国在鲍罗季诺的损失, i. 98
- Boskey, General, 鲍斯凯将军, 他在阿尔马河之战中突袭俄国人 i. 17
- Bothnia, Gulf of, 波的尼亚湾, 俄国的目标, i. 9, 41, 42
- Boxer Rebellion, 义和团叛乱, i. 136, 154, 155
- Bulgaria: 保加利亚: 土耳其-塞尔维亚战争, i. 24, 25; 俄国人在保加利亚的行为, i. 29, 30
- Burun, M., 比尤伦, 关于俄国舰队, i. 236, 237, 240, 241
- Caucasus, the: 高加索: 它与俄国的边界, i. 5, 8, 33, 34, 57, 58; 它的军队, i. 26, 114
- Cavalry: 骑兵: 未充分使用, ii. 151, 152; 军官不行 ii. 153—155; 部队的细节, ii. 162
- Censorship, 检查, 对报纸实行检查的必要性, ii. 176
- Charles XII, King of Sweden, 查理十二, 瑞典皇帝, 与俄国的战争, i. 5
- Cherniaeff, General, Geok Tepe, 切尔尼亚耶夫将军, 格奥克-泰佩, i. 32
- China: 中国: 中国的和平态度, i. 5; 北京条约, i. 35; 与俄国的边界和贸易, i. 67, 68; 与日本的战争, i. 69, 151, 201—204; 俄国的政策, i. 72, 157; 中国的觉醒, i. 91; 义和团叛乱及中国与俄国的条约, i. 154—162; 它对俄国政策的惊愕, i. 170; 俄国人对待中国人, ii. 190, 191
- Chin-chou, battle of, 金州之战, i. 257
- Civil disorder, repression of, 镇压国内骚乱, ii. 125
- Constantinople, 君士坦丁堡, 俄国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 i. 30, 82
- Cossacks, 哥萨克(参阅 Cavalry)
- Crimean War: 克里米亚战争: 俄国军队的兵力, i. 13; 俄国的无准备, i. 16, 101, 109; 英克曼, i. 18; 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i. 19; 过早的和约, i. 20—22
- Dalny: 大连: 俄国吞并大连, i. 69; 日本人利用大连, i. 127; 它的防御工事, i. 172; 通商, i. 190; 煤在大连的贮藏 i. 246
- Danube, the, 多瑙河, 俄国获得和丧失多瑙河口, i. 13, 16, 19, 24, 32
- Defence schemes, 防御计划, ii. 26—30
- Demchinski, M., 德姆琴斯基, «我们对战争做了准备吗?», i. 111
- Djam, 贾姆, 俄国部队在贾姆, i. 84
- Dragomiroff, General, 德拉戈米罗夫将军, 他和速射炮, i. 136; 他的理论, ii. 8, 10, 11
- Dubniak Hill, 都布尼亚克山, 攻下都布尼亚克山, i. 25
- Dukhovski, General, 杜霍夫斯基将军, 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和军队司令官, 他与西伯利亚铁路, i. 151, 171
- Dushkevitch, Colonel, 杜什凯维奇上校, i. 302
- Eastern Chinese Railway: 中东铁路: 中东铁路的不良状况, i. 131, 132, 182—242; 与兴建通过波斯的铁路对比, i. 193 建议卖给中国, i. 221; 运载能力, i. 243—256
- Emmanuel, Major, 埃马努埃尔少校, 他对日本军队的评价, i. 222
- Engineers, 工程部队, ii. 141—146; 部队的细节, ii. 162
- Essen, Admiral, 埃森海军上将, 他从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英勇出击, i. 239
- Esthonia, 爱沙尼亚, 俄国并吞爱沙尼亚, i. 5

- Eupatoria, 欧巴托里亚, 联军在欧巴托里亚的登陆, i. 17
- Feng-huang-cheng, 凤凰城, 俄国占领凤凰城, i. 170—174, 184
- Finance Minister, 财政大臣, 财政大臣的双重权能, i. 139
- Finland, 芬兰, 俄国并吞芬兰, i. 5, 12, 41; 与俄国的边界, i. 8 注, 9; 它的自治的企图, i. 42
- Fortresses, 要塞, 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的要塞工程, i. 126—130
- France, 法国, 它与俄国的战争, i. 10; 它的军队的兵力, i. 15; 法俄协定的原因, i. 46; 普法战争的教训, i. 78—81
- Friederchsham, Treaty of, 腓特烈海姆条约, i. 40, 41
- Frontiers, 边界 (参阅 Russia), 俄国边界, i. 8 注, 35, 40—77
- Galicia, 加里西亚, 加里西亚的战略价值, i. 54, 55
- Geok Tepe, 格奥克-泰佩, 俄国人进攻格奥克-泰佩, i. 31, 85, 148
- Georgia, 格鲁吉亚, 俄国吞并格鲁吉亚, i. 8
- Germany: 德国: 与拿破仑的战争, i. 10; 它与俄国的边界, i. 44, 45; 它与俄国的贸易, i. 45, 59; 它的战略准备, i. 46—49; 战争的可能性, i. 49, 50; 在波斯的贸易, i. 59, 60; 普法战争的教训, i. 79, 80; 它动员的相对速度, i. 90; 它军队组织的完善, i. 103, 113; 它的军费, i. 112, 113
- Gerngros, General: 格尔格罗斯将军, 义和团叛乱, i. 155; 在得利寺受伤, i. 219
- Giers, M., Russia Minister for Foreign Affairs, 基尔斯, 俄国外交大臣, 关于伊犁的让与, i. 93
- Glinski, M., 格林斯基, 《复活的死者》, i. 292
- Godunoff, Boris, 鲍利斯·戈都诺夫, 与里海, i. 4
- Goltz, Von der, 冯·德尔·戈尔茨, 一个卓越的德国作家, 他关于战争的格言, i. 88
- Gorbatoff, M., 戈巴托夫, 《最近的作战引起的想法》, ii. 75, 76
- Great Britain: 英国: 它的军队的兵力, i. 15; 克里米亚战争, i. 16—20; 它与波斯的贸易, i. 59, 60; 俄国与阿富汗, i. 62—67, 84, 85; 阿富汗边界委员会, i. 86; 英日条约, i. 269
- Grieg, Admiral, Russian Minister of finance, 格里也格海军上将, 俄国财政大臣, 关于伊犁的让与, i. 93
- Gripenberg, General, Commander of the 2nd Army: 格里彭伯格将军, 第二军司令官: 他的特殊理论与行为, i. 299, ii. 11, 23—25, 55—60; 《关于黑沟台战斗的真实情况》, ii. 83
- Grodekovi, General, 格罗戴柯维将军, i. 154, 155
- Guber, General, 古伯将军, ii. 52
- Gulistan, 古利斯坦, 古利斯坦条约, i. 60
- Guns, 大炮, (参阅 Artillery)
- Gurieff, M., 古里也夫, 《对日战争的爆发》, i. 146
- Gurko, General, 古尔科将军, 围攻普列夫纳, i. 26; 他的评论, ii. 9
- Hamilton, General sir Ian, 伊恩·汉密尔顿爵士, 他对日本军队的评价, i. 223
- Harbin: 哈尔滨: 在哈尔滨集中, i. 155, 160; 铁路的困难, i. 245, 254, 261, 268; 在哈尔滨酗酒, ii. 188
- Hei-kou-tai, 黑沟台, 在黑沟台的战斗, ii. 82, 83

- Herat, 赫拉特, 建议修铁路, i. 67; 赫拉特与俄国, i. 86
- Hershelman, General, 赫尔舍勒曼将军, i. 279
- Hsi-mu-cheng, 析木城, 在析木城集中, ii. 42
- Hsi-ping-kai position: 四平街阵地: 俄国人占领四平街阵地, i. 229, ii. 32, 182; 交给日本, i. 232; 在四平街附近作准备, ii. 184, 185, 194
- Hun-huses, 红胡子, 被红胡子袭击, i. 158, 159
- Imeretinski, General, 伊迈列京斯基将军, 在普列夫纳, i. 28
- India and Russia's policy, 印度和俄国的政策, i. 64—67
- Infantry (参阅 Army): 步兵: 主要的兵种, ii. 155; 步兵的改进, ii. 156; 军官的伤亡 ii. 157, 158; 在战场上晋升, ii. 159; 战场锻炼与办公室锻炼的对比, ii. 160; 部队的编制和细节, ii. 161—170; 对现役军人的处罚, ii. 171—175
- Istomin, Admiral, 伊斯托明海军上将, 他的英勇牺牲, i. 18, 21
- Ivanovitch, Tsar Theodore, 沙皇西奥多·伊凡诺维奇, i. 4
- Japan: 日本: 日本的和平态度, i. 5; 俄国与萨哈林, i. 35; 北京条约, i. 35; 中日战争, i. 69, 151, 202—204; 导致日俄战争的事件, i. 123—130, 151, 157—166, 170, 177—179; 皇家木材公司, i. 172; 库罗帕特金访问日本以及对日本的印象, i. 174, 175, 217—223; 谈判的进行, i. 188, 193; 俄国的恐吓, i. 193—198; 它的早期历史, i. 199; 它的军队的产生, i. 200—202; 远征中国, i. 203; 兵力的估算, i. 203, 208, ii. 192; 为战争而扩充兵力, i. 204—206; 它在日俄战争中的损失, i. 207, ii. 192; 它的海上运输, i. 209; 俄国人对它的军队的评断, i. 210; 它的军官在俄国服务, i. 212; 它的后备部队, i. 213; 武士道精神, i. 214; 它对俄国的怨恨, i. 215; 它的教育制度, i. 217—219; 朝鲜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i. 219; 德国人和英国人对它的评价, i. 222, 223; 它无障碍地在辽东半岛和关东登陆, i. 225; 它的有利条件, i. 226; 他们的士气, i. 227; 国家和军队在一起, i. 228; 部分耗竭, i. 230, 235, ii. 194, 195; 它在远东的舰队的兵力, i. 236, 237; 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的海战, i. 238—241; 它在鸭绿江、金州和得利寺的胜利, i. 257, 258, ii. 38, 83; 它与英国的条约, i. 269; 经过十五个月战争之后的相对的地位, ii. 31—35, 39—44; 它的损失, ii. 192, 193
- Jassy, 雅西, 雅西条约, i. 6
- Jilinski, General, 吉林斯基将军, 司令部参谋部, i. 206, 256
- Kamchatka, 堪察加, 俄国吞并堪察加, i. 35
- Kars, 卡尔斯, 夺取卡尔斯要塞, i. 26, 30, 32, ii. 14
- Kashgaria, 喀什噶尔, i. 70; 中国人占领喀什噶尔, i. 92
- Kaufmann, General, 考夫曼将军, i. 32; 考夫曼与阿富汗, i. 85; 伊犁的让与, i. 92, 93; 布哈拉汗国, i. 147
- Kaulbars, General, 考尔巴斯将军, ii. 58
- Keller, General Count, 凯勒伯爵将军, ii. 42; 他的阵亡, ii. 71
- Khanates, the, 诸汗国, i. 147, 148
- Khilkov, Prince, Minister of Ways and Communications, 希尔科夫亲王, 交通大臣, 他与西伯利亚铁路, i. 246,

248, 250, 254
Khiva, 希瓦, 俄国占领希瓦的失败, i. 5
Kipke, Surgeon-General, 基普克, 军医署长, 日本伤亡名单, i. 207, 208
Kirghiz tribes and Russia, 吉尔吉斯部落与俄国, i. 4 注, 5, 8 注
Kirin, capture of, 攻占吉林, i. 155
Kondratenko, General, 康德拉坚科将军, 旅顺英雄, i. 300, ii. 71
Korea: 朝鲜: 朝鲜的独立, i. 69; 朝鲜安定的必要, i. 72, 73; 俄国在朝鲜的活动, i. 153, 178; 采伐木材特许权, i. 170; 旅顺会议上关于朝鲜问题的讨论, i. 180, 181; 北京条约, i. 199;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i. 219
Korniloff, Admiral, 科尔尼罗夫海军上将, 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i. 18; 英勇牺牲, i. 21
Kronstadt, 喀琅施塔得, 喀琅施塔得的防御工事, i. 126
Kruimoff, Captain, 克鲁伊莫夫大尉, i. 303
Kuan-tung Peninsula: 关东半岛: 俄国吞并关东半岛, i. 35, 69; 日本登陆和设防, i. 127, 257
Kuang-cheng-tzu, 宽城子, 被叛乱者所据有, i. 155
Kuldja, province of, 伊犁地区, i. 70; 让与中国, i. 92—95, 148, 149
Kuprin, M., 库普林, 《决斗》, ii. 69
Kuroki, General: 黑木将军: 指挥日本第一军, i. 257, 258; 他关于俄国炮弹的意见, i. 306; 他在得利寺的胜利, ii. 35, 38; 他的阵地, ii. 39, 40
Kuropatkin, General, Minister of War, afterwards Commander-in-Chief: 库罗帕特金将军, 陆军大臣, 以后是总司令: 他的关于二十世纪各种可能性的报告, i. 39; 他的关于俄国边界及其适应情况的报告, i. 40—77; 由过

去军队工作引出推论, 指导未来的战争, i. 96—110; 陆军部面临的任務, i. 111—144; 他对于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意见, i. 145—198; 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之间的意见分歧, i. 167—169; 皇家木材公司, i. 172—184; 他访问日本的印象, i. 174, 175, 217—223; 他关于满洲形势的报告, i. 176—179, 189—193; 他对与日本破裂所负的责任, i. 177—179; 他的关于俄国利益的金字塔图解, i. 185, 186; 因建立总督辖区而辞职, i. 187; 他的退让的建议, i. 189; 他的关于日本军队兵力的报告, i. 242; 论改进俄国铁路的必要性, i. 252—254, 263—268; 关于动员的意见, i. 271—289; 关于储备军官的意见, i. 293, 294; 他的关于军官的建议, i. 301—305; 关于机关枪和弹药, i. 306—309; 他对参谋工作的批评, ii. 2, 3; 对骑兵的批评, ii. 4; 对进攻和防御的批评, ii. 5, 6; 对于进攻中纵队队形的批评, ii. 6; 关于炮兵和工兵工作的意见, ii. 7, 8; 论指挥官们的评论, ii. 9; 论我军的战术训练, ii. 10; 他的补充训令和每月训令, ii. 12, 13, 15—22; 在普列夫纳失败的原因, ii. 13, 14; 他对俄国和日本在满洲的相对地位的图解和意见, ii. 33—34; 论编制方面的困难, ii. 44—60; 论军队人员的缺点, ii. 60—72; 关于士兵和社会革命党人, ii. 72—81; 关于撤消命令, ii. 81—84; 对奉天战役失败负责, ii. 85, 86; 他的告别辞, ii. 87—97; 他对改进高级军官和各兵种的建议, ii. 98—176; 他对战争的总结, ii. 177—204
Kushk, 库什克, 建议修铁路到库什克, i. 67; 在库什克打败阿富汗人, i. 86
Lamsdorff, M., 拉姆斯道夫, 外交大臣, 他与皇家木材公司, i. 173, 174

- Lessar, 列萨尔, 代理国务大臣, 俄国驻中国公使, 旅顺会议关于鸭绿江企业的讨论, i. 175, 180
- Levestam, General, 列维斯塔姆将军, 撤退到析木城, ii. 40
- Liao-tung Peninsula, 辽东半岛, 日本在辽东半岛登陆, i. 225, 257
- Liao-yang: 辽阳: 被叛乱者占领, i. 155; 俄国人在辽阳集中, i. 225, 242, 258; 辽阳之战, ii. 18, 83; 俄国的退却, ii. 86; 日本人在辽阳的损失, ii. 193
- Linievitch, General: 利涅维奇将军: 攻占北京, i. 155; 指挥第一军, i. 230; 总司令, i. 301, ii. 198; 他与库罗帕特金, ii. 56, 58
- Livonia, 利沃尼亚, 俄国吞并利沃尼亚, i. 5
- Lomakin, General, 罗马金将军, 他对土库曼的灾难性的远征, i. 31
- Losses, Russian, 俄国的损失, 在两次主要斗争中的损失, i. 36; 在过去的战争中的损失, i. 98; 将来的损失, i. 99
- Madritoff, Lieutenant-Colonel, 马德里托夫中校, 他与木材采伐特许权, i. 175, 181, 184
- Makharoff, Admiral, 马哈洛夫海军上将, i. 225, 238
- Maksheef, Professor, 马克谢也夫教授, 关于俄、德两国军费的比较, i. 111—113
- Malakhoff Hill, 马拉霍夫高地, 攻占马拉霍夫高地, i. 19
- Malingering, 装病, ii. 174
- Maloshevitch, N.S., 马洛舍维奇, 《一个塞瓦斯托波尔人的回忆录》, i. 16
- Manchuria: 满洲(参阅 Railways): 俄国进入满洲, i. 35; 吞并满洲的问题, i. 71, 105, 157—179; 俄国守备部队的扩充, i. 122; 在满洲的叛乱, i. 126; 陆军大臣关于满洲问题的意见, i. 145; 对木材采伐特许权的调查, i. 180—184; 俄国利益的金字塔图解, i. 185, 186; 谈判, i. 187—198; 日本侵略南满, ii. 32—44; 战争的总结, ii. 177—204
- Martinoff, M. E., 马蒂诺夫, 《两个军队的精神和心情》, ii. 77, 78
- Menshikoff, M., 缅希科夫, 俄国作家, ii. 69
- Menshikoff, Prince, Commander-in-chief, 缅希科夫, 亲王, 总司令, 克里米亚战争, i. 17; 英克尔曼之战, i. 18; 免职, i. 19
- Meyendorf, General Baron, 麦延多尔夫将军, 第一军团的司令官, i. 302
- Milutin, General, 米柳京将军, 农奴解放, i. 24; 普列夫纳, i. 25; 伊犁的让与, i. 93; 军队的改善, i. 113
- Mischenko, General: 米斯钦科将军: 当地铁路警卫部队的撤退, i. 155; 他的骑兵的胜利, ii. 150
- Mobilization, 动员, 动员速度比较, i. 90; 动员的不便, i. 272—286
- Moscow, 莫斯科, 士气低落, ii. 198, 199
- Mukden: 奉天: 被叛乱者占领, i. 154; 收复, i. 155; 奉天周围的战斗, i. 229 注, 260, ii. 43; 日本在奉天的损失, ii. 193, 194; 俄国在奉天的不利地位, ii. 196, 197
- Nakhimoff, Admiral, 纳希莫夫海军上将, i. 18; 他的英勇牺牲, i. 21
- Namangan, 纳曼干, 占领纳曼干, i. 148
- Narbut, General, 纳尔布特将军, 军事委员会成员, i. 293
- Narva, 纳尔瓦, 俄国在纳尔瓦败北的原因, i. 5
- Nasha Jizu, Newspaper, 《我们的生活》报, 《阿列克谢耶夫总督的坚定政策》, i. 195

- Navarin, "纳瓦林"号, 俄国战舰, 在该舰上的惨重损失, i. 240
- Navy, Russian: 俄国海军: 俄国海军的状况, i. 15; 俄国海军的不利处境, i. 107; 它在旅顺作战无用, i. 131; 太平洋舰队, i. 224; 俄国海军的作用小, i. 236; 日本海军实力和俄国海军实力, i. 236, 237; 在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战斗, i. 238—241
- Newchuang: 牛庄: 俄国的意图, i. 157; 撤出牛庄, ii. 43
- Nicholas II., Tsar of Russia, 尼古拉二世, 俄国沙皇, 关于军队的改善, i. 120—122; 他反对战争的努力, i. 145, 187; 铁路运输, i. 245, 252, 263—268; 动员, i. 272
- Nicolaeff, Grand-Duke Michael, 米哈伊尔·尼古拉耶夫大公, 在亚洲作战, i. 26
- Nicolai-Pavlovitch, the late Emperor, 先皇帝尼古拉·巴夫罗维奇, 他的警告, i. 16
- Nishtabtski, Treaty of, 尼什塔布茨基条约, i. 5
- Nodzu, General, 野津将军, 在辽东半岛登陆, i. 236; 战争的总结, ii. 177—204
- Nogi, General, 乃木将军, 在辽东半岛登陆, i. 236; 关于旅顺的陷落, i. 260; 在奉天, ii. 84, 152; 战争的总结, ii. 177—204
- Norway, 挪威, 它的边界, i. 40
- Obrucheff, General, 奥布鲁切夫将军, 司令部参谋部参谋长, 伊犁的让与, i. 93; 军队的改进, i. 113
- Offensive, 进攻, 进攻在战略上的有利之处, ii. 169
- Officers, Russian: 俄国军官: 俄国军官的无能, i. 101, ii. 1—11; 俄国军官的不足, i. 290—295; 格里彭伯格将军的辞职, i. 299, ii. 57; 俄国军官的质量, i. 300—303; 《复活的死者》, i. 305; 俄国军官敏锐的感情, ii. 57, 58; 俄国军官的缺陷, ii. 61—72, 95—97; 建议改进, ii. 98—113; 军官的伤亡, ii. 157; 战列步兵的军官没有公平的机会, ii. 158; 战场上的晋升, ii. 159; 战场锻炼对办公室锻炼, ii. 160—161; 在军官军官阶方面建议的改革, ii. 164—168; 撤换无能的军官, ii. 172
- Oku, General: 奥将军: 他在辽东半岛的登陆 i. 235, 256; 与野津将军的军队会师, ii. 43; 辽阳之战, ii. 84; 战争的总结, ii. 177—204
- Organization, Russian: 俄国军队的编制: 编制的缺陷, i. 26, 27, 88, 89, 119; 编制方面的困难, ii. 44—60; 库罗帕特金关于编制方面的建议, ii. 161—176
- Orenburg-Tashkent Railway, 奥伦堡—塔什干铁路, i. 86 注
- Orloff, General, 奥尔洛夫将军, 在辽阳, i. 279
- Osaka, 大阪, 在大阪的盛大展览会, i. 219
- Ostolopoff, Colonel, 奥斯托洛波夫上校, i. 302
- Pacific Ocean, 太平洋, 反对俄国向太平洋接近, i. 146, 147
- Patriotism in Japan and Russia, 在日本与俄国的爱国心 ii. 78—80, 121—123
- Paul II, Emperor of Russia, 保罗二世, 俄国皇帝, 保罗二世与军队, i. 8
- Pavloff, Chamberlain, Russian Minister in Korea, 巴夫洛夫, 皇帝侍从, 俄国驻朝鲜公使, 鸭绿江企业, i. 175, 180
- Pavlovski, M., 巴夫洛夫斯基, 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师, i. 253

- Peking, 北京, 北京条约, i. 35, 199; 攻占北京, i. 155
- Penalties on active service, 对现役军人的处罚, ii. 171, 173
- Persia, 波斯, 与俄国的战争, i. 33; 与俄国的边界与贸易, i. 58, 59; 中东的斗鸡场, i. 59; 英国与德国在波斯, i. 60; 俄国在波斯的企图, i. 61
- Personnel, defects in, 人员(方面)的缺陷, ii. 60—72
-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与瑞典的战争, i. 5; 与土耳其的战争, i. 6; 俄国舰队的创建者, i. 7; 他与查理十二和拿破仑的斗争, i. 10, 11; 他的忠告, i. 20; 他的影响, i. 41
- Petroff, General, 彼得罗夫将军, i. 245
- Petrovitch, Paul, Emperor, 保罗·彼得罗维奇皇帝, 他的改革, i. 38
- Plancon, M., 普兰康, 外交官, 调查木材公司, i. 180
- Plevna, 普列夫纳, 在普列夫纳的战斗, i. 25—30; 俄国在普列夫纳失败的原因, ii. 13
- Poland, 波兰, 俄国的邻邦, i. 3; 它与俄国的斗争, i. 7; 波兰问题, i. 10, 11; 叛乱, i. 23
- Poltava, 波尔塔瓦, 俄国在波尔塔瓦的胜利, i. 5, 11, 41
- Port Arthur: 旅顺: 俄国的企图, i. 69; 在旅顺的工事, i. 126, 127; 旅顺的军备, i. 128, 129; 关于木材采伐特许权的会议, i. 180—184; 库罗帕特金对旅顺问题的劝告, i. 189; 190; 中日战争, i. 202; 在旅顺的海战, i. 238—241; 旅顺的陷落, i. 260
- Pri-Amur district, 阿穆尔沿岸地区, 阿穆尔沿岸地区与俄国, i. 77;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增加部队, i. 121, 122, 144, 151
- Punishment, corporal, 体罚, ii. 173
- Putiloff Hill: 普梯洛夫山, 日本在普蒂洛夫山的损失, ii. 193
- Railway, the Siberian, 西伯利亚铁路, i. 123, 149, 156; 在对日战争中作为一种因素, i. 131—134, 198; 西伯利亚铁路的问题, i. 242—254, ii. 31; 需要警卫, ii. 37
- Razsvet, Newspaper, 《黎明报》, 关于库罗帕特金的罪责, i. 177
- Razviedchik, 《探索者》, 《复活的死者》, i. 292
- Rediger, Lieutenant-General, War Minister, 列季格尔中将, 陆军大臣, 他的报告, i. 138, 139
- Rennenkampf, general: 伦南坎普夫将军: 攻占齐齐哈尔和吉林, i. 155
- Reservists, Russian, 俄国的预备役士兵, i. 275—286, ii. 73, 163
- Revenue, Russian, 俄国的岁入, i. 142
- Revolutionists, Social, 社会革命党人, ii. 75—80
- Roop, General, 罗普将军, 指挥官的讲评, ii. 9
- Roslavleff, M., 罗斯拉夫列夫, 论证库罗帕特金的罪责, i. 176, 177; 旅顺会议, i. 184
- Roumania: 罗马尼亚: 与俄国的边界, i. 44, 56; 它的愿望, i. 57
- Rozhdestvenski, Admiral,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海军上将, 他在对马溃败的结果, i. 241, 242
- Rusin, Captain, Russian Naval attach'e, 鲁森大尉, 俄国驻日海军武官, 他关于日本海军的报告, i. 206
- Ruski Viestnik, 《俄罗斯通报》, 关于远东舰队的文章, i. 236, 237
- Russia: 俄国: 十八世纪俄国的国土范围, i. 2, 3; 它的邻国, i. 3; 它的企图, i. 4; 伟大的北方战争及其结果, i. 5—7; 十九世纪俄国国土的扩充, i. 8, 35; 军

队的减缩, i. 8; 与欧洲的比较密切的接触, i. 9; 与法国的战争, i. 10; 波兰问题, i. 11; 吞并芬兰, i. 12; 与土耳其进行更多的战争, i. 13, 24; 军队的腐败, i. 14; 俄国海军, i. 15; 它的无准备状态, i. 16; 克里米亚战争开始, i. 16; 让联军登陆, i. 17; 阿尔马河之战, i. 17, 18; 英克尔曼, i. 18; 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i. 18, 19; 过早的和约, i. 20—22, 81, 82; 农奴解放, i. 23; 普列夫纳, i. 25; 猛攻失败, i. 26; 它的集中的缓慢和缺陷, i. 27—29; 它的最后胜利, i. 30; 格奥克-泰佩, i. 31; 库什克, i. 32; 它的地位, i. 33—35; 两个世纪中的损失, i. 36, 37, 98, 99; 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 i. 38; 它的未来, i. 39; 它与瑞典的边界, i. 40—44; 它与德国的边界和贸易, i. 44—50; 它与奥匈帝国的边界, i. 50—55; 奥地利的战略铁路, i. 55; 它与罗马尼亚的边界, i. 56; 它与土耳其的边界和贸易, i. 57; 它与波斯的边界和贸易, i. 58, 59; 它在波斯的企图, i. 61; 它与阿富汗的边界, i. 62; 它的政策与英国政策的对比, i. 63—66; 对印度无企望, i. 67; 它与中国的边界、贸易及对中国的政策, i. 67—73; 它的地位, i. 73—77; 从普法战争中应接受的教训, i. 79, 80; 整个国家的战争, i. 80, 81; 1878年它的孤立, i. 83; 它反对英国的手段, i. 84; 阿富汗边界委员会, i. 85, 86; 军费节约, i. 187; 它的无力, i. 188, 189; 动员速度的比较, i. 90; 中国的觉醒, i. 91; 伊犁的让与, i. 92—94; 问题的错综复杂, i. 95; 从过去得到的推论, i. 96; 武装和平的紧张, i. 97; 将来战争中可能的损失, i. 99; 外籍人口的危险性, i. 102; 二十世纪的主要任务, i. 103; 它在西部的困难, i. 104, 114; 它在满洲的推进, i. 105; 海军的不利条

件, i. 106, 107; 军费, i. 112, 118; 在阿穆尔沿岸地区增加军队, i. 121—123; 对日战争的开始和起因, i. 123, 151, 156, 157; 旅顺的工事, i. 127, 130; 铁路因素, i. 131—149; 五千四百英里的交通线, i. 135; 财政大臣的双重权能, i. 139, 140; 它的财政与岁入, i. 141—144; 陆军大臣关于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的意见, i. 145; 西伯利亚铁路的开始, i. 149—155; 义和团叛乱, i. 154, 155; 它对于满洲的意图及其结果, i. 157—170; 与中国的条约, i. 158, 160; 维特的影响, i. 171; 皇家木材公司, i. 172—184; 它的利益的金字塔图解, i. 185, 186; 在远东建立总督辖区, i. 187; 库罗帕特金的专门报告, i. 188—193; 它的威吓, i. 194—198; 它在对日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i. 229—309, ii. 1—97; 建议改进军队, ii. 98—176; 战争总结, ii. 177—204; 奉天之战的结论, i. 288—305

Russki Invalid, 《俄罗斯残废者》, 关于军费的文章, i. 111, 112; 论责任心与爱国, ii. 78—80

Russo-chinese Bank, 华俄道胜银行, 维特在华俄道胜银行的权势, i. 172

Saghaliën, 萨哈林, 俄国在萨哈林的守备部队, i. 148, 200; 部分割让给日本, i. 232

St. George, the Cross of, 圣乔治十字勋章, ii. 16

St. Petersburg Convention, 圣彼得堡协定, i. 40 注

Sakharoff, General, 萨哈罗夫将军, 司令部参谋长, i. 115, 207; 陆军大臣, i. 252; 西伯利亚铁路, i. 261; 动员, i. 272, 273, 276, 277; 将官不胜任情况, i. 300; 他对日军计划的描述, ii. 30

- Samoiloff, Lieutenant-colonel, 萨莫伊罗夫中校, 俄国驻日武官, 他关于日本军事力量的观点, i. 208
- Sappers, 工兵, (参阅 Engineers)
- Serfs, the emancipation of the, 农奴的解放, i. 23, 24
- Servia, war with Turkey, 塞尔维亚, 与土耳其的战争, i. 24
- Sevastopol, 塞瓦斯托波尔, 围攻塞瓦斯托波尔, i. 18, 19, 83; 俄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损失, i. 98
- Sha Ho 沙河, 俄国在沙河之战的兵力, i. 242, ii. 182; 日本在沙河的损失, ii. 193
- Shipka Pass, defence of the, 防守希普卡隘口, i. 26, 30
- Shtakelberg, General, 什塔克尔伯格将军, 在鸭绿江, ii. 38
- Siberia Railway, (参阅 Railway)
- Siberian Rifle Regiments, East, 东西伯利亚来福枪团, 这些团的扩充及其价值, i. 124—126, ii. 183
- Sinope, 锡诺普, 俄国在锡诺普的胜利, i. 15, 16, 107
- Skobeleff, General, 斯科别列夫将军, 在普列夫纳, i. 26, 28; 夺取格奥克-泰佩, i. 31, 85, 148
- Solovieff, M., historian, 历史学家索洛维耶夫, 克里米亚战争, i. 21, 22
- Sosnovski, Lieutenant-Colonel, 索斯诺夫斯基中校, 他和中国人的关系, i. 92
- Spade, 铁锹, 在军队中重新使用铁锹, ii. 142
- Subotin, General, 苏鲍京将军, 攻占奉天, i. 155
- Sungari River, 松花江, 俄国撤退到松花江, i. 232
- Surrender, the question of, 投降问题, ii. 175
- Suvoroff, Russian battleship, 俄国战舰“苏沃洛夫”号, 在苏沃洛夫号战舰上的英勇行为, i. 240
- Suvoroff, General, 苏沃洛夫将军, 苏沃洛夫的出征, i. 8, 10
- Sviatosloff, Grand-Duke, 斯维亚托斯罗夫大公, i. 4
- Sweden as Russia's neighbour, 俄国的邻国瑞典, i. 3; 与俄国的战争, i. 12, 36; 与俄国的边界, i. 40—44
- Tartars as Russia's neighbours, 俄国的邻人鞑靼人, i. 3
- Ta-shih-chiao, battle of, 大石桥战斗, ii. 182
- Tashkent, 塔什干, 俄国占领塔什干, i. 87, 147
- Tchernaya, battle of, 切尔纳亚之战, i. 18
- Telegraph and telephones, need for, 需要电报机和电话机, ii. 143, 144, 162
- Te-li-ssu, 得利寺, 俄国在得利寺的惨败, i. 257, 258
- Territorial system, the, 地区制度, ii. 126
- Tieh-Ling, 铁岭, 从铁岭撤退, ii. 86
- Timber Company, the Royal: 皇家木材公司: 它的重要性, i. 169; 别佐布拉佐夫的建议, i. 172; 对它的调查, i. 173—184
- Totleben, General: 托德列本将军: 克里米亚战争, i. 21; 袭击普列夫纳, i. 26
- Togo, Admiral: 东乡海军上将: 旅顺海战, i. 238, 240
- Trans-Baikal Railway to Vladivostok, 外贝加尔湖至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 i. 69; 该铁路的运载量, i. 247—256
- Trans-Baikal Cossack, 外贝加尔哥萨克部队, 他们的胜利, ii. 153
- Triple Alliance, the, 三国同盟, i. 46, 51, 87, 113
- Trous de loup, 陷阱, i. 215, 216
- Trubetski, Prince, President of the Moscow nobility, 特鲁贝茨基, 亲王,

- 莫斯科市议会议长, 与库罗帕特金的通讯, ii. 198—200
- Tsitsihar, 齐齐哈尔, 攻占齐齐哈尔, i. 155
- Tsushima, 对马, 俄国舰队在对马的失败, i. 238—241
- Turkey, 土耳其, 土耳其与俄国, i. 3; 与俄国的战争, i. 6, 81—83; 它的军队, i. 15; 它的平时兵力, i. 15; 克里米亚战争, i. 16; 它与塞尔维亚和俄国的战争, i. 24; 普列夫纳, i. 25; 俄国的损失, i. 36; 给俄国造成麻烦的可能性, i. 58
- Turkomans 土库曼, 俄国远征土库曼, i. 30—32, 85, 86
- Ujin, Colonel, 尤金, 陆军上校, 他的驮载电话系统, ii. 143, 注
- Uniform, Value of, 军服的价值, ii. 100—103
- Units, 部队, 关于部队的细节的建议, ii. 161—163
- Ushakoff, Russian ironclad, 俄国乌沙科夫号铁甲舰, 在对马海面全部损失, i. 240
- Ussuri districts 乌苏里地区, 俄国吞并乌苏里地区, i. 35, 69, 200
- Vannovski, General, War Minister: 万诺夫斯基将军, 陆军大臣: 改善军队, i. 113; 库罗帕特金继任为陆军大臣, i. 115; 关于拨款, i. 117
- Velichko, Major-General, 陆军少将维利奇科, 旅顺的军备, i. 128
- Viceroyalty, establishment of the, 设立总督辖区, i. 187
- Vladivostok: 符拉迪沃斯托克: 外贝加尔铁路, i. 69; 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防御工事, i. 126, 148, 151, 200; 俄国舰队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i. 237; 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英勇出击, i. 239
- Vogak, Major-General, 沃加克少将, 旅顺会议, i. 180
- War Department, 陆军部(参阅 Army), 俄国陆军部面临的问题, i. 1—39; 军队的扩充和防御问题日益增加的复杂性, i. 78—96; 二十世纪的主要任务, i. 102—104; 感到意外, i. 105; 预算的程序和所拨款项的不充足, i. 116—122, 138, 139; 1905年9月做好了准备, i. 134; 五千四百英里长的交通线, i. 135; 财政大臣的双重权能, i. 139; 满洲问题和朝鲜问题, i. 145—198; 俄国失败的原因, i. 229—309, ii. 1—97; 改善军队的措施, ii. 98—176; 俄国失败原因的总结, ii. 177—204
- Wei-hai-wei, 威海卫, 日本占领威海卫, ii. 30
- Witgeft, Admiral, 维特杰夫特海军上将, 在进攻日本舰队时阵亡, i. 238
- Witte, Sergius de, Minister of Finance, 维特, 财政大臣, 维特与大连, i. 127, 172; 他的双重权能, i. 139; 他的影响, i. 171; 他与华俄道胜银行, i. 172; 他与满洲撤军, i. 173; 他与皇家木材公司, i. 173—184
- Yakub Beg, death of, 阿古柏之死, i. 92
- Yalu, 鸭绿江, 鸭绿江之战, i. 125, 257, ii. 38; 木材采伐特许权, i. 169—184; 在鸭绿江口的海上交战, i. 202
- Yellow Peril, the, a reality, 黄祸, 是一个现实, ii. 200
- Zarubaeff, General, 扎鲁巴耶夫将军, i. 303
- Zasulich, General, 扎苏利奇将军, 他的失败, ii. 38